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捷克〕 奥勃拉赫特著

无产者安娜

倪 亮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Иван Ольбрахт

АННА ПРОЛЕТАРКА

本书根据 И. Ольбрахт, Избр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1956 年版俄译本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无 产 者 安 娜

〔捷克〕伊凡·奥勃拉赫特 著

倪 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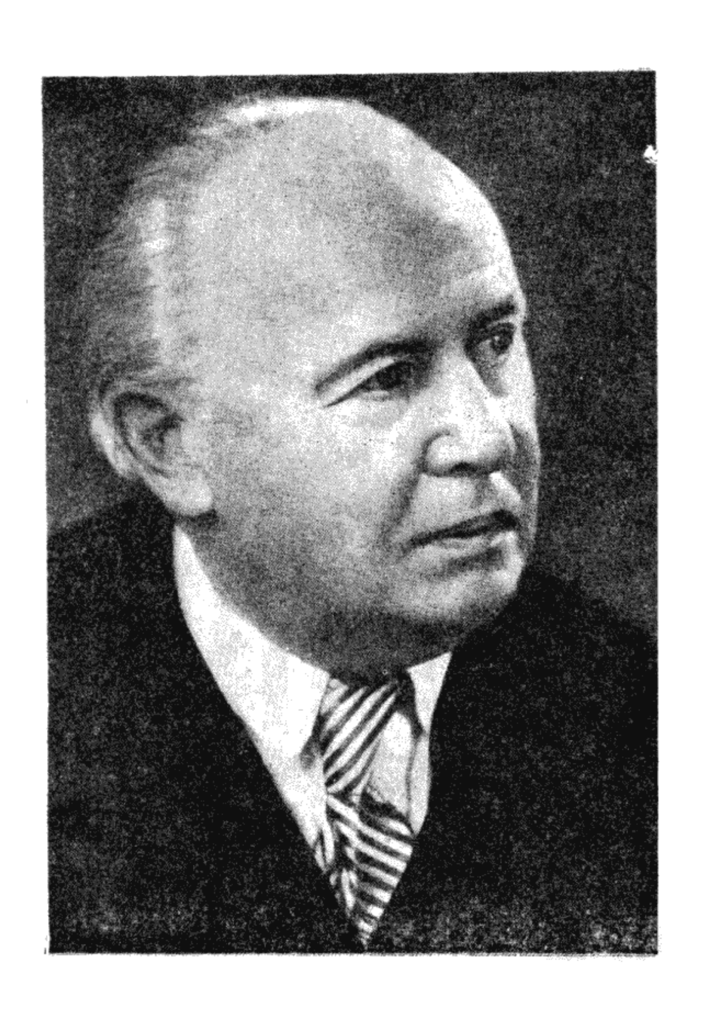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198,000

1982 年 4 月新 1 版 198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4,500 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281 定价：1.05 元



作 者 像

目　次

无产者安娜

（描写一九二〇年的长篇小说）

代　　序

《无产者安娜》这部长篇小说所描绘的是捷克在革命的一九二〇年所发生的情况。现在，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当我重新读它，并在修辞上（只是在修辞上）作若干修改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自己就是这部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老织布工奥乌葛腊勃卡，他也曾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回忆五十年以前的世界和工人运动。跟他一样，我看到：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内所经过的历程是多么惊人，——一切都在前进、前进！

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还在与大地主、国家民主党的银行家和工业巨头，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内的右翼分子作斗争——简言之，与奥地利的遗物——资产阶级民主制作斗争。当半封建的奥地利由于自身的腐朽，加上外部的冲击而灭亡以后，在它内部孕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按照一切历史和人类的规律，充当了它的继承者。但是，在祖辈死亡的时候，下一代的继承者，革命的无产阶级，已经在世界上出现，正在逐渐地成长起来，并且迟早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九二〇年，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发出了它那强有力的呼声。革命的捷克工人们仿效了自己的俄罗斯同志们的榜样，与过去的党① 划清了界线，并与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况在历史变革的进程中是常常会发生的），最后，建立了新的战斗的党，摆脱了过去政治上的妥协

性。

我的书所要叙述的就是上述的一切。以革命的一九二〇年为主题的还有一本小说——著名的诗人伊奥捷夫·高拉[②]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希望》。这两本书遭受到相同的命运：在旧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它们都不曾重版过；我的出版者将没有销售出去的《无产者安娜》通过旧书商减价卖掉。高拉的小说，就题材来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所写的都是关于布拉格和党内的情况；外国的读者几乎不能了解。《无产者安娜》有俄、乌克兰、日、德等文字的译本。希特勒上台以后，它和其他共产主义的书籍一起，被放在火堆上焚毁。

现在，当我体验到老织布工奥乌葛腊勃卡的心情、忆起了伊奥捷夫·高拉和当时的进步作家的时候，就暗自思忖：我们那时候已经想得多么准确啊！此刻，我想到这本书的主人公，头发金黄色的女仆安娜和柯耳卞工厂的翻砂工人东尼克，他们一定还活着，因为当时他们很年轻。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赤手空拳地并肩与武装警察作斗争。"前进，前进，东尼克和安娜！"就是在现在，我仍然用同样的话向他们呼唤："前进，前进，东尼克和安娜！"那时候，是希望他们在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中前进，而现在，则是希望他们在生活的建设中前进。

伊凡·奥勃拉赫特

一九四六年五月于布拉格

---

① "过去的党"，此处指的是捷克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滚到了改良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里。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捷克社会民主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资产阶级与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成了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俄译者

② 伊奥捷夫·高拉(1891—1945)，著名的捷克诗人，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艺术家。高拉的长篇小说《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俄译者

年轻的绅士

就在第一天晚上，女主人走到厨房里来找安娜。这一天早晨，安娜才从彼格尔齐莫夫附近自己的村子上布拉格来，手里捧着一只放置随身杂物的硬纸盒走出马萨里克车站。她象一头迷路的小狗似的惴惴不安地在热闹的街道上徘徊着，一边向路人打听怎样上伐兹拉夫广场三十三号那座房子去。

当女主人晚上走进厨房的时候，安娜在鲁别施的公馆里已经呆了五个钟头了，她熟悉了屋子里的七个房间和两个出入的门户，并且学会了点燃煤气、冲抽水马桶和用链条把大门锁上。

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束剪报。这位肥胖、威严、五十岁的太太停留在金黄色头发的女仆身旁，说道：

“你，安娜，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你不知道京城是个什么样儿。我根本就不雇用布拉格姑娘，因为她们个个都不走正道。在布拉格，你会处处碰到危险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要象做母亲那样预先警告你。我讲的话你也许不会相信，那么，就读一下这个吧！”于是，她就把剪报放在桌上，“仔仔细细地看一看吧！小姐马上就会来指点你怎样铺床，随后你把食具洗干净就可以去睡了。今天你不要拉上门上的链条，老爷在开会，回来很迟。好吧，上寝室去吧！”

达德拉小姐，十七岁的美丽的黑发姑娘，教会了安娜铺床。

“瞧，姑娘！这个放在这儿……这个呢，这样搞……枕头就

摆在这儿！把睡衣齐腰翻过面，放在被子上，这样就可以很快穿上身。瞧，就是这样子。每天晚上你要替妈放一杯水在床边的小台子上……喏，就是这个。等一下，现在别倒水，到快睡的时候再倒。要是你早上看见杯子里有象牙齿那样的东西，可别害怕啊，——这真的是牙齿。这里，在布拉格，比这还稀奇的东西多着呢！”

随后，她们就走到小姐的闺房里去。这里什么都是玫瑰色的——墙壁是玫瑰色的，家具是玫瑰色的，甚至那坐在角落里的玫瑰色小圈椅里的、褐色天鹅绒做的大熊儿的脖子上，也系着玫瑰色的带子。房间里发出浓郁的香水味。

“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是妈管的，但是这里是我的小天地，这儿是由我支配的；这就难搞多啦！嗯，仔细瞧瞧吧！瞧，得这样抖被子。睡衣放在这儿，头巾放在旁边，床边小台子上总得放着镜子和修指甲的用具……喏，就是这玩意儿。这是梳妆台，这儿是脸盆，懂得吗？好好儿记住香水瓶子、盒子和花瓶是怎样放的，明天再细心瞧瞧，今天你还有些摸不着头脑。要是你在收拾的时候把它们放错了位置，我会不高兴的！好啦，现在去吧，上帝保佑你……你叫安娜，是吧？”

“是的，小姐。”

“妈已经把这些讲基斯和朗得鲁的有趣的剪报给你了吧？”

安娜不了解这个问题，同时，瞧小姐的那副神气，使人摸不清她到底是在认真讲话还是在开玩笑。安娜发窘了。

“嗯，当然是给了的，”达德拉接着说，“它们放在那边厨房桌子上。我们这里每一个女仆都拿到这些剪报的。把它们看一遍——这真是绝好的读物，每个女仆看了以后，至少在两个星期之内，她们的行为会规规矩矩的。要是你看了报纸觉得胃痛的

话，那么早晨上我这儿来，我请你吃巧克力糖。”

在小姐那双乌溜溜的眼睛里，闪现着愉快的光芒。显然，这个新来的女仆，这个有着金黄色发辫、吃惊的目光、穿着袖子卷起的廉价衣服的乡下姑娘的那副窘样儿使她看了很开心。

达德拉小姐愉快而可爱地笑起来了，那样儿差不多就跟安娜自己和学校里的女同学们的笑容一样。

“要不要?”她用了安娜在乡下二年制学校里的女友的声调问安娜。

达德拉拉出床边小台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方块巧克力糖，拗下一块递给安娜。

“喏，拿去，好好过日子!”

“谢谢您!”安娜慌慌张张地大声说道。

“现在你可以走了，”达德拉最后说。

这时候，在安娜面前的已经不是学校里的女友，而是惯于支使仆人的小姐了。

当安娜在厨房里洗食具、把它们放在搁板上的时候，鲁别施建筑师太太又到厨房里来张望了三次。随后，安娜就上浴室旁的耳房里去睡了。这是一个极小的房间，三步见深，三步见阔，但是粉刷得很白，并且天花板下面还有电灯。狭小的、有铁栏杆拦着的窗子向楼梯开着。假如安娜不曾为她的所见所闻弄得茫然失措的话，她甚至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但是这一天的经历还不曾全部结束。

安娜坐在床上，遵照太太的吩咐，开始看起剪报来。这些都是讲女仆们被盗劫、欺骗、杀害的十分恐怖的血腥故事，看了使人不寒而栗。譬如，在巴黎，住着一个名叫朗得鲁的貌似美男子的恶魔，他诱骗女孩子到自己的别墅里，杀死她们，然后把她们

的身体切成小块，放在火炉里烧毁。安娜想象着这些赤裸裸的身子和血潭，潭里的血水一直流到门口；旁边站着眼睛里满布血丝的朗得鲁，在那儿恶狠狠地冷笑着，磨着刀……刀子在干燥的磨刀石上霍霍地响着，弄得安娜浑身打战。

安娜好象看到了火炉和火炉旁那个可怕的凶手。他全身照耀着火焰的红光，卷起袖子，把人的脚、手和头胡乱塞进炉子里……头发着了火，面颊烧焦了，骷髅对着她们所爱的人龇牙咧嘴……

在匈牙利的小镇青考特，住着一个名叫基斯的白铁匠。他用"文雅"的举止和谄媚奉承的手段骗取女人们的欢心。但是哪一个女的要是中了他的魔道，跨进了他家的门槛，她便要遭殃了：那个时候，白铁匠就变成了屠夫，他好似在屠宰场中对付绵羊似的抓住了那个姑娘，把她的喉管割断！他把受害者的尸体放在铁桶里，然后把这些桶子焊好，藏在地窖里，于是这个地窖就变成了没有十字架的可怖的墓地。

在布拉格也有着本地的朗得鲁和基斯，他们在伐兹拉夫广场和马萨里克车站窥伺着年轻的女郎，含着殷勤的笑容走到她们跟前，发誓说他爱她，并且答应娶她——但是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要杀害、抢劫这个不幸的人儿，或者，至少是把这些轻信的受害者的积蓄骗夺一空，弄得她们终身陷于不幸。

安娜坐在床上，专心地阅读着从《人民政治报》① 上剪下的片断，在她那浅蓝色眼睛里所含的恐怖并不亚于被白铁匠基斯杀害的情人。电灯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发着亮光，在它的照耀下，

---

① 《人民政治报》(«Народни политики»)，反映捷克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集团的利益的报纸，它支持国家民主党的政策。——俄译者

这个粉刷得洁白的狭窄的耳房，就象那被可怕的凶手朗得鲁所杀害的尸体一样的冰冷和死气沉沉。

安娜突然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恐惧。还在早晨，当她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下火车、腋下挟着硬纸盒在热闹的街上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恐惧的心情。但是此刻，她特别尖锐地感到了这一点。她怀念着自己的家，怀念着屋顶上有着漏洞的、用旧板箱以及保险公司和咖啡代用品工厂的广告牌补缀的温暖的屋子；她怀念着悦人的田间小路，那里她放牧过母亲的羊和邻人的牛；她怀念着故乡的白杨和有趣的篝火，在那些篝火旁边，她常常跟牧童们坐在一起，拿麻袋布遮盖着头。她开始可怜起她的母亲，她那酗酒的父亲和她的五个姊妹来了……

安娜一边解开鞋带，一边哭着脱衣服，泪水湿透了她的蓝底子印花布做的乡下衣服。她爬上床，把被子拉到头上，长久地叹息着。她感到异常的恐怖和忧郁，直到早晨都不曾睡着。

“喂，安娜，你把这些剪报都看过了吧？”早晨，女主人问道。

“看过了，”脸色苍白的安娜喃喃地答道。

建筑师太太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她的结实的胸脯在长袍底下起伏着。她把安娜昨天洗过的食具用手摸摸，然后瞧瞧自己的手指上有没有油腻。随后，她拉开又关上食橱的抽屉，看看灶头上的开关旋开多少，煤气烧得可合度。

“清洁比什么都重要，安娜，”她说道，“在我们这里，在布拉格，什么东西都不能打开放着，这里不比你们乡下：煤烟和灰尘很快就会积起来。现在，你马上把早饭给老爷端去；我会指点你怎样做的。九点钟光景，到小姐那儿去看看——问问她想什么时候吃早饭。要是她还想睡的话，不要弄醒她，走路轻一点。”

接着，女主人就转到最主要的话题上来了：

“那么，你已经看过不懂事的姑娘们被人勾引的故事了，”建筑师太太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要小心，安娜，要小心啊！你年纪轻，现在我预先警告你，这是我对你母亲应尽的义务。就在我们邻近，我们隔壁那一座房子里，也出过这样的事。后来，那姑娘就伤心得投河自尽了。诱拐她的人判了两年刑，并且结果还发现他已经第八次犯罪了。别跟我们这所房子里的仆人们打交道，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总之，最好跟谁都不要多罗唆。星期天吃过中饭你可以上教堂去，要是你喜欢看书的话，我们有着很多好书。最好还是坐在家里！那样你就不会出什么事了。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我会教给你很多东西，不但是家务——这是当然的事情，——同时还教你学文雅的举止。要找到象我们家那样的好地方是不容易的：老爷是出名的建筑师，我出身官宦门第。我的父亲从前做过市长。我谈这些并不是为了替自己吹嘘，而只是为了要你明白你是在怎么样的人家干活。你很快就会知道我的为人。我是慈善协会‘捷克之心’的副主席，在我，没有比行善更使我高兴的了。我爱人类，同时为了善良的人们爱我而自傲。要是你安份守己的话，我也会喜欢你的。你会呆在我们这里，就象呆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不喜欢换佣人，所以要是你肯听话、肯勤勤恳恳干活，你呆在我们这儿就再好没有了。”

这些话语对于熬受苦难的安娜的心灵就象香油一般。这种轻松而使人快慰的感觉她早已熟悉了：在家乡，在彼格尔齐莫夫教堂里布道的当儿，牧师把那盛着沸滚的树脂的锅子以及地狱里其他可怕的情状描绘完了以后，就在教区居民的眼前开启了天幕，在天幕后面，天堂在照耀着，人们可以听到天使的歌唱。此刻，安娜知道了，在布拉格不仅存在着那凡是行为不端和轻率的女仆都会堕落进去的有铁桶和赤热的炉子的地狱，并且还存在

着为勤劳和顺从的女仆们所设的永生的天堂。

“你明白了我的话，安娜，是不是？”太太温和地说，接着，用了较严厉的口气补充说：“要听话，不要去结交朋友。也不要跟那个看门女人往来。”

“不会的，太太，不会的！”怀着真诚的感激之情的安娜答道。

“好，那就对了！”建筑师太太说道，“可是已经七点啦，老爷马上就得起床了。快去买面包。面包铺就在隔壁那所房子里。说你是我们差去的，他们会给你所需要的一切。”

太太的警告完全是正确的，最近几天来，安娜已经深深地相信这个了。布拉格好似一所魔鬼的磨坊，它不停地旋转着，磨碾着，发出轧轧的声音。在这首都，每个人都会感到头晕，这儿的全部诱惑物只会给人带来苦恼。譬如说，你出神地瞪着在伐兹拉夫广场行进的一些巨大的广告瓶子，在瓶的下端移动着穿着裤子的双腿——这不过是一种玩意儿，使你看了不禁会噗哧一声笑出来！——可是，突然间，不知哪一个行人差点儿就会把你撞倒。当你站在橱窗旁边欣赏那穿着几乎长到膝盖的豪华胸衣的美艳而栩栩如生的人体模型时——突然就会有人把你手里装着土豆子的提包撞翻，而你只得在人行道上路人的脚下把它们捡起来。当你在大街上躲开一辆电车的当儿，保准就会有一辆汽车在你背后呜呜地大叫起来，你在这惊惶失措的当儿就会险些儿滚到迎面推来的小车底下。要是你听见：“瞎了眼吗？你这蠢货！”你心里还会高兴不曾碰上更坏的事情呢。太太的话不错：最好呆在家里。

而且，要是在仁慈的太太家里吃得饱、过得无忧无虑的话，干吗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呢。安娜吃的差不多跟主人们一样，而活儿的繁重也并不使她害怕——在家乡，她习惯于更艰苦的劳动。

太太很严厉，但是心肠好。她是慈善机关里的一员，凡是上她家要饭的没有一个会拿不到一杯咖啡和一块面包或剩余的菜饭的。贫苦的情景使建筑师太太感到衷心的不快。

"唉，世界上有多少苦恼！"她叹息着说。"多可怕的贫穷，亲爱的安娜！能够帮助别人，哪怕稍微减轻一点别人的痛苦，也是件乐事。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有财产可以帮助别人。这是我唯一的快乐。你自己看得出我的生活享受是多么少。只要有能力，我会分给别人更多的东西。想到人们也许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我的时候，我心里就高兴。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获得了独立，"她补充说，"所以，生活也许会变得好起来。但愿由战争所造成的苦难马上就会过去。"

安娜听着，垂下了眼睛，深深地被感动了。

服侍老爷是十分简便的。每天，他匆匆地在前室里出现四次，矮胖的身材，剃光的脑袋，蓄着短短的修整的灰胡子，上衣的翻领上佩着鹰章①。他对安娜并不吩咐什么，所有的家务都由太太料理。鲁别施清早就出去，晚上回来得很迟，只有午餐后才在家呆上一个钟头——看看报纸，稍稍抚爱一下达德拉小姐。显然，他喜欢她。但是他的爱抚总象是匆匆忙忙的，仿佛他老是在提醒自己：他实在没有工夫来搞这一套。鲁别施搂着女儿的肩头，望着她的眼睛，轻轻地、好象拍着马儿似的拍着她的背。

"嗯，怎么样，我的小马儿？"

他送她香水、花边、长袜子和绸子，但是他常常把这些礼物

---

① "鹰章"，"鹰"是一八六二年由米罗斯拉夫·特尔什所创立的群众性的爱国体育组织。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鹰"的军事化的队伍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核心，并且被捷克资产阶级所利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俄译者

忘记在自己的皮大衣的口袋里。有时，在吃饭的时候，他会突然记了起来，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来似的，瞅着女儿，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道：

“今天你爸爸赚到一笔小钱，买些什么东西给你呢？”

“最好给我钱，爸爸。”

父亲摇摇头。

“别向我要钱，孩子。钱这东西坏透了，你得会用它才行。好吧，给你些零钱，可是不多。为了补偿这一点，我什么时候给你带个王子来。”

“可是灰狐围领会给带来吗？”

他笑笑，点头表示允诺。

服侍小姐就没有象服侍男主人那样简便了。一提到内衣，她就变得十分吹毛求疵。她非常喜欢自己的东西，抚爱它们，亲昵地把它们称做——小衬衫，小裤儿，小长衣，小花边。她站在镜子前面，把自己喜爱的东西搂在怀里，温柔地抚摸它们，脸颊轻轻地在它们上面摩擦着，仿佛这些都是有生命的东西似的；要是别人马马虎虎地对付她的东西，或者把它们弄坏了的话，她就会受不了。可是就连小姐也没有坏心眼儿，她常常把烫得不平的胸衣扔到安娜面前，可是过了个把钟头，就会上厨房来请女仆吃巧克力糖或者甜杏仁。

“要不要？”她用了学校里女友的声调说道，“只是不要告诉妈，她又得说我把你惯坏了。”

但是达德拉不愿跟安娜吵架是有原因的。有时候，在晚上，当母亲上她的慈善机关开会的时候，达德拉就会在厨房里出现，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了漆皮鞋，戴着精致的帽子。

“我出去一会儿，找女朋友去。你可不要对妈讲，”她随随便

便地说了一句。小姐在母亲来到前半小时回到家里以后，便走到安娜跟前，黑眼睛鬼鬼祟祟地望着安娜："一句话都别对人提起，安娜！"她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又回转身来说，"我送你一件非常漂亮的衬衫。"

可是达德拉小姐并不是鲁别施唯一的后代。不久前，在这公馆的一间屋子里，曾经有人住过：当安娜刚到鲁别施家做活的时候，在这间屋子里还可以闻到男人的气息，有一股烟草和生发油的味儿；在床边的小台子上留着一小撮烟灰，放着《游戏和运动》杂志和一本翻开的《巴黎生活》。

这间屋子的神秘性吸引着安娜。

"这是谁的屋子，太太，靠近客厅的那一间？"有一次，她问女主人，那时候，女主人正站在厨房桌旁，往兔子里嵌猪油。

建筑师太太探索地望了安娜一眼。

"有教养的人不会问出这种话来的，要记住，安娜。有教养的人等着别人告诉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可是我没有理由对你隐瞒什么。这是我儿子契斯特米尔的房间，他出门了……在巴黎。"

建筑师太太突然丢开了活，开始不安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毫无目的地忽儿抓起这件东西，忽儿又抓起另一件东西，同时，执拗地避开安娜的目光。后来，她呆呆地望着窗外，从长袍里掏出手帕来擤鼻涕，接着就又弄起兔子来了。当安娜的眼睛从那盛着面粉团的钵子上抬起来的时候，她看到太太在那里哭。

安娜吓了一大跳。女主人发觉姑娘在望她。

"我有过两个儿子，安娜，"她开始说，"大的一个在战时没有了。老爷费了很大的力把他安插在维也纳的一个部里，感谢上帝，他可以不上前线了。当时我想：这真是天大的运气！不料他却死在那儿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已经是个建筑师了，"

两颗大大的泪珠沿着女主人的双颊滚下来。她重又掏出手帕。“生活是残酷的！可你倒是过得挺自在，安娜！而我却连一个可以诉苦的人都没有。丈夫老是没有空，女儿呢，我又不愿意让她年纪轻轻为着我的悲痛发愁。连一个可以诉苦的人都没有……”女主人重复着说，大声呜咽起来了。虽然兔子肉已经沾满了泪水，她那拿着嵌猪油的针和小块猪油的胖手还是不断地在干着活；她的这副模样，她那真切的痛苦和自我怜悯结合在一起的感情，引起了安娜的惊奇和怜悯。

如果安娜知道全部事实的话，她还会更怜悯她的女主人。但是当时，安娜还不知道：建筑师太太不仅为死在维也纳的儿子哭泣，并且也为了她的小儿子——契斯特米尔。还没有人告诉安娜，这个年轻人在三个月之内和从俄国逃亡来的柯伐列夫斯卡雅公爵小姐一起挥霍了一笔巨款，这笔钱足以维持安娜的父亲生前和他的儿女众多的一家温饱的生活。安娜还不曾知道契斯特米尔借用父亲的名义伪造期票，拿到了二十余万克朗之后，就跟华尔华拉·尼柯拉也芙娜一起，跑到德国去了，他父亲所雇用的私人密探目前正在那儿找他。安娜不知道建筑师太太流泪的原因不仅是为了她的两个儿子，同时也为了长女兹芹卡，她在大学舞会里爱上了一个贫穷的、患着肺病的大学生，当父亲坚决地说“不能”的时候，她同样坚决地说：“一定要！”兹芹卡挨了父亲一巴掌以后，不曾掉一滴眼泪，就在第二天带了自己的贵重首饰和存款折子跑到自己的爱人那儿，到他在萨札夫乡间做面包师的父亲家里去了。

兹芹卡已经到了成年，鲁别施的一些有权势的朋友们对他说：“我们很惋惜，建筑师先生，但是要用压力叫她回来是办不到了。”鲁别施想阻止女儿拿到折子上的存款，证明这些钱是他的，

但是机智的萨札夫地方的面包师们却能够发动本地的报纸和国家社会党的一个活动家来替这个富有的女继承人辩护。建筑师接到一份《中部捷克之声报》，上面登载着一篇讲到这件事经过的文章。在别聂萧夫他的一个建筑场的工人们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于是就把这个消息传遍了所有其他的工场，而伐兹拉夫广场三十三号房子的看门女人也同样把报上的这段消息告诉了住户。在安娜与女主人之间进行着我们以上所叙述的这段谈话的时候，兹芹卡的丈夫正在瑞士的达伏斯害着肺病，生命垂危，而他的年轻的妻子跟他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安娜到后来才知道。她压根儿不晓得每天早晨天一亮，女主人就从床上爬起来，在那只放在床边小台子上的丈夫的皮夹子里摸索，从里面偷偷地拿走一张五十克朗或二十克朗的钞票，为了要把这些钱积到相当的数目以后寄往达伏斯，接济那个命在旦夕的女婿，而这位女婿她只在那个跳舞会里见过一面。

是的，安娜的女主人并不幸福。甚至她唯一的慰藉——慈善事业也并没有时常带给她所期望的满足。

安娜记得一次可怕的情景。

有一天，她在厨房里做饭，女主人在客厅里抹灰尘。门铃响了，安娜跑出去开门。

在她面前站着一个穿得很褴褛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包东西。

“鲁别施太太在家吗？”她用发抖的声音说。

“在家，有什么事要转告她吗？”

但是那个陌生女人把门一推，走过安娜身旁，径往前室去了。她一扇扇的打开门，朝房门内张望。安娜紧跟在她后面。

“婶子，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安娜抓住了那女人的袖子，着

急地低声说，但是那个女人已经走到客厅里与女主人面对面地碰上了。

“您是不是鲁别施太太？”

“您要什么？您有什么事？”女主人严厉地问。

“我马上就会告诉您我要的是什么。”陌生女人竭力要想说得镇静，可是看来，她激动得很厉害。“您从‘捷克之心’送给我的几条裤子和两棵卷心菜在这里。把它们拿回去吧！”她把包裹放在桌上；它散了开来。安娜看见主人的旧裤子和两棵卷心菜。陌生女人把这些东西都推给女主人：

“去您的慈善事业！我要对您说的就是这个。”在那个女人的声音里含着愤恨。

女主人的脸色发白了。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布施，我们要拿到自己该得的一份！”女人叫喊着。“您可知道我的丈夫是谁？他在您丈夫和您公公手里做了三十五年的泥水匠。而现在您的丈夫却把他扔到街上，因为他老了，不中用了，又害上风湿病，变成了跛子，因为从他身上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榨取了！保险处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付给他，一星期前他拐着腿上你们的工场去，您的丈夫吩咐警察把他撵走。瞧瞧我，您这个女施主！”女人卷起袖子，露出了干枯的手臂，那手臂上一点肌肉都没有——只剩下皮包骨头。

“这也是从你们的工场里得来的残疾，为了这个病，我每月拿到三十三个克朗的津贴！可是除了这些钱以外，我还能挣到多少呢？我们快要饿死了！想想看，几条旧裤子可以抵偿这一切吗？您同您的男人巧妙地分扮着两个角色：他拚命地榨我们的血汗，而您呢，送我们几条裤子来遮掩一下我们赤裸的身子！”

“您在这儿干什么？”建筑师太太结结巴巴地反复说，“我不

认识您，也不曾送您这些裤子，这是‘捷克之心’送您的。您干吗对我说这些话？我知道这种事都是可怕的，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建筑师太太拚命忍住了眼泪。

“跟您有什么关系？”女人叫道，在她的凹陷的双颊上现出鲜红的斑点。“可是您的这些客厅里的陈设都是从哪儿来的？您的整个公馆里满是香水的味道！您的儿子哪儿来的钱同那些婊子们吃喝玩乐？当然啦，跟您是不相干的？”她叫道，讥讽地笑着，“当然，跟您不相干！”她轻蔑地重复说。“可是您想您丈夫榨取我们的血汗是为谁呢？为自己吗？我们已经认识他三十五年了，太太；我们知道他怎样生活，怎样穿着，怎样吃喝。他花在女人身上的钱并不多，——因为他领了工厂里的女工上自己的办公室里去，代价是每小时加她们五毛钱。他榨取我们的血汗就是为了您啊！”

那女人朝客厅里环顾了一下，她的眼睛宛如两具喷火器。

“喏，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这些！”她指着沙发、安乐椅、小雕像和画像叫道。“为了您，为了您！”她向建筑师太太走去，后者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一步步向钢琴那边后退。“这些东西是用谁的力气得来的？是我和我丈夫的！是用了我们的钱得来的！这是我丈夫的血，我的奶汁！”她捶着自己平坦的胸膛，“就是从这个胸膛里我挤出了奶汁，不给亲生的孩子吃，为的是要使你们发胖！”

“请您别讲了……”建筑师太太喃喃地说。“求您别讲了……真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连认都不认识您。”

女人开始猛烈地咳呛起来。

惊慌失措的安娜轻轻地扯着她的袖子：

“婶子，求您……”

“请别为我发胖而责怪我，”建筑师太太说道，“请相信我，这使我很苦恼。我想尽法子要自己变瘦，吃得很少，这一点安娜可以作证……”

女人的咳嗽声转为断断续续的痉挛性的笑声，随后又变成一阵剧烈的咳嗽。那女人喘息着，胸口嘘嘘发响。

安娜还是扯着她的袖口：

“婶子，求您……”

“好吧，姑娘，”那个女人用疲乏的声音说道。“你的那个女主人真是个蠢货！我对她说的话她一句都不懂。她真的相信跟自己不相干……她还想上卡罗维发利去治胖病呢！瞧她的心肠多好！她跟她丈夫俩的角色扮得真不错！”

她走到桌子跟前，从裤子和卷心菜底下抽出那刚才把它们包裹起来的头巾。裤子留在桌子上，两棵卷心菜却滚落在毛茸茸的地毯上了。

女人向大门走去，到了门口又转过头来，威胁地挥挥拳头，声调非常坚决地说：

“我们的儿子已经十五岁了。总有一天他会替我们报仇的！”

“婶子，求求您！”安娜喃喃地说。

但是，已经用不着恳求这个疲惫的泥水匠老婆了。安娜在她身后锁上门，回到客厅，想从那儿把旧裤子和卷心菜拿走。女主人站在屋子中央，面色苍白得跟角落里沙发旁边的石膏像一样，呆呆地望着前面，她的目光里含着怜悯、委屈、羞耻和愤怒。

安娜走到厨房里。她也一样脸色苍白，浑身打战，没有心思做活；她想哭。女主人是多么委屈地被侮辱了啊！安娜替那个陌生女人害羞。但是，就连对那个女人，安娜也说不出什么尖刻的话语。因为安娜明白：当一个泥水匠没有活做、铺子老板甚至

连一点碎米都不肯赊给他的时候，他的一家就会过怎样的日子。但是，世界上有贫穷，有残废的泥水匠们以及他们的陷于绝望的妻子，这难道是女主人的罪过吗？这一切多么叫人难过啊！住在这个名叫布拉格的巴比伦，① 真是痛苦！在自己家里，在故乡，生活就要轻松和简单多了。

前室里的锁儿嗒的一响，接着是砰的一下关门声。达德拉小姐朝厨房里张了一张。她正上完英文课回来。

"妈在哪儿？"

"在客厅，小姐，"安娜慌慌张张地说。

达德拉走到客厅里。母亲连口也不开，于是，她又回到厨房来。

"又出了什么事啦？"她叫道。

"唉，我的天，小姐……"安娜抱住头，说道。她到现在才找到了话语，于是她就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达德拉。

小姐冲到客厅里。

"丢开你这种愚蠢的慈善事业！"她叫道，"我对你讲过多少次了！它有什么好处？只有烦恼和忘恩负义罢了。为什么你们不撵走那个女人？为什么不去叫警察？我马上打电话给爸爸，让他吩咐马上把她抓起来。他一定打听得出她是什么人！已经对你说过一百遍了：找一个侍女吧！你还有什么可以指望安娜的，这条乡下母牛！我们过得跟店铺里的老板一样，我们的屋子就象院子的过道，连随便什么泥水匠的老婆都可以闯进客厅来。瞧你那一文不值的仁慈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你那节省佣人开支的愚蠢念头又得到什么结果！"

---

① 巴比伦，古代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为古代亚洲西部著名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此处喻布拉格的繁华。

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弄得石灰也撒落下来。她走进父亲的书房，在那里打电话给他，随后，就朝自己的玫瑰色的寝室走去，同样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安娜，你瞧，人们是怎样来感谢我的善意，感谢主人给他们工作做的，”第二天，太太在做饭的时候说道。在她的声音里含着悲怆的调子。“这个女人讲的都不是真事。假如我丈夫赚到什么钱的话，那并不是靠了他们的劳动，而是从公家的定货上赚来的。他们做的活只会弄到亏损！”

安娜默不作声。

“你不常常碰到德伏尔查企哈① 吧？”

“不，太太。”

“四层楼上的玛馨娜呢？”

“也不，太太。”

德伏尔查柯娃是看门女人，玛馨娜是住在他们楼上那一家的佣人。安娜在院子和店铺里看见过她好几次。玛馨娜是个活泼机灵的姑娘。她经常在面包铺子里跟别的佣人们开玩笑：把一个人的围裙带子和另外一个的结起来，悄悄地用草茎撩她们的脖子；姑娘们搔着痒，慌张失措地左顾右盼，弄得全铺子的人都哈哈大笑。老实说，安娜听见玛馨娜的声音比看见她的时候多：每当早晨，这两个女仆便打开窗户，各自收拾屋子，在打扫的时候，玛馨娜通常总是哼着歌儿。全院子都可以听到她的曲子——《鹬》、《橡树叶》和《里卞桥》。玛馨娜唱给全房子的人听，并且显然，她希望自己的歌声经过每所房子的屋顶传遍整个伐兹拉夫广场，传遍整个布拉格。安娜藏在门帘后面听。她微笑

① 德伏尔查柯娃的昵称。

着，心里也同样地感到愉快。她甚至还跟着哼《里卞桥》这支歌。走下楼梯的时候，玛馨娜平常总是三步一跨，假如她跟谁聊天的话，她的笑声就会传遍整个前门。

“这又是四层楼的那个女疯子，”建筑师太太说，这时候，玛馨娜正一阵风似的跑过她的门口。看门女人德伏尔查柯娃听见了响声，就从自己的耳房里跑了出来：

“这又是什么声音来着！”

但是，看见了玛馨娜，她软下来了，只装做生气的样子说：

“啊哈，你这个轻佻丫头！瞧我请你吃几下拖把！”

她抓住拖把，朝姑娘打去。玛馨娜尖声叫起来，两手叉着腰，大笑着跑到街上去了。

有一天早晨，安娜出去买东西，在楼梯口碰见了玛馨娜。玛馨娜向她走来，并且对她和气地微微一笑。

“怎么啦，你这个金黄头发的姑娘，整天跟你那老婆子呆在家里？咱们去找几个年轻小伙子出去溜达溜达吧！”

安娜涨红脸，垂下了眼帘。玛馨娜笑起来了。

“说真的，你们那位少爷还不曾找到吗？”她问道，“他是一个道地的花花公子，哎唷！……聂黑列波娃责骂你那老婆子的时候，她说了些什么话？你知道聂黑列波娃是谁？就是那个带着裤子和卷心菜来的女人。干吗你的眼睛睁得圆滚滚的？我和德伏尔查柯娃什么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我的亲爱的！”

安娜感到自己好象站在赤热的煤炭上似的。玛馨娜越是笑得起劲，安娜的脸就涨得越红。

玛馨娜并没有等她的回答就跑下楼去了。她在下面站住，笑嘻嘻地看了一眼还是站在原地不动的安娜：

“你啊，我看还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傻瓜！”她叫道，笑得浑身

扭曲起来。

到现在为止，安娜还不曾跟任何人往来或交谈过。“您的头发多漂亮啊，姑娘！”当她在宪夫洛克酒店买吃晚饭时用的一公升黑啤酒的时候，有人这样对她说。但是安娜低垂着眼帘，对于所有的问话和戏言总是一字不答。“瞧，这姑娘多神气！”穿着白上衣的堂倌接过了她的啤酒杯子，开玩笑说。如果大门口等着年轻的小伙子想跟她结识，向她随便说一句“您那么急着上哪儿去？”之类的话，安娜就会把头缩到肩膀中间，很快的跑走，弄得酒杯里的泡沫泼在她的围裙上。除开买东西以外，她什么地方都不去。出去干吗呢？从早晨六点起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或者十点，她巴不得赶快躺在床上，一觉睡到早晨，当女主人开了耳房的门，象唱歌一样地叫着“安娜！”的时候，她才醒来。敲门或者从门外叫安娜是没有用的，有时候，甚至一定得推推她的肩膀说：“喂，安娜，是起来的时候了，听见没有！”

每逢星期天吃过中饭以后，女主人就拿书给安娜看。这些书里所写的是关于胡斯战争①的故事、古老的捷克传说以及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列翁·克里夫东和尼克·卡尔吉耳的短篇小说。安娜看了很多侦探小说以后，许久睡不着觉，好几次从床上起来看看大门是否关好。在主人的书库里，还有一本奇妙的书——描写春天、湖上月色以及心灵之甜蜜哀愁的诗歌。这些诗歌唤起了安娜的回忆：她想起那长满薄荷的田间小路，那住着她的五个姊妹的、屋顶补缀的小屋。在安娜替主人买雪茄烟的烟铺子里，她买了一些明信片，上面印着湖上落日的景色，那反映在湖上的太阳好象是真的金子做的，安娜在这些明信片上抄下

① 胡斯战争，一四一九至一四三四年间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捷克爱国者胡斯而得名。参见本书第43页注。

了那本书里面的四行诗，把它们寄给自己的姊妹和乡间的女友。她还想把自己的生活写得稍微夸张一些。

达德拉小姐也有书，她把它们跟衬衫一起放在柜子里。

“丢开这些小孩儿看的童话，安娜，”有一次，她说，“我给你本好看一点的。只是对妈一句别提起，她不在家的时候你才可以看。”

达德拉的书完全跟女主人的不同：在这些书里面有着许多描绘着风雅的男子和半裸体妇人的图画。当安娜第一次翻阅这类书的时候，她甚至脸红起来。但是她开始读了以后，就相信这类书比起那些描写胡斯战争及侦探们冒险行为的读物来有趣得多了。安娜读了这些小说以后，有时甚至还感到头晕。她用手抚摸着她那发烧的脸颊，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打开了窗子，想使自己清醒一下。有一本书里绘着一幅漂亮的图画：穿得很雅致的先生搂抱着一位太太，男的是钢铁大王的儿子，女的是老公爵的夫人。这个妇人只穿一件衬衣和镶着花边的衬裤，左肩上的背带滑了下来，露出了乳房。图画下面写着：“‘我爱你，爱你！’乔哼着说，把她紧搂在自己有力的胸怀里。”

安娜时常久久地注视着这幅图画。在她那浅蓝色的眼睛里，含着梦想的神情。是否也会有人把她，安娜，紧搂在有力的胸怀里，是否她也会听到呻吟似的话语：“爱你，我爱你！”

安娜坐在厨房桌子和食具冲洗盆之间的一张凳子上，在电线拉得低低的电灯下，沉思地凝视着前面。书里的图画不知怎的使她想起了那个弥漫着生发油和烟草气味、充满了神秘性的少爷的房间。少爷会不会来？乔会不会来呢？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他了。

而他竟然来了。难道这不是梦，这真的是他在按门铃吗？她很快就认出了他，而她的心就猛烈地跳动起来了。他站在她前面，站在外室的草垫上，穿着灰色的外套，戴着软帽，手上戴着美国手套，足上穿着时髦的皮鞋。他站在那里，年轻、漂亮，长着一张逗人喜欢的、苍白的脸孔，在他的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底下有着淡淡的一圈青晕。在他后面彬彬有礼地呆立着两个上了年纪的先生。

"妈在家吗？我是契斯特米尔·鲁别施。你是不是新来的佣人？"

他的声调稳定而清晰。

"家里没有人。小姐跟太太上街去了。"安娜结结巴巴地说。

"Bitte，"① 契斯特米尔说道，转身向着自己的同伴们，然后径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同伴们跟随着他。

"妈回来的时候，"他对安娜说道，连看都没有朝她看一眼，"告诉她说我回来了。"

接着，他就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了。

安娜仍旧站在前室里。契斯特米尔的出现就跟奇迹一样，好象灿烂的云彩突然降落到房子里来似的。安娜瞧着那条少爷走过的红地毯，她仿佛觉得在这条地毯上有着一根银色的线一直伸展到他房间的锁孔里。

在厨房里盛着油腻的热水的冲洗盆里有着吃过的食具等着她去洗。于是她就动手干活了。但是在她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的半个钟点内，她总是心不在焉，好几次走到前室里去张望少爷的房门有没有开，他是否会跑出来吩咐她做些什么。同时，每次

---

① 德文，意即：请。

她的心总是扑通扑通地跳着。

后来锁儿嗒的一响，达德拉手里满满地捧着一包包买来的东西走了进来。安娜迎着她走去。

“小姐，少爷回来了！”她低声说。

“哪一个少爷？”

“契斯特米尔先生。”

达德拉不知怎的古怪地眯细着眼睛，掉开了目光，一言不发地上她的玫瑰色的闺房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建筑师太太回来了。

“太太，契斯特米尔先生来了。”安娜快活地报告说。

“他在哪里，在哪里？”太太叫了起来。她睁大了眼睛，她的憔悴的脸面突然变得年轻了，甚至还因双颊泛起了红晕而显得漂亮了一些。

“在自己房间里，太太。还有两位先生跟他在一起。”

女主人把小包都丢在安娜的手里，急急地跑向儿子的房间。她按了按门把手，但是门已上了锁。母亲敲着门。

“米烈克，米罗奇卡，① 开门！是我，是妈妈！”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好象一个在恋爱中的女人。

门开了，女主人倒在儿子的怀里。

“米罗奇卡！”她狂喜地叫着。

过了一会儿，达德拉从厨房旁边走过，她已经匆忙地换上衣服，梳洗好了。她也敲着兄弟的门。

“嗳，米烈克，开门，你这个荡子！”她用了装模作样的快活的声调喊道。

---

① 米烈克和米罗奇卡都是契斯特米尔的小名。

她走到房间里，只同他打了个招呼，就径往书房里打电话给父亲去了。

女主人飞也似地跑到厨房里。平常她总是慢吞吞地一步步地拖着，而此刻却象女孩子似的奔跑了。

"安娜，你知道他还一点东西都不曾吃过呢！"她低声通知安娜说，显然她为此而深深地感到不安。"他一清早就上路了！赶快，安娜，请快一点！不要让他等到吃晚饭！跑到肉店里去买一些牛排来，要三块鲜嫩的，随后上恰箕耳铺子里买一罐龙虾，契斯特米尔很喜欢吃的。还有蛋黄酱。拿个瓦罐子去装。买一瓶葡萄酒，少爷是不吃啤酒的。恰箕耳铺子里的人知道需要什么酒。只是请你快一点，使劲跑。"

安娜飞快地跑去。

当她喘着气、买了东西回来的时候，女主人正在熬牛油，煎土豆子，一边切着葱。

"好的，好的，安娜。现在到少爷房里去摆好桌子。三副刀叉！还要替那两位跟他来的先生去买些啤酒来。"

"就去，太太！"安娜红着脸说。她带着剧烈跳动的心走向契斯特米尔的房门，一抓住门把手，就感到自己的两腿发软。

房里灯光通明，整个屋子里弥漫着烟味。少爷躺在沙发上吸烟，眼睛望着天花板，往那放在自己手下的装满了烟蒂头的中国烟灰缸里弹着烟灰。他穿着一件家常穿的黑色绸上衣，足上穿着一双便鞋。他并没有注意走进来的安娜。他的同伴中的一个在桌旁看书。另外一个站在衣橱旁边厚颜无耻地打量着安娜。

安娜在桌上铺着台布，目不转睛地望着少爷。老天爷，他长得多漂亮！他的脸色多么苍白，多么忧郁啊！安娜渴望着他能望她一眼，即使一秒钟也好。她的这种强烈的渴望甚至使她战

栗起来。但是少爷却牢牢地盯着天花板，他那乌黑的眼睛是那么忧郁，使人一望而知：他正在萦念着远方，某种凄凉而美丽的东西正在他的心头显现。

安娜放好盘子，摆上银食具和餐巾，心里思忖着："他会不会朝我看？要是对我看，那怎么办呢？"但是少爷并没有看她。只有那个站在衣橱旁边的外国人却死命盯着安娜。她看到他有着一副又阴郁又粗鲁的脸相。

随后女主人走了进来。

主人让大家等了很多时候，他到傍晚才回来，虽然比往常回来得早一些，到家后，他就一直走到书房里。过了一会儿，他揿铃叫安娜。

"太太在哪里？"

"在契斯特米尔先生屋里。"

"小姐呢？"

"在自己房里。"

"叫她上这儿来。"

主人跟往常一样的庄重和严厉。

达德拉小姐走到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交谈了一会儿。后来小姐走出书房，敲了契斯特米尔的房门，把德国人中的一个叫出来，带他上书房去。她回到自己玫瑰色的寝室以后，就把那只天鹅绒做的熊儿放在桌上，开始在它的脖子上结上玫瑰色的带子，带着过分的注意力，摘着这个玩意儿。

主人和德国人谈了很久。他们谈完话以后，德国人就把自己的同伴叫到前室里，他们商议了一些事情，随后，他们中间的一个便穿上大衣，把帽子低低地拉到眼睛上面，走出了屋子，而另一个便回到契斯特米尔的房间里。

吃晚饭的时候，空气忧郁而沉静。大家在饭厅里吃饭；坐在饭桌旁的只有父母亲和达德拉。女主人的脸色还是绯红，甚至也许比先前更红，但是她眼里的快活的光辉已经消失；在丈夫面前不得不掩盖起自己的快乐。

吃过晚饭以后，安娜替契斯特米尔铺好床，又为德国人在沙发上放好被褥。女主人早又在儿子的房里了。她坐在桌旁，把自己胖胖的手放在契斯特米尔纤细而好看的手上，温柔地瞧着他的眼睛。安娜一走进去，他们便停止了谈话，久久地沉默着——很明显，他们不愿意在她面前谈话。德国人在旁边坐着看书，他不懂得捷克话，所以对于一切都不留意。别人也同样没有留意到他。安娜很厌恶他；为什么他要呆在这里？他明明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另外一个德国人走了，想来是在旅馆里过夜。

安娜洗好食具便去睡了。但是她睡不着。少爷面临着危机，在这屋里正在发生某种神秘而不愉快的事情，少爷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安娜却躺在这里，躺在耳房里，眼睛瞧着天花板，看不到他。无论在这里，或者在自己家里，假如有什么事情需要安娜去做的话，她总是乐意去做的。人家对她说："去做！"她就去做了。但是现在却一个人都没有叫她去帮忙。这儿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主人的寝室里没有熄灯？安娜晚上有好几次起来稍稍打开耳房的门。每一次，她都看见寝室里点着灯；光线透过钥匙孔，黄色的斑点投在外室的墙壁上。这种活生生的、但是又静止不动的斑点就象整个屋子的气氛一样，是种不祥的征兆。少爷正需要帮助！是的，他需要帮助，就跟安娜的小妹妹们在生病时需要她帮助一样，那时候，在安娜的家里，整夜都点着煤油灯，安娜把冰冷的湿布放在孩子发烧的额头上。今天别人却拒绝了

她的帮助。为什么呢？在少爷的眼睛里含着多少忧愁和苦恼。安娜想着这双眼睛就想哭，因为她已经爱上他了……

早上，她听到门嘎吱一声打开了，就从床上跳了起来。天哪，今天女主人的脸色多么难看！又苍白，又憔悴，两只眼睛红红的，没有一点神。

“到伏箕奇考夫街别尔格糖食店买些杏仁饼干来，”她吩咐道，眼睛没有瞧安娜。

安娜走出屋子，在下面大门口看门女人的那间耳房旁边，站着德伏尔查柯娃和玛馨娜；玛馨娜的手中拿了一个装粮食的提袋。玛馨娜一看到安娜，就赶忙朝她走去，显然，她在等着她的新相识。

“你们的米烈克回来了，是吗？”她劈头就问。

“是的，”安娜低声说。

“还有两个——这是柏林的侦探吧？”

安娜耸了耸肩膀。她记起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尼克·卡尔吉耳和列翁·克里夫东。

“没错，当然是侦探哪！”玛馨娜说道，“一看就知道是包打听。”

“侦探？”安娜低声说。

“你难道不知道人家已经找了他四个月了吗？”

“不知道。”

“你连米烈克偷走了你们老头子二十万克朗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嘘！”玛馨娜短促地打了个唿哨，“这样说来，你压根儿什么都不知道，你真是个傻瓜！可是昨天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

安娜讲了一点她所知道的事情，而玛馨娜时时提出许多问

题来打断她的话语。她很想知道全部的详情细节。

“哦，”她最后说道，“原来是这样！”随后，她惊奇地补充道：“这样说来，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鲁别施少爷小姐们的事儿吗？全布拉格都在谈论他们，报上也登过他们的事情——只有你还蒙在鼓里！啊，这些米烈克和费尔达都是大胆的小子，他们能够把整个布拉格弄得天翻地覆！米烈克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搞得一个住在这里维诺格腊特的女人怀了孕。这两个宝贝儿子使得做爸爸的花了很多钞票。哦，这个契斯特米尔又是个色鬼！有一次，他还挨过我一巴掌呢，就在这儿楼梯上。”玛馨娜笑起来了。“走吧，我陪你去。”

安娜糊里糊涂地走着，而玛馨娜却为那新奇的事件弄得兴奋起来。

“我们这所房子是你女主人的。只要有机会，她就把它当作抵押品向别人借钱。后来，建筑师得知了这件事，大发脾气，之后，米烈克就不能再胡闹了。在维也纳的费尔达，手头倒比较宽裕些，家里寄了钱给他，他就在那儿跟一些军官们大吃大喝。而米烈克却负上了债。他在那时刚巧爱上了一个俄国的公爵小姐。我们知道这些人在这儿个个都是公爵小姐呢！我见过她一次，那是当他们在里昂商场附近下汽车的时候。好个骚娘儿！喔，他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啊！当妈妈手头已经一个子儿都不剩的时候，他就假造了一张有父亲签名的期票，拿了二十万克朗便赶紧溜掉了。你们的那个老头子请教了私人的侦探机关‘眼线’，那个机关打听到契斯特米尔和公爵小姐跑到德国去了。那个时候，做父亲的便开始派人上柏林去探寻了。”

姑娘们已经走到伏箕奇考夫街上的糖果店，在门口站住了。

“那么，他们把他抓住了？”安娜吃惊地说。

“你怎的!”玛馨娜说道，“难道私人侦探可以抓人吗？只有警察才有权可以这样做。”

“那么,干吗他同他们一起回家呢？”

“干吗一起回来！你还问呢！你以为我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吗？大概是他们在他早晨还跟自己的公爵小姐一起睡着的时候,跑到他那儿去,说道:‘小伙子,请跟我们一起上布拉格去吧,要不，我们就要报告本地的警察局说你偷走了你爸爸二十万克朗。’这样一来,他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儿？”

“那么公爵小姐呢？”

“你倒在担心这种事情呢!”玛馨娜生气地说，“大概她总哭过一场，为的是钱没有了，她不得不重新再到酒吧间里去做女招待。”

安娜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起来了。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玛馨卡？”

“别叫我玛馨卡，我是曼尼雅。现在会怎么样？啊，我亲爱的,”曼尼雅拖长了声音说,“事情可弄糟啦！他们倒不会叫他去坐牢的……等一等，我好象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她扬起了眉毛，用神秘的声调轻声说:“他们会把米烈克送到美国去！有钱人对付他们的荡子们总是这样做的。侦探还在你们那儿吗？那么，我可以拿性命来担保，他们一定会把米烈克送到美国去的!这两个人会带他到汉堡，替他买了船票，送上轮船——接着是:‘再见吧，孩子，到了那里，替我问候美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吧!’告诉你,安娜,事情就会这样的!”

安娜站在人行道上,呆呆地瞧着前面,没留意到行人们正在推挤着她。

“你是替米烈克去买点心的吧？嗯,走吧,傻瓜，要不，你的

老婆子又要骂人了。我也要走了。再见！明天我再在大门口等你。”

安娜买好了杏仁饼干，飞也似地奔到家里。主人还在家，她把早饭替他端到饭厅里，随后又替契斯特米尔送了两杯咖啡和一些饼干到他房里。

少爷还不曾起身。侦探在椅子上坐着。并不是带书来的、在这里过夜的那一个，而是昨晚上站在衣橱旁讨厌地盯着安娜的一个。契斯特米尔穿着条纹的绸睡衣躺在床上吸烟。他漂亮极了。他依旧哀愁地凝视着天花板。

安娜把早饭放在床边的小台子上，向少爷望了一眼。“他大概想起了自己的公爵小姐，”她怜悯地想道。“俄国的公爵小姐！但是为什么就不让他喜欢她，为什么不准他到公爵小姐那儿去呢？他的父母明明很有钱，可以让他这样做的。那样，事情就会变得多简单！可怜的小主人！”

这个时候，契斯特米尔向她投了一瞥。他的大眼睛的视线停留在她的金黄色的头发上，然后溜到她的胸脯上。他的嘴唇上浮现着某种仿佛难以捉摸的微笑。

安娜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了，血液向她的头脑里冲去，一阵寒颤流过她的背脊。少爷在对她微笑呢！安娜想走过去，握住他的手说：“告诉我怎样才能使您高兴？唉，请告诉我吧！我会替您做好你所想望的一切！”

但是少爷重又凝视着天花板，安娜的心也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在她端咖啡给侦探的时候，她想道：“哼，你这个恶棍，我会马上走到厨房里，拿了大刀刺进你的喉管，要是这样做对少爷有好处的话！”

她不想离开这个屋子。走到门口，她又朝契斯特米尔望了一眼。但是他已经不在看她了。他那长长的、白晰的手指间夹着烟卷，正把烟灰弹到中国烟灰缸里去。

随后安娜就开始收拾屋子，但是她的头脑里还撇不下对于契斯特米尔的想念。她打开了窗子，微风吹拂着门帘。她听得到四层楼上曼尼雅在唱《橡树叶》那支歌。只有安娜一个人在屋子里。建筑师已经出去了，而奇怪的是女主人也不在家。

安娜苦苦地思索着，但是总想不透：太太这样早会上哪儿去呢？

在收拾客厅的时候，她突然站住了。她好象觉得在房子深处的小房间里传来一种声音，那声音是那么古怪，如果安娜站在黑暗里的话，她准会被它弄得害怕起来。她打开房门，吓了一大跳：女主人俯伏在地板上，额角撞击着地毯，发出一种喑哑的、活象从坟墓里面发出来似的呻吟声：“呜……呜！”

惊惶失措的安娜弯着身子问她：

“太太！啊，我的天，太太！”

建筑师太太抬起了疲乏的眼睛望着她。她的苍白而萎靡的脸面就象死人那样可怕，她的散乱、灰白的头发已经失去了光泽，带着脏烟灰似的颜色。

“他是铁石心肠……铁石心肠……”她反复说，同时，沉重地叹息着，用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瞧着安娜。

“我的天！太太，醒一醒吧，我这就去叫小姐来。”

太太清醒过来了。她吃力地撑起自己肥胖的身子，站了起来。

“不，不，不要去喊达德洛契卡！①”

① 达德拉之爱称。

她勉强走到躺椅跟前，沉重地倒在椅子里，弄得弹簧发出了轧轧的声响。

“他是铁石心肠……他是铁石心肠，安娜！”

安娜懂得这些话语是针对着建筑师讲的。她感到害怕起来，站在女主人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

“去干活吧，安娜，”建筑师太太疲乏地低声说，“不要为我担心。你是个好姑娘，安娜……”

安娜走了出去。

过后，在鲁别施的屋子里，突然异常地忙碌起来，但是这种忙碌是苦恼而沉郁的，好似在那儿准备出殡似的。显然，曼尼雅是猜中了：有两只旅行用的大提箱拿进屋子来，而侦探们轮流地出去又回来。女主人毫无生气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候到厨房里来吩咐安娜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无心地拿起锅子盖，尝一下酱汁的味道。“再加一点番茄汁，安娜，”她说道，但是这些话语好象不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因为她既不在想番茄，也不在想羊肉，她只是为了要掩盖自己的思想才说的。看来，她正面临着一件极痛心的事，这种事她原是可以抗拒的，但是她却连想也没有想到抗拒。她只是在等着，在她的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含着恐怖。她的儿子，这个她把全身心都寄托在他身上的人就要离开了，而没有一个人去帮助她。她走进米烈克的房间，帮着整理东西，她感到自己好象在收殓死人，好象在盖棺以前与他告别一样。

大家很不愉快地吃过了中饭。建筑师和达德拉是在饭厅里吃的，而女主人则留在儿子房里，并且亲自替他端来饭菜。侦探们轮流到饭馆里去。吃过中饭以后，母亲和女儿更换了衣服，达德拉还在那个时候哭了起来。主人坐在饭厅里尚未收拾过的桌子旁边抽着雪茄烟，装着在看报的神气。随后，汽车夫和侦探进

来拿提箱，而女主人、达德拉和小鲁别施便从契斯特米尔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安娜站在外室里想最后望一望他。他和母亲在外室的红地毯上走过去。

走到饭厅门口，女主人站住了。

“去，米罗奇卡，同爸爸去告别，去，孩子！”她请求说。

契斯特米尔犹豫不决起来。

“去吧，亲爱的。要是你没有做到母亲最后的请求的话，你将来会后悔的。”

小鲁别施开了饭厅的门，站在门槛上，文雅而有礼地说：

“请允许我向您道别，建筑师先生！”

父亲没有回答。

契斯特米尔同母亲和妹妹走了出去。大门砰的一声关上，这个短促而沉重的声音在安娜的心里引起了痛苦的感觉。

她长久地站立在半明半暗的前室里，感到世界上除了她以外已经空无一人了。随后，她走到自己的耳房里，跪在眠床旁边，把头埋到枕头里，开始啜泣起来了。

她听到建筑师出去的声音，后来又听见女主人和小姐回来了。她赶快站起来，擦掉了眼泪，把膝上的灰尘拍掉，走到厨房里去。

这一天和第二天，整个屋子就好象才出过殡一样：空虚、阴郁、静寂。所有的人都沉默着，竭力想不遇到另一个人的视线，同时，大家几乎都在踮起脚尖走路，生怕自己的响声会打扰那个居留在这里而看不见的人。女主人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最边上那间屋子里的沙发上度过，而小姐也不出她的闺房一步。但是在吃饭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食具、餐巾和盐瓶都放得好好的，而汤呢，也一定是很热的，——女主人和小姐照料着这些事

情，因为她们明白只有主人会打破沉寂；要是他的脾气一旦发作，准是相当可怕的。

到第三天，来了一封骇人的电报。女主人在厨房里看着，身子摇晃起来，她抓住了食橱门，使自己不致跌倒。

安娜和达德拉把她送到寝室里，达德拉又去叫了医生和父亲来。

契斯特米尔开枪自杀了。

过了两天，送来一封死者写给母亲的信。但是这封信没能够交到母亲手里，因为她病倒了，病得很重。

契斯特米尔在汉堡的一家三等旅馆里，晚上躺在床上，当着两个陪伴他的侦探的面，开枪自杀了。他朝自己的眼睛放了一枪，就这样死了，口里念着母亲和自己的俄国公爵小姐的名字。

达德拉穿上丧服，主人也在衣袖和帽子上系了黑布条。只有安娜不敢表露自己的哀悼。当她在寝室里递给女主人溴素或者放下帘子使光线不致打扰病人的时候，她真想拥抱这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在她的怀里哭叫着："太太，亲爱的太太，我们是多么不幸啊！"但是女主人却躺着，用她的死气沉沉的目光瞪着前面，她对一切都冷漠，同时也没有注意到安娜。

有一天早晨，少爷的灵魂飞到安娜的身边。安娜正在收拾着屋子，窗子是打开的，阵阵的微风在各个房间里穿来穿去。在安娜打开客厅门的当儿，灯架下的水晶饰物开始摇晃起来，发出轻微的响声。少爷的灵魂飞到这里来了。它飞来看望安娜，并且只看望她一个人。安娜马上就猜到契斯特米尔是在这里，在房间里，于是她就感到十分幸福。

后来，日子又一天天照旧地过去。

当女主人稍稍复原的时候，她就吩咐把她的床和梳妆台搬到一个空房间里去，她已经断然决定：以后决不再回到与丈夫共用的寝室里去住了。

沉 重 的 日 子

由小鲁别施的风流韵事以及他的死讯所引起的激动和谈话使安娜和女仆玛馨娜互相接近了。那个玛馨娜对鲁别施家所发生的事件很感兴趣，并且通常每天早晨总是在大门口等待着安娜。

曼尼雅是一个出色的姑娘。她知道得很多，并且把这所房子里各家的情形，甚至世界上的事情，都讲给安娜听。

“你们的建筑师是全布拉格城最大的骗子，”她说道，“他在收买旧军用物资时贪污了国家的钱，而在装置污水管时，又欺骗了市政府。他有七所可以生利的房子，但是对待工人却象对待狗一样。你可知道，人家替他编了一个怎样的歌子？”

安娜不知道，于是曼尼雅就在她们站着的院子里，手里拎着装粮食的提袋，当场唱了起来：

我们那里有一个建筑师鲁别施，
你如果在他那里干活——
准会毁坏自己的身子。

“曼尼雅，曼聂契卡，① 住嘴吧，看在上帝份上，窗子是开着的呢！”安娜惊惶失措地说。

“他们有了百万财富有什么用呢？”曼尼雅继续说。“这批老

爷们真了不起，儿子用枪自杀，姑娘们又从家里逃跑了！你们那老婆子整天走来走去，伤心得要死，可是，想想看，有哪一个可怜她？你知道，你们的建筑师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这些人也是有母亲，有孩子的？而你的太太呢？这样吝啬的女人真少见！一个财主太太，住着有七间屋子的公寓，而只用了一个女仆！你真是个呆子，让人家骑在自己身上，从早做到晚，还要洗衣服！她在你身上扣刮，把钱寄给在瑞士的女儿，好让她同她的男人在疗养地闲逛。你是个糊涂虫，真是的！呆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去，甚至连星期天都呆在厨房里。你难道不知道她们照规矩应该让你出来的？这个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玩！要是你没有衣服穿的话，可以穿我的——我有两件。"

安娜迟疑不决起来。

"你怎的？"

"你知道我还很蠢，曼尼雅……我害怕。"

"什么？你害怕？你究竟怕什么呢？"

"呶，我还不熟悉布拉格……我不象你那样懂事……"

于是安娜就把朗得鲁和基斯的故事讲给玛馨娜听。

玛馨娜把她的一双大大的栗色眼睛盯着安娜，喊了一声："哎哟，我的天！"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弯腰曲背，连后脑勺子上乌黑的鬈发也露了出来，声音响得全院子都可以听到。

"嗳呀，扶着我吧！我的男朋友刚巧是个白铁匠，——万一他把我焊在桶子里怎办！"曼尼雅笑得简直就喘不过气来了。"安妮卡，② 你真是个大傻瓜！"

"曼尼雅，曼聂契卡，看在上帝份上！窗子是开着的呢！"

---

① 曼尼雅、曼聂契卡均为玛馨娜之爱称。

② 安妮卡、安聂契卡均为安娜的爱称。

曼尼雅笑了个痛快以后，便闪了闪眼睛，用一本正经的口气说道：

"你瞧，她多没良心。鬼知道她用什么来教导一个乡下姑娘，只要能随心随意榨取她的血汗。干活，干活，随便什么事情都不要去想，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而当你做不动的时候，就把你撵到街上，让你饿死。"

"但是她并没有想要这样做，"安娜为自已的女主人辩护道。

"不管她有没有想，她可是这样做的。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做法，她的丈夫也是的。她榨取的是一个人的血汗，而他呢，是成百人的血汗——一样的恶毒！"

突然，整个院子可以听到一种好象洋铁器从架子上撒落下来似的刺耳的声音：

"安娜，你还要长久在那儿闲扯不成？"

从厨房的窗口，出现了建筑师太太结实的胸脯。

安娜红着脸，从玛馨娜的身旁跳开，向家里奔去。

"喂，喂，赶快，拚命跑，傻瓜！"玛馨娜在她后面叫道。

建筑师太太的脸色象乌云一般的阴沉。

"你再也挑不出一个比四层楼上的这个玛馨娜更坏的伙伴了，"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威吓着，"要小心啊，安娜！"

但是星期天吃过午饭以后，安娜还是鼓足了勇气请求让她出去溜达。她为了应付这场谈话，曾经在星期六准备了整整一天，在星期天也几乎准备了半天，在这期间，曼尼雅就不得不因她的胆怯而久久地责备她，直到最后，安娜才敢启口：

"太太，许我出去走走，可以吗？"

女主人对安娜望望。

"呀，已经开头了！"她不高兴地说，"得啦，洗好食具去吧！不

过要小心，安娜！”

中午吃过饭以后，两个姑娘就出去溜达了。曼尼雅把安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曼尼雅的主人们到城外去了，所以她可以把女朋友叫到自己的厨房里，把自己新的格子衣服和一顶饰着蓝蔷薇的旧草帽借给安娜用。曼尼雅拿着这顶帽子在安娜头上试了很多时候，最后，弄得简直美极了。曼尼雅自己穿的是一件玫瑰色衣服，衣服的前胸部分是淡蓝色的，头上戴了一顶格子帽。两个姑娘都显得很漂亮，安娜望着厨房镜子里的自己出了神。她怀着一种过节似的情绪。今天在洗好食具以后，她就起劲地洗脖子、手和膝头以下的腿部，穿上雪白的刚刚烫过的衬衣。最后是穿上这件漂亮衣服。她的心情怎能不象过节日似地愉快呢！

“现在让我们到普尔希柯贝去出出风头吧！”曼尼雅说。

同曼尼雅在一起闲逛是一件乐事。在这个晴朗的日子里，大部分的布拉格人都在符耳塔伐河岸边或者在克尔奇斯基森林中消磨时光，街上的车子也比平常稀少，可是安娜见了车子还是怕。而曼尼雅却安闲而有把握地带了她在电车或者公共汽车的车厢里穿来穿去，就象她在乡间自己家里似的。

在下边伐兹拉夫广场上，有一个头发蓬松的鬈发青年拦住了她们的去路，那人系了一条随风飘拂着的黑色领带。

“哪里去，哪里去，美人儿？”他叫道，叉开了两手，“你们上哪儿去，一个金发姑娘，一个黑美人儿？”

曼尼雅微微低着头，斜眼望了他一眼：

“走开，不值一文的花花公子！”

安娜吓了一大跳，但是曼尼雅说这句话毫无恶意，并且是随口说出来的，所以倒弄得那青年高声大笑起来了。曼尼雅也吃吃地笑了起来，但是马上又把头缩到两肩中间，抓住了安娜的

手，溜之大吉了。她们拐了一个弯，躲在邮箱后面继续笑着。

过了一会儿，姑娘们到了普尔希柯贝，久久地打量着绸缎店的橱窗，后来又在采列特那亚街看看皮货和帽子，到了旧城广场，她们参观了杨·胡斯①的纪念碑。

"瞧，僧侣们就在这里烧死了杨·胡斯，"曼尼雅解释道。

她们在玩具店前面歇了一会儿，随后又站在服饰店前面，在那里，曼尼雅用了内行人的口气告诉女友怎样扣上搭扣和钮子，怎样系结女衬衫和胸衣上的狭带子。后来她们又沿着旧城区多荫的街道走到河边，过了卡尔洛夫桥，沿了斜坡走上彼特尔欣山岗。

到了上面，她们就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安娜小心地撩起裙子，免得弄绉了女友的熨得平平的衣服，然后就开始端详着布拉格和那在太阳底下闪烁发光的符耳塔伐河。愉快的心情没有离开过她。有这么半天完全空闲的时间在她还是生平第一次。这个时光是属于她的，她在这时候没有干任何活儿。在蓝色的薄雾里展开的城市的辽阔景色和那只有电车铃声才偶尔打破的沉寂使她入迷了。不，无论是她在鲁别施家看到的书中那些优美的诗歌，或者是当她在乡下与女伴们一起牧羊时所唱的歌子都不能表达她此刻的心情。她很想朗诵在学校时代所读过的已被遗忘了的诗歌，或者回忆一下那些关于捷克国王们的传说。但是她只用了低低的呼声表达了控制着她的感情：

"哦，哦，多少房子啊！"

---

① 杨·胡斯（1369—1415），十五世纪捷克爱国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德意志封建主与天主教会对捷克的压迫和剥削，痛斥当时若干天主教的教义与措施，谴责教皇的滥用职权和教士们道德的堕落。他的活动受到天主教会的仇视，卒被教会焚死。

坐在旁边的曼尼雅短促地笑了一声。这好似一个受到阿谀的物主在向着迷的观众们展览自己的宝物时的笑声。但是，就连曼尼雅这个淘气姑娘，今天也显得异常地沉静，她很想安静地坐着，一边眺望那在山岗底下展开着的城市，一边深深地吸取夏日的空气。那时候，周围游人很少，没有人可以一起谈笑，而娱乐的时间还没有到，于是曼尼雅便先自悄悄地体味着这些未来的乐趣。

“嗳，咱们走吧，”她说道，那时候，太阳已偏向格拉特羌了。

“已经得回家吃晚饭了吗？”安娜沮丧地问道。

“没有的事！如果你们那老婆子什么都没有替你留下的话，至多今天不吃晚饭好了！……”

姑娘们不慌不忙地走下坡，进到城里，就向吉别尔恩斯卡亚街的人民宫走去。今天，卡尔·马克思协会① 将在那儿举行晚会，曼尼雅同她的白铁匠鲍高乌斯约好在那个会上见面。

当姑娘们走到人民宫的当儿，天已擦黑了。她们经过雄伟的巴罗柯式的大门，那扇门非常宽阔，门洞里容纳了一个理发铺子和一个香烟摊，接着她们就出现在第一个院子里。随后，穿过新的过道，来到第二个院子。园亭里已经有了灯光。第二个院子没有铺砌过，长满了枯萎的榆树，大家照旧管这院子叫做花园。人民宫在过去曾经是文箕施格列茨王公们和金斯基爵爷们的府第，以后又在这个建筑物的周围造了巴罗柯式的几所四层楼房，在那里安置了印刷所和办事处。院子里那些四周围着砖墙的树木还是从那个时候保存下来的。那个在薄暮里发着亮光的园亭过去显然是公馆里的暖花房。园亭的胶板屋顶支在高高的住屋

① 卡尔·马克思协会存在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是当时捷克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所组织的讨论团体。——俄译者

的耐火墙上，而这耐火墙就成了亭子的后墙；正墙由暖花房的框子组成，全部都镶着玻璃。此刻，园亭好象路灯一样地发出亮光，因此里面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在卷烟的浅蓝色的烟雾中，在许多铺着方格子台布的小圆桌旁边，拥挤地坐着三百来个人，其中有许多象曼尼雅和安娜一样的姑娘。当她们刚刚走进园子的时候，安娜马上看到了这一切，她预先想象着自己即将接触到的某种新的事物，心房就忐忑地跳动起来了。她是不错的：人民宫的这个园亭对于她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曼尼雅在门口遇见了白铁匠鲍高乌斯。这是一个愉快的、长着一口阔牙齿的鬈发青年。

"你好，曼聂契卡！"他说道，同她们握手。"这就是那个在鲁别施家干活的安娜吗？你同我讲起过她的，是不是？"

"就是她，我们的小傻瓜！"

鲍高乌斯在桌子旁边添放了两张椅子，姑娘们就在男女工人中间出现了。桌子上放了几杯没有泡沫的啤酒、装着苏打水的浅绿色瓶子和满得不能再满的烟灰缸。

在厅堂里有一个给业余爱好者们表演的小小舞台，小伙子和姑娘们在上面演出——他们独个儿或者几个人一起朗诵诗篇、唱歌；业余乐队奏着曲子。安娜喜爱音乐和歌子，但是朗诵却听不大懂。

坐在安娜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冶金工人。

当音乐停止、厅里发出鼓掌声的当儿，他对她说道：

"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来吧，同志？"

"你"这个称呼和"同志"这个词儿使安娜发窘，她脸红了。但是曼尼雅替女友解了围，她告诉她的邻座说，安娜是彼格尔齐莫

夫地区的人，来布拉格不久；她在鲁别施家干活，她的女主人是一个狡猾的骗子，随便什么地方都不放她的仆人去。于是，谈话就开始了。安娜的交谈者知道彼格尔齐莫夫这地方，他曾经到那儿去开过职工会，到过安娜的村子，很可能看到过她此刻描绘给他听的她家的小屋。起初不好意思的安娜活跃起来了。这个话题使她很愉快——她很高兴想起母亲、姊妹、父亲和自己的小屋，屋顶上补缀着上面画着鸽子的、作广告牌用的白铁皮子。安娜的交谈者也知道鲁别施。“这是全布拉格最无耻的剥削者之一，”他说道。安娜第一次听到“剥削者”这个词，这个词儿很合她的意，并且引起了她的兴趣。

那时候，有几个青年上了台，开始一起朗诵不知什么诗篇，在这些诗篇中，常常反复地说着“群众”、“力量”、“千百万”、“步调”、“一，二，左，左，左”等等的词儿，实在的，这些诗篇使人想起在伐兹拉夫广场上千万人的步调。当暴风雨似的掌声停息下来的时候，安娜的交谈者又重新谈起鲁别施来，并且叙述了不久在他那儿发生的工人大罢工。

旁边坐着曼尼雅，她的半握紧的手按在那放着啤酒杯子的台布上。鲍高乌斯用他的手掌盖住了它，这手掌是那么大，使得放在它下面的曼尼雅的手也看不见了。两个人都幸福地微笑着，姑娘仿佛变得好看了，她的深色眼睛的目光异常地柔和；曼尼雅平日那股刺人的味道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乐队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

“这是《马赛曲》，法国的革命歌曲。”安娜的交谈者向她说明道。

“是吗？”安娜惊奇地说，就在这一瞬间，她的目光和他相遇了。这短短的一瞬足以让她看见东尼克——白铁匠鲍高乌斯是

这样称呼他的——有着一双漂亮的浅蓝色眼睛。

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在安娜的前侧方，坐着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人，他穿得比别人好。他的脸孔差不多跟女孩子一样。他已经不只一次望安娜了，而此刻，他的目光久久地逗留在她身上，不能不引起姑娘的注意。在这目光中并没有纠缠的意味，只有赞美的表情。曼尼雅也注意到这个。

“你怎么啦，亚罗乌歇克？[①]”她对那青年叫道，“你看上了我们的安娜了，嗯？”

那青年微微地笑了一下，安娜的脸庞涨得通红。

“这是亚罗乌施·杨达克，大学生，一位议员的儿子。”曼尼雅说道。

议员自己坐在儿子旁边，也朝着他们那边望。这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有着一张刮得光光的、愉快的脸孔和卷曲的头发，别人可能会把他当作大学生的哥哥而不以为是他的父亲。

“姑娘们，你们瞧他将来可有出息？”他问道，拍拍儿子的肩膀，拥抱他。

“别这样，爸爸！”亚罗乌施红着脸生气地、但是亲切地埋怨道。

坐在杨达克父子那张桌子旁边的第三个谈话者也转过身来朝着姑娘们那一边。他的深色的眼睛严厉而尖锐，如同刀口一样。当你感觉到这个目光在瞧着自己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再去注意到另外随便什么人了。这个人的头发和胡子墨黑，整个脸上拖着一条伤痕，把右面那绺胡髭也割断了。有个在桌子中间挤过来的、上了年纪的工人把手搁在他肩上，问道：

---

① 亚尔达、亚罗乌施、亚罗乌歇克均为亚罗斯拉夫的爱称。

"你可喜欢我们这里，普列栖德依同志?"

"你们那些小孩子的玩意儿有什么可以使我喜欢的呢?"普列栖德依没有笑容地回答，抬起了严厉的目光望着他。"你们难道要想拿这些诗歌来战胜资产阶级吗?"

安娜很不喜欢这样的答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东尼克说道，弯身向着安娜。"他从俄国回来不久。他在那儿的红军部队中作过战，被邓尼金①俘虏了，险些儿被杀死。下一次我把他的事情讲给你听。"

安娜又朝东尼克看了一眼，说道：

"真的吗?"

在"真的"这个带着疑问口气的肯定语里含着喜悦，这喜悦是由东尼克的话语——"下一次"引起的。

最后，业余乐队演奏《国际歌》。大家都站起来，凡是会唱的就开始唱这支无产阶级的歌曲。这是胜利的俄国革命之歌。安娜也站了起来。但是她还不懂得"国际"这个词的意义。

到了九点多钟，鲍高乌斯和东尼克送两个姑娘回去。人民宫举行的晚会通常总在九点多钟结束，以便让参加晚会的人来得及在大门还未曾上锁以前回到家里，因为不然的话，就得给看门的酒钱。街上人还是很多。曼尼雅又变得吵吵闹闹了。她一边大声笑着，一边在人行道上走着，经过亮堂堂的橱窗和五颜六色变幻不定的广告灯。从戏院和舞厅里出来的成双成对优雅的仕女们不满地回过头来望着她。

东尼克送姑娘们到了伐兹拉夫广场，就同她们告别了。

"以后再上我们这里来，同志，"他说道，把手伸给安娜。

---

① 邓尼金，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白匪军首领。

她感激地点了点头。

“你不是很少出来吗，嗯？”

“晚上七点钟出来买啤酒！”曼尼雅笑着插嘴道。

东尼克朝旧城区的狭窄的街道走去，两个姑娘则跟鲍高乌斯沿伐兹拉夫广场走着。曼尼雅跟自己的爱人在门口又站了一会，而安娜径自上楼去了。在厨房的桌子上，放着留给她的冷香肠和面包，——女主人总算表现了她的高贵的心意。这天晚上，安娜已经看不见一个鲁别施家的人了。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星期一，安娜在半地下室的洗衣房里洗衣服。她忙着搓揉那浸在肥皂水里的衬衣，嘴里低低地哼着歌儿，沉浸在星期日晚会的回忆中了。到了星期二，在她熨平衬衣、把它们折叠起来的当儿，这些回忆还是不曾离开她。

下一个星期日，两个姑娘又上人民宫去，并且还是坐在同一伙人中间。这一次舞台上并没有业余表演，但是那天晚上过得也不错。星期二晚上，安娜拿了三只容量半公升的啤酒杯跑出大门，她看见东尼克在人行道上徘徊着。血液直冲到她的脸颊上。东尼克陪着她到啤酒店里，随后又送她回来。星期三，他又来了，安娜跟他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这时候，看门女人德伏尔查柯娃从自己的耳房里出来了两次，微笑地望着他们；等到安娜上了楼，女主人就怀疑地打量着杯子里瘪落下去的泡沫。第三次，安娜在晚饭后下楼呆了十分钟，接着，便垂下目光，请求女主人让她在晚上出去。

“噫，”女主人说道，“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你是有权这样做的。但是要小心谨慎，安娜。你变了，我已经留意了你好久。听着，没有人会侵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只做你份内的事，那么，

你从我这里也只能拿到你所该得的东西。"

于是女主人便走出了厨房，怒冲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过了一会儿，达德拉小姐来到厨房里。她微微笑着，向厨房的镜子里看了一眼，扯松着鬓角上的头发。

"你只要把他抓住得啦，安娜。咱们嫁了丈夫，就不能再开玩笑啦！妈妈受的是旧式教育，她要我们照从前那样做人，那时候，女孩子只能老呆在家里绣着爷爷的背带和拖鞋。"

安娜连自己也觉得奇怪，她居然没有把女主人的不满放在心上。她从小就知道在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白白得来的，为了跟那个已经在下面等待着的东尼克见面，听太太的这些气话也并不算昂贵的代价。

漫长的夏夜。东尼克和安娜乘了电车上齐日考夫，上灌木丛生的维脱考夫山坡，往残废院或是犹太炉子去。对齐日考夫的无产者来说，犹太炉子——这是皇家的禁苑，是金斯基花园，是他们的尼斯① 和阿巴齐亚，他们的"哈尼"旅馆。犹太炉子是指布拉格城郊的一片荒野的沙地——这是一块凄凉的地方，上面长着没有色彩的、被人踩踏得乱七八糟的野草。但是在这里，还是可以碰见甚至比在加普里② 的棕榈树和勃利盎的橄榄树下更为热烈的爱情场面。在这个荒地上，有着许多不知怎样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峡谷——或者是由人们挖掘出来的，或者是自然形成的。在峡谷里面，杂乱地丢着打碎的瓦罐、满是孔洞的洗脸盆和造房子扔下的各种垃圾。城市毫无止境地向这块地方伸展着，它从两方面把这块地方钳住，并且城里的房屋已经突入

---

① 尼斯在法国东南隅，濒地中海，风景极佳，气候凉爽，为游览胜地。

② 加普里岛，位于意大利那坡利海湾南部，岛上风光优美，气候异常温和，为游览胜地。

荒地上来了。这块地方很快就会寸地不剩了。但是目前，在犹太炉子上面，还是展开着一片并未为首都的污云弄得昏暗的广阔的天空。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城郊的女人们常上这里的枯萎的草地上来歇息。她们解开了衣领上的钮子，坐着织袜子，一边留心着不要让孩子们把花花绿绿的玻璃瓶碎片放进嘴里去。白天里，小伙子们在这儿踢足球，夜间，小偷们就在此地掩埋赃物。每当晚上，从齐日考夫来的爱人们在这里互相拥抱，——这些沙质的峡谷就代替了旅舍里的安适的、隔开来的房间。在这个峡谷里的人看不见另外一个峡谷里的行动，星空代替灯光通明的天花板在他们头上照耀着。晚间，从工厂回到家的齐日考夫街上的老年工人们脱掉了上衣，站在自己屋子的门槛旁边，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观望着一对对的青年男女急速地往犹太炉子走去：姑娘们穿着刚刚熨过的印花布衣服，而洗得干干净净的小伙子们则换上了洁白的领子。老年人从嘴里抽出烟斗，微笑地忆起昔日的某些事情，说着："好吧，引她受罪去吧。"晚上，警察巡逻队巡视着这块荒地，用手电筒朝爱人们的脸上照去。

安娜和东尼克也常上那儿去。他们在幽静的峡谷里坐下，就手搀着手，长久地谈着话，接着，又长久地沉默着，在他们看来，那称作犹太炉子的荒地，一点不比小姐的闺房或者达德拉小姐书里的海滨丛林来得差。

在这里，东尼克第一次热烈而长久地吻了安娜，使得安娜感到头晕起来。她颤了一下，紧贴着亲爱的人儿。"'我爱你，爱你，'乔哼着说，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有力的胸怀里……"不，东尼克既没有哼哼，也没有说什么，只有安娜喃喃地说着："东尼契克！[①]"

① 东尼克、东尼契克均为安东宁之爱称。

彼此叙述自己的生涯是一件乐事。这些谈话好似小提琴和大提琴，或者是双簧管和猎人角笛的二重奏。这些谈话更象孩子们玩的球戏，这球戏是这样玩的：先用两手接球，然后，用右手接，再用左手接，然后拍一下手掌，接住球，然后又跪着接！于是皮球就这样抛来抛去……

东尼克把在波高尔席耳茨的半坍坏的小屋子里所过的童年生活讲给安娜听。在这个贫民窟里住着老是在吵嘴的、孩子众多的四户人家，屋里发出馊粥味、脏东西和垃圾的臭味。东尼克讲到自己的父亲，彼鲁特茨工厂——一个道地的杀人窟里的纺织工人。父亲四十岁的时候就显得很苍老了，东尼克只有在晚上或是星期天才看到他。他的衣服永远布满着毛茸茸的棉花末子，就是这种尘末密密地侵入了他的肺部。老头儿经常愁眉苦脸，各式各样的忧虑永远折磨着他：有时候，担忧着主人侵占工人们的工资，有时候，又怕失业。东尼克又讲到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做了烤面包工人，另外一个在小时候患瘰疬症死了，——他又讲到那个从十岁起就帮着母亲干活的姊妹。母亲是打短工的：替人洗衬衣，帮别人管家务，缝麻袋，替人家从市场上搬运一筐筐的货物，替酒店里擦洗楼梯和厕所，帮园丁做活——总而言之，只要能得到一些工钱的活儿她都干。

东尼克把回忆象一个球似地掷向安娜，而她，把它抓住之后，就对他叙述自己家里的情形。他们的小屋顶有着很多破洞，有一个破洞是用了咖啡代用品工厂的广告牌上的白铁皮补缀的——广告牌上画着一只脚爪里抓着一小包菊苣咖啡①的鸽子，那鸽子仿佛就要飞向辽远的什么地方，飞过云端，进入苍空，

① 菊苣咖啡，一种咖啡代用品，由菊苣之根制成。

向天使们和圣母玛利亚飞去。安娜非常喜欢那只鸽子，幻想着同它玩儿，并且做梦也看到它。那时候她不明白这只鸽子何以这样地吸引着她，现在她明白了：她也想飞得远远的，远远的，飞向那地方，在那儿……“哦，在那儿，我会找到你。”安娜的父亲有时候做泥水匠，有时候在有钱人家的领地上打杂。他老是为了喂牛用的饲料，为了张罗付抵押出去的小屋的三十克朗利息而担着心，这种忧虑弄得他变成了一个酒徒，一个家庭的折磨者。而母亲除了操持家务外，还得拼命替别人干活，她把一筐筐的菌子、黑莓、覆盆子、红酸果和一包包的脂油和凝乳运往市场。除了安娜外，家里还有五个姊妹，其中一个是经常有病的。安娜背上驮着年幼的妹子们到田里去，而那几个已经上学的姊妹便被富裕的庄稼汉雇去放鹅、采果子，在收割庄稼的日子里收集散落下来的谷粒。她们干这些活就可以拿到一大块面包和每小时三个赫勒①。

“现在是清算这一切的时候了，”东尼克坚决地说道。“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前辈。”

早晨，在上学以前，东尼克常常站在新的建筑场旁边，——那儿总有活儿给他做。那些被老板们残酷地剥削的搬运夫，自己也克扣别人：他们每卸下一百块砖头到手十二个赫勒，但是只付给东尼克三个。在工场里干活的学生，上课自然常常要迟到，砖灰把他的裤子和光脚都弄脏了。而教师呢，不知道挣钱的乐趣，也不知道一段廉价的血肠是如何可口，发着脾气，大声嚷着，罚这个学生面对墙壁，站在屋角，并且扣减他的品行分数。于是，东尼克就在有钱的少爷身上出气，这些人总是穿得很好，并

① 赫勒，捷克的辅币。

且总是带来夹火腿的面包做早点。在所有的教师中，东尼克只喜欢一个，因为他对大家都一样严厉。有一次，他们跟那位教师之间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情。东尼克和他的友伴洛依萨·波尔和埃达·符蓝那装扮成三个魔法师，口里唱着耶稣圣诞节的祝祷歌串门儿。他们在外套底下藏着纸做的王冠、代替香炉的花盆和从母亲那儿央求来的衬衣，在口袋里放了烧焦的瓶塞，这是用来涂黑那个扮黑皮肤魔法师的面孔的。他们把换衣服的地方安置在他们打算在里面游唱的那所房子的走廊上，事后还得重新把自己弄整齐，用唾沫沾湿手绢，把脸孔擦干净；因为化了装在街上走路是不准的——会受到警察的追逐。

孩子们走遍了一个个的寓舍。从一家他们按了铃的门里突然伸出了他们那位老教师的脑袋。

"啊，你们这些无赖小子！"他完全象在教室里一样地对他们叫喊着。"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孩子们楞了一会儿，随后就拼命地向楼下冲去。东尼克有生以来没有跑得这样快过。洛依萨·波尔滑了一交，屁股着地，一直滑到楼梯转弯的地方。到了下面，他们才清醒过来，尽情地哈哈大笑起来，庆幸着老师没有把他们认出来。他们脱掉了外面的装束，跳到街上，在那里又笑了很久，随后光是淘气地胡闹着，这些行为惹得一些可敬的先生大冒其火。

安娜用两只手接住了回忆之球。

是的，她也做过零活挣钱。夏天，在彼格尔齐莫夫的森林中有许多菌子，但是要能够找得到它们才行。在男孩子们去采菌子的时候，他们嘴里打着唿哨：菌子儿是好奇的，它很想知道打口哨的是哪一个，于是就从青苔中钻了出来。但是姑娘们不会打口哨，所以她们拿到菌子的时候总是抚爱着它们；吻吻那被找

到的菌子，说道："谢天谢地，走吧，老天，让我们采到一百倍那么多。"

安娜把金黄色的菌子、黄色的菌子和长在橡树下的菌子都拿回家，把它们放在土豆子窶里；那些白色的菌子，她就把它们洗干净，放在土钵子里，打成一个包儿，带到彼格尔齐莫夫的市场上去。在没有菌子的时候，她采集浆果，而晚秋时光，就上林子里去拾干树枝。在那个时候，她一定得小心提防着，不要碰上守林人，因为他马上就会把你的一捆柴抢走，无论你怎样求情或者对他哭都没用。当安娜和姊妹们拿着大捆大捆的树枝回家的时候，村姑们就逗弄着她们："卡尔，卡尔，卡尔！"这意思是说，她们偷窃了乌鸦窠，而现在乌鸦正在追赶她们。

在秋天放牧牲口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牲口静静地嚼草的当儿，你可以在篝火旁边取暖，唱歌，同那些神气活现地越过篝火、抽得鞭儿劈啪劈啪响的男孩子们打趣。但是当牲口使性的时候，你就得跟在它后面，在土豆子田和麦田里奔，你常常会冻得那么厉害，以致觉得把光足放在新下的牛粪里取暖也是件乐事。也许，东尼克在想：安娜可曾唱着圣诞节的祝祷歌串门儿？还用说！她们的老师是一个好人，是本地志愿救火队的领队，养着二十二个蜂房，并且除了自己的蜜蜂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是他还是给安娜的勤学分数打了个二分，因为她常常旷课；父亲有一次甚至还被拘了十二小时，为了他没有叫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东尼克叙述了他在做学徒时代的挨饿日子。啊，他是怎样渴望着吃东西啊！中午，当工厂里的汽笛呜呜地吼叫起来的时候，东尼克就象小兽一样地从翻砂间里奔出来，向对面的铺子里跑去。胖胖的、好心的女掌柜把碎面包廉价卖给这个男孩子。于

是东尼克便跪在装着陈货的筐子旁边，在那里翻寻和收集着一块块的碎面包，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油腻腻的无边帽里。

“这小鬼从哪里找出来那么许多碎块？”女掌柜从他手里接过五分钱，惊奇着。但是有一次，女掌柜悄悄地走到孩子跟前，她看见他故意把筐底里的整个面包捻成碎块。东尼克挨了打，虽然他象小狼一样地躲开了，可是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能进那铺子的门了。他希望能饱餐一顿香肠铺里出售的饲猫的“碎屑”（这是各种香肠、火腿皮、陈咸牛肉的碎片），这念头引起了他强烈的食欲，而看到放在食物铺里一小桶咸黄瓜，东尼克就垂涎三尺。但是当他忆起那些诈人的搬运夫和好心的女掌柜的时候，他还是对他们怀有好感，——假如没有他们的话，他就不能长成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了。

安娜立刻接下去追忆自己的往事。

小时候，她是怎样地梦想着一块涂着牛油的面包啊！安娜的父母有一头牛，它只能靠孩子们晚上在地主田里偷来的三叶草养活。但是孩子们从来也不曾吃到过自己的牛所产的奶油，因为这些奶油都要拿到彼格尔齐莫夫去卖掉——支付抵押品的利息。最早的童年的回忆也是凄苦的。母亲搅着奶油，年幼的安娜缠住她，硬要妈妈替她在一块面包上涂些奶油。她啜泣着，后来就放声大哭，倒在地上，拼命地蹬着脚。无论打骂都没有用。母亲心里爱怜孩子，替她涂了一块面包。但是小女孩连第一口还不曾吞下，父亲就在门口出现了。母女俩看到他的目光就哆嗦起来。女孩子甩掉面包，向门口冲去，急速地奔下斜坡，跑向小溪。父亲跺着脚追着，在后边响起了母亲的叫喊声。父亲在小溪旁追上了安娜，从后面抓住了她的衣服，把她举在空中，随即用力摔出去。吓得发昏的孩子给掷过了小溪，掉在对岸

柔软的杨柳林里。到了那里，她才睁开了抽搐地眯缝着的眼睛。惊惶失措的母亲把她抱了起来……

安娜和东尼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彼此相似的。但是到后来，他们的生活就不同了。在东尼克方面，行军的战鼓开始敲打，可怕的交响乐——呼啸似的子弹的急奏和轰隆隆的爆炸声在意大利的战场上鸣响起来了。随后，开始了俘虏们的忧郁而凄凉的囚歌，而最后，终于响起了欢乐的回乡歌。但是只有这个歌子的开端是欢乐的……

东尼克在柯耳卞冶金工厂做翻砂工人。

“讲给我听听你们的工厂和你在那边干的活儿，”安娜请求道。

于是他就向她讲述着巨大的翻砂车间、制型砂、金属液体以及成千成百的工人。在熔铁炉和马丁炉里沸腾着熔化成白热液体的金属，而在出熔铁的时候，炫目的白光就把黑暗的翻砂车间照得通明。翻砂工人们赶紧用长柄的勺子舀起发光的液体把它倒入嵌在地里的、错综的砂土模型中。在天花板下面，在熔铸工人们的头上，行车急速地转来转去，分送着盛在大桶里的金属液体。这里的工作很危险，常常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故：工人们被掉下来的钢板压死或者被炽热的铁滓烧伤。在把金属浇入模型的时候，往往会碰到小小的爆炸，那时候，一股液体的铁流就在空气里变成了一个个炽热的小球，落在工人的头上。东尼克讲述着工厂的管理当局，讲到工程师和技师，讲到分配工作和确定工资时所起的冲突，讲到工人的组织及其团结精神。

安娜远没有全部懂得。她想象着那个巨大、黑色、有时突然发出白光而在那当儿就变得炽热而可怕的东西。能够不顾危险，驯服这头猛兽就好了，而东尼克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他，她的

东尼克是强壮而勇敢的。

东尼克确实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当他在犹太炉子的峡谷里抱着安娜的腰部的当儿，她可以安静地靠在他的手臂上，而这只手臂始终也不会松弛下来。他的嘴唇也是有力的，无论说“是”或者“否”，他的言语总是坚决的。

“你爱我吗，东尼契克？”安娜温柔地问。

“爱，”他说道，平静地望着她的眼睛。

“生活是美好的，是吗？”

“你怎么想呢？”

“是美好的！比以前好多了。”

“好了一点是真的。但是还不算好。”他开始沉思起来了。“为什么你觉得我们开始过得好了一点，安聂契卡？”

“因为我们相爱着。”

但是东尼克有着另外的想法，而他的“我们”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多了。

“我们过得好了一点，”他说道，“这是生活在我们以前的同志们努力争取得来的。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还应该争取更多的东西。”

“是吗？”安娜感到惊奇，紧紧地偎依在东尼克的身旁，朝他的眼睛望望。

黄昏时分，有时候已经到了夜晚，他们才回到城里去。他们互相搂着腰，踩着舍不得分离的爱人们所走的缓慢步子，走过象棋盘那样排列着的、有着狭小的花坛和低矮的篱笆的小园子。在这些园子里面，邮差和银行信差们的家属怀着孩子般的兴致搞着自己的园务；他们走过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每当早晨，一辆辆的汽车几乎把全城的灰烬、厨房里的垃圾和梳子梳下来的头发

都运到这里来。在这个垃圾场上，总有什么东西在冒着烟，散布着刺鼻的、灰黄色的烟雾。

有一天晚上，他们碰见了一个黑胡子、有着伤痕的汉子，安娜曾在人民宫的晚会里看到过他。他同议员的儿子大学生亚尔达·杨达克一块儿走着。在暮霭里，东尼克和安娜一时没有认清他们，东尼克和安娜互相搂着腰，走近了他们。安娜想从东尼克身边走开，但是他却有些生气地拉住了她，仿佛在说："为什么要这样？你想我会为我们的恋爱而害臊吗？"

"你们好！"普列栖德依向他们打着招呼，在他的刺人的目光里和那被伤痕弄得丑陋的脸面上掠过了不愉快的嘲讽似的微笑，仿佛他在轻蔑地说道："在这种时候你还把时光花在谈恋爱上吗？"

"你们好！"亚尔达·杨达克温和地说道，他的淡蓝色的眼睛一直盯着安娜，直到这一对爱人在他们身旁走过。安娜脸红了。亚尔达好似用目光抚爱着她的脸庞和头发，在这种爱抚中含着羞怯的倾慕。在安娜心中，掠过了对于契斯特米尔·鲁别施房间的模糊的回忆。

他们所遇到的同志在暮色苍茫中消失了，而爱人们还长久地沉默着。东尼克的手不由得从安娜的腰上放了下来，他开始皱起眉头。普列栖德依为什么要嘲笑他呢？难道他，东尼克，忽视了他自己的责任吗？难道他同安娜在一块消磨的时间太多了吗？难道他不是常常在伐兹拉夫广场那座房子门口同她告别的时候对她说："明天我不来，明天我要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后天要举行体育小组会。那就是说，在星期四，安聂契卡！哎，哎，不，星期四开职工会"？

到了电车终点站附近郊区明亮的街道上，东尼克和安娜的

手才又重新互相搀上了。在电车前面的站台上，在司机背后，他又凝视着她的眼睛，他们站在那里，紧紧地互相偎依着。

"东一尼一契克！"安娜不出声地重复着，心里高兴着他能够理解这种无言的声音。空空的电车发出叮当的响声，从行人稀少的街道上向中心区疾驰着。

在鲁别施那座房子的大门口，东尼克在两次告别的接吻中间说道：

"明天我们要开全体大会。后天是星期六——马克思协会开会……等一等，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会有很精彩的辩论。我们将在人民宫的园亭里集会。"

当然，安娜想去的！她可以从家里抽身出来，女主人的冷冰冰的目光现在已经不能对她起作用了。

"我会来的。晚安，东尼契克！"

"晚安，安娜，要来的呵！"

但是安娜星期六并没有到人民宫去。鲁别施的亲戚，一个罗马尼亚人和他的太太从契尔诺维兹来到了布拉格。他们住在黑马旅馆，非常明显，建筑师很关心他们。在这星期三，鲁别施就请了他们吃晚饭，而达德拉还特地为这件事替安娜买了黑色的工作衣和洁白的围裙，同时替她在头发上扎了一根白缎带。而在星期六，罗马尼亚人在黑马旅馆宴请鲁别施一家。女主人为了这次访问尽力作了准备，久久地同达德拉商议怎样穿着才合服丧的规矩。午后，她差安娜到住在靳尼索夫车站附近的姊妹家去取一个厚纸盒。

安娜卸下围裙，放下卷起的袖子，那当儿，不知为什么焦急不安的达德拉小姐跑进了厨房。她让门半掩着，以便有人进来的时候，可以及时发觉到。当妈妈往厨房里张望的当儿，达德拉

就在小镜子前面转来转去，装着好象在跟安娜谈着洗衣服的事情：

“你得把袖口也放在肥皂水里洗……”

妈妈走了以后，达德拉小姐就给安娜一封信和乘电车的钱，要她在去靳尼索夫车站以后，马上就把这封信送到维诺格腊特去。地址写在信封上，要走上二层楼，向右第二扇门，找工程师鲁稻耳夫·法比安。总之，一切都在信封上写明着。还有一个小便条：在回家的路上到普尔希柯贝街上的里彼耳特伙食店买三瓶葡萄酒、野味、三十克朗最好的香肠、牛油和干酪。还有一个克朗——准备安娜要换车的时候用。东西买来之后，暂时藏在地窖旁边的角落里。赶快，赶快，不要让任何人看出她耽搁了时间。

安娜走出屋子，想按时把所有的事情办完。她固然怀疑这个法比安是工程师，因为曼尼雅说他是酒吧间里的演员，但是这一切对安娜说来都无所谓——她很高兴晚上不必呆在屋子里而可以跟东尼克在一起消磨时光。

安娜在女主人的姊妹那里拿到一个大大的厚纸盒后，就乘上电车，到维诺格腊特去了。乘了三站以后，她突然在街上看到了东尼克。

“东尼契克！”她叫着。

他没有听到，于是安娜就探出身子，招着手，提高嗓子叫了起来：

“东尼契克，东尼契克！”

东尼克扭过头来，脸上露出了喜色。在他的蓝色的工装上面，穿着一件外套，头上戴着旧便帽。每星期六，他在工厂里的值班时间到四点钟为止，现在他已经下班了。

东尼克马上转过身来，赶紧跟着电车跑。安娜在站头上跳下电车，向他奔去。他们互握了手，相对微笑着。安娜把她的差使告诉了他，东尼克望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说他可以陪安娜到那里去。他们重又坐上电车，经过维诺格腊特街上的博物馆，到下一个站头下了车，在陡峭地向山上伸展的、幽静的巴尔宾街上走着。在离开他们几十步远的地方，一个瘦弱的、铺子里的小学徒，穿着龌龊的白色罩衫正在拖一辆小车，车上装满了大概盛着熏鱼的扁箱子。小车上的东西装得满满的，一堆捆着绳子的小箱子高过了孩子的头。小车上的轮子慢慢地在石子的铺道上滚动着，显然，这个孩子是筋疲力竭了。

“没心肝的剥削者！”东尼克皱着眉头，忿忿地说，“等一等，让我来帮忙。”

于是他便急急地朝前走。在这时候，孩子的气力已经用尽了，也许他绊了一下，车柄从他手上滑走了。小车的前端撞在地上，而箱子就开始劈劈啪啪地掉落在街路上了。在旁边走过的两位先生跟一位太太便哈哈大笑起来。因紧张和恐惧而脸孔涨得通红的孩子，向他们转过身去，显然由于惊惶失措的缘故也跟着笑了起来。从附近的铺子里跑出一个穿着黑色假缎子长袍、耳朵背后夹着一枝铅笔的结实汉子。他跳到孩子跟前，举起手来，打了一巴掌，接着又是一下。孩子摇摇晃晃地退缩着，跌倒在小车的轮子跟前，拿两手蒙着脸孔。铺子老板用脚踏着他的背脊。

“把箱子收拾起来，混蛋！”他叫道，声音响得全街都能听到。

东尼克已经离开他们不远了，他的肩膀扭曲着，几步跳到了铺子老板面前，揍了他两记耳光。

“我揍你，资产阶级的猪！”

铺子老板的嘴唇和下巴沾满了血。东尼克那只结实的、工人的手是沉重的，它是惯于对付铁的。铺子老板睁圆了眼睛，呆呆地瞪着东尼克，显然，他的惊奇胜过了疼痛。

适才笑那孩子的两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走近来了。又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从对面街道上飞奔到出事的地方来。当人群突然在小车周围聚拢来的当儿，安娜一时还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以听到激动的争论和东尼克的声音。铺子老板把手绢紧压着鼻子，弯着身子去拾那枝掉下去的铅笔，然后重新把它插在耳朵背后。

安娜奔到出事的地方，但是要挤到东尼克身边去已经不可能了。她看见有一个脸面刮得光光的中年人站在他面前，那家伙穿着淡色服装，戴着角边眼镜，这副眼镜弄得他的样儿酷似中国清朝时代的官吏。

"对，"他向东尼克说道，"但是难道可以拿更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残酷吗，瞧，您把他打得满嘴是血！在年轻的共和国里，决不能这样行事。民主与残酷是不能相容的！"

"我憎恶这种容许剥削和折磨孩子的民主！"东尼克叫道。

听了这个答话以后，这一群人的情绪立刻就变了。

"这是怎么的，他在侮辱共和国吗？"一个腋下挟着皮包的青年人神经质地叫了起来。

"蛮横无礼到了极点！"原先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的一个老头儿挤近了一点，气忿忿地说。

"哎，这是个什么脚色！"穿着淡色格子衣服的先生说道。

"您大概是个布尔什维克吧？"

"是的，我是个布尔什维克，"东尼克挑衅地答道。

人群阴郁地笑起来了。

“啊，原来如此！”有人恶意地喊着，而原先笑孩子的那个太太尖声尖气地叫道：

“他是个布尔什维克，你们瞧，他是个布尔什维克！

东尼克周围的人群骚动起来了。这些小资产者从来不曾看见过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每天在报上看到各式各样血腥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杜撰的报道，而每逢星期天，他们又在酒吧间里听到庸俗不堪的讽刺歌。当他们第一次遇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们就记起了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大书特书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一切可怕的情形：……用手枪射击关在地窖里的人们的后脑壳，把人活埋在污水坑里，把伯爵夫人放在赤热的炉灶上烤，还用从年轻的武备中学学生手上剥下的人皮做手套。政委们杀人发了狂，要烤婴儿作菜肴，这婴儿是一个不中他们意的车站站长的儿子，如此等等……

站在人群中的小市民们已经想象到犹太人的抬头，公妻制，破衣烂衫的公主，被亵渎了的教堂，文化的没落和衰败，被掠夺一空的博物馆，提香和柯勒乔① 的画幅被泥水匠们用作围裙系在身上，一切可敬人士的消灭和他们财产之被杀人犯、盗贼、犹太人所侵占。自然，布尔什维克会断送捷克共和国！

在围绕着东尼克的人群中，有一个巴尔宾街的细木匠叫了起来：

“不要放过他！去叫警察来。岗警！岗——警！”

突然有两个渴望着活动的少年人从人群里跳了出来，飞快地向警察分局奔去，好象在逃命似的。在他们后面又有一个自告奋勇的人跟着跑，这个人的鞋底在人行道上嗒嗒地响着。

---

① 提香（1490—1576）和柯勒乔（1494—1534），均系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

怕失去自己财产的恐惧使得在东尼克周围的人们惊惶地心跳起来了。这种恐惧是由于怕新的美国炉子会被夺去，为了买这个炉子，物主积了三年的钱，最后，在去年，才在自己的饭厅里把它装了起来。这种恐惧是由于怕失去太太的那件樱桃色丝质的连裤衬衣，为了怕丧失存在布拉格市储蓄银行里的八百十五克朗的积蓄和在这半年里所生的利息……

小市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犹太人、德国人和共和国的灭亡，看到了大屠杀和那些穿着抢劫来的漆皮鞋、鞋上系着店铺里用的细绳子的野人们……

“不要放走他，不要放走他！”骚扰不安的人群叫嚣起来了。原先笑过孩子的那位太太尖声地叫着，好象在追逐着什么人似的：

“抓住他！别放过他！”

当人群开始静寂下来的时候，那位太太好象恍然大悟的样子开始向前挤着，用臂肘推开人们。

“搜查他！搜查他，看他有没有带违禁品！”

两个听了那女人的话准备动手的年轻人向东尼克走近去，但是东尼克采取了防御的姿态，眼睛闪闪发光，叫道：

“谁敢！”

于是年轻人还是留在原地方。

东尼克一点也没有想逃避的意思。他站立着，他的在场使人群感到恐慌，他的勇敢而无畏的目光约制着人群。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小车周围还是有着一个好似果酱坛里的气泡似的无人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站着东尼克，铺子老板，孩子和那位脸面刮得光光的、戴着眼镜、穿着淡色衣服的绅士，这个人在这儿显然是享有威望的。

铺子老板抹着鼻子，向这位绅士说道：

"您可知道，先生，我买这些熏鱼花了多少代价？我连钱还没有付清，正在绞尽脑汁，想从什么地方弄到这笔款子。昨天他还打碎了我一只盛着牛油的大玻璃瓶。"

"不，不，"戴着大眼镜的绅士挥了挥手说道，"打孩子总是不应该的！"

铺子老板弯身向着孩子，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到那位绅士身边。

"喂，告诉这位先生，你在我那儿过得苦吗？"

孩子否认地摇摇头。

"我给你吃得好吗？"

孩子点点头。

"我打你吗？"

孩子又摇摇头。

"这一点，我们刚才亲眼看到过啦，"东尼克冷笑道。

"您看到什么，您什么也没有看到！"铺子老板气势汹汹地说。"您叫我资产阶级的猪。我！我，先生，比起您来更是个无产者呢！我没有地方可以每星期六拿工钱，我也没有八小时的工作日，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我一直象牛一样地干着。"

"可是学徒也跟着您一块儿干的。只有您得到好处，而落到他身上的只有耳刮子，"东尼克插嘴道。

"好处！您不知道税有几多？"商人愤激地说，而狂怒的太太叫道：

"他是不付税的！"

"当然，太太，他是不付的！"商人转身向她，而这位太太又嚷叫着说：

“布尔什维克是不付税的，我们却是非付不可！你懂不懂这个，可疑分子？”

“您可知道，先生，我要花多少钱付房租？这一点恐怕没有一个人会问起！”铺子老板弯着身子，小心地推开人群。“请不要踩箱子……把它们收拾起来！”他向学徒怒吼着。

惊惶失措的安娜，手里拿着厚纸盒，站在人群中间，恐惧地看到人变得越来越多了，而其中同情东尼克的却一个都没有。住在这条街上的只有商人、家庭手工业者和绅士先生们，工人在此地是没有的。安娜心惊胆战地用眼睛找寻着辩护的人，她把希望寄托在那位似乎竭力要做得公正的、穿着淡色衣服的绅士。安娜挤到他身边，轻轻地拉拉他的上衣。

“先生，”她说道，“掌柜的可打了孩子呐。”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绅士严厉地回答，用冷淡的目光透过眼镜向她瞥了一眼，“可是请您别管这件事。”

安娜羞怯地走开了。

东尼克向她平静而愉快地笑了一笑。

“别怕，安娜，”他说道，鼓舞着她，“他们不会咬我，咬我要弄碎牙齿的。再说他们也没有勇气。资产阶级自己是不打架的，它惯于要别人替自己打。”

有人轻蔑地笑起来了。

“我们才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呢！我们这就给你瞧瞧资产阶级是什么样儿。”

在人群上面扬起了两根手杖，咒骂的声音响起来了。

东尼克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挺直了身子向前走了一步。

“我没有工夫跟你们罗唆，”他喃喃地说道，用右手推开了一个看热闹的人，又用左臂肘推了一下另外一个人的胸膛。

“不要放走他！”不知哪个爱好假别人的手来打架的家伙在后面嚷道。

东尼克把人们朝左右推着。安娜跟在他后面挤，好几次她的背上挨了打。

“咱们走吧！”当他们从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东尼克搀了她的手，对她说道。

他们沿着街道向上走着。大群的人跟随着他们。这些人中间只有那位狂怒的太太，勇敢到了极点，她居然想拦阻东尼克。东尼克转过身来，举起了手。

“听着，太太，我有生以来还不曾打过女人，但是假如您还要纠缠的话，我就要不客气了。”

太太的同伴们把她带走了。

忽然间，慢慢稀少下来的跟随着的人群活跃起来了，爆发出胜利的呼声。

“这儿，这儿，抓住，别放走他！”

两个警察沿着街道匆促地往上走着。在他们前面匆忙地跑着三个少年。

“这儿，这儿！”

东尼克冷笑了一声。

“等一等，”他对安娜说，“咱们别跑。”

于是他就站停下来等着。过了一会儿，警察和人群追上了他们。穿着淡色衣服的绅士又是第一个发言。

“我是凯特聂尔博士，参事，”他对警察们说道，“我正式向你们报告，这个人诽谤共和国。”

不多一会，警察、东尼克和安娜、戴着大眼镜的绅士和铺子老板就沿着街道向下走去了。铺子老板锁上门，显然很不乐意

去。他想溜走，但是没有溜成。他还在拿手帕抹鼻子，看看在不在出血。表示满意的人群走散了，只有几个好奇的家伙慢吞吞地跟在东尼克和警察的后面走。安娜在一个袖子上饰着金线的警察旁边转来转去。她心里害怕：她的亲爱的人儿要被带走了！这是乡下女人们在警察的刺刀和无情的法庭前面的恐惧。安娜要有很大的勇气才敢拉住警察的袖子，但是她终于鼓足了勇气把它拉住了。

"警察先生，这个人打了孩子。"

"不要管警察的事！"穿着绣有金线的蓝制服的那个家伙咆哮着。

"走开，安娜，别牵累在这件事里，"东尼克说道。

后来，安娜久久地在警察分局的玻璃门前站立着，那里放着一块红牌子，上面写着几个白字："警察分局"。她的东尼克就是被带到那儿去的。

四周街道上发出闹哄哄的声响，行人在人行道上走着，但是所有这些都仿佛在雾里似地飘散着。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好象一团纠缠不清的纱线，只有那块她不敢正视的红底白字的牌子在安娜的意识中清楚地竖立着。

从玻璃门里走出几个人来，但是在他们中间并没有东尼克。铺子老板出来了，随后又出来了几个不知什么人，后来是穿着淡色格子衣服的绅士，他用冷漠的目光瞥了安娜一眼。

最后，东尼克在门口出现了。

"东尼契克！"安娜叫了起来，抓住了他的手，"东尼契克！"

"不要象小孩子那样，安娜。走吧，"他说道，轻轻地把她从自己身边推开。

"他们没有对你怎么样吧，东尼契克？"

“他们能够对我怎么样呢？嗯，走吧，走吧。”

他们开步走了。安娜紧握着他的手。

“你不会有什么事吧，东尼契克？”

“呃，关两三天，就完事了。”

安娜把他的手指紧握在自己的手里。

“东尼契克！”

他带她向电车站走去，她顺从地走着，准备跟着他走，对什么事情都不问。

“乘车吧，安娜，你得挨家里骂了。我有个会，还要到家里去跑一趟。假如可能的话，上人民宫来。”

天开始黑下来了。东尼克帮她上了电车，用目光送着她。等到他已经看不见了，而安娜想往车厢里走的当儿，她突然看见普列栖德依——有着伤痕的大胡子和大学生亚罗乌施正站在自己前面。

“您怎么啦，同志？”亚罗乌施问着，一边同她打招呼，一边握着她的手。他的手又温暖又亲切，而他的目光表示着同情。

安娜忍住了眼泪，吃力地把经过的事情告诉他们。

“难道他不能躲开吗？”安娜讲完了以后，普列栖德依用着冷淡的声调问。

“他不愿意，”安娜回答。

昔日的红军战士瞅着亚罗乌施漫不经心地说道：

“蠢事！他为什么不在厂里的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呢？在街上跟些小市民们吵架，还让自己到警察局去，有什么意思呢？”

普列栖德依并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他只关心革命。

安娜惊奇而不解地朝他看了一眼。难道他把东尼克讲成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亚罗乌施说道，安娜马上就懂得这是为她说的，"东尼克在工厂里一定是做着鼓动工作的…… 他是好样儿的。"

安娜和这两个同路人一起乘了两站，对他们望也不望一眼。她感到自己把普列栖德依恨得要死。到伐兹拉夫广场，她就下了电车。亚罗乌施又用他那柔软而温暖的手掌同她握手，但是这次握手的时间并没有他所想望的那样久，因为安娜挣脱了手，几乎在电车还在开行的时候就从车厢里跳了下去。

"你会挨家里的骂，"东尼克在告别的时候说过，而他是说准了。一个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光，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惩罚，对于他过去和未来的罪恶的惩罚，都一古脑儿象食具从搁板上轰隆一声掉下来似的落到了他的头上。

当安娜刚刚关上身后的大门走进屋子的时候，女主人马上就跳到前室来了。

"你刚才在哪儿？"她突然吼叫起来了。

安娜吓得不敢回答。

"你刚才在哪儿？"建筑师太太叫喊着。她已经穿好镶着花边的晚装，身上戴着珠宝手饰，头也梳好了，粉也抹了。"废物，你真是个废物！"

房间门打开了，鲁别施向门外望了一望。

"走吧，不用发脾气，也不要睬她。到一号我们就把她撵走算啦。东西她带来没有？"

"带来了。自然，一号就叫她滚！"女主人叫喊着，从安娜手里把厚纸盒抢过来，走到房间里去了。

达德拉小姐来到前室里。

"你把信送去没有，安娜？"她甜蜜地低声说，假装上盥洗室

去的样子。

“没有，小姐。”

达德拉站住了，脸色变得苍白。随后，她用吃惊和疑问的目光瞪着安娜，但是还不等到回答，就露出牙齿，狞笑着，死命抓住自已梳好了的头发，仿佛要把它扯下来似的。但是她马上又想起不能再耽搁了，父母会怀疑到什么不好的事情的。

“嘿，混蛋！”她带着无法形容的狂怒喃喃地说，然后一溜烟消失在盥洗室里了。这个不幸的人儿甚至还不能发泄怒气，——不能重重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当达德拉重又走过安娜旁边，象先前那样狂怒地朝她吐了口唾沫的时候，安娜还是低着头，站在前室里。

安娜走到厨房里去了。她在厨房桌子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头搁在手上，闭上眼睛，希望什么都不要看见，什么都不要听到。一切都随它去吧！她听到主人们走出去的脚步声和院子里汽车的声响。随后就静下来了。

过了十五分钟，达德拉冲了进来。安娜并没有抬起头来。

“你为什么没有把信送去？”达德拉用了忍不住冲出口来似的声音叫道。“真是个废物，死尸，畜生！我恨不得把你杀掉，该死的婊子！”小姐不惜说出种种咒骂的话语。她把厨房门碰得那么重，以致搁板上的食具叮当叮当地响了起来。到头来，她在父母面前不得不保持的克己功夫得到了补偿！达德拉在寓所中的所有七间屋子之间跑来跑去，重重地碰着门，弄得石灰散落下来，灯架下的饰物铿锵作声，全所房子也震动了起来。安娜从来也不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时候，父亲发了脾气，拿拳头捶打她的头，——而父亲的手是沉重的，——但是他却不曾这样狂暴过。

过了一会儿，达德拉小姐又在厨房里出现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天哪，你对我做了什么啊！"达德拉放声大哭起来。"简直是斩了我，杀了我！"她用前额撞击着食具架子。

安娜抬起了头。

"您这是做什么，小姐！静一静吧！"

达德拉从炉子旁边走了开去，抓住了自己的发鬓，眼睛往上翻着。

"安娜，看在上帝份上，要知道今天这一晚，我象盼上帝赐福似的直盼了两个星期了。你还不知道你把我弄到什么地步。简直是杀了我！"小姐捧着头，失魂落魄地在厨房里跑来跑去。"天哪，天！"

"小姐，"惊慌失措的安娜喃喃地说，"恐怕我还来得及赶到那儿去吧？"

达德拉跳到她面前，用手指甲抓住了她的肩膀。

"去吧，安娜，"她嗄声地说。"快跑，安娜，为这事情我要送你一件漂亮的镶花边的细麻布衬衣。快跑！鲁箕已经不在家了，但是你可以上京都咖啡馆去跑一趟，假如他不在那里的话，到'阿尔克'、'爱迪生'或者'罗佛尔'去瞧一瞧。除了这些地方外，他可能在'罗科科'，在下面的酒吧间里。要是在那边也找不到他的话，乘车到格拉特羌街的熊酒店去。你可知道京都咖啡馆在哪儿？"

"不知道，小姐。"

"天哪，她什么都不知道！"达德拉呻吟似地说。

她抓起了钢笔和纸，开始写下咖啡馆、饭店、酒吧间、街道的名称和第几路电车，在安娜听不懂的时候，她便不耐烦地跺着脚。

“快去，安娜，快去，亲爱的，一定要把他找到，我会给你报酬的，再送你一条有花边的衬裤！到格拉特羌乘一路电车，上车的地方你是知道的，到了上面再问问别人。办好这些事情以后你别回家啦，妈妈和爸爸最早要到半夜才回来，拿五克朗去，在咖啡店里坐坐，看看杂志里的图画。快去，安娜，快去。没有忘记带钥匙吧？”

“不过先得铺好被褥。”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快去！”

安娜走到街上。今天的日子实在可怕。是否有人咒了她，或者对她用了妖术，要她在这一天里偿赎一生中所有的罪过？难道她得罪了什么人？小姐吩咐下来，也不想一想能不能做到。“快去找到他！”——就象差她去买面包一样！少爷小姐们常常是这样的，他们对什么事情就是逞着自己的性子做。

安娜在人行道上走着，乘坐电车，到酒吧间和咖啡馆去。人行道上的路人们推挤着她，她缠在旋转的大门里，在这个玻璃和木头做的旋转机里转了两次，才出现在被灯光照得炫目的大厅里，出现在许多镜子和洁白的台布中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怯生生地站在门帘旁边、穿着棉布工作衣的女仆；人家甚至没有把她当作乞丐而注意她，因为她很健康，同时又穿着得很干净。侍者们手里托着盘子，上面装满了咖啡具、放在银制小桶里的酒瓶和盛着菜肴的瓷盆子，在安娜的身旁跑来跑去，没点儿空，而年轻的侍应生们又为自己的燕尾服和白胸衣而自负，不肯降低身份来跟安娜交谈。只有坐在附近桌子旁边的客人们才发觉到安娜长得不错，并且还有一头漂亮的金黄色头发。在所有这些纷扰之中，安娜多少次胆怯地说：“劳驾……”但是并没有人理会，有时候，人家听完她的话以后，说道：“他不在这儿，”要不，更

糟的是："不晓得"，或者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她简直是无能为力了。当"罗佛尔"里的侍者们一连四次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不清不楚的话来回答她，同时一个坐在边上桌子旁的胖绅士使了个眼色、招手要她去的时候，安娜真想停止寻访，跑到符耳塔伐河边，投水算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来了，并且又来得那么轻易，好象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救助，而是最最平常的事情：十点钟的时候，安娜在"罗科科"找到了工程师法比安。她站在这个酒馆的衣帽间里，站在红得象生肉似的地毯上，而好心的侍者回答了她的询问："是的，他在这里。"于是就把工程师先生叫了出来。

这是一个年轻的、穿得很漂亮的男子，在安娜看来，甚至穿得太漂亮了。安娜发觉法比安身上洒了很多香水，并且抹了粉，套着浅色的鞋套，打着华丽的领结，手腕上戴着金表，中指上戴着一只指环，上面有着一粒大大的绿宝石，这粒宝石甚至把手指上的两个关节都遮没了。

"您有什么事情？"工程师傲然地问道，竭力装出绅士的声调。但是安娜发觉这不过是做作而已，法比安还没有象安娜的主人们对她讲话时所具有的那种自信力。

"我这里有封给您的信，先生。"

"拿来，"工程师说道，拆开信封，很快地看着信。在他的嘴角边掠过了得意的微笑。"好极了！"他最后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克朗的钞票，做出很大方的姿势递给了安娜。安娜脸红了，但是拿了钱。

工程师穿上浅色的大衣，在镜子面前久久地整理着他的彩色的围巾，那时候，安娜手里拿着钞票，踏上铺着红地毯的楼梯走到街上去了。这样一来，她是自由了，苦差使办完了。安娜赶

紧上人民宫去，盼望能在那里碰到东尼克。但是会议已经结束，人们已经走散了。安娜走到园子里，透过玻璃的墙壁朝亭子里张望了一下。那里只开着一盏电灯，有两张桌子旁边坐着人。一张桌子旁边的人们在玩着"结婚"，① 另外一张桌子旁边有三个同志在辩论着不知什么问题，而第四个人正在看《木工报》。②

"现在怎么办呢？"安娜一边思量着，一边向吉别尔恩斯卡亚街上的电车站走去。达德拉小姐叫她到咖啡馆去翻阅杂志的建议是完全不行的，——安娜对于这些咖啡馆、酒吧间和饭馆已经厌恶极了。如果再到咖啡馆去受这种羞辱，还不如低下头，为了不要招引男子们的目光，匆匆的在街上走两个钟点的好。主人们是些极端自私的人，他们所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安娜突然想起了曼尼雅，于是就赶紧上伐兹拉夫广场去。她拿自己的钥匙开了大门，顺着黑暗的扶梯走到四层楼。曼尼雅小房间里那扇有栏杆围住的窗子是朝楼梯开的。安娜敲着窗玻璃，起初是轻轻地，后来用力一点。但是曼尼雅并没有醒来。安娜就开始敲得很响了。

"是谁啊？"最后，发出了睡意蒙眬的声音。

"是我，是安娜。"

小窗上亮起灯光，随后窗户打开了，于是从雕着花纹的栏杆背后露出了曼尼雅的头。她挤挤眼，又眯起了眼睛，但是看见了安娜脸上的那种茫然失措的样子，就睁圆了眼睛，说道：

"你怎么啦，亲爱的？"

"曼聂契卡，求求你，让我到你这儿来吧。"

---

① 一种牌戏。

② 《木工报》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捷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机关报之一。——俄译者

"嗯，当然，来吧！"

曼尼雅悄悄打开向着楼梯的门，搀住安娜的手，在黑暗里领着她走进了自己的小房间。她们肩并肩地在床上坐了下来。对于女友的问话，安娜只能回答说："曼聂契卡，我多么倒楣啊！"随后，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啜泣代替了话语。曼尼雅明白了，也不细问下去。她们搀着手，久久地并肩坐着，这两个姑娘，一个是金发姑娘，另一个是黑发姑娘，一个穿着长衣，另外一个只穿一件衬衫，金黄头发的姑娘哭泣着，黑头发的那一个同情地望着她，抚摸着她的头，拍拍她的膝盖，说着："嗳，嗳！"

最后，谈话开始了。

"好啦，讲吧！"

于是安娜就诉说今天所受到的惊吓，从太太差她上姊妹家去取厚纸盒那时候起所遭遇到的一切都讲了。只有关于普列栖德依怎样欺人地批评东尼克一事绝口不提。当她讲到东尼克被捕的时候，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于是她就用双手蒙住了脸。曼尼雅的好奇心已经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并且也不再替朋友感到恐惧了，于是就竭力逗安娜高兴，把她推倒在床铺上，动手去呵她的痒。

"小傻瓜，哞哞叫的小牛儿啊，这都是小事，真正的小事！在布拉格，对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习惯，这儿不比你们的普尔凯尼崔啊！"

她替安娜脱掉鞋子，脱了衣服和袜子，安置她在自己的床上躺下，把被子一直盖到她的脖子上面，吻着她。

"喔，喔，糊涂虫！"

后来她就熄了灯，在旁边躺了下来。夜里，她们还久久地低声私语着。主人们表演的那场戏特别引起曼尼雅的注意，而当

她听到达德拉小姐那种狂暴的行为以后，她立刻恍然大悟了，她从床上坐了起来，举起了食指，打了个口哨。

“嗯哼！”她象这样子坐了约莫一分钟，仿佛在检查自己的揣测的正确性，随后，她要求道：

“喂，把所有的事情按着次序再说一遍。”

她很想把这桩事情好好体味一下。

于是安娜就把达德拉小姐的狂暴行为重又叙述了一遍。听完以后，曼尼雅下结论说：

“达德拉掉到泥坑里啦，这是一定的。她已经在打算着私奔了。等一等，这还只是开头，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呢。到明儿早晨一定得把这一切告诉德伏尔查企哈。”

最后，曼尼雅又吹了个口哨，这一次完全是短促的，仿佛打了个句号。

姑娘们转过身来，蜷曲着腿，背对背地睡着了。

“我们现在正象是奥国国徽上的老鹰，”曼尼雅边说边睡着了。这是她最末了的一句话。

武器，我们需要武器！

诊断原来是不正确的：一九一九年震动中欧的那种抽搐现象并不是由于世界上诞生了几个新国家以后所引起的产后性痉挛。这是一种产前的阵痛。诊断是错误的，因为事件进展得太快了。

在齐日考夫区东尼克寄住的那个靠屋顶下面的房间里，一个来自匈牙利的流亡的革命者①已经在他的床铺上宿了十夜了。在同志们还不曾替他弄到一张伪造的通行证、一个街头报贩的位置以前，他得一直住在东尼克那儿。这位流亡的革命者，是一个患着末期肺病的人，有着一双患热病似的深色眼睛和一张颇具特征的嘴，在这张嘴的黑洞洞的窟窿里，只看见三只牙齿——上面两只，下面一只；牙齿是出奇的白和坚实，好象松鼠的牙齿一样。这位匈牙利人叫向陀尔·凯烈凯施，从前曾经做过旋工。有一天，是在九月底，他来到设在人民宫的冶金工人职工会书记处。凯烈凯施瘦骨嶙峋，象条野狗一样，衣服破破烂烂，既无证件又没有钱。在当时，有好些冒充匈牙利革命分子的人——乖巧的小骗子，有时是警察局的特务，都拿了伪造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证明书到工人团体里来请求援助。但是同志们相信向陀尔·凯烈凯施，所以东尼克就把他带到家里来了。

东尼克和凯烈凯施两个人靠做手势和用铅笔在旧《人民权利报》② 的页边上草草画成的图形互相交谈，同时也靠了凯烈凯

施所知道的二十个斯洛伐克词和两个人都认得的三十个德国词的帮助。他们得花掉不少时间才能彼此领会，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工人，劳动把他们训练成顽强的性格，因此他们总是能够彼此了解的。

"懂不懂，他们把我缚起来，逮捕了……监狱。懂不懂，象这样狭小的，"凯烈凯施比划了牢房的大小，随后就用手指点着各种家具。"床铺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我在那里呆了十天，二十天，又加三天。每天——霍依吉，盖斯吉恩，莫尔耿③——门开了，一个后备军校的学生同两个后备军人——上尉伊姆莱·别拉斐伯爵和军事学校学生塔西洛·谦盖利男爵走进来了。他们剥掉我的衣服，什么东西都剥掉，我，赤身裸体；他们把我放在地上，把我的嘴往地上揿，瞧，就是这样的。然后一直揿住。军事学校学生带着一只瓶子，象放在那边你手提包里那只一样的。瓶里盛着硫酸……懂不懂？就是——H_2SO_4，我写在这里报纸上的。呵，懂得了吧？！在瓶里有一根鹅毛管。得把它画下来。瞧，这是鹅，再瞧这个，我们从它翅膀上拔下羽毛。军事学校的学生把羽毛管在瓶子里浸湿，随后插到我的肛门里。我大声喊叫着：'啊，啊，啊！'每天都是这样的——懂不懂？——霍依吉，盖斯吉恩，莫尔耿。十天，二十天，又加三天。上尉和军事学校的学生站在我面前，瞪着眼睛说：'讲！'我说：'不讲！'他们说：'讲，畜生！'我说：'不讲！'他们说：'讲，阿耳达尔·阿奇在

---

① "来自匈牙利的流亡的革命者"，一九一九年八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许多匈牙利的革命者为了摆脱反动政权的迫害，流亡到国外。——俄译者

② 捷克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于一八九三年创刊，一九四八年停刊。——俄译者

③ 德语，意即：今天，昨天，明天。

哪里，费歇尔在哪里，沙鲍在哪里？’我说：‘不讲！’他们带着鞭子。他们抽我，我昏过去了。一桶水拿了进来，浇在我身上——我的眼睛张开了。‘讲！’我说：‘不讲！’他们吸着烟，把燃烧着的香烟贴在我胸膛上。我死命喊叫起来，身子扭曲着。他们说：‘沙鲍在哪儿，阿奇在哪儿，古脱曼·维耳莫斯在哪儿，拉卡托斯在哪儿？’我说：‘不讲。’他们就鞭打我的脸颊。看见没有？”凯烈凯施指着打落了的牙齿，随后又脱掉衬衫。整个背脊伤痕累累，胸膛上布满了结好口的烫伤疤。“我的一个同志派洛·柯伐奇是被他们打死的。你知道，用装着沙的麻袋。这应该画出来。瞧，拿袋子朝头上打。被打的人摇晃着，随后就倒在地上死了。这个对刽子手说来是最方便不过的。医生来了，透过眼镜看看，检查了一下死者，耸耸肩膀：没有一点痕迹——脸孔是干净雪白的，身子上既没伤痕又没血。‘得啦，’医生说，‘死了，把他抬走就是。’上尉和军事学校学生一边笑，一边搓着手：‘他什么都没看出来。’这样子他们弄死了很多人。洪吉尔特，① 许多洪吉尔特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用装了沙子的麻袋把人打死是最方便不过了。‘他们也会把我这样弄死的，’我思忖着。怎么办呢？坐在牢里已经二十三天了。一个看守走了进来。不是上尉，也不是军事学校的学生，而是那个腰带上挂着钥匙、开门锁门和送饭进来的家伙。这是一个还不算坏的、上了年纪的人。我已经十分虚弱了。膝头哆嗦着，浑身没有力气，差点儿就倒了下去。但是我使出了所有的力气，伸直身子，朝后一缩——向他扑过去。咬破了他的喉管。我们在地上打滚，我紧紧地咬住，不让牙齿放松，喏，就是这三只挨打以后剩下的。瞧，它们在我嘴里突出着，好象松鼠的牙齿一样。看守死了，而他的血弄得我嘴里甜粘粘

① 德语，意即：一百。

的。多可厌啊！最好不要想起它。一想起这，我到现在还觉得不好过。这个看守并没有什么错处，所有的罪过都在伊姆莱·别拉斐伯爵和塔西洛·谦盖利男爵身上。啊，他们真是血腥的禽兽！将来有一天给我碰上的话，准要把他们干掉！”凯烈凯施大声喊出一句长长的匈牙利话。“一定的，捷克朋友，”他继续说，“我只能用祖国的语言才能说出自己的痛苦和报仇的渴望，因为只有用它，才可以狠狠地咒骂那生出刽子手霍尔蒂①手下血腥的走狗们的贼胎狗种……唉，我咳得多凶哪！我知道我染上了痨病……但是我得干掉他们！嗯，请原谅，这个以后再对你讲。我把看守的制服剥下来，穿在自己身上。逃跑了！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只得整天步行。还要躲躲藏藏的。我只能在田野里找到点东西充充饥，很少向别人要，因为这是危险的。只有一次，我在一个绅士面前脱掉制帽向他要火柴。他给了。丹凯匈恩！②火——这是好东西。伐尔姆。③我使劲扭了一下母鸡的颈子，把它放在火上烤。最后就来到布拉格。到了这里，我心上的石头就落下来了。这里有组织，有无产者，有共产党人……善良的同志们……”凯烈凯施重又用了祖国的语言说了些不知什么话。“同志，在我握着你的手、望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难道会不明白：我在向你道谢吗？”

是的，人们对于一九一九年局势的诊断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是产后的痉挛，而是快要分娩的征象。而在一九一九年的五月，人们又犯下了一个大错误。人民在“给投机分子的最后警告！”

① 米克洛什·霍尔蒂，一九二〇至一九四四年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执行镇压工人运动的血腥政策。

② 德语，意即：谢谢。

③ 德语，意即：暖和。

的口号下度过了这个日子，并且相信他们一定会清除奥帝国的余毒。

革命[①] 以后第一次，群众又出现在街道上。但是，在这一次游行示威中，已经看不见象战争结束后的狂欢日子里，人们的那种愉快的目光和舞蹈似的步子了；当时，捷克人获得了自由，庆幸着自己民族的独立，在街上欢呼着"那兹达尔！"[②] 并且高唱着国歌"嗨，斯拉夫人！"现在，游行的人显得又忧郁又严厉，就象一年前，炮口和挖掘好的坟墓还在各个战线上张着大口，而这些人集合在旧城广场上，以上千人的声音狂暴而激怒地朝市政厅的窗口喊着"和平……"时的情景一样。今天，他们又排成了队伍往市中心走去。来了那批复员的兵士们，半年赋闲的日子使他们明白了：在郊区的家里挨饿一点不比在战壕里或者俘虏营里挨饿来得好受，在战壕里或者俘虏营里，至少不会看到气冲冲的妻子和挨饿的孩子，也不会有人胆敢拿橱窗里的整条猪肉、熏火腿和象金字塔那样迭起来的酒瓶来逗弄他。来了那批奥地利军队里昔日的逃兵。林中生活、饥饿和迫害教会了他们一条聪明的规律："自已拯救自己！杀吧，要是你不愿意被别人杀掉的话！"军团[③] 里的兵士们也来了，因为在半年之内，他们还没有改掉坚决行动的习惯，还没有放弃对于自由祖国的想望，为了这个想望，他们战斗了五年，并且经历了重重困难，才算回到了家。这

---

① 指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捷克斯洛伐克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俄译者

② 捷克的贺词。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由奥地利军队中那些投降协约国的兵士所组成的捷克军团。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竭力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自由的、真正民主的共和国而战斗，在这个共和国里，劳动人民的最迫切的社会要求将获得实现。——俄译者

里也有着布尔什维克。他们为数不多，但是他们经过了俄国革命熔炉的锻炼，懂得事件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疲惫不堪的女人们从半地下室里跑了出来，她们要向那些为了一麻袋的麸皮拿走她们最后一条被子的老板们复仇。这里有着失去儿子的母亲和死掉丈夫的寡妇们——对于这些女人，"解放了的祖国"并没有给予怜恤，因为国家的行政人员无暇顾及，况且这样的女人实在太多了；她们好久没哭了，眼泪仿佛已在她们身上凝结起来，象块石头似的横在心上。来了残废军人的妻子们——对于这些女人，"和平与自由"仅仅使她们家里多添了一张嘴。那些盗窃成性的偷儿、懒汉和骗子也混进了游行的队伍，这批人在这个五月的日子里，看清了在共和国警察总长宾聂特的时代，可以跟帝国警察总长克尔希卡维和孔采时代一样方便和有利地偷窃。骗子们感到有机可乘，互相打着招呼：

"好极了，彼庇克！今天看来可以不用花多大力气替鲍仙娜弄到上衣和袜子了。"

来了那些袖子上缚着红布条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这批人明白今天示威游行的政治意义，并且奉到了上级关于让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到什么程度和不能超出何种范围的训令。他们接到上级的指示：游行应该经过哪几条街，在什么时刻必须把队伍带到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将在那里演说的旧城广场。在邻近的街道上站着警察巡逻队——以防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们袖子上的红布条不起作用的时候帮助他们。

阴郁的示威者们在布拉格以及捷克所有的城市和村镇的街道上迈着步。屋顶上扬起了"打倒暴君，扔掉枷锁！"① 的歌声；

① "打倒暴君，扔掉枷锁！"是波兰革命歌曲《红色的旗帜》的开头两句。在九十年代初，被译成捷克文，成了捷克无产阶级的革命歌曲。——俄译者

年轻小伙子们唱着讽刺投机商人的歌子：

投机分子，小商人，
交出你们的利润！
你们嘴里长满獠牙，
吸血鬼，发了财，够啦！

游行的人擎着安有麻绳绞索的新绞架模型，上面写着几个红色的大字："对投机商人的最后警告！"游行的人在敲诈得最凶的几家铺子前面停了下来，冲到里面，把那些躲在箱子和麻袋里吓得满头大汗、脸孔发青的老板带出来，让他们站在绞架模型下面，把绞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要他们郑重允诺不再投机倒把、在穷人身上发财，而要做年轻的共和国里规规矩矩的公民。卖肉商、磨粉商、面包商、酿酒商、食品商、服饰商和皮鞋商们用力咽着唾沫，结结巴巴地起着誓，而人群阴郁地缄默着。随后，这些商人就象俘虏似地被押送着走遍全城，眼睛里充满了愤怒的女人们接二连三地向他们咒骂着，而年轻的小伙子们则在他们的耳边唱着讽刺歌；当时这些俘虏心里想：这一切将会致命地损害他们的健康——有一个人患着糖尿病，另外一个有心脏病，第三个人生着腰子病，——同时，还想起了他们家里的太太和小姐们会怎样由于激怒而暴跳如雷，怎样歇斯底里地全身颤栗。商人们被带到市政厅，在那边的集会上，演说者还久久地在讲台上发表着关于廉洁、民主共和国以及最后警告的宏论。

这次五月的游行示威是多么大的错误啊！群众只想根除君主制度的最后余孽，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与资产阶级的民主面面相对着。示威游行的人不能决定怎样对付这些投机商人——

杀了他们呢还是不杀——可是借着这个象征性的绞刑发泄一下怨气，心里也就感到痛快了。

内地各城市的示威游行是依照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的指示举行的。而在布拉格，在这个五月的日子，在昔日捷克国王的王宫里第一次讨论着一个问题：在这自由的共和国里是否可以派遣军队来对付解放了的人民，来屠杀他们。想到这一点，就使得社会党的部长们惊慌起来，因为示威游行是为了支持他们的政策，为了表现社会党的力量和对政府里的那些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施以压力，而组织起来的。并且在目前那种令人不安的局势里，让人民把自己的失望和愤怒借着这种不伤人的绞架游戏尽情发泄，难道不是政府的一种聪明的措施吗？但是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却持异议。照他们看来，绞架，就算不是真的，这玩意儿拿在群众手里总是不妙，而那些可敬人士以及毫无罪过的商人们的财产的完整和人身的安全却是无论如何要保障的。

到了下午，社会党的部长们就开始失去了自制力和自信心。警察局来了报告说，示威游行原定的计划破产了：在旧城广场的集会结束以后，示威的人群并没有走散，他们一堆堆的聚了起来胡乱行动着，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威胁。警察总长宾聂特不断地在电话里和内阁联络着，在他的声音里含着焦急不安的语调。有人报告他说，军人们站在食品和皮鞋店的柜台后面，自己定了物价，当着无助的店主的面把所有的货物在几分钟之内销售一空。但是在这种场合里还维持着某种秩序——军人们不准抢劫并且还把收集起来的钱交给商人。然而也有一批不负责任的家伙，他们喊着说，投机商人从人民身上所榨取的要比今天所受的损失大上千百倍，于是就闯进衬衣店和布店里，从那里把一捆捆的布

匹扔到街上，而这些货物就被大家争先恐后地抢光了。在齐日考夫的酒吧间里有人喊价五克朗出卖丝袜、女上衣和漆皮鞋。

关于城里情况的电话报道越来越使人不安了。在街道上正进行着鼓动性的宣传。议员杨达克坐了汽车驶往各处，并且向人民发表演说。警察不敢擅自判断他的演说的价值，但是认为自己有义务报告：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演词是十分危险的。有一批不得不目之为布尔什维克的家伙跟随着议员先生。他们爬到电车顶和纪念碑的台座上，在那里作着煽动性的演说。他们讲着俄国的榜样，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并且还教导人民必须把玩绞架的游戏变为真正的革命。人民倾听着这类演词，热烈地赞同发言者的话，并且向俄国革命欢呼。警察们弄得毫无办法，因为使用武器是被禁止的。警察总长请求撤销这个禁令。有几个警察已经遭了殴打，有许多被解除了武装。危险性是挺大的，所以必须采取迅速而断然的措施。

傍晚时分，社会党的部长们被说服了，于是军队就被派往布拉格的街道上。并不是反对人民——喔，自然，不是反对他们！——因为人民在旧城广场开完会以后已经平安地各自回家了，——而是反对那批不负责任的家伙。

于是星期五就成了幻想破灭的日子了。“对投机商人的最后警告”并没有发生作用。虽然老板们在假绞架的绳索下面发了誓，答应把要求他们的事统统做到。然而无论是一个圆面包或者一公升牛奶都不曾跌价。很明显，问题不仅仅在于商人们的贪婪。奥帝国的余毒还不曾根除。但是劳动大众开始明白：目下斗争的对象并不是过去的势力，而是现在还富有活力、渴望着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群众行动迟缓，有时优柔寡断，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解；六个半月获得自由的欢乐——这不过是过去与

未来的斗争间的一个喘息期罢了。解放的欢乐现在是与争取美好的未来的企图相结合了，因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飘扬着红旗，同时在皇村上空也升起了镰刀与锤子的旗帜。列宁万岁！

工厂里又热闹，又活跃。工人们在上工以前已经知道了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在家里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匆促地翻阅着报纸，右手无心地一会儿拿起一杯咖啡，一会儿又抓住一块面包，而左手却不放松那张还有油墨气味的报纸。

“快吃，快吃，要不，就得迟到了！”妻子们生气地说。于是男人们就把报纸塞进袋里，跑出屋子，跳上挤得满满的电车，就在那儿，在难以想象的拥挤的场合中，也试着看报纸。全世界都行动起来了，而这行动的指导者并不是那些外交家和制服上绣着金线的将军们，而是工人大众。在匈牙利，在德国——慕尼黑及其他城市，——在芬兰，在爱沙尼亚，在意大利，工人大众行动起来了。还有在俄罗斯，主要的——在俄罗斯！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电车和早班火车里，人们进行着政治问题的辩论。从电车站到厂门的途中，人们一边跑一边交换着新闻，而在衣柜旁边换衣服的时候，又互相争论着，把一只手插进蓝色工装的袖子里，另外一只手寻找着第二只袖子。在车间里，在铸型和锻冶过的铁器中间，在马丁炉旁边，在煤栈里，在堆沙场上，热心分子和怀疑派，有阶级觉悟的和没有阶级觉悟的都在互相交换着意见。在所有的工厂和制造厂里，旋工们和木工们、裁缝们和染匠们、钻孔工人们和冶金工人们、面包工人们和磨坊工人们都是这样的。在织布机的隆隆声中，织工们互相凑着耳朵嚷着各种新闻，而发行科和包装科的姑娘们一边以敏捷的手指翻着纸张和锡箔，一边谈论着女友的情人的品格，现在她们感兴

趣的已经不是他头发黑色或是淡黄的问题，而是他有没有加入“鹰”或工人体育协会的问题了。因为革命已深入到了每个地方。

各种集会都是热烈而动人的。东尼克参加了所有最重要的集会，常常是跟安娜一起。鲁别施家并没有从一号起把她解雇，并且因为她坚持不屈，争取到了晚上可以出去的权利。东尼克和安娜坐在城外酒店里铺着方格子台布的桌子旁边，怀着与大家一样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讲演的人。他们已经不象平日那样搀着手了。东尼克的身心完全被事件进行的速度所控制了。并且几乎在每个集会上，他都发了言。

“同志们！”

东尼克在讲台上是多么漂亮，安娜为他感到多么骄傲啊！他的身子挺得笔直，蓝眼睛发出钢样的光芒，好象磁铁一样地吸引着大家的目光，而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同志”这个词儿就好比锤子敲着铁砧那样响亮。在讲台上的东尼克不是安娜所认识的那个东尼克了，好象这已经不是他，而是仅仅在这令人兴奋的时刻才出现的另外一个人了。

“同志们！”东尼克在人民宫园亭的舞台上喊着。晚上，装着玻璃的会议厅发着亮光，而从花园那边望过去，可以看得见里面的一举一动，好似看见一盏燃着的路灯的内部一样。会议厅里挤满了人，人们紧密地坐在小圆桌旁边，站在墙壁跟前，填满了舞台前面的空地方。在他们的头上，在烟草的烟雾里，仿佛飞驰着事件与希望的回声。一张长长的桌子移在舞台旁边，桌子旁边坐着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

“同志们，我们受骗了！”东尼克说道，“共和国是由我们一手建立的！为了共和国，我们在外国的军队里作战，有的逃到山

上，我们在军队里组织暴动，在后方进行着破坏工作。我们打仗、死亡、挨饿，而资产阶级却在那个时候逃避了兵役，在投机生意上发了财，逼得我们的妻子为了一钵子土豆而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件衬衣。但是现在谁在统治着共和国呢？是他们！我们还是象从前那样地做别人的奴隶。有什么改变呢？瞧瞧自己的手，铁匠们！难道它们比奥地利王朝时候软些了吗？纺织工人们，难道吸进你们肺里的棉花末子少点了吗？难道你们，掘土工人们的背脊少弯了一点吗？难道街上的乞丐减少了吗？由于肺病而死亡的穷人们少些了吗？瞧一瞧自己的孩子，工人的妻子们！难道他们不象从前一样地瘦弱吗？”

“在普尔希柯贝有许多吃得饱饱的孩子在闲逛呢！”一个充满了愤恨的女人声音在会议厅的深处叫喊着。

“人家答应我们建立一个牛奶成河、蜂蜜遍地的理想国，”东尼克用力地继续说，“答应的话不照做，就是帝王也会来这一套的。在那个时候，这种诺言称为皇帝的诏书，① 而在今天就叫做华盛顿公告。② 可是哪里做到了他们所答应的把矿井和重工业国有化？”

---

① “皇帝的诏书”，此处指的是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830—1916）在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所颁布的诏书，在这个诏书中，表示奥地利承认捷克历史上的国家法，并且承认捷克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它与奥地利的唯一联系是拥戴奥地利皇帝为统治者。皇帝的诺言并没有实现。——俄译者

② 《华盛顿公告》，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八日由托马什·哈利格·马萨利克在华盛顿发布的。在这个公告中，宣布了捷克的民族独立权，并且不承认哈布斯堡王朝在捷克的统治权。同时，《华盛顿公告》还答应捷克人民进行广泛的民主改革：建立一个有充分的信仰、出版和集会自由的共和国，使矿井和重工业公有化，赎买和分配地主的土地，采取反对投机商人的坚决措施，以民兵代替正规军等。这些诺言大部分成了空文。——俄译者

"我们受骗了!"在静寂的会议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呼声。

这声音发自少地农民联合会书记,一个瘦弱、青筋毕露、长着鹰钩鼻的人。他的深色眼睛突然发出光来。

身材魁梧的石匠,脸孔仿佛是由石头雕出来似的,把拳头搁在桌子上,慢腾腾地说道:

"他们想哄骗我们,争取时间,然后在共和国里建立起自己的秩序。"

"哪里做到了一口答应过的分配地主的土地?哪里没收过投机商人的财产?"东尼克把这些简短的话语象燃烧弹一样地扔到会议厅里。"哪里做到了政教分立?"

在讲堂上响起了一片笑声。

"塔博尔——我们的纲领!"① 不知哪一个叫喊着,于是笑声更响了。

"上星期……"有个女人嚷了起来,但是在大伙的嘈杂声中听不出来,于是她就等了几秒钟。"上星期在维歇葛拉特,一个银行送信员被人抓了去,为了他在走过拿着圣礼的牧师身旁的时候没有脱掉帽子!"

会议厅的玻璃墙由于笑声重又颤动了一下。

"哪里做到了拿民兵代替正规军?"东尼克继续说,"政府每月扩展着军队。为了什么?到去年,我们知道了原因:为的是要

① "塔博尔——我们的纲领!",塔博尔是捷克南部的一个城市;在十五世纪初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胡斯战争)时期中,它是急进派——塔博尔派的活动中心。"塔博尔——我们的纲领!"这个口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捷克资产阶级思想家托马什·哈利格·马萨利克提出的,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其争取国内的统治权、与奥匈帝国的专制制度和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企图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到它的方面来。——俄译者

把我们的兵士变成世界资本家的雇佣军，同时把匈牙利革命淹没在血泊里！为了他们要杀害那些争取做人的生活条件的匈牙利无产者！”

“可耻，可耻！”厅里发出了震耳的声音。在这些叫喊声里含着愤懑和羞耻感。“这种事怎么能够发生?!为什么我们让别人来欺骗自己！我们工人的组织也在参与着这种刽子手干的事情！”

会议厅里仿佛象炸药爆炸似的轰隆一声响了起来：

“可耻，可耻！”

“是的，同志们，可耻！”东尼克叫着。“那些命令由革命建立起来的军队去扼杀匈牙利革命的人，那些甚至企图扼杀俄国革命的人，他们的耻辱是洗不掉的。那些同意这样干、把咱们运动员的队伍派往斯洛伐克去①的我们的领导人，他们的耻辱也是洗不掉的。”

东尼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全厅的人也沉默着：讲演的人触到了痛处。阴郁的寂静笼罩着全厅，除了有几个人闷闷不乐地说道：“对，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敢再多说，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只要一说出“叛变”这个可怕的词儿以后，党就要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关于这一层是大家都害怕的。只有少地农民联合会的书记以他的鹰般的目光环视着与会的人，他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指着那张旁边坐着议员的桌子，喊着：

“这是你们干的事！”

在场的人打了个寒噤。

“……我们受骗了！”东尼克继续说，竭力把全厅人的注意力重新吸引过来。“我们上当了。他们反反复复地对我们说：‘忍耐

① 指体育组织“鹰”的队伍于一九一九年四月至七月受命镇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红军。——俄译者

点吧！'这句话在四年战争期间我们常常听到。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现在来告诉你们。要等到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已经稳固、把军队和警察都抓在自己手里为止。那时候，资本家就会抓住我们的喉管，说道：'你们别再搞下去了，工人们！民主和自由这个玩意儿已经搞得够了。我们要减低工资，废除八小时工作制！现在照我们的吩咐行事吧！'"

安娜为亲爱的人儿而自豪。瞧他站立着，涨红了脸，他那闪着钢样的光芒的眼睛吸引着全厅人的目光，同时把这些人的愤怒、痛苦和希望化为自己的感情，然后又用激动的言语把这种感受向人群表达出来。

"他多漂亮啊！"安娜想道，她渴望着他会想起她在这里，因而向她那边望一眼。但是东尼克并没有朝她看，在他看来，安娜的目光已同所有其余的人的目光融而为一了。安娜已经不再去理解东尼克的言语，她只听着他的声音，而这就是她的乐趣。他那举着的手发散着力量，并且还发散着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她全身起了战栗的感觉，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啊，她是多么爱他啊！

东尼克的演说快结束了。他挥了一下手，眼睛闪着光：

"俄罗斯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为着我们大伙儿的斗争。在俄罗斯，工人们正在为我们大家流血。在俄罗斯，正为我们，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可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表示我们也能够成为这斗争的忠实的参加者！俄罗斯革命万岁！"

人民宫的园亭由于热烈的呼声而震动着。东尼克走到台边上：

"世界革命万岁！"

听众们狂呼起来了："万岁……光荣归于列宁！光荣归于革命！"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声，烟草的烟雾袅袅上升，人们的兴奋的脸面和鲜红的旗子闪现着。东尼克涨红了脸，站在脚灯旁边叫喊着：

"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万岁！"

园亭的玻璃墙险些儿震碎了。无论什么东西——画着森林的舞台侧面啦、主席台啦、玻璃杯啦、满满的烟灰缸啦、方格子台布啦、天花板下的灯光啦——仿佛全都在旋转起来。使敌人们生气的呼声喊叫着："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万岁！"在这个呼声中含着对过去的激烈的憎恨，对于未来幸福的幻想和解放的欢乐，含着未来巷战时的激昂的心情，含着复仇和胜利的调子。人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挥动着手。

"第三国际万岁！"东尼克叫道，"光荣属于领导我们走向斗争和胜利的人。"

"光荣！光荣！光荣归于列宁！"

东尼克走下台，来到厅里。他的脸由于激动而涨得通红，太阳穴上露出了青筋。他从许多排得很挤的桌子中间穿过来。厅里还是人声喧哗，鼓掌声象雷鸣似地响着。东尼克在安娜旁边坐了下来，以目光和微笑同她打着招呼。她倾身向前迎他，淡蓝色的眼睛温柔地瞧着他。

主席，一个老木工，站在自己的桌子旁边，等待着大厅里的人声静下来，可以让下一个演说者讲话。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一个黑头发的汉子已经跑上了讲台。昔日的红军战士普列栖德依！安娜的脸色变白了，她不能容忍这个人。

"同志们！"普列栖德依叫道，并没有去理会主席。后者看到没有办法阻止，只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普列栖德依的声调跟东尼克的完全不同。它好似磨快的刀一样的尖锐和锋利，引起了安娜的敌意和恐惧。

“叫喊和鼓掌对谁都没用，”普列栖德依开始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挺冷静，并且语气中还带些轻蔑的意味，仿佛他不能容忍那种认为在目前，除了他所坚信的那条出路外，还有任何其他出路可走的想头。安娜感到这个人不但象刀一样的锐利，并且还跟制刀的金属一样的冷冰冰。“空谈也是没有结果的，”普列栖德依继续说，“让社会民主党那些讲废话的人去搞这一套吧……”

会议厅震动着——发言者毫不留情地触到了人们的痛处。他在说什么，难道他们大家不是社会民主党员吗？

坐在主席台后面的老工人站了起来。

“同志！”他温和地说道，拉了拉发言者的袖子。

“去你的！”那一个恶狠狠地回答着，“别去听社会民主党这些空话，自己行动起来啊！替自己去找武器！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主席站起来，扬起了手。

“同志！”他严厉而郑重地说道。

一片呼声打断了他的话语：

“让他说！让他讲话！”

秩序混乱起来了，人们从位置上站起来，主席喊叫着不知什么话。坐在舞台旁边那张桌子后面的议员中，有一个站起身来，以冷淡的目光朝听众望着，看来是在那儿估计着反对派的力量。

“静一静！”不知哪个象雷鸣似的声音在厅里喊叫着，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听他。

“让他说，他是对的，让他说！”一个头发灰白的女工嚷叫起来。在她的脸上现出了一块块的红晕。

“听他说，让他讲话！”厅里响着叫喊声。

大多数与会的人都从位置上跳了起来，在会议厅的各个角落里组成了一伙伙的人群。很明显，这里有着两个敌对的阵营，党内意见有了分歧，大家为党的命运担心。想到这一点，就使人们气愤填膺。人们彼此叫嚷着，竭力向自己人那儿靠拢一点。在厅的左面，有个脸色苍白的少年跳到桌子上，拖长了声调叫着：“静—— 一 ——静！”这使得秩序更加混乱了。少年被人从桌子上拖了下来，女人们叱骂着他。议员们坐的那张桌子被那挨紧得象堵墙壁似的许多人体围住了，人们嚷叫着，做着各种手势。工人们挤到脚灯那里，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推挤着坐在前面几排桌子旁边的人们，不去理会他们的抗议和女人的尖叫。这些人站成半圆形，挥着手，向主席叫道：“让他讲话！”“我们不准别人禁止他发言！”“我们就是要听他说话，你们的话我们已经听了千万次了！”

主席向普列栖德依不知说了些什么，但是后者做了个拒绝的手势。

安娜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她渴望能够参加到中间有东尼克，但是，当然没有她所痛恨的普列栖德依在内的那一边去。为什么他在任何地方出现总得惹出纠纷来？

后面，简直就在角落里，静悄悄地坐着向陀尔·凯烈凯施。他的额头上出着汗，眼睛燃烧着。在右面靠墙的地方站着亚尔达·杨达克，他现在已经忘记了安娜的眼睛，他是在刚开会的时候看到她的。东尼克在前面，在汉子们中间。全厅沸腾着，喊叫声使它震动起来。

普列栖德依走到脚灯跟前，喊叫着不知什么话。只看见他张开了嘴，但是话语却听不到。他做着手势，要那些在舞台前聚

拢来的人向后退。人们听从了他的话，舞台前面的人群稀疏下来了。大家开始明白主席团不得不让步，而普列栖德依就要讲话了。厅里响起了一片胜利的笑声。一伙年轻人开始鼓起掌来，厅里有一半人跟着他们这样做。

普列栖德依挺直身子，举起手来，表示他要讲话了。人声静寂下来了。坐在舞台旁边的那些被挤得顶住自己桌子的人移动着椅子，一个女人拿手绢揩拭着被溅湿的衣服，向周围的人群投着愤怒的目光，嘴里抱怨着这些"疯子们"。

普列栖德依开始说道：

"没有武器你们会完蛋的！资产阶级是武装了的。如果你们让它走在前面，你们要完蛋的。你们有武器握在手里，可能也会失败，但是如果没有武器，那就一定得失败。资产阶级是不讲感情的。"讲演者脸上的白色伤痕抖动了一下，"难道你们当真以为：只要在我们国内唱唱流行的人道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高调，就可以避免牺牲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使没有流血的事情，工人们也会死亡的。假如你们不死于巷战的话，你们就会死于肺病。假如你们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变成孤儿而逃避斗争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死于瘰疬症和佝偻病。不要忘记一点：在目前的那种生产和物质资料分配的方式下，我们国家是不能够养活我们的。但是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移居！失业和贫穷的现象增长着，这一点你们自己看得出来。饥饿和死亡也在等待着你们！"现在，普列栖德依已经不是冷淡而轻蔑地说话了，他躬着身子，仿佛准备跳跃的样子，他挥动着拳头，眼睛闪烁发光："你们可知道，如果千万个注定要死亡、但是现在还活着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而能够挺身起来斗争的话，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将会获得怎样的胜利，我们每个人将会获得怎样的胜利？当一个有钱人被

子弹射穿脑袋、死在墙脚边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他，各国的报纸都惊惶地哀悼他。但是没有人会看到你们临终前的痛苦挣扎。你们可能千百万地死在战场上，成千地死在工厂里、手术台上、木棚里的铺板上而没有人回头瞧你们一眼。只有当工人在巷战中被警察的子弹打死的时候，才有人留意到他的尸体，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是由于他死亡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作了战的缘故。到了那时候，市侩们便会对那些驱使人民去反对武装警察的不负责任的煽动分子们满怀义愤。但是指使这批警察动手的正就是那些满怀愤怒的诸君，正就是那些好心肠的资本家。他们不希望发生这些可怕的事件，因为这会破坏他们在国外的信用。如果我们无声无息地死去，那对他们说来是合意得多了。但是正是那死于巷战的几十个革命者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拿起武器来，同志们！”普列栖德依热烈地叫喊着，而“R”① 这个声音就跟战斗信号似的滚转着。“你们有了武器就会得胜！只要看一看，你们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少人！只消一次攻击——政权就在你们手中了。夺去富人们的财产，惩治叛徒，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国家的经济和各方面的生活。劳动者做主人，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的时机还不曾过去，虽然很快就会太晚了。资产阶级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我们的领袖正在这一点上帮它的忙。但是资产阶级还没准备好战斗，希望还是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我们给资产阶级以时间，让他们作好准备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消灭掉的。”

厅里笼罩着紧张的寂静，但是跟东尼克演说时的那种寂静不一样。人们的目光已经并不融成一条单一的巨流，作为产生

---

① 捷克语“武器”一字里有“R”这个字母。

演说者眼中新的力量的源泉了。现在，这些目光就跟放电和闪电似的交叉着，使彼此感到惊讶。这是空前未有的力量。讲演者，一个新来的人，向大家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喜交集的远景。

“斗争，只有斗争才是你们的救星！而为了斗争，第一，需要武器，第二是必须把那些阻拦你们斗争，那些有意使你们麻痹的人从自己的队伍中驱逐出去。赶走屠萨尔、迦勃尔曼、文特尔、汉普耳！① 这些就是你们的大敌！毫不客气地撵走他们！”

脸色苍白的主席从位置上跳了起来。

“我不允许有谁侮辱党和劳苦功高的工人领袖们！禁止你发言！”他用着由于激动而发颤的声音叫喊道。

混乱开始了。人们从桌子后面跳起来，托盘和啤酒杯子叮当响着。普列栖德依把双手放在嘴上成喇叭状，然后叫喊起来，压倒了群众的喧哗声。

“我讲完了，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把领导者们撵走，自己武装起来，这是你们胜利的两个条件。”

他走下梯级，开始从人群中挤过去。全厅响着雷鸣般的声音。议员们的桌子旁边重又围住了人，那里群情激昂，领袖们昔日的威信扫地了。集会的主席站在舞台边上，低低地弯着身子，一面做着手势，向站在下面的人们不知说些什么。

普列栖德依朝四下里张望着，寻找个可坐的地方。他发觉在东尼克的桌旁有两只空位子，于是便走了过去。一阵憎恨的感觉使安娜的脸色变白了。普列栖德依向他们点点头，微微一笑。

“啊，爱人们！”

---

① 屠萨尔、迦勃尔曼、文特尔、汉普耳均为捷克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当时捷克资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人物。

跟他同时，有人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个人东尼克先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矮个子，头发稀疏，全副模样儿没点生气，戴着眼镜，好象商店里的伙计或者小公务员似的。

"妙极了，同志！"他阿谀地对普列栖德依说道，"你对他们说的这番话真对！"

昔日的红军战士用目光扫了他一眼。东尼克留意到那人在说出"你"和"他们"几个字时的古怪声调，这是人们在不能十分自信是否有权用"你"这个称呼时的那种音调。东尼克怀疑地望了望这个戴着眼镜的家伙，那个人重又勉强地笑了笑。

厅里还在喧哗着。

"继续开会，"主席叫着，"奥乌葛腊勃卡同志有话要说。"

只有坐在前几排的人听到他的话语。人群的愤怒尚未平息，但是聚在舞台前面的人已经稀少了。老奥乌葛腊勃卡，党的老战士，七十岁的纺织工人，在舞台上等待着。他站立在画着森林的布景旁边，他那没有光彩的、象未漂白过的麻布似的脸面和稀疏的、象一绺绺黄麻样的头发在舞台的碧绿的背景上显得非常突出。他的脚完全是弯曲的。这个世袭织工的母亲是在波尔盖斯纺织工厂的车间的纱堆上怀下他的，并且也就在那里，在那些原棉包上把他养了下来。到了七岁，他就在这个工厂里开始做插线轴的活儿，拿到十五克莱泽① 一天的工钱。厂里的窗子总是盖着厚厚的一层棉花飞絮，透过这一层飞絮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这些飞絮永远侵蚀着老奥乌葛腊勃卡。现在他站在舞台上，很有耐心地等着人们坐好位置。

"静静！奥乌葛腊勃卡同志有话要说。"

---

① 奥地利旧时的铜币。

厅里静下来了，于是社会民主党的先驱便摇晃着弯腿走到脚灯跟前。

"同志们，"他开始说，"我不想讲很久的话使你们厌烦，但是有一点是一定要说的……"他的声音很呆板，仿佛它也饱含着棉花飞絮似的，但是却很坚定。在他的七十年的生活里，奥乌葛腊勃卡在千百次集会上以及跟那些老捷克人党党员、青年捷克人党① 党员、国家社会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农民党党员以及教权派分子的辩论中讲过不少话。"直截了当跟你们说：遗憾的是在我们的集会里发生了象今天这样痛心的事，遗憾的是在我们社会民主党员中间失去了团结。要知道只有靠团结，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多少过得去的生活条件。你们大家都比我年轻，同志们，所以你们之中很少人会记得在我们还刚刚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有多么艰苦……"

听众们表现了同情的脸色，准备耐心地听下去。每个人都已经逐字地知道了老奥乌葛腊勃卡要说的话，大家已经听了多少遍这个马尔凯特代表大会② 和罗斯托契耳③ 时代的受难者的叙述了。

坐在东尼克桌子旁边的那个戴眼镜、活象商店伙计的家伙重又弯身向着普列栖德依：

"你说得真好！对！"

"你这样想吗？"那一个微微笑了一下。

---

① 老捷克人党和青年捷克人党是奥匈帝国时代的两个党派，前者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的党派，后者为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党派，两者均为反动党派，与封建主和教权派相勾结。

② 指捷克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七八年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俄译者

③ 罗斯托契耳是一个以迫害社会民主党党员出名的捷克地方司法机关的官吏。——俄译者

“唔，当然！我也在想我们一定要有武器。没有武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

“你觉得怎样，我们一定要弄到武器吗？”

坐在普列栖德依邻座的东尼克用膝头推了他一下，但是那一个却在桌子底下把东尼克的脚轻轻地推开了。

“我认为需要的，”戴着眼镜的家伙回答说，“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好的，我去弄武器来。”

东尼克为普列栖德依的这种轻信的举动吓坏了，便插到谈话中去：

“我好象不认识你，同志，在这里看到你还是第一次。”

“你大概不相信我吧？”陌生人急忙问道，声音那么响，弄得邻座的人气冲冲地嘘了起来：“嘘——嘘——嘘！”他匆促地从衣袋里拿出党证来，把它递给东尼克。

老奥乌葛腊勃卡在舞台上叙述着半世纪以前工人们的生活有多么艰苦。纺织工人们一星期做七天工，每天工作十三个到十四个钟点，而挣到的却只有十五到三十克莱泽。工人们吃和住都在工厂里，往往就在那里死去，女工们也就在那里生养孩子。工头们打上了年纪的工人们的嘴巴，用绳子来抽孩子们。警察是车间的常客，人们为了拿走一块破布或是说了一个反抗的字就被抓去。工头们无耻地纠缠着年轻的女工们，并且强迫女工和他们姘居。每到晚上，在工人们从工厂里回家的当儿，小市民们一看到他们便会绕个大弯，因为工人们的身上发出机器油、黄麻和烧酒的味儿，并且他们还爱说粗话。

不感兴趣的听众们冷淡地听着老战士的话，甚至没有装出关心的样子来。这一切早已过去了的可怕现象跟他们有什么关

系呢？大家都知道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奥乌葛腊勃卡的呆板的声调活跃起来了，在他的无神的眼睛里突然闪过火样的光芒，于是老人就开始讲到在符耳塔伐沙滩上社会主义者们的头几次集会，讲到工人们的地下组织和报纸，讲到自由的曙光升起时的情景。厅里的人们很想告诉讲演者："我们很尊重你，老同志啊，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哪怕讲一句得罪你的话，但是要知道，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走下讲台吧！我们敬爱你！在你死后，我们要拿红花铺满你的棺材，而且会永远纪念着你，只是请你现在放弃这个题目。你讲的什么都是过去的，而目前，在我们面前却展开着未来。"

东尼克把党证交还给"店伙计"。

"你是齐日考夫组织里的，马尔齐克同志？可是我们彼此却不认识？"

"我住在国外，一个月前才回来。"

普列栖德依笑起来了。

"布拉格人真是小心，什么都怕，"他对马尔齐克说道。"可是我却认得自己人。这样说来，同志，你答应了把武器运到这里来吗？"

"很愿意，"那一个答道，"你住在哪里，同志？"

东尼克重重地踢了一下普列栖德依的脚踝。

"在卡尔林，考罗列夫街六号，二层楼，施列格罗娃的住所。但是你不会在家里碰到我，我过三天就动身到汉堡去了，武器在那里，在一艘泊在港口的轮船上。你能够上那儿去吗？"

"没问题！"

"准定的！"

"一言为定！可是我不会白跑一趟吧？"

“不会的，这一点我可以担保。”

“得什么时候到？”

“过一星期。地址是汉堡，圣－保尔，阿耳吉尔大街一百二十七号，魏斯吉尔曼客栈。在那边，你会从我那儿拿到机关枪和一箱子手榴弹。通过国境的事我们再来安排，行吗？”

“行！”那家伙说道，有一点儿惶乱的样子，向普列栖德依伸出手来。

“现在让我们听讲演吧，”普列栖德依最后说，“要不然，大家就得一直回过头来瞧我们了。”他向东尼克转过身去：“怎么，这个弱老头儿是自己爬上舞台的呢，还是主席团塞上去的？”

“不是的，”东尼克回答说，安娜看到他跟普列栖德依说话就觉得不高兴。“奥乌葛腊勃卡同志是常常参加大集会的。”

“我也一贯反对跟资产阶级联合……”传来奥乌葛腊勃卡的声音；老人接触到一点现代的事情了。

戴着眼镜的家伙拿出一本簇新的厚笔记本簿子，在那上面记下普列栖德依在布拉格的地址，并且重又问了一遍汉堡的地址。

“我一定来，”他说道。

“来吧，你可以信托我，我会等你的。”

老奥乌葛腊勃卡又讲了很久。他阐述着那能够使工人们摆脱过去的不幸，并且给他们的美好前途以保障的团结的意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是有力的、统一的，随便哪样的分裂只会对敌人有利。

“是的，同志们，必须跟资产阶级断绝关系，我也是这样的想法，”他结束道，“我们的领袖们应当要服从工人群众的意志。党的分裂是不能容许的，这是最可怕的事。让我们在集会上讲话，

向工人们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的领袖们自己不懂得必须跟资产阶级断绝关系的话，那么，他们得无条件地服从工人阶级的意志。我的话完了。”

响起了一片鼓掌声，但是多半是为了习惯才拍手的。弯着腿、身材矮小、脸面跟未漂白过的麻布样没有光彩的奥乌葛腊勃卡从舞台上走了下来。

“老头儿错了，”普列栖德依向东尼克说道，“他连情况都不了解。分裂将会出现，领袖们是不会执行工人群众的意志的，”接着他便掉转身子向着戴眼镜的家伙问道：“你的意见怎样？”

“当然，他错了，”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惊惶失措的马尔齐克答道。

议员安东宁·聂密茨，①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主席，走上了舞台。他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胖胖的男子，有着粉红色的秃顶，戴了副金边眼镜。听众们以沉默来迎接他，这种沉默反映着他们复杂的情绪——愤怒、激动、好奇。

“亲爱的同志们！”聂密茨开始不慌不忙地说道，“前面几位讲演者有许多地方说得对。我们共和国的情况早就不能使我们，工人们，满意了。”聂密茨很自然而肯定地把东尼克和普列栖德依所提出来责难政府的各点一一重述着。“我，就我自己而论，还想在这些评价中加上与之同样重要的一点：在工业方面，危机的征象是显而易见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们打算把这危机的重担推在我们身上。他们哪怕在自己巨大的战争利润中放弃一部分也不愿意……”

昔日的红军战士带着冷笑望着讲演者，叫道：

① 安东宁·聂密茨(1858—1926)，捷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者之一，党的机关报《人民权利》的总编辑。后来他是党的右翼的领导者。

“讲得好！我一直在等着你什么时候会说：‘但是终究’或者‘虽然如此’。”

厅里的人笑起来了。

“嘘——嘘——嘘！……静静！”不知哪一个愤怒地喊着。

从座位上发出的叫声并不使这个老练的讲演者发窘。他整了整金边眼镜，威严地望着普列栖德依坐着的那个方向。

“请原谅，公民，”他故作镇静地把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据我记忆所及，我没有打断过您的话，同时希望您也让我说完。我称您为公民，而不称您为同志，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您是否是我们党里的人……”

“你真会在集会上耍花样，”普列栖德依笑了起来。“一点不奇怪：这是多年的惯技了！”

“我们认得他！”人声响起来了，“我们大家都认得他！这是普列栖德依同志。我们在战前就认得他了。”

“议员先生也认得我的，”昔日的红军战士冷笑道。

“我相信你们认得他的，”聂密茨不慌不忙地说，“但是有不少战前我们认得的人后来不见了，回来的时候好象换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不愿意以不公平的责难得罪任何人。如果你们相信他，那么，你们总有相信他的理由。至于我呢，”他指着自己的胸膛，“我是不十分相信那种在集会上公开谈论炸弹、炸药和定时炸弹的人的。”

安娜很满意这种对普列栖德依的斥责，她是那样满意，竟至想笑出来。她忍不住向东尼克投着欣喜的目光。但是那一个却抱着另外的想法。

“自然，他在扯谎，”他说道，把头朝讲演者一点。“但是如果现在站起来声明这一点的话，他会说他所指的不是今天的集会，

而是普列栖德依在那里谈论炸弹的其他的集会。”

普列栖德依冷笑着，这使他的白色伤疤变得更明显了。但是马尔齐克，没经验的家伙，却拚命大笑起来。别人扯扯他的衣服，于是他便马上不作声了。

“但是还是让我继续讲下去吧，”讲演者说道，“这样一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聂密茨议员还不立即就说出普列栖德依所期待着的“但是”。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集会上是相当不稳固的，而如果在聂密茨以后，反对派里没有一个人来得及再作演说的话，那是对领袖们有利的。工人们的集会很少在晚上十点以后结束，并且在这种场合，大多数的与会者通常总是早退的，因为过了十点就得给看门的钱。现在已经九点，讲演者应该说得简短一点；但是他却故意拖长他的发言，过了十五分钟以后，他才转到臭名昭彰的“但是”上去。他沉默了一会后，就重新带着沉着的、颇具自信的神情透过金边眼镜朝普列栖德依的方向望了一眼。

“现在，”他说道，“让我们转到这个‘但是’上来吧。尖起耳朵听着，普列栖德依公民！但是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困难的境况？”讲演者在他说话的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提高了声音，象雷鸣般地喊着，“你认为一定要迫使工人们去对抗刺刀、机关枪和大炮吗，普列栖德依公民？你认为应当在首都的街道上洒满高贵的、无产阶级的鲜血吗？你想，普列栖德依公民，假如出现成千成万新的寡妇和孤儿的话，我们的境况会变得好些吗？”

在会议厅的各个角落里，有人喧嚷地、示威式地拍起掌来。赞同讲演者的人有几分之几？五分之一呢，还是六分之一？大家的头都转向鼓掌的那一批人，因为大家都对此很感兴趣，特别

是聂密茨；他的目光从眼镜底下向厅里搜索着。

当厅里静下来的时候，普列栖德依站起来，喊着：

“我们不是到街上去寻死的，而是去得胜的！”

全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些掌声比议员所获得的更响亮、更长久。年轻人明显地都站在普列栖德依一边。

聂密茨平静地站在舞台上等着。淡淡的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上。他把右手举到下巴上，轻轻地摇晃着食指。这个姿势激起了听众的好奇心。

“不，不，普列栖德依公民，”讲演者的粗手指象钟摆一样地从这一边摆到另一边，“我们太意识到自己对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良心的责任了，因此，不但不能容许这一类的罪行，”讲演者的整个身子向前弯着，喊出了这些话，“并且要竭力阻止那些不负责任的、轻率的或者冒险的家伙去干这样的事情！您知道，普列栖德依公民，我说得很客气，因为我愿意相信您发表这些危险的谬论不是故意的。我决不称您为煽动分子。同时，对于我们说来，俄罗斯革命是神圣的，普列栖德依公民，对我们说来，我们俄罗斯兄弟的斗争是神圣的。但是我们的情况跟俄国人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另外一条路。”

“跟克拉玛什①一伙吧！”叫喊声响起来了。

“我们是不跟克拉玛什一伙的，”讲演者坚决而镇定地答道。“相反的，你们知道，我们把克拉玛什逐出了政府。”②

①②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捷克国内进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克拉玛什（捷克宣布独立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所领导的国家民主党（代表大银行资本、捷克大地主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的政党）遭到了惨败。“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们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克拉玛什内阁倒台，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和农民党的代表所组成的政府。领导这个政府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屠萨尔。——俄译者

“施魏格拉① 也不见得好些！两个人半斤八两！”

“我们向来是不跟资产阶级走同一条路的。如果说我们参加政府，那么，我们有着另外的理由这样做的。参加政府使工人们不仅可以实行监督……”

厅里的人笑起来了。

“照你们的意思，如果资产阶级独自管理国家的话，情况会好些吗？”讲演者问道。

“不！我们要自己管理！要无产阶级专政！”叫喊声鸣响着。

“对啊！”聂密茨谦逊地点了点头。“毫无疑问，同志们，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早就包含在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了。我们应当向这方面努力，同时我不怀疑我们将来一定会把这种口号付诸实现。”讲演者愉快地微笑起来了。“但是我实在担心，”他用了和蔼可亲的谈天式的口吻继续说道，“假如我们总是互相打断别人讲话，那我们就难以交谈了。让我，同志们，安静地把话说完，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话，他有讲话的权利，可以发表意见，因此……”

普列栖德依走到舞台跟前，望了一下主席台上讲演者的名单。

“在他后面登记的是迦夫连议员，随后是富密耳冈斯校长，”他走回来的时候笑着向东尼克说道。“但是他们已经来不及讲话了，登记也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我走了。你们这一对爱人留下吧！”

“我们也要走了，”东尼克说道。“安娜得在锁大门以前回去。”

---

① 安东宁·施魏格拉（1875—1933），农民党的领导者，在屠萨尔领导的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

“那么你留下吧，马尔齐克同志，”普列栖德依命令式地对戴着眼镜的家伙说道。那家伙窘了起来。“留下吧，留下吧！一定要学习怎样开始做地下工作。我们一下子都走掉了，那会引起别人怀疑的。那么，一定要来的啊，我什么都会准备好的。”

“一定来！”

安娜、东尼克和普列栖德依走出来了。安娜不高兴普列栖德依跟他们一块儿走，于是就竭力不去瞧他。他们穿过庭院。一束束的光线透过园亭的玻璃墙倾泻出来。他们经过大门，来到第一个庭院。在那里，他们被大学生亚尔达追上了。

“你为什么走掉了？我想同你谈谈，”他对普列栖德依说道，但是安娜觉得杨达克在他们后面追赶是为了她的缘故。

“十点半我要从威尔逊车站动身，在这以前，还得到家里去一趟，”普列栖德依回答。“聂密茨老头向大家唠叨个没完，他们过一刻钟就会走散的。这样一来，这个会议就一点结果都没有。你们做得真糟透了！让他们去领导集会实在是蠢得可以！”

他们走过人民宫的两个庭院，来到后门。印刷所里的轮转机刚在开始工作，编辑部窗子里面的灯光亮着。

“你到哪儿去？”亚尔达问道。

“上维也纳。这里的警察已经在搜捕我了。而现在又没有闲工夫呆在安全的地方坐等。再说这里又没有事可干；要是有的话，我倒会留下的。可是你们这里还光是在那儿讲空话。”

“你相信这个马尔齐克吗，普列栖德依同志？”东尼克问道。

昔日的红军战士笑起来了。

“真少见，你们这儿的特务竟这样蠢！”他说道，“簇新的笔记本、党证，并且又马上答应把机关枪和炸弹运过国境，但是过一个星期，我可真的到了汉堡了。”

“干吗你把他请到那儿去呢？”

“要是他肯去的话就好了！可是他不会去的：布拉格的警察头子宾聂特只要写封信通知汉堡的警察们，让他们去办这件事就完了。在那边港口里，确是停着一艘外洋轮船，船上有着可靠的同志们。他们会把象这个密探那样的混蛋引到货舱或者下甲板舱里，拿螺旋钳朝他的脑袋上一击，然后扔到港口的脏水里去。如果这种坏蛋不干掉的话，他会断送几十个同志的性命。”

安娜听了这些话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他们从人民宫出来，走到那喧嚷的、灯光照得通明的布拉格夜晚的街道上。普列栖德依回头瞧了一下，看见他后面没有人跟踪着，于是就紧紧地握了两个男子的手，随即跳上电车的车厢。

亚尔达·杨达克一直陪着安娜和东尼克走到伐兹拉夫广场，虽然他开头说他只是为了要追上普列栖德依，想跟他谈几句话才从会议厅里跑出来的。安娜看透了这个用意。当东尼克在鲁别施的房子前面拥抱她、吻她的时候，她感到很高兴。她回报他一个热烈的吻，然后红着脸，伸手给发窘的亚罗乌歇克。他们俩都把视线掉向别处，但是安娜既温暖又亲切地握着他的手，仿佛同情地说道：“我心上已经有了别人了，亚尔达……”

剩下了大学生和东尼克两个。

“我很想同你谈谈，”亚尔达说道，抑止住自己的激动。“让我们到随便哪个咖啡馆去坐坐。”

“好吧。”

近旁，“派沙日”的灯光照耀着，这是一所有着镀金的枝形灯架和大理石墙的豪华的咖啡馆。从那里面传来奏着某种感伤曲调的弦乐队的声音。大学生向咖啡馆的门口走去。

“上这儿？”东尼克问道。

“是的。”

“这地方我不去。”

“为什么？”

“就是不去。”

“究竟为什么呢？”大学生感到惊奇了。“或许你怕见那些干净食具和银匙子吧？总有那末一天，无产阶级会用瓷器吃饭，会使用银的碗盏的。”

“这一切都是空话！”东尼克气冲冲地说道。“有资产者在那儿的地方我不去！假如你高兴的话，让我们到齐日考夫街上的随便哪一个咖啡馆去，要不然，我就回家了。”

“好，去吧！”惊奇不置的大学生回答道。

他们默不作声地开步向齐日考夫走去。

东尼克的激怒很快就过去了，他开始想起今天的集会，重新体验着争论时激动的心情，注意到所犯的错误，并且估计着战略上的可能性。普列栖德依是铁面无情的，但是他，和往常一样，总是对的：多么愚蠢——让他们来主持集会！他们使它迷失了方向。显然，奥乌葛腊勃卡老头是他们给塞上台去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东尼克的心依旧在集会上，而大学生却单单想着安娜。亚罗乌歇克感到很悲哀。安娜和东尼克的接吻刺痛了他的心。他还在体味着安娜的握手，明白它所含的意义。他感到羞愧，同时红着脸想道：“刚才在派沙日咖啡馆旁边彼此间的这种恼怒的心情是什么事情引起的？是工人和知识分子间的冲突呢，还是爱着同一个女子的两个男子间的反感？”

他们向齐日考夫的高架桥走去。夜晚的街道上，行人已经渐渐稀少了。

“你想，党内会分裂吗？”东尼克突然问道。这个问题提得那么突然，弄得大学生茫然不知所措，——他所有的念头都在安娜身上，——但是他立刻就控制住自己。在他的记忆中突然涌现出人民宫的园亭，在天花板下面烟雾缭绕中的电灯，关于武器的言论、标语，画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于是他就开始讲到革命。这使他的心头轻松了些，他仿佛在以自己的话语压倒一切其他的想头，高兴着自己的热情转到别的事物上去了。他讲到俄国同志们的榜样，讲到列宁，讲到无产阶级群众的胜利和夺取政权，讲到向未来的飞跃，讲到“我们街上的节日”。

“党分裂与否反正都是一样，”他热烈地肯定说，“这已经不能起决定作用了。革命已经开始，它是阻挡不住的。它象自然力，象烽火，象洪水！”

“不知道，”东尼克冷冷地说道，“可能是的。但是革命一定要有领导。普列栖德依说得对：必须要有武器。”

大学生开始讲到自己的父亲和党内同志——杨达克议员，并且阐述了父亲对于社会民主党统一的看法。杨达克认为一部分领导者是不会跟着革命走的，他们过于资产阶级化了，而革命的那一派又不能领导全党跟着自己走。所以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建立新党，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将成为它的战斗的先锋队。这必须立刻去做，并且要不惜任何代价！

他们走近齐日考夫的高架桥。东尼克默不作声。大学生转述着父亲的见解，他的父亲是属于极左派的，与维也纳和柏林的左派有联系，并且通过他们与莫斯科有联系。在这一周里，他要在克拉德诺开会。矿工们的克拉德诺比布拉格更具革命性，初次的爆发就会在那里出现！

东尼克默不作答。

“可惜父亲刚才没有在人民宫！他在里本开会，他在那里跟汉普耳作斗争。”

“可是你为什么到人民宫来，”东尼克想，“为了安娜吗？”

大学生觉察到了他的对谈者的冷淡和故意的沉默。

“你为什么不作声？”他神经质地问道。

东尼克耸了耸肩膀。

“你为什么不作声？”大学生气冲冲地重复问。

“你父亲不会跟我们走一条路的，”东尼克突然说。

这种想法已经不止一次地涌上他的心头，象那突然爆出火光、随即又熄灭的火星一样地闪现着。如果没有这场谈话，东尼克就会永远不把它说出来的。

他们走在高架桥底下了。亚罗乌施挡住了东尼克的路，两个人都站停下来。火车在他们头上隆隆地响着。在路灯底下的墙壁上，可以看到那画着卓别林像的五颜六色的戏报。

大学生抓住东尼克的手。

“你疯了吗？！”

东尼克凝视着他，摇摇头。

“你是否知道了什么有损父亲名誉的事情？”

“不，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

东尼克没有回答。

“不要不作声，这不是办法。作为一个同志，你有义务回答我。”

“别再提这个吧，亚尔达，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你应该谈的！”大学生叫喊着。

“好吧，我讲，”东尼克说道，“问题是：我看见你母亲戴着雪

白的手套,穿着漆皮鞋,而你的姊妹穿的又是绸衣服。"

亚罗乌施放开东尼克的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你疯了!"

"没有。"

"为了这个缘故,我父亲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吗?"

"就为这个。"

大学生神经质地笑起来了。他们默默地在齐日考夫的夜街上迈步走去,进入一个三等咖啡馆,那里坐着一伙手艺匠和一个瘦瘦的女人。有一张桌子旁边,人们在玩着纸牌。两个靠妓女养活的家伙,差不多只有中学生那样的年纪,在那儿等待他们的女友给他们送钱去,同时由于无聊的缘故,往手摇风琴① 里丢着铜子。歌剧《卡门》中的斗牛士的抒情曲象雷一般地鸣响着。在手摇风琴的玻璃上画着冬日的景色和一座磨坊。

东尼克和亚尔达在涂饰成大理石模样的铁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涂脂抹粉的女侍者端给他们两杯咖啡的代用品。

大学生坐着,把胳臂支在桌上,双手紧按着太阳穴,同时摇着头,直望着东尼克,而东尼克也没有掉开目光。手摇风琴还在那里轰隆隆地雷鸣着,吐出斗牛士的抒情曲,邻座的赌徒们玩着纸牌。

"但是这真可怕,"大学生伤心地说着,"这简直是可怕——工人与知识分子间这样的不信任!"

东尼克啜着带甜味的流汁。

"这样说来,问题都在于白手套、漆皮鞋和绸衣服了。自然!这是太资产阶级化了……就跟'派沙日'里的干净杯子和银叉子

① 一种装有机械发条的风琴,音调象管弦乐。

一样。但是假如安娜替自己买了件绸上衣的话，你是否会不再喜欢她了呢？”

“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自己就会买给她这样的上衣的。”

“瞧你自己！”

“但是我永远不会有钱的。”

“啊，原来这样！你的意思是：凡是有钱的人就不能成为革命者吗？或者你在想，”大学生愁眉苦脸地说，“我父亲的薪水是向资产阶级领取的吗？”

“别谈这个吧，亚尔达。我已经说过我并不知道关于你父亲的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他是不会跟我们走一条路的。”

一旦说出的话，东尼克是决不放弃的。

“这样说来，你对我也是不信任的——因为我有一只带着金链条的表？如果我把它取下来，送给那两个无赖的话，你觉得合意吗？”

“你在胡扯了！”

“明天我卖掉它，把钱捐作党的经费。”

“你别说空话了！现在我是相信你的。但是假使你不得不在我们和父亲之间选择的话，那你是会选择你父亲的。并且你又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因为你得结束你的学业，要变成一个工人，在你是不可能的了。那是愚蠢的，同时对谁都没有用处。让我们瞧瞧一年之后的情形，或者还可能早一点。”

大学生还是坐在那里，两手按住太阳穴，眼睛朝下望着。“是工人与知识分子间的争论呢，”他想，“还是两个钟情的男子——幸运的与被摈弃的之间的争论？”他的处境是多么不利啊！

他又想着关于父亲的事。

“这是可怕的，东尼克，这是最大的不公平！三十年来，父亲

一直跟你们在一起斗争，为你们工作，所想到的只是你们的成功，而你们却还是不能够原谅他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受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教养，我们是在你们中间成长的，而你们却不肯把我们容纳到你们工人的大家庭里来。这是可怕的！”

“你——是的，对于你是可以这样说的。你虽然并不是在我们中间长大的，但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你是例外。然而究竟连你也是跟我们不同的……”

“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学生扬起了头。

“我怎么知道呢？这个关于咖啡馆的例子自然是没有意思的。但是你刚才唠唠叨叨的说了许多关于银匙子和干净食具的话，而你却连想也没有想到：一个工人在那样的‘派沙日’里面，看到那些把自己掠夺得精光的混蛋们便有一种无名的忿恨；他穿的不是他们那样的衣着；他在那样的咖啡馆里一举一动都觉得别扭，并且也不知道两手应当怎样去拿那些漂亮的东西。你在各方面都跟我们不同！你就是这样子的！再拿党的领袖们、议员们、各位书记和编辑来说，把他们全都挑遍，请说给我听听：你曾经看到过哪一位的儿子或女儿是同我们在一起的，即使单只一位也好！听了这些话以后，还能对我们的怀疑感到惊奇吗？尤其是在目前，和平时期已经过去、重大的事件快要来到的时候。”

大学生久久地以悲哀的目光凝视着东尼克。似乎，在他的眼睛里快要淌出泪水来了。

“那么你怎样想象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呢？”他问道。

“怎么也想象不出！凡是跟我们一起在街上作战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我们的人。但是知识分子对于事情决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把个别的叛徒干掉虽然有用处，但是也不能解决问题。决定权掌握在工人大众的手里！”

“黑　手”

安娜变成东尼克的妻子了。这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弥漫着闷人的晚香玉香味的华丽的寝室里，不是发生在海滨的棕榈树丛中，甚至并不是发生在犹太炉子的峡谷里，在天幕上的千万只星灯底下。这么热烈的光景是发生在伐兹拉夫广场三十三号房子的门廊里，当有一天晚上，东尼克和安娜一起走进大门，想在上二楼的途中再接几次吻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写了那么多书描写爱人们拥抱时的甜蜜？可是接吻使人愉快多了。”安娜想道。在这几分钟的全部欢乐里，她意识到自己因为东尼克要这样做，因而就顺从了他。这一晚上，安娜许久没有把自己小房间里的电灯熄掉，她躺在那里，眼睛凝视着天花板。这一天是她一生中的转折点。

“糟啦！”曼尼雅听了安娜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她以后，说道。

过了几天，曼尼雅在往铺子去的途中，又问安娜事情怎么样了，听到说没有变化以后，她的鼻子皱起来了。

“你倒了楣啦。想不想弄掉？”

安娜不懂，于是曼尼雅就向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不，安娜不想弄掉！

那么怎么办呢？

东尼克成了站在住宅分配科旁边的队伍中的常客了。他一出厂门，就出发去找那些有可能帮他解决房子问题的议员、党的

头头以及每个有势力的熟人。他，安东宁·克罗乌斯基，从来也没有向谁请求过什么事，现在却解释着、陈述着、请求着，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感到自己仿佛被人殴打一样。他所获得的答复是漫不经心的目光和千篇一律的、于事无补的询问。这些被请求的人耸耸肩膀，手指轻叩着桌子，嘴里说上一句敷衍的话："这件事很伤脑筋，我的朋友。"议员们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几句介绍的话，有势力的熟人们打发东尼克去找另外有势力的熟人们，而他又得在接待室里坐等，这一切简直使他烦恼得要发狂了。由于这一类奔走，东尼克损失了工资，而车间主任已经为了东尼克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给假半天、工资照扣而开始朝他皱眉蹙额了。但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机，在这新生的共和国的首都里，人口是过剩了。有钱人自然是找得到房子的，同时也没有一位来自工人的议员，没有一位职工会的头头或党的领袖或编辑会在晚上没有地方安枕的。但是对柯耳卞工厂的一个工人、他的爱人和他们未来的孩子说来，在布拉格是找不到住处的。

"现在怎么办呢？"安娜思忖着，她的心由于恐惧而麻痹了。"怀孩子是不能长久瞒住别人的。"安娜已经有了四个月的孕了，每到早晨摸着自己肚子的时候，她暗暗惊奇太太和那个对于这种事很留神的达德拉居然还不曾看出来。以后怎么办呢？如果有某一个工人家庭肯收留她，而她就在那里呆下来的话，那么，把自己积蓄下来当嫁妆的几十克朗花掉以后，东尼克就得为她负债了。然而要是什么地方都不能收容她的话，那又怎么办呢？安娜晚上常常从恐惧中醒来，额上布满了汗水。回家吗？决不！她心里明白，在家乡她将受到何等样的讥笑，同时也明白父亲会怎样对付这件事的。不，最好还是投符耳塔伐河吧！

但是建筑师太太和达德拉小姐哪有工夫想到安娜。小姐害

病了。有一天下午，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把达德拉用汽车接了回来，并且跟一位不熟识的先生一起扶着她上了楼，把她安置在床上。当下太太非常焦急不安，她的肥胖的脸面带着土色。等到那位不相干的先生走掉以后，太太便走到安娜跟前，她的下巴颤抖着，眼睛闪闪发光。

"安娜，"她叫道。"达德洛契卡的脚扭坏了，得躺上几天。她需要很周到的照料。周到，懂吗？假如你不好生服侍的话，你会遭殃的！"

接着，女主人便用拳头在安娜的鼻子面前挥了几下。

做母亲的这种为自己唯一还活着的孩子极度焦虑的急躁情绪是安娜所不能了解的，她只是想着："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凶呢，难道我得罪小姐了吗？"

晚上鲁别施回来了。他心绪不好，这从他那皱起的眉毛上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当她在女儿床上坐下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变得开朗了。

"你怎么搞的，小马儿啊？瞧这些倒棢的高跟鞋把人弄成这样！算啦，别怨了，医生会把你治好的，以后我们再送你到什么地方去按摩。有一次我的腿也扭伤过的，这玩意儿痛得很厉害，我知道的。"他拍拍女儿的肩膀。"好吧，静静地躺着，以后我送你件好礼物。"

达德拉吩咐把梳妆台移到床跟前，她梳着头发，扑着香粉，结着睡帽上的玫瑰色带子，并且朝三面镜里欣赏着花边衬衫对她可合适。显然，她并不很难受，因为她通常只要有些小痛就得把全家都折磨着，而现在，她并没有愁眉苦脸的样子，反跟安娜打着哈哈。

"生活真是极有趣的玩意儿！对吗，安娜？"当安娜用托盘端

给她早餐的时候，她说道，一边笑着，一边伸着懒腰。过后，达德拉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嗳，安娜，爸爸说你的爱人是布尔什维克。可是真的？”

安娜不作声。

“别抵赖了，我们反正是知道的。你去转告他……”小姐又笑起来了，但是现在，这笑声与其说是出于高兴，不如说是出于怨恨。“告诉他：让布尔什维克们毁掉全世界吧，同时别忘了我们这所该死的房子！”达德拉朝镜子里瞥了一眼，整了整头发。“你过得很好吧，安娜？”

安娜连脸色也变白了：是的，她过得好极了。真亏小姐说得出！

“嘻，干吗你象出神似地望着？可以走了，我用不着你了。要不要巧克力糖？”

“不要，谢谢，小姐，”安娜拒绝说。

“好吧，由你。”

达德拉小姐的害病还不算是鲁别施家最不愉快的事故。主人自已或许处在更坏的境况里：每天总有叫叫嚷嚷和突然冒火的事情。主人们争吵着，为了建筑师不肯分给舅子们的几千克朗，此外，为了女主人向姊妹那里借的钱，——这笔借款由后者转到兄弟们的帐上，而他们就向鲁别施要钱……——总之，是错综复杂的事情。主人们在安娜面前竭力不谈这些事情，而当她去上菜或收拾桌子的时候，鲁别施夫妇就会说到一半突然中止谈话，只是彼此恶狠狠地瞪着。但是如果争吵继续到整整一个星期，家里再也不谈别的事情的话，那么可以从片言只语中知道很多事情。而当主人怒吼得全房子都听得见的时候，仆人就什么都明白了。

“难道你以为我的钱是偷来的吗?”主人在吃午饭的时候叫喊着,从桌子旁边跳起来,把餐巾揉成一团,开始在饭厅里跑来跑去。“你的兄弟们是些什么东西,真是骗子!这种人应该坐牢!坐牢,懂吗?”他把餐巾朝地板上一扔,“十二万!莫非你们以为我一生象牛样的工作只是为了供给你们挥霍吗?没廉耻的老狐狸!他们梦想我会一声不响就给钱的!他们可想错了,真是见鬼!从我这方面说来,这是完全合法的契约。瞧着我要叫他们坐牢!”

有一天,他没有按照平常的时间回到家里,往书房里一坐,按铃叫安娜,吩咐她喊太太来。当安娜通知太太的时候,她的脸色变白,但她还是去了。

在书房里,谈话开始了。主人时不时地提高嗓子,但是立刻又压低了——大概太太在提醒他:仆人可能会听见的,或者是他自己忽然想了起来。但是有一次,他还是大声地叫嚷起来,连厨房里都能听得到:

“最后一次问你:你把这六千克朗用到哪里去了!不要编谎话,你骗不了我的,我一切都很清楚!你从姊妹那里借了这些钱,而她就拿这些骗子,你的兄弟们的钱来抵你的债!你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女主人哭着,激动地不知解释些什么。

“住嘴!”主人打断了她的话,“我来告诉你,你把它们用到哪里去了:寄到达伏斯,给那个下流胚跟她的懒汉去了。”

那时候,女主人便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声音里充满了极度的恨:

“我赌咒我没有寄一个钱给兹芹诺契卡!我拿最神圣可贵的东西——那两个你还给我留着的孩子的生命来赌咒!懂吗?

同时我的兹芹卡不是下流胚，听见吗？你……你是凶手！”

长久地只听到悲哀的哭声和主人在书房里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随后，低抑的谈话声又开始了。

“安娜！”

这个尖声的叫唤是从达德拉的房间里发出来的。安娜朝那里望了一眼。

“您要什么，小姐？”

达德拉的黑眼睛在一堆枕头和花边中间闪闪发光。她正躺在那儿看书。

“他们又在那里嚷嚷了吗？”

安娜默默地点了点头。

“让鬼逮了他们去才好！”达德拉咬牙切齿地说道。“多可诅咒的生活啊！”她把书朝房间的另一端扔去，接着就把头埋在枕头里。

鲁别施家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争吵、叫喊，一切都是为了钱。到了晚上，主人们又在寝室里吵嘴。契斯特米尔死后女主人所下的、永不再跟丈夫合用一个寝室的决心并不能持久，她睡在独用的房间里没有超过一个月。有一次接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的信以后，她便带着苍白的脸色走到厨房里来：

“来，安娜，帮我搬搬床。”

于是她的床铺和化妆台就搬回到寝室里去了，因为没有太太每天清早从丈夫的皮夹子里偷来的那些钞票，兹芹卡就不能在达伏斯生活下去。她为孩子们作了不少的牺牲，而这种牺牲比起其他的一切牺牲来更为艰苦。女主人久久地含着眼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姑娘，跟你说几句话，”一清早，看门女人小声叫唤安娜，同

时，在大门口挑了个地方站下来，使得别人不能从鲁别施的窗口望见她们。"你们的小姐身体怎样了？还在害脚痛吗？"德伏尔查柯娃狡猾地微笑了一下。"嗳，姑娘，昨天有个穿淡颜色西装的先生老是在这里踱来踱去。有没有到你们楼上去？"

曼尼雅也总是每天早晨等候安娜的。

"扭伤了脚脖子？"当她们手里提着篮子沿伐兹拉夫广场往上走的时候，曼尼雅说道，"他们想哄骗谁呢，你说说看！我跟德伏尔查企哈统统都明白：你们的达德洛契卡出了岔子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出了岔子，所以只得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妈妈。鲁箕替他们找到了医生，那一个拿到三千克朗替她打了胎。所以，在这一桩事上只花掉三千克朗，而你们那老头子却喊着说六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鲁箕是个大骗子，他想靠鲁别施家过一辈子。你看见过他没有？我昨天碰到过他的，穿着簇新的衣服，手杖上的捏手是金的。他向你们的太太敲竹杠，对她撒谎说那个医生的助手敲诈他，拿这件丑事和牢监来威吓他。想得出这样的鬼话！难道医生助手会这样骗钱吗？但是你们那老婆子可着了慌，从姊妹那里借了钱给他。瞧，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我不是对你说过，闯下了大祸吗？好一户人家！象爱掌上明珠似的爱护着自己的小姐，不放她一个人在街上走，也不肯放她一个人上戏馆和电影院，但是她却在五分钟之内挣脱了锁链——瞧，就是这么回事！而对我们这班傻瓜呢，就拿那些把姑娘们焊在铁桶里的白铁匠来吓唬我们！"曼尼雅忽然站住，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使她恍然大悟。"嗳，安娜，她的脚可是包扎起来的。"

"包扎的。"

"夹在夹板里呢，还是用绷带包着？"

“只用绷带包着。”

“谁包扎的，医生吗？”

“不，是太太自己。”

“啊哈，见鬼！啊，这些老狐狸！这样做是骗骗鲁别施的！”

安娜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心里在想着另外的事情。她只是思忖着：达德拉小姐“逃过关”了！安娜的目光在伐兹拉夫广场上转来转去，她仿佛觉得：这条热闹的街道是在离她很远的某个地方，她好象是从颠倒过来的望远镜里看它似的。四周的一切看上去又陌生、又异乎寻常。达德拉小姐“逃过关”了——这个念头不让安娜安静下来。曼尼雅挥着食粮袋，向她讲着太太的兄弟们的事情：他们中间的一个在社会工作部做事，另外一个担任布拉格市政局顾问的职务。他们跟鲁别施合作，替他拉到定货，而他所得的好处就跟他们一起分摊。在杰依维茨装修排水管这一工程上，鲁别施就从市政局骗到了两百五十万！

安娜不经心地听着。她觉得周围的街道黯然无色，而行人们好象银幕上的影子一样。原来达德拉小姐“逃过关”了！并且什么事也不曾临到她头上——在床上躺几天，一切就都跟从前一样了。多么便当！

安娜突然把视线从广场上掉开，定睛俯视着自己的双脚。“不，”她心里想道，“不，决不！”而这个“不”字就象东尼克嘴里说出来的“不”或“是”同样的坚定。

曼尼雅还在讲着鲁别施在接受国家定货时的欺诈行为：据说建筑师没有把二十万克朗跟舅子们分摊，关于八万那一笔，他们已经谈妥了，但是为了那十二万，他们还是在争吵着。

“怎么办呢？”安娜想着。她跟东尼克没有房子住。东尼克到处奔波都落空了。昨天，达德拉小姐的目光比平常更久地逗

留在安娜身上。

"我要请'黑手'帮忙了，"昨天东尼克愁眉不展地说道，于是安娜便想起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尼克·卡尔吉耳的冒险行为。"黑手"——这是齐日考夫区的秘密组织，是该地房主们恐惧的对象。关于它的其他情况，东尼克就全然不知道了！……

"不，不，这样到头来还是会毫无结果的，"安娜打了个寒噤，心里思忖着。

曼尼雅用了令人信服而充满着神秘的音调讲着关于几百万克朗的事情。在伐兹拉夫广场上，红色电车隆隆地响着，汽车呜呜地疾驰而过。安娜还是仿佛从颠倒过来的望远镜里看见它们一样。"这'黑手'能够帮忙吗？……"

"好，咱们走吧，我的美人儿，"曼尼雅跨出食品店的门槛时说，"要不然，你家老婆子要骂人了！"

但是建筑师太太已经并不望着厨房里的钟，计算她的女仆出去的时间了，她甚至不去注意后者是否耽搁了辰光。当安娜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女主人正站在厨房桌子旁边，敲着替达德拉弄的牛排。她一只手捏着木槌，另外一只手把盐和胡椒撒在肉上，同时泪水直落在上面。

"啊，安娜，"她叹着气说，已经不在仆人面前掩藏自己的心事了。泪珠从她的红肿的眼里簌簌地滚下来，肥胖的右手敲着肉，左手无意识地从瓷瓶里抓出一撮撮的盐和胡椒。牛排已经完全变成了又黑又白的颜色了。

"啊，安娜，"女主人反复地说着，老是敲着牛排，同时往它上面撒着胡椒。"啊，天哪！"她又抓起一撮盐。"你们这些下层阶级的人生活得多轻松，我真想处在你的地位。"

安娜听到这些话语已经不止一次了。它们差不多跟达德拉

所说的一模一样。真是怪事：百万富翁的太太和小姐居然羡慕她，一个眼看就要没处安身的、怀着身孕的仆人。"假如她们一切都知道了，她们还想处在我的地位吗？"安娜想来想去找不到答案。

但是有一天，她终于对自己说："是的，即使她们一切都知道了，她们还是会羡慕我的！"因为她们是孤单单的，而安娜却并不孤单——她是巨大的家庭里的一员。而这个家庭在她困难的时光来援助她了。

有一天下午，安娜一个人在屋子里洗食具的时候，有人揿门铃。安娜跑去开门。一个瘦长的汉子站在门口对她微笑着，露出了黄黄的牙齿。这是从齐日考夫来的弗蓝泰·查乌艾尔，[1]职业是半工半商，他是齐日考夫区那些无所顾忌的汉子们和许多党员同志的亲人，一个心肠挺好的四十岁左右的大孩子。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纪比他稍轻的工人，安娜常常在集会上看见他，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是'黑手'，"弗蓝泰说道，"找您来的，安聂契卡。"

安娜发窘了，心里有点慌张。"黑手"？就是那个把财主赶出屋子、让穷人住进去的"黑手"吗？"黑手"——这就是弗蓝泰·查乌艾尔吗？他们在开玩笑呢，还是怎的？

"您为什么不放我们进来呢，安聂契卡？这是洛依济克·考特尔巴。难道您不认识他吗？"弗蓝泰继续说道。

安娜让他们走进前室里。

"有房子给你住了，同志，"洛依济克·考特尔巴说道。"赶快

① 即弗蓝季歇克·查乌艾尔(1882—1947)，捷克作家，在青年时代曾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查乌艾尔的创作中，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捷克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情况。

收拾东西，咱们走吧！”

安娜把他们领到厨房里。她同东尼克有房子了吗？难道这是真的吗？安娜更加着慌了，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在家。她又没有向女主人辞过工，她一句也不曾对太太提过要走的话。

安娜拿不定主意。

“我……”

她想对他们解释事情的原委，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讲，所以她只是一会儿把身子支在左脚上，一会儿又把身子支在右脚上，双手往油污的围裙上擦抹着。

“我……”

“只是不要多讲话了，同志。事情很紧急。我们一定得在四点三刻以前到那里，而路程又并不近。你的手提箱在哪里？”

安娜明白这都是认真话。

“这样说来：我一定得去吗？可是真的？”

她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小房间里，递给他们一只旧的手提箱，这是在认识东尼克之前、拿到第一次工钱买的。查乌艾尔和考特尔巴抓起手边的一切，开始乱七八糟地把安娜的东西往那里面丢，这样的做法只有男子才如此。过了一会儿，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没有？”

“不，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想……”

她来不及说，她想换件衣裳；因为同志们已经抓住手提箱的铁把手，迅速地把它提到楼梯口，沿着梯级向下冲了。安娜心里七上八下的走到梯台上。天哪，这屋子怎么办呢？安娜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一转念，突然拿定主意：碰上门，跟着同志们跑下

去。他们已经到了下边，几乎在街上了。

他们沿着伐兹拉夫广场往下向普尔希柯贝走去。安娜跟在后面。弗蓝泰和洛依查①一句话都不说。安娜很想仔细问问他们，但是直到他们已经走到火药塔附近的十字路口，她才敢开口问。安娜加快脚步，走到查乌艾尔身旁。

“可是我们上哪里去啊？”她怯生生地问。

“上齐日考夫，到叶赛尼奥伐街去。”瘦长的查乌艾尔笑着回答道。“那边，咱们跟房东会有一场厉害的争吵，得忍耐一下。可是房子真好！两只金丝雀的窝儿呢！杨达克议员跟我们说过：一定得把你们安置好，而我们是尊重他的意见的。您丈夫已经在那边，在房子里等您了。”

茫然失措的安娜想在年纪较轻的同志那里打听一下详情，但是他却一本正经地不想开口，为了回答她的不安的目光，只说了一句：

“放心吧，什么都会安排好的。”

安娜盼望他会详述怎样把一切都安排好，但是他却始终没有说。她跟他们并排走了一些时候，随后又掉在后边了。就这样，沿着布拉格街道，走着这两个带着黑提箱的工人，而这提箱是由他们抓住箱环抬着走的；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穿着蓝罩衫、足上套着便鞋的女人，她那模样就跟她站在厨房的冲洗盆旁边的时候完全一样。他们顺着电车路走着，时时要让路给电车、汽车和装着叮当作响的铁器的载重卡车。

在四点三刻的时候，他们就在叶赛尼奥伐街的一所油漆剥落的房子前面站停下来。一个警察立在大门口。安娜一看到他

---

① 洛依济克之爱称。

就心跳起来了。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看到了停在人行道上的小车她就明白了这一点。在小车上放着东尼克的家私——木头做的折床、稻草床垫、套着有条纹的红套子的被子和两只椅子。这表示东尼克就在这儿近旁。那就稍微安了安娜的心。

“那边事情怎样了，彼庇克？”查乌艾尔向那个站在小车旁边的孩子问道。

“为了钥匙，还在跟房东争吵着呢。他们上警察局去过了，警长已经来到这里，瞧那边也站着一个警察。还有一个在那里，在里边。”

“还有十分钟，”查乌艾尔对自己的默不作声的同志说道，“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探探情况。”

他走过那个装出一本正经办公事模样的警察旁边，就消失在屋子里了。安娜跟一声不响的考特尔巴留了下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她想道，“房子还没有，光在那里谈判。并且还有警察在这里！现在你去依靠‘黑手’吧！到头来，还不是空忙一场！难道东尼克相信他们可以搬进去吗？”安娜简直想哭出来了。考特尔巴开始抽起烟来，没有去留意安娜。他表现出那样一种神情，仿佛他是在这里准备做一桩他已经干过许多次的工作。

这时候，在房东住的二层楼上，从正午就已经开始的谈判还在继续着。安娜还在厨房里洗食具的当儿，弗蓝泰·查乌艾尔、老陶工契尔马克、印刷工人维克、帮工考特尔巴——就是此刻跟安娜一起站在下面的那个，和细木工贡查·柯拉尔就到了房东那里。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东尼克。

“你们有什么事？”房东站在门口嘟哝着。这是一个头发亚麻色、腮帮绯红的四十岁左右的胖子，他是靠了在战时供售食品发财的。

“有要紧事跟您先生谈谈，”弗蓝泰·查乌艾尔说道。他们把房东推进前室，径自走进了屋子。

“好吧，什么事情？”房东咆哮着。

“先生，”弗蓝泰·查乌艾尔开口说，“您这里三层楼上有一套空着的房间，一间屋子跟一个厨房，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恭恭敬敬的请求您把它租给克罗乌斯基同志。他此刻跟我们在一起，让我来介绍一下：安东宁·克罗乌斯基同志，柯耳卞工厂的翻砂工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这位是房东先生——考兹里克。而我是弗蓝泰·查乌艾尔，住在齐日考夫区的。”

“我这里没有空屋，”房东嘟哝着说。

“有的，先生，有的！”弗蓝泰·查乌艾尔反驳说。

“没有，”房东恶狠狠地答道。“这套房间已经租掉了。”

“我们知道的，先生，我们知道是租给别人当堆栈用的。但是在布拉格有那么多人没有住处的当儿，把房子租给投机商人当作堆栈用是挺不好的。”

“同时法律也不允许这样做，”陶工契尔马克插嘴道。

“对极了，不允许的！”弗蓝泰附和着说，“但是房东先生是个热心人，只要瞧一瞧他的面貌生得多仁慈啊！不用提法律，他就会让给我们的，对不对，先生？”

房东脸红了。

“我不想跟你们多罗唆。就是一句话！我没有空屋子。”

“‘就是一句话’……啊呀呀！谁能想到您这么说不通！”弗蓝泰·查乌艾尔吃惊地说。

“请你们别再打扰我，马上离开我的屋子。”

“这是随便怎样也办不到的，先生。我们，您瞧，是齐日考夫的‘黑手’，在克罗乌斯基同志夫妇没有租到三层楼上的那套房

间以前，我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你们想搞出什么花样来？”房东勃然大怒了。

东尼克向前跨了一步。他的眼睛燃烧着。

“您知道布拉格的房子多么少，”他叫道，“而您却拿房子做投机买卖，把它租给别人当堆栈用！您可明白……”

“等一等，东尼克，等一等，”弗蓝泰把他的大手搁在东尼克肩上，打断他的话说。“怎么可以这样莽撞？做事一定得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你自己别心焦，也不要去惹房东先生气恼。要是他突然中了风怎么办呢？你要知道：这样一来，你的良心就会过意不去。你还是别开口的好，东尼克。我们想搞什么花样？”他掉转身子对着房东，“很简单的事，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生手了。这事情我们已经搞了三十次上下了，哈，哈！克罗乌斯基同志跟他的妻子得搬进房子里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会告辞的。很简单，不是吗？”

“好，”房东绷着脸说。“我在这里跟你们罗唆什么！”他用了吃人般的目光朝工人们打量了一下，接着就喊出照例应该使他们震惊的威胁的话语：“瞧我去叫警察来，让他处置你们。”

“喔——唷——唷——唷，”弗蓝泰朝自己的屁股上一拍，“这真是好法子，先生！我们怎么刚才没有想到！上警察局去吧，我还不曾到过那里。”

房东抓起电话听筒，但是好久不能跟警察分局接通。工人们嘻嘻地笑着。最后，他总算跟警长通了话。

“有六个人闯进了我的屋子……全是不认得的……”气得发疯似的考兹里克诉说着。“硬要我租给他们一套房间。我请求警察局保护！”

对方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回答他。

“好的！”他朝电话筒叫了一声，接着就把它挂上。“最后一次，”他对工人们说，“问你们：你们离不离开这里？”

“不！”东尼克大声说道。

“等一等，东尼克，我不是告诉过你做事应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而你是答应我了的……”

“不！”契尔马克冷冷地回答房东。

“我们倒是乐意走开的，先生，”弗蓝泰·查乌艾尔说道，“但是这却万万办不到，因为这有关‘黑手’的荣誉。”

“那么我们上警察局去吧！”房东咆哮着。

“去吧，伙计们，上警察局去，”弗蓝泰冷笑着，“让我们去扯一阵吧。到五点钟还有很多时候。”

他们走到街上。弗蓝泰·查乌艾尔跟考特尔巴去找安娜，而所有其余的人就都上警察分局去了。

警长气愤地朝进来的人瞥了一眼。这不是“黑手”的初次访问，并且四位来客中间的两位他早已认得了。

“‘黑手’吗？”他大声喝着。

“是的，”老契尔马克阴郁地答道。

警长摆出一副严厉的官架子来。

“听着，伙计们，”他说道，“你们做得太过火了。这套把戏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们会大碰钉子的……那么，是怎么回事，考兹里克先生？”

考兹里克开始激动地讲了起来。他说有几个骗子闯进了他的屋子……民主和秩序到哪里去了？他已经收了别人租这一套房间的定洋，而税款他又是按时缴付的……警长厌烦地听着。这些话他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了，并且早就晓得：要是跟这些工人们争论，他们会用什么话来对付。警长很明白住屋分配科是怎

样束手无策，也知道他区里的人们住在鬼才知道什么样的贫民窟里——在地窖里、洗衣房里和草棚里。白白花费唇舌在这些事情上面是毫无意思的，而要制止破坏秩序的行为，唯有象过去奥匈帝国时代所做的那样使用警察的武力。但是这样做是禁止的。固然，在国内，一切都是那样迅速地向旧的轨道滚去，所以他，警长，如果敢于采取断然的处置，或许就可能官运亨通了。但是也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这样的独断独行，他会丧失头颅，至少是在这句话的象征性的意义上。

所以，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以后，警长苦恼地说道："我自己去瞧瞧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戴上制帽，带了两个警察就走了。在叶赛尼奥伐街的房子里，警长巡视着三层楼上那个单间的住所。里面有两只箱子和许多瓶矿泉水。厨房窗子是向楼梯开的。

房东越来越急躁了，而工人们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不管怎样总是坚持着说："给我们钥匙！"

弗蓝泰·查乌艾尔跟安娜一起回来以后，就在厨房里找到了所有的伙伴。房东气呼呼地总是一遍遍地重申着自己的理由，而警长则愁眉苦脸地回答他。到后来，大家便一起走到房东屋里。那儿又继续着那冗长而令人厌烦的谈话：考兹里克激动着、叫喊着，而工人们则跟开留声机唱片那样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说：把住屋变成堆栈是不合法的，并且根本是种卑鄙的行为，因为在布拉格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这一点警长先生自己应该承认。无论房东跳得多么凶，他们在没有拿到房子的钥匙以前是不会离开的。东尼克蹙着额头沉默着。印刷工人维克掏出手表来按照墙上挂着的那只字盘镀金、钟锤上刻有花纹的大钟对了一下时间。

弗蓝泰·查乌艾尔的好脾气特别使房东冒火，——前者吸着烟卷，把烟灰弹在火炉后面。

“不能吸烟！”考兹里克朝他咆哮着，“您是怎的，在畜圈里吗？”

弗蓝泰笑了笑，又深深地吸了口烟。

“不吸就不吸好了！”他心平气和地说道，重又在火炉后面弹掉烟灰，随后把香烟头藏在背心口袋里。

房东在地毯上跑来跑去。他的大脸孔和粗脖子涨得血红，——仿佛他要中风了。他，一个有钱而又兜得转的生意人，虽然有着自己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同时这里还有三个警察跟他在一起，却没有办法对付这三个来自郊区的工人，想到这一点就使他狂怒起来。他不给钥匙，不给，一定不给！宁可当场死去，而钥匙是不给的！

“难道我没有付税吗，真是见了鬼？！”他用了已经嘶哑的声音叫道。“警长先生，请保护我！难道法律已经一文不值了吗？”

警长有气无力地坐在红丝绒圈椅里。

“或许，你们仍旧会和和气气地谈出一个结果来吧？”他用了没精打采的声音反复说道。

挂在墙上的那只镀了金的钟跟着安娜听到的教堂钟楼上的钟声打了五下。安娜还是同那个不爱说话的考特尔巴和十二岁的彼庇克站在街上。她再也等不下去，就哭起来了。他们不会有房子住了！干吗弄得他们空欢喜一场？安娜满脸都是泪痕，她手上拿着的帕子完全湿透了。

“别哭，同志，再过十分钟，你就已经在屋子里了，”闷闷不乐的考特尔巴对她说道，在他的声音里第一次充满了同情的调子。

五点零五分了。在距离安娜几百步、刚才几乎没有人的街

道上突然挤满了人。年轻的工人们下工后从隔壁工厂的大门里跑出来了。一群青年人一边深深地吸着新鲜空气，一边沿着街道朝安娜站的方向蜂拥而来。随后，从工厂的大门里又拥出了一批批新的人群，他们迈开步子走着，赶上那些走在前面的人。这群劳动的先锋队迅速地沿着叶赛尼奥伐街向下冲去。现在从大门里涌出了密集的人流。在整个街面上，翻腾着黑色的人流，一批批潮水似的新的人群从工厂的大门里不断地涌出来，这密集的人流并没有朝邻近的街道分散，却朝着旁边停放着装东尼克杂物的小车的那所房子汹涌而来。

人群中的第一批已经到了安娜旁边。三个在蓝色工装上面套着上衣的年轻小伙子，有着年轻人容光焕发、但是沾满污垢的脸面，几乎同时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是搬场吧？不放你们进去？”

“房东，那个坏蛋，拿房子做投机买卖，租给人家当堆栈用，不肯把钥匙交出来。这个穷苦女人留在街头上，你们只要瞧一瞧就明白了！”突然活跃起来的考特尔巴解释道。

小伙子们高兴而同情地笑起来了，露出年轻人雪白的牙齿。他们当中一个有着乱蓬蓬的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掉过脸来对着人群，把两个手指塞到嘴里，大声吹了个豪侠式的口哨。而最小的、脸面最污黑的一个则把两个手掌放在嘴旁，叫了起来：

“伙计们，到这里来！这里有人搬家呢！”

站在大门口的警察便走进了门，随手把门锁上。

工人们围住了安娜。

“怎么回事？”

“怎么啦！”

“搬家吗？”

“‘黑手’?”

周围响起了笑声。

考特尔巴似乎在作着鼓动性演说似的说明道:

“这个骗子拿房子做投机生意:把它租给别人当堆栈。自己有五间屋子，脸孔胖得象猪一样。但是却不肯把最小的房间租给穷人。他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两个多钟头了，而在投机商人那里还坐着一个警长和两个警察。”

不知哪一个又用两个手指打了个口哨。哨声互相呼应着，重复了好几次。激动而沸腾的人群围住了安娜。

“咱们帮他们搬进屋去!”有人叫喊道。

“到那边去，来啊!”

人群急速地向门口冲去。但是门是锁着的。愤怒的呼声响起来了。不知哪个的手摇动着门把手，六只脚踢着门上的嵌板。但是门关得很紧实。

这是齐日考夫工厂里的一百五十个工人成为一个集体的瞬间。这集体之形成是由于前面有着挡住他们去路的障碍物——那扇由于敲击而嘎吱作响的门。人们失去了个别的特征而融为一体了。

就是那同样激动和欢腾的史前期的人群，身披兽皮，在猛犸掉进去的洞穴边兴奋不安，预先体味着即将举行的欢宴，恼恨那最后的障碍物，由于欢乐和饥饿而咆哮，把石头向野兽扔去，用一头修尖的粗棍刺穿它的肚子。

就是那同样渴求正义的人群，为了卫护对上帝的信仰，把背信弃义的市参议员们从布拉格市政厅的哥特式窗子里直扔到杨·胡斯信徒们的棍子和长枪上。①

就是那同样勇敢无畏的法国男女公民群众，高喊着“自由、

平等、博爱”的口号，准备把每个企图使他们相信巴士底的花岗石墙和堡垒是牢不可破的人撕得粉碎。在十月的一天，怀着空前未有的热情的人民大众，手里拿着步枪，突击那里面有士官学校的学生们埋伏着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大门。

此刻，同样的集体在齐日考夫的一所房子前面形成了。这集体承继了几千年来的遗产——热情和意志，愤怒和饥饿以及人类精神遗产中最美好的东西——对正义的渴望。

门把手和桦木嵌板被敲击得轧轧作响了。

新的人流由工厂涌到房子前面。人群堵住了街道。

在邻家的窗口，在花盆和垫子中间，已经有些好奇者出现了；有些人笑着，另外一些人一脸孔又正经又严厉的神气。

“叫这个坏蛋过来，让我们瞧瞧他是什么样儿！”

“丢——脸！丢——脸！”人群叫喊着。

人群中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看出安娜怀着肚子。她一跃跳上小车轮盘，身子靠在一个汉子的肩上，开始叫喊起来。脸面由于激动而现出一块块的红斑。

“她是个穷苦女人，怀着九个月的身孕，而这条狗却把他们赶到街上！”

“丢——脸！丢——脸！”人群怒吼着。

“让我们帮他们搬进去！”有人尖声叫喊起来。

这是人群所渴待着的召唤。他们用口哨和喊声响应着：“帮他们搬进去，帮他们搬进去！”

在这召唤的声音里已经带着威吓的调子。邻居们的窗子开

---

① 这里所指的是揭开胡斯战争的序幕的那个事件。一四一九年七月三十日，起义的布拉格市民把七个市参议员——敌视胡斯学说的德意志富商的代表——扔出市政厅的窗户。——俄译者

始砰砰地关上了。突然间，敌人堡垒的大门打开了；门户豁然大开，三个工人在里面出现了。有一个举起了手。人群顿时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在任何时代，当被围的堡垒里扬起了白旗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的。现在，老契尔马克的右手就成了这一类的旗子了。

"让我们选出代表来跟房东谈判，工人同志们！"他高声喊道。

这声召唤在人群中一行行地传过去，处处都有人响应。

警长跟着工人们从大门里走了出来。

"诸位，"他开始说道，"这完全是私人的事情，警察局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们想办法让这事情和平了结。它总会解决的！"

有人笑了起来。当然，事情总会解决的！这一点，难道大家，包括警长在内，不是一开头就都明白的吗？

"可是秩序无论如何总得遵守，"警长继续说，"我不能够允许任何样的聚众妄动，为你们着想，不要逼我采取极端的措施。"

假如警长真正想把事情顺利解决的话，他现在可就犯下了策略上的错误，因为他侵害了群众的权利。

"住嘴，尽耍鬼舌头！"有人叫喊道。

"这是吓不倒我们的，讨厌东西！"

"你越凶，就越倒楣！"

在这些呼声中已经含着激怒的声调了。

几个小伙子和打包装的姑娘们当众讥笑着警长。他的下巴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代表！"近大门那边叫喊着如雷般的声音。有五个汉子已经在人群中挤过去了。

“派代表干什么？”一个穿着工装的蓬发小伙子叫了起来。“把这个房东拖到街上来！”

“把他拖到我们这儿来惩办！”他的同志附和道。

但是这是不守纪律的个别人的呼声。代表们已经进入大门。大家的眼光一齐集中在他们身上。

寂静降临了。

人群连动也不动地等待着。

这样的沉默只能维持几分钟。它并没有长久延续下去。

街道上突然欢腾起来。在房子门口出现了东尼克、契尔马克、维克和工人代表们。大家微笑着，在满面春风的契尔马克的高举着的手中捏着钥匙——一把最普通的、套在小环里的钥匙，这种钥匙在铁器铺里卖三克朗一把。但是这把钥匙却是胜利的象征。

没有一个舞台上的演员或者讲台上的演说家体验过象契尔马克在拿着钥匙出现的时候那种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胜利的欢呼和笑声震撼着叶赛尼奥伐街上房屋的窗子，冲进一个个的住所，飘过屋顶，向着烟雾弥漫的天空飞去。

巴士底狱垮了！

工人们欢呼着，笑着。他们为自己已经实现的愿望而狂喜，同时讥笑着资产者房东和丢脸的警察们的失败。

安娜站在那里，脸孔苍白得跟被单一样。突然，有十个到十五个左右的人向小车冲去，——比搬运东尼克的家具所需要的人手多得多。转瞬间，几十只手解开了绳子，抓住物件，几十个肩膀在人群中挤了过去，几十只脚跑进屋子，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三步并做两步地向三层楼急速走去。过了三分钟，在三层楼上的那间屋子里就摆好了东尼克的简陋家具，准备容纳新的住

户了。那些搬物件来的人重又喧嚷着冲下楼去，他们那橐橐的脚步声就象锤子的敲击声在房东的脑海中反响着。

东尼克并没有用好多话表示自己的谢意，他的谢意都表现在几次热烈的握手和亲切的微笑之中。随后，东尼克和安娜就上楼来到自己的新居里，而军火工厂、丹聂克工厂和国营机器制造厂里的两千个工人便开始走散了。兴高采烈的群众分散到邻近的街道上，散到齐日考夫区的各个住屋里去了。然而，就是到后来，当这人群变成两千个不同的人的时候——男人们赤裸着上半身站在盛着热水的脸盆面前，女人们燃起炉灶准备晚饭，男女青年工人们在镜子前面换上干净的领子、穿起宽上衣，准备在这春日的晚上出去溜达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许多人嘴唇上的微笑还不曾消失，同时胸口里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温暖的感觉。而当这些人躺下来睡觉的当儿，他们之中许多人会突然笑起来，心里想：今天在叶赛尼奥伐街上可有过一场出色的纠纷呢！

安娜站在自己的新屋子里，偎依在东尼克的怀里哭着。已经是黄昏时分，夕阳把一束金色的尘埃投射在房间的角落里。

“怎么样，东尼契克，我们可以在这里呆下去吗？”

“可以，”东尼克回答道。“事情解决得很快。我们走来就说：‘给我们钥匙，要不然，我们就是没有钥匙也要搬进来了！’那时候，他就不再多考虑了。当然，我们要在这里呆下去的。”

“可是几点钟了，说真的？”安娜忽然想到，心里就焦急起来，连头都晕了。“我要不要回到女主人那里去？”

东尼克皱起了眉头，思索着。

“哦，不要去了！”他刚要说出口，但是接着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的身份证在哪儿？不在身上吧？瞧你！女主人会报告警

察局说你失踪了。所以你一定得去。”

“一定得去？”

“是的，走吧！”

他们走出房间，锁上了门。锁儿喀哒一响，这种声音对于安娜说来是熟悉的，但现在听来却觉得完全新鲜而异乎寻常，仿佛她从来不曾听到过这种声音似的。东尼克陪安娜到电车站，随后，她就回到自己的老房子里去了。

女主人替她开了门，眼睛死命盯着她。

“你在哪儿？”她用冷冷的、刺耳的声调问道。

“我跟东尼克找到了房子。我要结婚了。”

安娜的心狂速地跳动着，但是她并没哭起来，而是沉着而坚定地回答着。这样就征服了女主人。她默默地掉转身子走出去，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安娜在厨房里补做耽误下来的工作，开了饭，铺了床。在这所有的时间里，没有人跟她讲过一句话，仿佛她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但是主人的这种蔑视今天并不能对她起作用。在她和东尼克终于成为夫妇以后，难道它还能起什么作用吗？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结婚日并不是在他们互相认识的一天，也不是他们在市政府登记结婚的那一天。他们的结婚日乃是在他们找到了共同藏身处的今天。

但是难道太太和小姐能够懂得这一点吗？鲁别施有着八所自己的房子。达德拉在结婚的那一天将穿上洁白的绸衣服，披上饰有桃金娘花冠的兜纱，于是新娘（已经被妇科医生动过手术了）跟装束得象王子似的新郎便乘上汽车——一长排中间的一辆，向教堂驶去，那里将为他们铺上红色的地毯。“在您未来的婚礼上会有多少客人，小姐？”安娜心里暗自问着主人的女儿，“三

十个？四十个？无论如何总不会超出五十个。然而您可知道，小姐，在我的婚礼上有多少客人？两千个！整条街上都是我们的朋友——从军火工厂来的，从丹聂克工厂来的，从国营机器制造厂来的！而您想想看，小姐，人们在您的婚礼上会象在我的婚礼上那样的欢天喜地吗？”安娜甚至由于满心的喜悦和骄傲而打起战来。

安娜收拾着达德拉的房间，一边铺着镶花边的细麻布被单，一边心里想道：“啐，您床铺里发出来的味道好难闻啊，小姐。香水精啦、香粉啦、各式各样化妆用的香水啦。我的床铺可就会发出怪好闻的味儿！东尼克会使它发出好闻的味儿，小姐！他厂里铸成的铁器味会把它搞得香喷喷的！”

在上床以前，达德拉走到厨房里想来一次外交式的谈判。她装着要一杯水的样子，喝完了以后就在厨房的镜子前面扯松着头发。

“有人说你要结婚了，安娜？”

安娜背对着达德拉在洗食具。

“是要结婚了，小姐。我们已经有了房子。”

“喔……在哪儿啊？”

“在齐日考夫区的叶赛尼奥伐街上。”

达德拉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样做不大好，安娜，”她说道，“你的行为显得忘恩负义。我们一直都待你很好，而你心里的打算却点滴不漏。你这样做是想叫妈妈没有佣人吗？”

安娜不做声。缄默的状态拖得使人难堪地长久，但是安娜却坚不作答。

“你为什么一声不响，把背对着我？我在跟你说话啊！”达德

拉气冲冲地叫道。

安娜挺直了腰，转身向着达德拉，两手往围裙上擦抹着。

“我不能预先通知你们，小姐，因为家里一个人都没有，而我又不能等待，如果一等，房子就没了。假定太太要我留到新佣人来以后才走的话，我倒愿意的。现在我们已有了房子，就是耽搁几天也无所谓。”

“好吧，那么别干蠢事了，安娜，明儿早晨跟妈妈谈一谈。可是再对你说一遍：你今天的行为显得忘恩负义！”

后来，当安娜躺在自己小房间里的床铺上，等待主人房里熄灯的时候，她便思索着自己究竟是否忘恩负义。达德拉的责难微微有些使她不安，不知怎的使她忆起了学校以及牧师先生的那只为学生们所亲吻的、发出雪茄烟和汗水味的手。但是这轻微的、不安的感觉并不持久，安娜马上又恢复了骄傲和平静的感觉。“不，”她对自己说道，“我并没有忘恩负义！”她自己也不能解释她对于这一点何以这样自信，因为她还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分析得很清楚。但是，要是她能够解释一切的话，她会说：“是的，在你们那里我真的过得并不坏，鲁别施建筑师。比在乡下家里好得多了，并且恐怕还比住在我们房子里的别家的佣人好一点。太太送我两件衬衫，只是稍微有点破，小姐送的衬裙连送给伯爵夫人都合适，而在圣诞节，你们又送我一件衣料。但是，难道你们为了要行善才把我从乡下叫出来的吗？难道你们送我这些东西是出于基督教的爱吗？你们在想我报答你们，鲁别施建筑师，去你们的吧！你们今天不曾看到叶赛尼奥伐街上的这些工人群众，因此不知道他们送给了我什么！你们永远不会了解他们把东尼克送给了我，还送给我一个家，凡是我现在所有的都是从他们那儿得来的。但是你们可知道，我甚至没有对他们说

过一声讨厌的'谢谢你们'，这是你们在厨房桌子上为我放每一杯咖啡时都要我说的！你们可知道我现在心里是怎样地满怀着爱和感激之情，使我简直想欢笑，又想哭泣。假如我想对他们说'谢谢'（不是对你们说的那种奴仆式的'谢谢'，而是我们工人之间互道的'谢谢'），我也不知道对哪一个说才好。因为帮我忙的都是些我不认识的男人和女人、少男和少女，他们是无产阶级。而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是二层楼上寓所里一个愚蠢的、没有阶级觉悟的女佣人；我，一个金黄色头发、淡蓝眼睛的平平常常的姑娘，到现在还仍然有些糊涂；我是一个穿着蓝布罩衫、足上套着旧鞋子的仆人。可是，当象我这样的人有着千千万万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将高于工厂里的烟囱和熔铁炉，高于无线电台上的天线和船上的桅杆，高于全世界的摩天楼！您同我有什么关系，鲁别施建筑师？我要到自己人那儿去了。您的愤怒，您的痛苦和忧虑，您的孩子们同我有什么相干呢？我不是你们中间的人。让你们在这里腐烂，在这里互相吞吃吧！"

透过房门底下的缝道可以看得见主人卧室里的灯熄了。然后安娜从床上爬起来，悄悄地蹑着脚走到四层楼上。一定得把自己的幸福讲给曼尼雅听！安娜在格子窗上敲了敲，于是女伴便把她引到自己的小房间里。

听完了关于事件的叙述以后，曼尼雅就开始狂吻起安娜来，并且呵她的痒。她替女友高兴得几乎掉下眼泪来。这简单的叙述自然不能使她满足，她很想知道所有的详情细节，从开始到结尾。曼尼雅的主人们上戏院去了，而孩子们又已经睡着。曼尼雅穿上衬裙，便把女友领到厨房里。她们在一张靠着还有热气的炉子的长凳上坐了下来，随后，安娜就得把所有的事情再从头讲起，并且尽力要讲得详细一些。等到已经没有话可讲了，安娜

就向女友讨了张明信片：她想把自己的幸福告诉家里。曼尼雅给了她一张华丽的明信片，上面画着琉璃草并且系着丝带，于是安娜就用了自己那很大的、小学生的笔迹写道：

“你们好，亲爱的父母亲！我在这里亲热地问候你们，同时告诉你们我就要出嫁了，因为我已经有了房子。我的未婚夫叫东尼克，他是柯耳卡工厂的翻砂工人，这是非常好的工作。我的姓将要是克罗乌斯卡雅了；写信给我的地址是：布拉格，齐日考夫，叶赛尼奥伐街，……号门牌……”但是安娜不记得门牌的号数，所以只能空着不写。整张明信片上几乎全已写满了，因为安娜开头的时候写得太大，所以在结尾时，她只得用极小的字附上一笔：“热烈地问候姊妹们，叫她们到布拉格我这儿来玩。如果我跟东尼克的生活过得去的话，我会寄给她们路……”“费”这个字在明信片上写不下了，就是“路”字也是潦潦草草地写在角落里的。

在叶赛尼奥伐街的房子里

安娜在鲁别施家又干了一个月的活：建筑师太太还在那儿寻找乡下姑娘。光是买家具就花掉了这一对新婚夫妇很多钱，虽然他们买的只是些旧货。那些店里的伙计们挺喜欢金黄头发的安娜，想尽方法帮她的忙，他们甘心情愿地爬到柜台底下和货栈的角落里去看一看那儿的稻草堆里可有什么挑剩下的食具。安娜在鲁别施家一个月的工钱——一百克朗正好派用场。

东尼克已经住在叶赛尼奥伐街了。

"我还要跟您算帐，克罗乌斯基先生！"房东在他那儿收取房租的时候，用冷冰冰的声调说道，但是很明显，房东说这些话不过是要表示他不肯认输而已。他分明知道，要使房客搬出去并不比通过住屋分配科找到房子来得容易。

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晚上，安娜跟东尼克一起住在他们的新居里，以后又回到鲁别施家，这也是同女主人说好了的。这些夜晚真是说不尽的美好，因为它们并不是一天接连着一天的，而是好比在"平日"那条钢铁链条里插入的几个金环子，——六个钢铁环子，而第七个是金的！世界上没有比醒来看到身旁爱人的脸孔更愉快的事了。

"你喜欢我吗？东尼契克？"安娜把丈夫看了个够，随后就用亲吻唤醒他，一边小声问道。

"你自己明明知道！"他还闭着眼睛，睡意蒙眬地说。在东尼

克看来，象“我爱你”这种无意义的话，他是说不出口的。

东尼克张开了发亮的、钢样的眼睛，他那刚睡醒的、清新的脸现出焕发的光彩，有力的手紧紧地抱着安娜的肩膀，使她不由得轻轻地哼叫起来。

“这多好啊！多好！”她喃喃地说道。“是吗，东尼契克，这真好？”

但是东尼克只知道劳动和革命斗争的语言。他的拥抱表明了自己的心意，而他对安娜的爱恋则表现在他的劳动上。安娜每星期六总发现屋子里有什么新的东西做了起来：东尼克把火炉改装过，或者把房间和厨房粉刷白了，或者用旧箱子的小木板把地板上的窟窿补好。有一次，他做好一张厨房里用的凳子，并且还上了白色的油漆，这种种比情话要强得多了。

在这四个星期六的夜晚之中，东尼克有三个晚上对她说：“你不会睡着吧？你瞧，我要去开会了，十点钟回来。”但是他没有说过一次：“真可惜，还得去开会。”什么也不能使他讲出这种话来。他是一个战士，现在，在这个战士的营房里吹起了战斗的军号。

甚至独个儿留在家里的时候，安娜也是幸福的。她打量着自己的房间，心想：“要是这里有一张沙发和一口橱，在窗台上放些花儿，象我们乡下家里似的，那该多好啊！啊，最好东尼克快些开完会回来！”

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六晚上，曼尼雅到她那儿来做客，她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纸包，把一盏有着全新的灯芯和玻璃罩的漂亮的铜灯放在桌上。

“嗳呀！这个做什么，曼聂契卡？”

“这灯反正谁也不用，在我们顶楼上搁着。”

但是新的灯罩和灯芯一定不是在顶楼上搁着的。

"曼尼雅，"欣喜万分的安娜重复叫道。

"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曼尼雅笑着。

"你在我们家坐会儿，曼聂契卡，"安娜说道，而她在对自己的第一个客人初次说出"在我们家"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是多么愉快。

"怎么能呢！鲍高乌斯在人民宫等着我哩。"

曼尼雅跳了起来，急急地向楼下跑去。安娜刚来得及陪她到门口。走下一段楼梯，曼尼雅记起了什么事，又停了下来。

"对了！德伏尔查企哈叫我在你那儿打听一下：你家那老婆子今天为什么事哭丧着脸在那儿走来走去？"

"主人又在骂人，又在嚷嚷了。"

曼尼雅哈哈大笑起来，飞跑着向前走了。

星期天，安娜总是很不愿意离开叶赛尼奥伐街的屋子，可是在早晨九点以前，她却一定得在鲁别施家了。她吻了那坐在桌子旁边写着党内不知什么文件的东尼克，随后就打开了向楼梯开的门。这时候，有两个女邻居——又瘦又长的军士克拉邦的太太跟商人恩德列尔的妻子——好象碰巧的样子也一齐走到了梯台上。军士太太足上穿着一双红色便鞋，身上穿了件花花绿绿的长衫，那长衫是用做灯罩的料子缝的（"瞧那副样子！"要是曼尼雅看见了一定会说，"简直就象一盏台灯。"）。这两位女邻居已经在半掩的门边守候了一些时候，为的是不放过瞧一眼新婚夫妇的机会。就在那当儿，十七岁的斯拉娃·库契罗娃，手里抱着小弟弟，也呆呆地站在那里。她身上只穿着短短的衬裙和一件衬衫，在衬衫下面，显露出她那隆起的胸脯的轮廓。她在梯级上等着安娜，一点也不隐藏自己的好奇心。安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

么脸红起来了，赶快朝楼下跑去。

现在去乘电车了！最后，安娜就沿着行人稀少的伐兹拉夫广场向三十三号那所房子走去。一路上，她总是想念着东尼克，她的身上还充满了这一晚的甜蜜，同时她知道要过整整一个星期才能再回到家里；她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感到自己好象一个上课迟到的女学生，知道要被老师责骂似的。

女主人已经在做汤了，厨房里有一股新鲜的肉和蔬菜的味儿。安娜向她问了好，便照每星期日的规矩，到客厅里去抹灰。主人此刻在洗澡。在客厅里，尚未梳洗过的达德拉穿着蓝色的丝长袍，伸展着四肢，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她交叉着两腿，撩开长袍的衣裾，正在得意地端详着自己美丽的小腿。安娜脱掉鞋子，把椅子移到碗橱跟前，然后站在椅子上面，想把一只黄色的大花瓶拿下来。她举起双手，伸展全身去拿那只花瓶，就在那个时候，她觉察小姐正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望着她。

达德拉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站在安娜面前，死命盯着她看。

“安娜！”她叫道，好象警察捕获了犯人似的，“安娜，你怀着孕呢！”

安娜从脸孔一直红到发根。达德拉突然发出一阵不带丝毫欢乐的狂笑，接着就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安娜继续收拾着屋子。她发起窘来，但是这件事的揭露——过去曾经那么长久地使她害怕的——现在已经不能吓唬她了。鲁别施一家跟她有什么关系？达德拉小姐跟她有什么关系？

过了一会儿，小姐回来了。她走到窗子旁边，做出望着街道的样子，后来就走到安娜紧跟前。她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

“你想我会在这里长久呆下去吗？”她说道。“随便碰到哪一

个男的，我就会跟着他跑的！”

小姐在说这些话时那种怨恨的口气不禁使安娜害怕起来。但是她只微微地耸耸肩膀。这一切跟她有什么相干？在叶赛尼奥伐街上有她的新居和她的东尼克在等待她。她在鲁别施家不会呆多久了。

日子确实在一天天的过去，但是过得实在太慢了。有时候，在晚上，东尼克腾出一刻钟时间来跟安娜在威尔逊车站旁边的公园里溜达。但是这些短促的散步只能增强安娜想回到自己新居里去的渴望。而在这个包括七个房间的鲁别施的公馆里，脸色苍白的、虚胖的建筑师太太还是跟往常一样地在那里踱来踱去，吩咐着佣人，默默地对着从达伏斯来的信流泪，一清早从丈夫的皮包里偷钞票，并且站在厨房里的炉灶前长吁短叹着：

“唉，你们下层阶级的人生活得多轻松啊！”

在这些话里，含着病人对健康者的妒嫉，含着老的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憎恨。

但是说定的四个星期过去了。建筑师太太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佣人。在这以前，已经有两个试用的仆人在她那儿跟着安娜做了几天活，但是其中有一个是个畏畏缩缩的傻瓜，因此没有用她，而另外一个呢，——又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有一天晚上，女主人偷听到这位姑娘怎样跟安娜谈着穷人和富人，——所以她也不曾留下来。前者的名字叫玛季尔达，她是伐拉施克-密济尔齐切人，经常上教堂去，早晨四点半就起身，并且还吻女主人和小姐的手。

“用不到，用不到的！”女主人说着，但是却不曾挣脱她的手。但是达德拉就不准别人碰她了：“你怎的，疯了吗？不要巴结我了！”玛季尔达死抓住小姐的手不放，于是那一个就笑了起来：

"天哪，好蠢啊！可是妈妈给你看了关于基斯和朗得鲁的故事没有？"

不久，安娜终于搬到叶赛尼奥伐街去了。在分别的时候，女主人伸给她两只胖胖的手指，小姐拿出一双穿旧的皮鞋，三双有些脱线的长袜，一方崭新的、上面绣着简名的玫瑰色丝手帕和三块香皂。所有这些送她的东西一定不能让东尼克看见，要不然，他会把它们扔到窗外去的，而安娜却舍不得把它们扔掉。

永别了，鲁别施一家！

"回家！"这是新鲜而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由于安娜拿了末一次工钱，买到新的、上好的碗盏而更为强烈了。现在，她既有铁锅，又有煎锅，锅上描着色彩象华贵的咖啡馆里的大理石柱子似的花纹。安娜做着自己家里的第一次饭菜，为了对那只新的烤炉没有信心而着慌，到后来，她给丈夫做好了肉卷，这肉卷由她小心地切好，替他放在一只盛满了白菜饺子的盘子里。

于是，她就这样住在自己家里了，住在叶赛尼奥伐街一所旧房子的三层楼上，在一间通走廊的屋子里，在这走廊上同时还另外有四扇门。

安娜开始弄清楚了这所房子，并和邻居们认识了。在这一层楼上的五个住处都是同一种式样的——包括一个房间，里面有两扇朝院子开的窗，院子后面现出长满了灌木丛的斜坡；黄昏的时候，阳光斜照在坡上。这儿的厨房又暗又小。到了晚上，在公共的走廊上，这些被铁格子拦着的、罩着白的或者花花绿绿窗帷的厨房窗子就亮起了灯光。走廊永远是半明半暗的，这里仅仅靠了上下两个梯台上的两扇窗子的毛玻璃才透进些光来，况且下面一扇窗子还要同时照亮底下一层楼上的梯台，而上面一扇，同时照亮顶上一层楼上的梯台。走廊里的空气总是带着一股霉

臭，那是由带甜味的、各种混合的气味所造成的；这儿发出煎葱、土豆子粥、粗肥皂和煤油灯的味道，而煤油灯从下午起就得点起来了。

白天，在齐日考夫的这些房子里，您只能看到女人，——男人们在做工，孩子们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街上。要是有哪一个男的做了夜班，而此刻在家的话，别人也不会看到他的，他正裹在被子里，在铺着花花绿绿被单的床上睡着好觉，从被子下面，只露出他的一绺头发。女邻居们都知道彼此的一切事情：谁家的中饭做了什么菜，谁的口袋里有多少钱和衬衣上有多少补钉。这里的风气跟有钱人住的公寓里不一样，有钱人的公寓正如他们的保险箱一样，总是锁上了法国锁，不准旁人轻易踏进去的。在齐日考夫的房屋的公共走廊里，家家户户的门总是敞开着的，为的是要让水槽和锅子里的水蒸汽跑掉。即使谁家的房门关着，别人也总可以往窗口望一下，如果看到女邻居在家，就走进去，说声早安，向她借个擦板用一下，或者要点儿茴香，或者借五个克朗等到明天归还。就在这走廊上，设着公用的自来水管和两个厕所——永远是争论和吵架的起因。

女人们在家里总是闲谈。她们的话题有二：钱和妇女的命运——宇宙的两个支柱。在社会的其他集团里，人们就把这些问题写成经济的定则，列进各个政党的政纲里，或者把它们作为审美学派和世间习俗的要素，可是，在这里，人们却是用最单纯的物质观点来看金钱和妇女的命运的：如果在星期六，丈夫拿来的工钱比上星期多了十克朗，这就跟铺子老板把人造奶油又抬价半克朗的事实同样被认为是家庭里最重要的事件。没有再比随便哪个女邻居"又怀了胎"更使人担忧的事了，因为大家都想多有点钱，而少有几个孩子。

除了这个主要的话题以外，也谈到男人、孩子和邻居们。在主妇们的生活里充满了细小的顾虑、对旁人的苦难和报纸上各项刑事新闻的关心、毫无意义的争风吃醋以及关于轮流打扫走廊和厕所问题的争论。

但是这一切只是平日的情况。到了星期天，情况就改变了，因为每逢星期天，男人们总是在家的。在星期六晚上，他们把上半身在盛着热水的盆子里洗过以后，就穿上干净的衬衫，可是外套却只有在星期天吃过中饭以后才穿。整所屋子显得另一个样子了，好象在过节似的。厨房里下了窗帷，每间屋子变成了堡垒。女邻居们匆匆地走过彼此的身旁，仿佛陌生人一样。此刻，每个人的丈夫都在家里，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做妻子的总认为她的丈夫是众人中最出色的一个，并且有点猜忌自己的丈夫会对别的女邻居们发生好感。他的衬衫一定得比所有旁人的干净，他的领子和每粒钮扣都应该弄得十分整齐，因为女邻居们都在注意、比较的。如果哪一个女邻居敢于瞅一眼旁人的丈夫，那她就该倒楣了。

安娜跟邻居们渐渐认识了。住在隔壁的是鼻子尖尖的军士太太克拉邦诺娃。安娜认得她的“灯罩”似的长袍和红色的拖鞋。克拉邦诺娃太太有着一对双生子；她跟邻居们并不亲热，因为她的丈夫拿着固定的薪水，并且他们独自一家占有着一套房间。在再过去一扇门里，住着有七个孩子的小工库契腊一家。丈夫有时在建筑场里做工，有时干着装置污水管的活儿，而妻子是替洗衣作洗衣的。如果两个人都在做工，那么收支还可以勉强相抵，但是做父亲的要是没有工做，家里的境况就很窘了。他们屋子里常有人寄住着，有时两个，有时三个，而在去年库契腊失业五个月的期间，又卖掉了被子，所以他们现在就没有东西可以

盖了。有时候，连母亲都没有活儿做的时候，那么，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们就得去要饭。他们手搀着手，走到旁人的厨房里，默默地站在门口，既不回答人家的询问，也不理会别人的戏言，只是用自己轻信而天真的眼睛望着大人们，一直等到最后他们拿到了随便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为止。邻居们已经认得他们，只是偶尔有一家的主妇，当她家的境况不见得比库契腊家稍强的时候，才会对他们说："今天上别家去吧，小鬼们，我自己家里一点东西都没有呢。"库契腊家的家务都由十七岁的斯拉娃照管着，她是一个瘦瘦的姑娘，老是穿着一条条子衬裙和一件短袖衬衫走来走去。

再过去一家住着斯塔伏符斯基戏院里衣帽间的女侍者，一个叫恩德列罗娃的寡妇，跟一个年龄不详、没有固定职业的男子同居着。去年他到处为救济在战争中瞎了眼的老兵们兜售香皂，今年又为妇幼保护协会推销彩票，抽取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在这些行业结束以后，他就做起"保证出于原作者之手的写生画作品"的生意来了。他们的屋子里也有寄宿的人：一个开汽车的——穿着皮短外衣的小伙子和夜总会里的一个女侍者，他们两个人合用一张床，轮流睡觉——晚上是开汽车的睡，这时候，那个卖身的还在夜总会忙她的事情，而在白天，当他在工作的时候，她就睡觉。这儿并不认为"卖身的"是一个骂人的词，如果您，譬如说，问四层楼上那个成衣匠的老婆说："斯吉依斯卡洛娃太太，您的姑娘是干什么的？"她会回答："玛尔任卡在玛尔施聂尔那儿干活，最小的在女裁缝那儿学针线，而爱米尔卡是卖身的。"这个行业跟所有其余的行业是一样的，而当父亲、母亲、玛尔任卡或者小妹子晚间到走廊里去解手的当儿，他们照样走过爱米尔卡正在那儿替自己挣面包的厨房。

在右面那间屋里住着工人庆奇伐腊一家。庆奇伐腊和他的妻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但是难道他们是真正的党员同志吗？当话题转到这一对只知道做工和积钱的夫妇的时候，东尼克老是挥着手。在这所房子里，人们关于庆奇伐腊的积蓄谈得很多，而在安娜的心里也暗暗地起了羡慕的念头。农民的贪求和未来的母亲的自私心在她身上冒了头。东尼克看出了这一点。

"这些人活得多蠢啊，"他说道，"一个工人的家庭象牛马样干着活，求得了资产阶级式的富足，这有什么用处呢？难道做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给儿子一张大学文凭吗？如果老庆奇伐腊不把每个夜晚耗费在赚外快上面，而积极地参加党的活动的话，他就会因此替无产阶级的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在内，多做一点事。"

安娜在几个集会上看见过庆奇伐腊和他的妻子，他们牢牢地留在她的记忆里，第一是因为他们的姓挺古怪，第二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好象有点跟大家不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表示赞成或不赞成，从来也不曾请求过发言，只是喝着啤酒，始终是两人合饮一杯。庆奇伐腊燃起烟斗，然后，没有吸完就把它藏到口袋里。在集会上常常举行募捐，工人们能捐多少就捐多少。谁如果一点都捐不出，就不捐，别人也不见怪。老庆奇伐腊每一次总是捐的，同时每一次都捐得不太多也不太少。

这一对夫妇在各方面都与别的工人们不同。庆奇伐腊是个砌炉匠，同时又在工厂里做工。下工回来以后，他不象别的工人们那样换了衣服休息，而是提了一桶粘土，出发到各家去装修火炉。他连星期天也工作。安娜经常看到他的妻子卷起了袖子，身上罩着湿的围裙。庆奇伐罗娃老是站在炉灶或水槽跟前做着自己家里或者旁人的活儿。在天气晴朗的星期天里，甚至连最贫

苦的人家也到城外去溜达的时候，庆奇伐罗娃还是站在厨房里的熨衣板跟前，而她的丈夫则提了自己的桶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最大的彼庇克攻读法律，亚尔达上的是职业中学，鲍仙娜在女帽商那里当学徒，而方达还在小学念书。一家人都吃马肉，睡在狭窄的厨房里，因为他们把房间租给了三个做女售货员的姑娘。每天晚上，他们把两个褥垫搬到厨房里，到了早晨就重新把它们放置在房客们的床上。庆奇伐腊一家人是分两张铺睡的：夫妻俩一张，兄弟姊妹们一张。在所有的邻居全都睡下以后，他们厨房里的灯光还是长久地亮着。父女们已经睡了，母亲在熨着衣服或者洗衣裳，两个儿子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点着煤油灯在做功课。要是读中学三年级的亚尔达在书本上打盹的话，母亲就会给他一个嘴巴，叫喊着："读啊！"

这个身材高大、阔肩膀、有点发胖的女人是一家之长，而矮个子、蓄着胡子的砌炉匠站在她旁边就象只小麻雀一样。钱，一定要赚钱！由于庆奇伐罗娃不在饭食上节省，她一家人总是吃得饱饱的，因此她就更知道钱的价值，她不会忘记隔壁一户人家的悲惨例子，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老是只喝咖啡，结果两个儿子没有念完书就生肺病死了。钱，一定得赚钱！

有一回，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院子里做工的木匠们把十五岁的、有着象狐狸般棕黄色头发的鲍仙娜叫到草棚里，他们盘问她是否全身都有斑点，并且答应各人出五十个赫勒给她，如果她肯在他们面前脱掉衣服的话。邻居们告诉庆奇伐罗娃说她的女儿被这个诱惑降服了。过后，母亲便推着鲍仙娜的肩膀，问："你把这些钱藏到哪里去了，死鬼？"

庆奇伐罗娃有着一双冷酷而森严的眼睛，安娜看到它们就

有些害怕。"我们是认识的，"当庆奇伐罗娃跟安娜第一次在走廊上碰见的时候，她严厉而不带笑容地说道，同时向安娜伸出她那由于不断的洗濯而白得象纸的手。她十分冷淡地握了握对方的手。也许她正仇视着周围的人们，因为她为了要抚育孩子们而不得不象驮兽那样地干活，而其他的邻居所过的生活，在她看来，却充满着欢快和玩乐。

再上面一层楼上住着一个头发染色、嘴唇涂得猩红的离了婚的女人。她由一个商人供养着，他规定每星期一和星期四白天十点钟到十二点在她那儿。这位太太在馆子里吃饭，并且雇着一个佣人。

有一天白天，庆奇伐罗娃等候着这位太太，一看见后者顺着楼梯走下来，她便从厨房里走到梯台上。

"有几句话跟您谈一下，太太！"

"哦，好的，庆奇伐罗娃太太，"那一个谄媚地答道。

"彼派！①"庆奇伐罗娃呼唤着。

在厨房门口出现了二十岁的大学生。他的脸涨得通红，目光紧盯在母亲身上。

"这儿，这儿，走近一点！"庆奇伐罗娃提高嗓子叫道，年轻人不声不响地服从了。

母亲把两只湿手往腰间一叉：

"可是这样的，太太，您以为我把这个小伙子抚养成人就是为了您吗？"

"啊，您这是什么话，庆奇伐罗娃太太！"

"别想厚着脸皮抵赖！这蠢货到您那儿去过。三次！我逼他

① 彼庇克之爱称。

招认的。是你勾引他的，你这妖精，你这婊子……”

“妈妈，看在上帝份上，请你……”

“住嘴！”庆奇伐罗娃叫道，朝儿子挥一下手，“这是我的儿子，太太！我是用这两只手把他养大的，——瞧一瞧我的手，它们在二十年里变成了什么样儿！您，当然是喜欢小伙子的，那还用说！但是这是我的儿子，如果您还要纠缠他的话，我要给您瞧瞧这两只手，”她把双手朝金发女人的头发伸去，“不光会做活儿！就是这样的，好生记住吧！你替我滚回家去，蠢孩子！我要狠狠的揍你，让你的脑袋清醒清醒！”

脸孔红得象蟹一样的大学生在门口不见了，而那个离了婚的女人则轻蔑地耸耸肩膀，苦笑一下，便走下楼去了。庆奇伐罗娃在她后面晃着拳头：“你真是个下流胚！”

在厨房的打开着的门边站着军士太太克拉邦诺娃，从隔壁的门里出来了斯拉娃·库契罗娃，手里抱着小弟弟，旁边跟着五岁的妹子，抓住了她的五颜六色的裙子。安娜正在厨房里，这一场戏她都听见了。在齐日考夫区的房子里，没有一件事是能够瞒得住人的。

安娜晚上把这事情告诉了东尼克。

“可不是，庆奇伐黎哈①老是这样子：‘我的，我的！’”他笑了起来。“但是那个好吃懒做的资产阶级女人也是活该！”

安娜住到叶赛尼奥伐街以后，就认识了受尽苦难的匈牙利革命者向陀尔·凯烈凯施。有一天，她跟东尼克在齐日考夫区的街上碰到他。凯烈凯施的模样好象一个垂死的人，他的两手是灼热的。

---

① 庆奇伐罗娃之昵称。

“你好吗，凯烈凯施同志？”东尼克问道。

“快死了。”那一个简截地说道。

“可是再艰难点的事情你也熬过来了。”

“现在已经熬不过了。”

凯烈凯施拿到一个斯洛伐克同志的身份证，在布拉格留下来了。他化名进了丹聂克工厂当旋工。但是这样吃力的工作他已经干不下来了，同时，社会保险处的医生在他的表上写下“I P T”几个字母，这是拉丁文“infiltratio pulmonum tuberculosa”① 的意思，可是工人们却把它们作了如下的解释：“残废者，后天就成一具尸体。”对这类事情，医生和工人们都很少会预料错的。

凯烈凯施靠了在街上卖报挣点钱过活。他陪东尼克和安娜到了家门口。他们谈着党，谈着匈牙利的亡命者，谈着匈牙利国内的白色恐怖。

“我已经不能回到家乡了，”凯烈凯施用了肺病患者的软弱无力的声音说道。“我等不到我们胜利的日子了。你们这里还刚刚开始行动呢。唉，要是我还能对革命有所帮助的话，我愿意拿出多少力量来啊！”

他们站立在东尼克和安娜住的房子面前。凯烈凯施向上望着，仔细端详着楼梯，——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的眼睛不要跟对谈者的目光相遇。

“你现在住在这儿吗？”他问道，甚至没有注意到安娜肯定地点了点头。

“你家里有没有音信？”东尼克打破了沉默。

① 意即：严重的肺病。

凯烈凯施摇摇头：

"兄弟被绞死了，妻儿们的下落一点也不知道。"

他匆匆地用自己灼热的手握了握东尼克和安娜的手，接着，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们目送着他，心里很难受。凯烈凯施多令人惋惜！这不仅是惋惜一个垂死的人——在那个时候，死亡的人太多了！——更其值得惋惜的是一个战士不得不离开他的战斗队伍了。

向陀尔·凯烈凯施的故事

政治上的决战迫近了。杨达克议员正在把群众组织起来。他不惧怕高声呼喊别人还刚在那里小声发出的口号："让我们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走向革命的新政党！打倒陈腐的社会民主主义！"

这些口号获得了克拉德诺的矿工们和布拉格各工厂工人们的拥护。现在必须把俄斯特拉发的矿工和五金工人们，布尔诺的纺织工人和木工们，各铁路大中心站的员工们，普耳浔军火工厂的工人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杨达克领导着一切活动。他消息灵通，随时随地都是警惕的，并且善于驳倒论敌的长篇大论。他敏捷如燕子，勇敢如猛狮，机灵如鳟鱼。每天他总得在某个集会上讲演，《人民权利报》上每星期都出现他的机智的、勇敢的、令人信服的论文。杨达克变成了最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了。他的名字在所有的工厂和工人的集会中被反复传诵着，而当杨达克低着头，仿佛准备战斗似的登上讲台的时候，听众们千百只结实的工人的手就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来欢迎他。

执政党在报纸上激烈地攻击杨达克。报上说杨达克被犹太人收买了，说他把捷克人民出卖给德国人，说他是杀害军团的士兵的罪魁，说他从俄罗斯那里领到金刚钻和金链条，说他有着华丽的汽车，而他的太太和女儿则有价值千金的衣饰等等。

杨达克，杨达克议员！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健壮的男子，有

着漂亮、平直的额角，鲜红的厚嘴唇和结实的颧骨，——他乃是运动家、脑力劳动者、身材矮胖者那几种人的奇特的结合，不同凡响地兼备着无产阶级的坚韧、知识分子的精细和凶禽猛兽似的机灵。杨达克变成了大众注目的对象。

"你父亲不会跟我们走一条路的，"东尼克曾经对小杨达克说过这句话。这是东尼克的工人的直觉告诉他的，可是这种直觉也可能使人受到蒙蔽。从那时候起，东尼克每每有机会使自己相信：一个雍容贵妇的丈夫和优雅的小姐的父亲可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好领袖。东尼克不习惯向人道歉，在他的词汇里没有"请原谅"这句话，但是他却为了在齐日考夫高架桥下的那场谈话而久久地恼恨自己，并且为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有一次，在人民宫热烈的集会上，当左翼在工人运动中很明显地获得胜利的时候，杨达克结束了自己的演说，他在如雷般的掌声中从讲台上走下来以后，便挨着东尼克和安娜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东尼克阴郁地望了望他的脸面。在他的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最后，他愁眉蹙额地说道：

"过去我很久不能信任你，同志，因为我看见你的妻子穿了绸衣服，女儿穿着漆皮鞋。但是现在我可相信你了。"

东尼克很费力地说出了这些话。当时，他跟杨达克，甚至于安娜都脸红了起来。

"哦，这没什么！"杨达克说着，笑了一笑。"在我们共同去作决战以前，必须彼此间有很清楚的认识。"

这个日子一直保留在东尼克的记忆里，还有着别的原因。当他和安娜晚上十点钟左右开完会回家的时候，向陀尔·凯烈凯施在叶赛尼奥伐街等着他们。

"我想跟你谈谈，"他对东尼克说道。安娜发觉在匈牙利人

的微弱的声音中，包含着激动不安的音调。于是她自己也跟着心乱起来了。

他们把凯烈凯施带到自己家里，随后，安娜上厨房去热咖啡，而两个男子便坐在屋子里。

“……跟你单独谈一谈，”客人补充说。

东尼克点了点头，就关了通厨房的门。

“伊姆莱·别拉斐伯爵在布拉格！”凯烈凯施一开头就宣布说，他今天的脸色异常苍白。

“这是什么人？”东尼克弄不清楚。

“不记得了吗？这就是在牢里拷问我的那个人，后备军上尉伊姆莱·别拉斐伯爵。他住在蓝星旅馆十六号房间。我探出了他的行踪。旅馆里没有一个人注意我，而伯爵呢，当然认不出我来。”

“他来干什么？”

“制造反匈牙利共产党员的白色恐怖，同时要把我们刚开始的运动镇压下去——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探索匈牙利流亡者的行踪，并促使捷克政府将他们交给匈牙利，然后在那儿把他们送上绞架。他是国际反共联盟的间谍。”

在凯烈凯施羊皮纸似的脸面上现出了鲜红的斑点。

“这是你打听来的，还是光是自己猜测而已？”

“证据我自然没有，可是这是非常清楚的事。”

东尼克想了一想。

“得预先通知党。”

凯烈凯施摆了摆手。

“通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吗？”

“它的左翼。”

凯烈凯施重又摆了摆手。

“我自己去跟他算帐。”

“怎么算法呢？”

“弄死他。”

东尼克没有回答。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伊姆莱·别拉斐——这是一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假如让他活着的话，他会做很多破坏革命运动的事。我只有几个星期好活了，我已经等不到革命了。杀死了别拉斐，我至少可以以此来报答捷克共产党人，同时还可以帮助我的匈牙利同志们。”

安娜端了两杯咖啡走到房间里，朝丈夫和客人望了望。作为一个未来的母亲，她直觉地感到了危机，她的心微微地颤了一下。“出了什么事？”她心慌起来了，同时觉得她肚子里的孩子也仿佛微微地动了一下。男子们停止了谈话。安娜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走出房间去。

“到厨房里去吧，安娜，我们有事情。”

安娜走了出去。

“一定得把这一切报告党，”东尼克重复说。

“你反对个人的恐怖行动吗？”

“要是有组织地去进行，而对革命有好处的话，我不反对。但是不管在哪种个别的场合下，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能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跟你两个不能单独决定这种恐怖行动是否需要，因为我们对政治情势了解得不够。”

凯烈凯施苦笑了一下。

“奇怪的是党员同志们怎么会不相信反革命的危险，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自己可就不得不相信这个。你想把这件事预先通

知党内什么人呢！通知国会里的党团吗？通知书记处吗？有什么用？你只会把整个事情弄得复杂起来，并且还给了警察局一个线索。别拉斐是应该死的！”

“霍尔蒂还会派几十个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的。”

“象别拉斐这种人在他们中间不会再有了。我知道他，而你不知道。”

他们互相说了声再会，于是凯烈凯施就走了。

晚上，当安娜在东尼克身边躺下来，并且为自己的已经高高突起的肚子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以后，她就问了起来，那时候心里虽然激动，可是却装出随便问问的口气：

“他想做什么？”

“暂且别问！”东尼克严厉地回答道。安娜的心又颤了一下，同时孩子又在肚子里动了一动。“瞧，孩子也在担心呢，”安娜想着。

东尼克没有睡着。他整夜都在考虑着，到快天亮的时候，他决定不去跟任何人讨论这件事以后，他才睡着。凡是对革命有利的事情总是好的。让他去干这件暗杀的事吧！

一清早，当东尼克准备去上工，而安娜下楼去取牛奶的当儿，凯烈凯施来了。

“我身上穿的衣服是从一个匈牙利侨民——一个大学生那儿拿来的，”他说道。“我穿了这件衣服好象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这会引起旅馆里职工们的猜疑。把你的工作衣借我一下。”

东尼克把工作衣从衣柜里拿了出来，交给匈牙利人。

“你是不是到那边去？”他问道。

“是的。”

“马上？”

“对。”

东尼克的心急速地跳动起来了。他想送送同志，但是凯烈凯施说道：

“别去，不应该让任何人看见我们俩在一块儿。如果我被捕的话，我要把对我的审问变成对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控诉。全世界将会因我的控诉而震惊。记着，这工作衣是我在今天早上，你们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偷的，我趁你的妻子出去拿牛奶、而你上厕所去的那当儿，钻了空子。懂吗？倘若他们没有把我抓住的话，我今天晚上把这件工作衣从走廊上丢到你们厨房的窗子里。”

于是凯烈凯施便去弄死别拉斐伯爵了。他在他平日宿夜的废铁堆栈里换了衣服，并且就在那儿，替自己在工装外套的里面缝了个挂斧头的套索，随后他就出发上蓝星旅馆，在早晨八点钟光景到了那边。看门人看到他走上楼去，但是并没有对他特别注意。到了二楼，凯烈凯施就敲了敲十六号房间的门。

没有人回答。

凯烈凯施又敲了敲门。

“是谁？”一个困倦的声音用德国话问。

“开开门！”凯烈凯施用匈牙利话回答。

在门后响起了脚步声。

“是谁？”那人又用德国话问了一遍。

“开开门，伯爵，有重要的消息报告您。”

门打开了。在凯烈凯施前面站着伊姆莱·别拉斐伯爵，身上穿着睡衣，脚上趿了双拖鞋。凯烈凯施拔出斧头，用斧背朝自己敌人的头上击去。在伯爵的脸面上现出了惊讶的神情。凯烈凯施挥起斧头，又是一击。伯爵的身体摇晃起来，膝头一屈，朝

旁边倒了下去。

凯烈凯施关上门。他走到衣柜旁边，从那里面拖出几件脏衬衣，弯身向着别拉斐，解开了他的睡衣，摸摸他的心是否在跳。它在跳着，别拉斐伯爵活着。凯烈凯施用脏衬衣的袖子把他的脚捆起来，同时把他的手绑在背后，用一块手绢塞在他口里。后来他就动手使伯爵清醒过来。头上的伤并不重，伯爵的身材高大，所以受伤的地方不在头顶上，而是在前额上。第二处的伤势很轻，斧头不过在骨头上滑了一下。

凯烈凯施用湿毛巾在伯爵的胸口拍着。别拉斐睁开眼睛，刚想再闭上，可是突然明白了自己眼下的处境，于是他的眼睛睁得圆滚滚了。仇人们相对望了约莫一分钟。凯烈凯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您可认识我，伊姆莱·别拉斐公民？"

手脚捆绑着的伯爵否定地摇了摇头。

"我相信您不记得我了。我们是阶级的、而不是私人之间的仇敌。我叫向陀尔·凯烈凯施。你们在布达佩斯曾经折磨过我，要是我逃不掉的话，你们还要用沙袋弄死我。您想尽方法要我招出我的同志们藏身的地方。您的猜测是对的，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私人之间的仇敌，我不是到这里来报私仇的。我是来处决您的，别拉斐公民。"

真奇怪！一切情景都和凯烈凯施屡次所想象的一模一样：他坐在椅子上，在他前面躺着被摔倒在地上的、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他，凯烈凯施，站在敌人前面控诉他的罪状。

在伯爵的睁得大大的黑眼睛里含着恐惧的表情。眼睛里的睡意已经无影无踪了。

"您过去看错了，现在还是一样的看错，别拉斐伯爵。您的

想法过去没有获得胜利，将来也不会获得胜利。你们在匈牙利只是暂时占了上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获得胜利，你们的阴谋是白费心机的。”

在凯烈凯施的羊皮纸似的脸颊上现出了红红的斑点。

“您被派到这里来是有使命的，”他继续说。“我不知道是谁派您来的，可能是霍尔蒂或者反共联盟的走狗。”

伯爵焦灼地转动着身子，睁得圆圆的眼睛盯着凯烈凯施。别拉斐的胸脯起伏着，他透过手绢不知叫喊着什么，而这种喑哑的声响就象是从深远的地窖里发出来似的。

“您被派来刺探匈牙利流亡者的踪迹，并且要把他们送去绞死。除此以外，您想帮着捷克反动派镇压共产主义运动。”

别拉斐伯爵的眼睛险些儿从眼窝里掉了出来。它们仿佛在喊着：“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是大大的误会！”他转动着头，拚命地反复叫着：“不，不！”

“不要抵赖，我们什么都知道。您是应该死的。”

别拉斐的身子象抽筋似的扭动着。他把头朝地毯上撞着，仿佛一头被折磨的、吓疯的野兽似地哼叫起来。“拿掉我嘴里的东西，”他的眼睛喊叫着。“我把一切都解释给您听！这是误会，大大的误会！让我说话，放松我，放松啊！”

凯烈凯施弯着身子，拿两只手指捏住了他的鼻孔。

“您过于嚷嚷了，伯爵。住嘴，要不然，我就把你扼死。”

凯烈凯施放松了伯爵的鼻子，重新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还是要好好地告诉您：您现在碰到的是怎么回事。我不愿意您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强盗或者凶手。我要您死，不是为了您过去的罪恶，而是为了不让您再犯新的、反革命的罪行。”

伯爵拚命呜呜地叫着。他拱起膝头，身子往上一纵，开始

翻来覆去地挣扎着，把头往地板上撞着。他呜呜地叫着，好象一头在屠宰场里的牲畜似的。凯烈凯施跳到他身边，抓住了他的喉管，把他紧按在地毯上。革命者的声音，到现在为止一直象斧头的锋口似的冷冰冰的，此刻却为热情燃烧着：

"混蛋，你想我们会让自己象绵羊似的听凭人家宰割吗？你想，你这狗养的，我们不会保护自己吗？"

他抓起了斧头。

"要你的命，你这猪！"

他把地毯角朝伯爵的头上一遮，接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随后，他疲乏地伸直了腰，走向那还有热气的被窝，往床上一倒，闭着眼睛躺了几分钟。后来他又站起身来，走到大理石的洗脸盆旁边，仔细地用了涂上肥皂的丝瓜筋把手和脸都擦干净，好象从前在吉密施伐尔冶金工厂里下工后的样子。接着，他就毫不畏惧地跨过血潭，走到门边，侧耳倾听着。走廊上是静悄悄的。凯烈凯施打开门，走了出去……

有一个人向他迎面走来。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生着墨黑的络腮胡子，穿一套运动衫似的衣服。他离凯烈凯施已经只有三步路了，并且很明显是到别拉斐那个房间里去的。

凯烈凯施的心一震。"完了！"他想，但是仍旧不慌不忙地关上了身后的门，镇静地开始顺着灰色地毯朝楼梯走去。"现在这已经是无关紧要了，"这念头在他的心头掠过。"事情已经做完了。"并且："我要把对我的审问变成对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控诉，这样的控诉是全世界还不曾听到过的！"

凯烈凯施听见这不认识的人怎样在他的背后敲着别拉斐的门，一遍，又一遍，后来又打开门，走了进去。

可是那时候却出了件怪事——完全不是凯烈凯施所等待的

那样。不曾发出“来人啊！”的喊声，旅馆里并没有起什么骚动。

十六号房间的门重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凯烈凯施听到在地毯上走着的匆促的脚步声。但是没有人从背后抓住他的肩膀，没有人对他叫喊着：“凶手！”穿着运动衣的家伙踩着匆促的步子经过他身旁向楼下走去。在楼梯转弯的地方，凯烈凯施看到门房同这个家伙打着招呼，并且还回头对他看了一眼。陌生人迅速地走出那扇旋转的门。凯烈凯施也走过看门人的身旁，跟着两位穿黑衣服的太太一起走到街上。到了那边，他还看见陌生人跳上了正在开行的电车。

凯烈凯施朝齐日考夫的方向走着。

关于暗杀事件的报道已经在早报上登出来了。在叶赛尼奥伐街的房子里，军士太太克拉邦诺娃讲述着这件事。她虽则跟邻居们不太合得来，可是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哪能沉默不提！

安娜到走廊上去打水的时候，在那儿看见克拉邦诺娃太太和那衣帽间的女侍者恩德列罗娃。

“您听到蓝星旅馆的谋杀案没有？”军士太太问道。

恩德列罗娃已经准备上自己的戏院里去了，她正在那儿扣吊袜带，这时候便自下而上朝安娜望了望，说道：

“报上说他是抱着不明不白的目的到我们共和国来的。不外是个造假钞票的！”

“不是的，”军士太太坚决地宣称，“他准是个间谍，一定的，您相信得了！”

在吃中饭的一段休息时间里，东尼克在香烟铺子里买了一份早报，走在街上的当儿就把它翻开来看了。但是无论他把这消息看多少遍，他总还是莫名其妙。只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警

察局已经找到了追捕凯烈凯施同志的线索。东尼克弄得头昏脑涨起来了。他坐在工厂的饭厅里，薄粥咽不下口，他通常从家里带来一块面包，这一天的面包却几乎动也不曾动过。

吃过中饭以后，东尼克又在沙沟底里干着活儿。已经三点多了。周围的人们工作得正起劲。在翻砂工场上，整个地面铺着一公尺来深的沙子，翻砂工人们好象在壕沟里似的在那里面挖掘着——建立起象防御工事似的建筑物和类似孩子们造的小房子。这儿将有熔化了的铁流进来，熔铁在这里凝结起来，变成机器的零件、飞轮或者机台。东尼克弄平模型壁上凹凸不平的地方，润湿沙子，并且把一条条长长的金属丝做的撑柱打进模型去，为的是要使它牢固一点。但是今天他不能聚精会神地工作，活儿做不上手，他不停地摸出表来，焦躁地等待着熔炼的时间，熔完铁以后，他就可以回家了。他心里老是惦念着向陀尔·凯烈凯施，这使他苦恼。

《捷克的话报》① 上登载的消息是非常离奇的：

蓝星旅馆的谋杀案

在出报以前的几分钟里，我们获悉了如下的消息：今天早晨在普尔希柯贝的蓝星旅馆里出了一桩离奇的谋杀案，被害者是一个从冈诺魏尔来的厂主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在早晨九点钟的时候，旅馆里的女仆去敲勃烈乌艾尔的门。没有听到回音，于是她便走了进去，看见客人躺在地板上的血泊里。死者穿着睡衣。谋杀的武器，一把短柄斧头丢在他身旁。死者的头上覆盖着地毯，凶手的斧头是隔着

① 当时捷克国内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捷克国家社会党的机关报。——俄译者

一层地毯砍下去的——显然，是为了不让血溅到身上来。根据法医检验的结论，谋杀发生于早晨七点半左右。谋杀的动机殊难猜测，因为死者所有的贵重物件原封未动。可是警察局已经找到了追捕凶手的线索。旅馆看门人伊奥捷夫·缪列尔的供词将有助于凶手的捕获，他曾看到过凶手中的一个，并且作了关于他的详细的描述。这个谋杀案的审查工作已交有经验的侦查员布勃尼克警长担任。从死者的物件中发现了证据，证明他到我国来怀有暧昧的目的。也许，应该从这方面来探索这个神秘的谋杀案的动机。

报纸上的消息很简短，可是却能引起许多揣测。东尼克把这个消息读了许多遍，几乎能把它背出来了。可是它却还是使人摸不着头脑。

从冈诺魏尔来的厂主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简直胡说八道！或许是凯烈凯施搞错了，弄死了另外一个人吧？或许这不是真正的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而是伊姆莱·别拉斐的化名？旅馆里的看门人注意到凯烈凯施，并且甚至把他详细地描写了一番。警察局已经找到追捕匈牙利同志的线索了！……东尼克想到了自己的工作衣，同时想到了安娜。

“你今天脸色不大好，克罗乌斯基同志，你身体可舒服？”老打杂工勃拉席克说道，他正提给东尼克一桶润湿沙制模型的水，这时候东尼克仿佛突然醒悟过来似的看到自己正在翻砂场上，看到周围尽是金属和沙子，而在天花板下面有着隆隆作响的起重机。在那边，在车间的另一端，技师在发出信号：击碎熔铁炉上的粘土制的栓塞。而东尼克自己此刻正蹲在沙坑里，毫无目的地拿铲子在铸型的边缘上刮着……

他一句话都没有回答老勃拉席克，可是吃了一惊，同时对自己这样不能自制感到非常生气。

熔铁炉仿佛受了伤似的放出了一股火红的血流。浓厚的、白里带玫瑰色的熔化了的金属沿着凹槽流出来，它的白光照亮了沙子和工人们的脸孔。翻砂工人们成对地走到炉子跟前，把长柄勺子放到凹槽底下。勺子里盛满了爆着火花的金属。翻砂工人们走到沙制的模型前面，把熔铁倒到它们里面去。全车间被白光照得通明，在灼热的空气里散发着刺鼻的、酸溜溜的味道。

一天的工作快要完了。此刻在隔壁的车间里，人们正在把马丁炉里的熔铁放出来，随后，汽笛就要呜呜地响起来了。

于是，最后终于听到了汽笛声。

东尼克赶快走向衣橱，就这样在蓝色工装上套上外套，甚至没有洗脸，就跑到街上去了。但愿没有任何一个同志会阻挡他。他在书报摊上买了晚报，就往上向克别耳走去。到了离工厂较远的地方，东尼克就一边走，一边打开报纸看起来了。

蓝星旅馆案的凶手被捕

东尼克的心急速地跳动起来了。那么，凶手被捕了！东尼克的目光匆匆地在报纸的各栏上溜了一遍，找寻凯烈凯施同志的名字。

“凶手被捕”，小标题这样写道。东尼克的目光匆匆地顺着每一行滑下去，抓住了几个个别的单字。

米兰·伊奥凡诺维奇 …… 旅馆看门人 …… 供述如下……侍役长及女仆……在腊陀京车站……捕获凶手……警长布勃尼克……二十九岁的米兰·伊奥凡诺维奇……

东尼克的目光狂热地顺着每一行跳过去。

啊！瞧，"审问凶手"！

伊奥凡诺维奇……说……不认识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并且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他不熟识的一个妓女的屋子里……伊奥凡诺维奇的行李……

这里没有他要找寻的东西！于是东尼克就拚命往以下的各行看去：

米兰·伊奥凡诺维奇……和几个证人……

见鬼！跟什么米兰·伊奥凡诺维奇有何关系？

东尼克瞥了一眼消息的结尾：

坚持自己的口供。审讯在继续中。关于这件耸人听闻的谋杀案的详细消息，我们将登载在我们明日的早报上。

就是这些吗？就是这些！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凯烈凯施！

东尼克又回过来看"凶手被捕"那个小标题，并且把这一段重复看着：

腊陀京……火车站……警察局……被捕的凶手是札格烈勃人米兰·伊奥凡诺维奇，今年二十九岁……

怎么会这样的？

被捕的凶手是从札格烈勃地方来的米兰·伊奥凡诺维奇，今年二十九岁，他是布拉格警察局所熟知的一个屡受审判的国际诈骗犯。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是米兰·伊奥凡诺维奇？

东尼克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他的眼睛重又紧紧地盯着这句话。对的，毫无疑义，这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米兰·伊奥凡诺维奇"。

东尼克眼睛睁得圆圆的，站在街中心，随后就迅速地把报纸塞进口袋，几乎用跑步向城郊奔去，经过田野，往上到克别耳。到了那里，他便转入田间小路，在地上坐了下来。他藏身在麦穗丛里，重新又看起报来。首先应该把"凶手被捕"重新看一遍，以后再把其余的依次看下去。

在国际诈骗犯的巢穴里

对被杀的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的房间略加搜查，即已引起此案的惊人转折。首先，密探们发现了一只盛着一包包假钞票的手提袋，票面价值是两克朗，总款近一万克朗左右。这些假钞票是从匈牙利或者奥地利私运来的。警察很快就明了：这十六号房间原来住着一个危险的国际盗贼，骗子手和贩卖妇女者。这个房间是赃物的秘密堆栈，在这里发现了二十万五千克朗以上的捷币和外国币——马克、美元、英镑和荷兰币。

后来又发现五只男用和两只女用的金表、两只金香烟

盒、五粒大金刚钻和一只银的女提包。所有这些东西显然是扒手的赃物。有一只手表已归原主。其余的失主请往警察局认领。

此外，在勃烈乌艾尔的房间里，又找到了一大迭相片和各地方来的信件，这些东西证明他在干着替近东各国的妓院物色妓女的行业。

死者无疑地是最危险的国际罪犯之一。可是奇怪的是他的一切文件都是清清楚楚的，同时在警察局的照片簿里也没有他的相片。关于这一点，布拉格警察局已经跟冈诺魏尔当局有了联系。

谋杀的离奇动机

蓝星旅馆谋杀案的审讯工作虽在加紧进行，可是谋杀的动机到现在还是个谜。有几点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第一是勃烈乌艾尔的现款和贵重物件不曾被盗窃，虽然这些东西甚至没有上锁；第二，死者的手足均被捆缚；第三，被杀的勃烈乌艾尔穿着睡衣，躺在靠门的地板上。因此，对谋杀的情景作如下的推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勃烈乌艾尔是罪恶的盗伙里的一员。今天早晨，这个盗伙中的一个喽罗敲他的门，勃烈乌艾尔从他的声音或暗号中认出是他，便把门开了。这时候，凶手就立即向他扑去，把他捆缚起来，塞住他的嘴。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个谜。可能是想用威胁和拷问的手段从他口里逼出某种机密，或者迫使他交出对凶手说来极为重要或者足以损害后者名誉的文件或物品。因为，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把被害者捆缚起来，而不立即把他处死呢？可是，也许这谋杀是

一种东方式的报复行为吧？可能这种报复与拐骗某一妇女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自然只是猜想而已。我们希望警察局的调查和对米兰·伊奥凡诺维奇的审问会对所有这些问题给予答复。

凶手被捕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凶手早就于上午被捕。蓝星旅馆看门人伊奥捷夫·缪列尔的供词给予警察局很大的帮助。下面就是他向警察局及我们的新闻记者所作的叙述：

“在八点缺二十三分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从楼梯上走下来，他是约莫在五分钟以前上二楼去的。他身上穿一套运动衣式样的衣服，脚上套着咖啡色的鞋套，头上戴着无边格子帽。他看上去大约有三十岁光景，有着黑黑的络腮胡子、深色的眼睛，整个说来——标准的犹太人外表（米兰·伊奥凡诺维奇是塞尔维亚人——编者）。我留心地望了望挂在写字台后面的钟，因为这个家伙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星期四，在我休息的日子，我跟自己的朋友侍役长伊奥捷夫·克和姑娘们派芙拉·施、伊奥捷法·尔上谢克特派维里昂游乐场去。我们在早晨两点多钟的时候到了那儿。在一个包厢里坐了一伙人——四个男的和几个妓女。我们特别注意他们，因为他们闹得很厉害并且把钱乱花一通。他们喝着波密利牌子的香槟，并且还拿它款待吉普赛人的乐队。不消说，他们花掉了很多钱，照我的推测，总有五六千光景。在这一伙人中间有此刻被谋杀的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他那时候已经住在我们旅馆里了，所以我认得他。今天七点半以后下楼来的那个家伙也在那儿。关于这一层，绝

对不会弄错，因为在这样清早，不会有客人在旅馆里进出的。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只有旅馆里的职员跟在顶楼上干活的盖屋顶工人。在这时候，旅馆里的人很少，因为在主要干线上行驶的火车早就在七点以前开出了。在七点到八点之间，从旅馆里走出去的有两个男人、一位带着女孩子的太太和两位上了年纪的太太，他们在出去以前都是在旅馆的咖啡室里吃的早点。我不能准确说出那个有着犹太人的外表、身穿运动衣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时候上二楼去的，因为那当儿，我正回答上面提到过的两位老太太的询问，所以没有看钟。可是我猜想他在上面呆了四分到五分钟，无论如何决不会超过一刻钟。”

警察局在得到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以后，就立即开始有力的追查。关于凶手的描述和追捕他的命令已转到布拉格及近郊所有的警察分局。各个车站都处在极严密的监视之下。在早晨十一点钟的时候，已经接到从腊陀京来的、关于凶手被捕的报告，凶手在那儿买了上马利恩斯克温泉去的车票，正在等候火车。布勃尼克警长立即驱车前往腊陀京，把被捕的人解到布拉格，在那儿，后者受到了详细的审问。他是二十九岁的米兰·伊奥凡诺维奇，札格烈勃人，一个屡次受审判的国际诈骗犯，为布拉格警察局所熟知。

审问凶手

伊奥凡诺维奇向腊陀京警察局交出具名华沙商人玛克斯·迦聂夫斯基的身份证。但是他并不能把警察局引入迷途，因为在布拉格警察局里有着他的照片和指印，该局很清

楚地记得他。在一九一七年，伊奥凡诺维奇因犯蓄娼、扒窃、欺诈的罪行而被布拉格陪审委员团判处一年半徒刑。他在布拉格潘克腊茨监狱里服刑期满后，就被移交给南斯拉夫当局。

伊奥凡诺维奇经过短时间的狡赖以后，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可是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肯招认，并且坚持说他并没有参与这谋杀的事件。据他说，他今天早上并没有到过蓝星旅馆，同时并不认识死者，至于谢克特派维里昂游乐场他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伊奥凡诺维奇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这些口供。他隐瞒了自己布拉格的地址，坚持说自己昨天才到这里，并且在某一个咖啡馆里度过了上半夜，而后半夜则宿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妓女那里。为什么他不从布拉格车站乘车往马利恩斯克温泉而偏偏要徒步两小时走到腊陀京，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在晚上狂饮以后，感到身子不舒服，想溜达溜达。在他被捕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五千多克朗。可疑的物件一样都没有搜到。伊奥凡诺维奇没有行李，显然他把它藏在布拉格的什么地方。警察局正在设法找出他的行李。

最后的一分钟

在出报以前的几分钟里，我们获悉了如下的消息：

今日下午当局曾安排被捕的米兰·伊奥凡诺维奇与几个证人对质。蓝星旅馆看门人毫不犹豫地认出了伊奥凡诺维奇。此外，谢克特派维里昂的侍役和侍役长、姑娘派芙拉·施和妓女伊奥捷法·尔也认出他是那天晚上饮酒作乐者之一。虽然有着这些确凿的证据，伊奥凡诺维奇依旧坚

持自己的口供。审讯在继续进行中。

东尼克被所读到的一切弄得完全迷惑了，他坐在田埂上，垂下了双手，呆呆地望着一长条被踩坏了的草。两旁的庄稼象墙壁似地竖立着。

米兰·伊奥凡诺维奇，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真是一团糟！这事情是怎么搞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凯烈凯施同志，没有一个字提到别拉斐伯爵……

东尼克又看了几份晚报。所有的消息都是相符的，什么也不能帮他解决这个谜。

他仿佛被艰苦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似地从田埂上站起身来，向电车站走去。天色暗下来了。东尼克乘车上市中心，到了凯烈凯施往常在那儿卖报的街上。但是匈牙利人并不在那边。东尼克在随便哪一个近旁的十字路口都找不到他，而凯烈凯施住的地方，他又不知道。

他差不多到天黑的时候才回到家里。

“东尼克！”正在熨衬衣的安娜快活地向他叫了起来，“你已经到家来过了吗？”

“没有。”

“没有？”她惊奇起来。“那么是谁把你的工作衣从柜子里拿了出来呢？”

东尼克脸红了。

“天晓得我是怎么想的！”安娜继续说。“我差不多整天都在家，可是到了傍晚，却在厨房的桌子上找到了这件工作衣。我想，难道出了贼吗？可是家里的东西都好好的没有动过。”

“别说了，安娜。”

他这样生硬地打断了谈话，使安娜吃了一惊，甚至使她着急起来。

东尼克勉强坐下来吃晚饭，安娜替他端来了一盘土豆子汤。可是他不想吃，就把匙子放了下来。

“吃不下，安娜，你别生气，汤的味道很好。”

安娜忧虑地对他望着。

“出了什么事，东尼契克？”她问道。

“没有什么，”他严厉地答道，点燃了煤油灯，在桌旁坐下来，开始专心地做着党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东尼克就洗了脸准备睡觉。安娜开始铺床。她从被单上收起了《人民权利报》的晚刊，它就摊开在报道蓝星旅馆谋杀案的那地方。东尼克显然很窘。他怎么会没留意到：即使他们的报纸只约略报道关于谋杀案的消息，安娜还是会由此而得知这件事的！

他们在床上躺了下来，默默地并排躺着。安娜象母亲样地抚摸着丈夫的头。当她在家里替生病的姊妹放下冷的压定布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抚摸病人的。

东尼克没有动弹。

安娜已经睡着很多时候了，在梦里均匀地呼吸着，可是东尼克却还是睡不着。在他的脑海里迅速地掠过了许多人物和事件。从冈诺魏尔来的商人、米兰·伊奥凡诺维奇、向陀尔·凯烈凯施、旅馆看门人、侍役、妓女、吉普赛乐师……东尼克时而短暂地睡着一会儿，做着恶梦，时而又醒了过来。

早上他闭起眼睛，假装睡着的样子，等到安娜一出去取牛奶，他便跳起来，匆忙穿上衣服，跑出去买报了。他买了份《捷克的话报》，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开始看起来，等到走到了家，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才把它看完。

蓝星旅馆谋杀案件的惊人转变

昨天晚上，蓝星旅馆的谋杀案有了惊人的转变。被捕的米兰·伊奥凡诺维奇作了若干招供。他自己虽然否认与谋杀案有关，可是警察局毫不怀疑这件事是他干的。根据他的供词，昨天夜晚在布拉格逮捕了一连串人。大部分的国际盗贼、扒手、诱拐妇女者和骗子已被监禁。目前正在我国西部的各疗养地搜捕其余的匪徒，根据现有的报道，他们原打算分赴该地。根据伊奥凡诺维奇的口供，又确定了死者的真正身份。这是一个过去后备军的军官艾密利赫·别拉斐(伊姆莱·别拉斐)，出身于匈牙利有名的贵族之家。这一伙匪徒用的都是假名和伪造的身份证，伊姆莱·别拉斐也是其中之一，自称为古斯塔夫·勃烈乌艾尔。已经有几个失主到过警察局。凶手的手提箱亦已查获，手提箱里的物件揭露了别拉斐的罪状。这只手提箱是由迦尔尼旅馆的司阍在报上看到关于凶手的描述以后送到警察局去的。在新证据的压力之下，被捕者已经作了部分的招供。

凶手的说法

伊奥凡诺维奇企图使警察局相信以下的荒诞无稽的说法乃是事实：他说昨天早上，他想要把扒手们日常的赃物交给冒称勃烈乌艾尔的艾密利赫·别拉斐，同时向他传达某一位开设妓院的“太太”的委托。虽然匪徒们是被禁止到旅馆里来会别拉斐的，但是伊奥凡诺维奇之所以敢大着胆子这样做是因为他接到了从马利恩斯克温泉来的一个通知，要他立即上那儿去。当他走近别拉斐房间的时候，他说，

有一个人从那儿走出来，伊奥凡诺维奇当他是在房间里修理什么东西的工人。他不能够精确地描绘出这个人的外表，可是记得他是中等身材，一副病容，年纪大概在五十五岁左右。伊奥凡诺维奇走进房间，看见伯爵躺在血泊里死了。他刚想喊叫起来，可是又突然想到这样做可能会使自己和其余的匪徒们受到威胁。所以他赶忙躲藏起来。他在楼梯上追上了凶手，可是那时心里非常着慌，只想着逃跑，以致连他的脸孔都没有瞧一眼。

不待说，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当局审问了那一天在旅馆里做活的盖屋顶工人，并且安排他们与伊奥凡诺维奇对了质。他不能认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们的无罪是毫无疑义的。

腐化的贵族

关于死者艾密利赫·别拉斐伯爵，伊奥凡诺维奇报道如下：别拉斐出身于一个匈牙利历史上出名的望族。他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曾以他的狂乱的生活而著名，为了这样的生活，他同家里常常发生争执。在战时，别拉斐担任过后备军团的上尉，在布尔什维克暴动时期，曾逃往罗马尼亚，而在霍尔蒂执政以后，又加入了军队。伊奥凡诺维奇认识别拉斐还是在后者服现役的时候。别拉斐是个出色的骗子，伊奥凡诺维奇干的也是这一行；不久，他们就勾结起来了。去年秋天，别拉斐的上司发现他盗用公款近一万美元（约合一百万捷克克朗）。伯爵并没有被送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家里偿付了他盗用的款子而把这件事掩盖了，可是盗用公款者却不得不离开团队到外国去。他保持了与伊奥凡诺维

奇的联系，他们一齐迁移到华沙，在那里靠玩牌和诱拐妇女为生。慢慢地，他们又结识了几个同一类型的人，组织一个盗匪的伙帮，横行于华沙、布加勒斯特、维也纳、布拉格及捷克西部的各疗养地。别拉斐是这一伙盗匪的头目和赃物的窝藏者，所有的同谋者都听从他的号令。

看到这里，东尼克甚至吐了口唾沫。

“唉，多么愚蠢，多么失策啊！”他阴郁地嘟哝着。

安娜走了进来，她刚从铺子里回来。东尼克站起身，生气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多么愚蠢……多么糊涂啊，安娜！居然把这个废物，这个下流东西当成了什么重要脚色！”

“怎么回事，东尼契克？”她问道，为他的冒火而高兴，——这表示他不会再闷闷不乐了。

东尼克把手一挥。

吃过早饭以后，他就上工去了，随身带走了《捷克的话报》。不久，女报贩送来了《人民权利报》。安娜收拾好房间，在走廊上跟女邻居们打过招呼以后，就拿起报纸来看。在第一版上，一个标题闯入了她的眼帘：“匈牙利反革命分子们就是这样的！”在文章里所讲的是关于伊姆莱·别拉斐伯爵和蓝星旅馆的事。安娜蓦地想起了向陀尔·凯烈凯施以及他前天晚上奇特的访问。她又记起了那桩关于东尼克的工作衣的莫名其妙的事情，于是她明白了这里面有着某种关联。各式各样的恐惧钻进了她的脑海。安娜的心紧缩起来了，眼睛里带着惊惧的神情，头脑里不知怎的变得可怕地空虚了。

时间拖得使人难耐地长久。安娜不知道怎样来消磨时光，

活儿她又做不上手。有时候，她用这样的念头来安慰自己：东尼克大概整天都在厂里……但是这不过是大概而已……并且他又回来得很迟，怒气冲冲的，什么东西都不吃！还有这桩关于工作衣的事情。而东尼克今天早晨所说的"下流东西"又是什么意思？在安娜的额头上出现了一粒粒的汗珠。在中午的时候，她坐在煤箱上，想勉强喝几匙汤，但是喝不下。

在走廊上响起了女人们拖鞋的啪嗒声，人们在取水，发出食具的碰击声。安娜不想出房门，为的是怕遇见随便什么人。她感到有生以来，时间从来没有象这样过得慢的。

东尼克回来得很迟，约莫九点钟光景。下工后，他久久地在报贩们经常站着的各个十字路口和车站上走来走去，徒然地找寻着凯烈凯施同志。随后他就去开会了。

在他到家的时候，刚才紧张得不知所措的安娜又开始不安起来了，但是在暮色苍茫中，东尼克没有发觉到这个。他回来的时候很平静，拥抱她，吻她，并且关心地问道："你身体可舒服，安娜？有什么新闻吗？"随后他点燃了灯，津津有味地吃起晚饭来了。

东尼克的平静使安娜失却了向他提出问题的决心，这个问题一直磨了她十三个钟点。到了晚上，当他们并排躺着的时候，经过了内心的斗争和波动以后，她才鼓足了勇气，用肘臂撑起身子，俯身向着丈夫，喃喃地说道：

"你没有去杀他吧，东尼契克？"

东尼克起初吃了一惊，随后气冲冲地答道：

"难道你还可怜他不成？"

安娜吓了一大跳，重又平躺下来。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经过了长时间的沉默以后，东尼克才温和地说道：

“不，我不曾去杀他。”

安娜的心跳缓和下来了。她躺在那儿，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假如我杀死了他的话，”东尼克慢腾腾地说道，“你会不爱我了吗？”

安娜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她这样地躺了约莫有一分钟，然后吻了一下他的脖子，低声说道：

“不，可是我大概要有些怕你了。你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东尼契克？”

安娜感觉到他摇了摇头，然后又开始了沉默，只听到闹钟滴嗒滴嗒的响声。

“多么愚蠢，安娜，居然把这个下流东西当成了什么重要脚色！”

叛　徒

东尼克在全布拉格找寻着向陀尔·凯烈凯施。他向报贩们打听，奔走于斯米霍夫的各个砖厂、齐日考夫区的各个仓库、高列萧维茨区的各堆木栈之间——每一处听说是凯烈凯施同志宿夜的地方。可是匈牙利人什么地方都不在。东尼克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他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情负有责任。要是法庭相信了伊奥凡诺维奇的看来是真实的招供，事情会怎么样呢？要是凯烈凯施打算自首的话，事情又会怎么样呢？也许他已经被逮捕并且自己承认了吧？可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想到这谋杀事件是匈牙利革命者干的？其实，《人民权利报》在无意中已经对读者暗示了这一点。

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事情非常严重，再要对它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了。

东尼克决定跟杨达克谈一谈。议员既不在报馆，也不在党书记处，于是东尼克就上他的家里去了。杨达克的书房使东尼克愣了一会，因为一个柯耳卞工厂的翻砂工人对于有钱人总是下意识地感到敌意的。这是一间敞亮的、陈设得相当奢华的屋子，有着很多的藏书。在写字台上面挂着列宁的肖像。

杨达克让东尼克坐在一张皮圈椅里，然后把香烟递给他。东尼克谢绝了，他是不抽烟的。

“我做了件蠢事，”他说道。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开口，于

是就皱眉蹙额起来了。

“你做了件蠢事？讲出来听听吧，克罗乌斯基同志。”

东尼克讲述了向陀尔·凯烈凯施的故事。杨达克搔搔后脑勺，皱起了鼻子。

“见鬼！也许什么都会平平安安过去的。”

东尼克期待着另一种回答。他很不喜欢这种轻率的口气。两个男子相对望了一望——东尼克带着忧郁而顽强的神情，议员则在沉思着。

“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应该怎么办呢？”临了，杨达克说道。

“有的，把我开除出党，”东尼克说道，脸色发白了。

“为什么？”

“理由很明显，”东尼克用了激动得发颤的声调说道，“如果我因这件事被捕的话，人家不光会责难我，并且还会责难党。毫无疑义，这件事情会被当作谋财害命案向社会披露的。在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开除我吧，这样一来，万一被捕的话，我已经不是党员了。”

议员尊敬地望着客人的脸。比尊敬更胜一筹——有爱慕之感了。他知道这个人是何等地重视党，何等地珍惜无产阶级的荣誉，他是在作着何等样的牺牲。

“我们没有理由开除你，”杨达克温和地说道。

“关于这一点，我也想过了。我是我们那个党组织里的党费收集人。就说我挪用了党费。”

他吃力地咽下了唾沫。

“不，东尼克，这不行。再过几天就要开始公开的斗争了，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打算同意资产阶级减低工资。他们不让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代表大会会使我们获得压

倒的多数。只有一部分党的官僚分子才跟着目前的领导走，他们最多不过占全党的百分之十五。他们将会造成党的分裂，而残酷的斗争接着就要爆发了。你在党内是一个受人注意的人物。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柯耳卞工厂的党的组织者克罗乌斯基同志是个贪污分子，那么，比起党员克罗乌斯基同志跟谋杀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案有牵连来，情形就恶劣多了。而在决战的前夕，你要自动退党也是对党不利的。伊姆莱·别拉斐的事情只能听其自然了。把它保守秘密。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东尼克阴郁地对议员望了望，随后就不满地从他的屋子里走了出来。

法庭对米兰·伊奥凡诺维奇和盗伙们的审判提早得出乎大家的意料。恰巧在这个时候，反对派的报纸揭露了政府在采购煤一事中的舞弊和贿赂行为。某几个显要的国会议员弄得声名扫地，几个部与这舞弊案有牵连。在这由舞弊案引起的喧哗未曾平息之前，必须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对伊奥凡诺维奇和他的同谋犯的审判继续了八天之久，听取了八十多个证人的供词。出庭受审的有九个被告——七个男子和两个女人，一对头发淡黄色的美人儿，她们那种粗俗的艳丽由于审判前的拘禁而大为减色了。总之，这是一群成份复杂的伙伴，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血液。被告们一会儿表现得彬彬有礼，一会儿又表现得象盗贼似的蛮横，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保持一分钟的安静。在他们中间有着眉清目秀的塔西洛·谦盖利男爵，过去的后备军校学生，就是跟别拉斐一起在牢里折磨向陀尔·凯烈凯施的那个人。

米兰·伊奥凡诺维奇招认了大部分的盗窃行为，但是矢口否认谋杀的事。法庭审讯时的最激动人的场面之一是：这个魁

梧的黑发汉子从位置上站起来，举起了双手，叫喊着：

“我的生活荒唐，但是我不是杀人犯！我从来也没有干过这一类的事，我没有胆子这样做。”

接着，他便神经质地放声大哭起来了——不知道这是一个被诬告的人的心灵的呼声，抑或是善于引起戏剧性效果的南方人气质的表现——无论如何，这对公众起了影响。

所有其余的被告都带着有经验的惯犯的顽强态度，拒不供认，他们不相信：全盘而坦白的招供将为他们造成减轻罪名的情势，而宁愿因自己的那些既被揭发而无可反驳的罪状受到判处。米兰·伊奥凡诺维奇把他们一个个地出卖了，他提供了证据，并且叙述了在布拉格、卡罗维发利、马利恩斯克温泉、维也纳、华沙、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等地所犯的罪行。他竭力帮检察官的忙，希望因此而获得陪审员们的宽容。因此，其余的被告们都一致仇视他。他们用恶毒的目光狠狠地盯着这个叛徒，所以在他们和伊奥凡诺维奇之间就不得不安置一个警卫，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向他扑去。美人儿玛利雅·弗洛烈斯库露着牙齿，接二连三地用罗马尼亚语诅咒着他，这些诅咒的话虽然没有一个人懂得，但是从美人儿的闪烁发光的眼睛以及她怎样跟警卫们争吵的情形看来，这是些骇人的诅咒。这个女被告被带出了大厅。

杨达克议员高兴地注视着法庭的审判。他觉得满意：对东尼克说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至于伊奥凡诺维奇，杨达克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骗子是完全应该受绞刑的。杨达克很忙，当然不能每天都出席审判，但是在判决的那一天，他就忍不住要到法庭去了。“只去一会儿，”——他决定，因为他跟人民教育部的部长迦勃尔曼约定在四点半相会，而晚上，他又得在柯希尔日的集会上演说。

法庭里充满了兴奋的公众，记者席上挤得水泄不通，因此，虽然窗是开着的，厅里还是非常闷气。当杨达克走进去的时候，庭长正在诘问蓝星旅馆的看门人缪列尔。虽然缪列尔早在诉讼的第二天已被讯问过了；但是当法庭审判的时候，在证人们的供词中，发现了几处矛盾的地方，因此，陪审员们就要求在法庭判决以前，再把缪列尔审问一次。

缪列尔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关于他所提到的"四分或五分钟"这一点，在法庭上谈得很多。早在警察局里，缪列尔就指出：在他看来，被告在旅馆的二楼上呆了四分或五分钟。"我不坚持四分或五分钟，"他说道，"可是我确信他在上面不会超过一刻钟。"缪列尔在法庭上所说的也完全是同样的话。这供词成为审问的要点。是否可能在四分钟到十五分钟之内，把一个人捆绑起来，迫他交出钱、文件或泄露秘密，用二十下斧头把他砍死，在面盆里倒上水，用肥皂和丝瓜筋把手洗干净，然后走掉？检察长肯定说：对于勒索金钱、文件或者秘密一事无法证明，可是其余的事情却可能在一刻钟，或者甚至在五分钟之内很容易地做完，何况证人缪列尔所断定的时间的准确性又无从证明。辩护人自然很急躁地宣称：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能够完成这一连串的行为的那种假设乃是荒谬无稽的。蓝星旅馆看门人变成了庭长、检察官、辩护人和陪审员们反复盘诘的目标了。

在判决的那一天，他受到了同样的盘问。"究竟过了几分钟呢？"审问的人重复着，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问，而胆战心惊的被告则把乌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证人，这个人的答复将决定他的命运。

但是缪列尔并没有动摇。

"五分钟光景。可是决不会是一刻钟，"他执拗地反复说着。

庭长把表放在桌上，问证人：在他看来，这次审问持续了多久。

“半点钟或者稍微再久一点，”那一个答道，接着，庭长便宣布：审问持续了二十六分钟。如果估计到证人所处的不寻常的、使他慌乱的环境，那么，不能否认他所断定的时间是相当准确的。

可是检察长并没有屈服。

“您说说，证人先生，”他问道，“也许被告在那里竟呆了一刻多钟呢？十八分钟，二十分钟光景？”

“不会的，”证人带着不满意的声调回答道。

“您说‘不会的’，但是您从哪儿来的这种自信心？也许，这不过是一种顽固脾气吧？有不少人，假如他们原先说‘不’的话，他们宁可把自己斩得粉碎，也不愿意说一声‘是’。这样说来，您认为超过一刻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是的。”

“请您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自信心的根据，您自己可就说过您不曾看过表。”

“在这些事情上，我看得很准。”

“哦，”检察长把手一挥，“难道可以相信您那看得很准的眼力吗！您也曾同样很有把握地认为被告伊奥凡诺维奇是犹太人，并且还是典型的犹太人。如果每个黑头发的男子在您看来都是犹太人的话，那么，很可能五分钟在您的眼光里就变成了一分钟。顺便说说，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他讥讽地补充说，“你们那儿常对客人说：‘过五分钟饭菜就准备好了。’可是过了半点钟才把它端来！”

辩护人竭力反对检察长的这种攻击。

在检察长和辩护人发言完毕以后，陪审员们就退出去讨论了。检察长还在那儿研究这件事，怀疑着十二个陪审员之中是否有八个同意承认伊奥凡诺维奇犯有杀人罪，而施之以绞刑，因为他估计到这个罪行的动机是完全不可解的，并且还有见证人缪列尔的引起争论的“四——五分钟”那一点。因此，检察长为了预防万一起见，就把所有最近在布拉格、卡罗维发利、马利恩斯克温泉所犯的抢劫、偷窃和掠夺罪都推在伊奥凡诺维奇身上，其中包括那些非但没有证据归罪于伊奥凡诺维奇，并且根本就没有证据归罪于任何人的罪行。

陪审员们评议了四十五分钟。不惯于错过约会的杨达克性急地不断看表。可是陪审员们终于鱼贯地进入大厅，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大厅里顿时静了下来，紧张的寂静开始了。陪审长，一个酿酒厂的经理，郑重地宣读着陪审员们的裁决：

“向陪审员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米兰·伊奥凡诺维奇是否犯了这样的罪，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早晨七点半钟左右，他在蓝星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把匈牙利伯爵伊姆莱·别拉斐捆绑起来，为了谋害他而用斧子在他头上砍了二十多下，因此而致伊姆莱·别拉斐于死地？’陪审员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五票‘是’，七票‘否’。”

被告的绝望的目光一直不曾离开过陪审长，此刻，他眼睛里的恐怖表情消失了。杨达克议员满意地微笑着。庭长取下夹鼻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法庭里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

在这个沉闷的静穆中，陪审长继续宣读着法庭的裁决：

“对于第二个问题：‘米兰·伊奥凡诺维奇是否犯了这样的罪……’”——下面跟随着三十一项有关个别罪行的细目——抢劫、盗窃、用假钞票投机、欺诈、诱拐妇女、有伤风化的罪行、破坏

户籍登记法、私藏武器和赌博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陪审员们一致答复"是"！他们了解检察长的策略，因此，就同样断定：如果不能判决伊奥凡诺维奇有谋财害命罪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坏蛋也应该为了他其余的罪行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所有十二个陪审员都三次回答"是"。

伊奥凡诺维奇所懂得的捷克话足以使他了解这个。他垂下了头，呆呆地凝视着自己的前方。

杨达克不再等待法庭的判决了，因为表上已经指着四点一刻，他上部里去的时间到了。他赶忙走到街上。至于判决，他在第二天看了早报才知道。伊奥凡诺维奇被判十二年徒刑，其余的被告们被判一年至五年徒刑。被判无罪的只有一个过去后备军的军官塔西洛·谦盖利男爵。在陪审员中间有两位太太，男爵的年轻、他的风度的优雅自若、他的黑得象乌鸦翅膀似的头发和热烈的目光对她们起了作用。此外，年轻的男爵与其余那些讲蹩脚德国话的被告们不同，他讲一口流利的斯洛伐克话；这种语言的悦耳的、柔和的音调平息了陪审员们的怒气。

杨达克议员从法院大厦走出来，跳上开行中的电车，乘往马拉-斯特蓝那，① 到人民教育部官去了。他满意于陪审员的裁决，还在那里微笑着，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想这件审判的案子了。古斯塔夫·迦勃尔曼部长本人请他到部里去，这是使人惊奇的事。在这明天也许就会彼此分道扬镳的时候，迦勃尔曼部长需要革命者杨达克做什么呢？杨达克在今天早晨接到部长的请柬时，就觉得奇怪，这个请柬是用有力而细小的笔迹写的，虽然很明显，部长的字体最近已经变得圆浑起来了，但是多少还保

---

① 布拉格的一区。

存着无产阶级出身的人那种有棱有角的笔势。信里一点也没有提到邀请的目的，部长只是作为一个同志，请议员来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拒绝是没有意义的。迦勃尔曼老了，就新职后他变得饶舌起来了，所以，这次访问即使不能有什么特殊的成果，无论如何，杨达克总会打听到一些什么的。

杨达克议员的来访已经预先通知了宫里的门房，这所宫是巴罗柯式的建筑，座落在卡尔密里茨卡亚街上。部长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议员，亲切地跟他握手。

“原谅我没有亲自来拜访你，”他客气地说道，“可是我从早一直忙到晚，工作多得简直使人害怕！在我出席党的执委会的那些日子里，我不得不在晚上，在这儿部里，把工作补做掉。”

杨达克有些幸灾乐祸地微微笑了一下。他知道：人家故意把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加在工人出身的部长们头上，使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别的事。

“你还没有到我这里来过吧？”迦勃尔曼突然想了起来。

“没有来过。你这里弄得挺漂亮，”杨达克说道，环视着四周，不住地微笑着。

“走吧，我来领你看看，我们这里是怎么布置的。”

部长领着客人在装饰着圆柱和女像柱的白色大厅里，在宫廷的豪华的房间里走着，这些房间已经变成了部的各处和各科了。他把地毯和挂毯、图书馆、出于古代和近代大师们手笔的画指给客人看。部长的发光的眼睛以及温和的声调似乎在说：“瞧，这就是民主，杨达克同志！从前，在这些大厅里，封建的暴君们商议着如何压迫捷克人民，如何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进款。可是现在这里的人们，除了考虑捷克人民的福利以外，就没有别的念头。两年以前，这里还受着外国的贵族们——卡米耳和阿

兰·罗汉们的支配，而现在这里的主人是我，古斯塔夫·迦勃尔曼，一个旋工，他在八十年代曾因参加被禁止的工人联合会而坐了四年牢。”

迦勃尔曼一边把施伐宾斯基[①]的画指给客人看，一边仿佛用目光询问着："瞧，我们如何鼓励捷克的绘画！我们的艺术家们已经无需象奥匈帝国时代一样的挨饿了，在我们工人领导下，艺术就会欣欣向荣。”

杨达克在各会客室和大厅里走着，点着头，仿佛成人在听小孩子夸口时那样谦逊地微笑着。他完全明白：部里的这一切奢侈品是从哪儿来并且是做什么用的。资产阶级把一些漂亮的玩意儿送给工人出身的部长们，而部长们便感到很满意。资产阶级在军队、国家机关、工业、财政制度各方面巩固着自己的地位，而轻信的工人出身的部长们却以这些玩意儿——宫廷啦、汽车啦、布置得极好的办公室里的美国写字台啦——来自娱。在一整天里，这些部长接待着几个教师们的代表团，几个作家、艺术家、演员们的代表；部长们费了不少力气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同时在周围的人面前掩饰着他们对一切东西生疏的程度，而这一切，他们此刻正在这儿对之表示虚假的兴趣。晚上，部长们上法文课，向女教师询问怎样准确地写：Monsieur et Madame N. N., ministre de……prie de lui faire l'honneur de venir au thé。[②]而在夜里，已经上了床，他们还按照教本，死背着对他们毫无用处的荷兰写生画家以及文艺复兴时代各大师们的名字。

迦勃尔曼居住和工作都在历史宫里。他的住宅是在米库拉

---

① 玛克思·施伐宾斯基(1873—1962)，捷克著名画家，曾获捷克人民艺术家称号。

② 法文，意即："……部长敬请某某先生及夫人光临茶会。"

施斯基街上洛勃柯维茨伯爵的府第里。在那儿，当晚上有空的时候，他就离开那沉闷、高敞、饰有炮战和海战画的大厅，走到温暖的厨房里，叫人拿来一大杯甜咖啡，把自己的公文摊在铺着蓝底花斑的漆布的厨房桌子上，于是就在这里，在万籁俱寂中，制订着他日夜想望着的、使学校民主化的草案——一个伟大的创举，他把它当作自己最后的功绩……可是这个创举却注定不能实现的，因为没有人给他钱去做这事情。

议员和部长回到书房里，面对面地在那放置在贵重的波斯地毯上的皮圈椅里坐了下来。从迦勃尔曼严肃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会面主要的目的——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就要开始了。

杨达克已经好久没有面对面地和迦勃尔曼相会了。这个过去的工人和内地的报纸通讯员变成了一位脸面刮得光光，头发梳得平平整整，穿的衣服、鞋子和衬衫仿佛昨天才从纽约最好的商店里买来的优雅的美国绅士了。只有迦勃尔曼的眼睛没有改变，在他的眼睛里面保持着过去的恳切的表情和特别温和的光辉，这种光辉老是迷惑着他的对谈者。杨达克知道社会民主党老党员眼睛里的这种表情是在监狱里形成的。它永远留在忧郁的囚徒身上，这个囚徒在四年之内所看到的仅仅只有离自己五步半远、老是引人深深地发愁的白墙壁。部长的脸色很难看，显然，他疲劳过度，并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在长久的沉默以后，迦勃尔曼弯身向着杨达克，用自己的手握住客人的那双放在膝盖上的手。

"杨达克，"他用发抖的声音说道，同时他的眼睛变得忧郁起来了。"老同志杨达克！你们在那儿干些什么啊？"

"你说，我们干了些什么呢？"议员微微笑了一下。

"你们在推行着错误的政策，可怕的政策，卡列尔！"部长用

双手捧着灰白的头。“要明白，明白这一点，我的朋友！”

“我正在听你说呢，”议员说道。

但是部长所说的一切比起他的目光和温暖的握手来，就比较缺少说服力了。迦勃尔曼只有在情感上是伟大的。革命？当然罗，他是赞成革命的！难道他全部的生命和劳力不都献给了革命吗？可是要知道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而不是遭受失败。对于这一点说来，目前不是合适的时机。而要在俄国革命中去找寻捷克革命的支柱乃是极大的错误。在俄国所发生的事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完全不是革命，而只是土地问题过迟的解决罢了。在我们这儿，这个问题早在一八四八年就解决了。俄国无产阶级英勇的斗争也深深地感动了迦勃尔曼，可是……

“你当真以为西方的资本家们能让工人们管理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地方吗？”迦勃尔曼说道，“资本主义猛兽的力量太大，他们会把俄国的革命扼死的。”

“原来如此！”杨达克想道，“跟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所说的一模一样！”

“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就应该背叛社会主义，转而为资本主义掠夺者效劳吗？”他问道。

“不要偏激，卡列尔，把我的话听完。半年之后，在俄国就不会留一点苏维埃的痕迹了。那里将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我们不知道。但愿它是个民主制度，可是极有理由推测：它将是极可怕的反动制度……而你们却把捷克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俄国革命的命运上。”

“一年以前，你们同样自信地说过：苏维埃不会支持到三个月！”杨达克带着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反驳道。

“是的，我们曾这样想过，并且想错了。可是难道高尔察克[①]、邓尼金和波兰的白党们——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家伙吗？俄国无产阶级熬过了这些最后的打击，可是俄国革命就要终止了。国内成了废墟，运输工作遭受破坏，工业停顿，饥饿和贫穷威胁着人们。国家受到了总的财政上的灾难。这是死亡！任何牺牲和英雄主义都没有用！”

部长停顿了一下。他坐在皮圈椅的边缘上，重又把手搁在杨达克的膝头上。

“我要向你泄露某些事情，虽然应该把它保守秘密的。可是这事情关系重大，况且，在我们党员同志们之间又有什么事可以相瞒的呢？”他开始缓慢、清楚并且富有表情地讲起来了，于是杨达克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今天宣读裁决书的情景。“向俄罗斯的大规模进军正在准备之中。她将遭受外来的致命打击。同时，国内也将发生暴动。这是最后的打击，是衰弱的俄罗斯所经受不住的。半年以后，一切都会完结的。这是最迟的期限，杨达克同志。”

可是这个消息显然并没有在议员身上产生部长所预料的那种影响。杨达克甚至微笑起来了，而这微笑在老迦勃尔曼看来乃是不合时宜的轻率举动。

“你认为俄国的农民们会把土地让给地主吗？”杨达克问道。

“不，不会让的，他们会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它的。可是农民们将要遭受到无情的镇压。”

“我们有着另外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巩固的消息。”

“他们是片面而错误的，卡列尔。我们的来源要可靠些。无

---

① 高尔察克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白匪军首领。

论俄罗斯有多强，难道她能独自抵抗全体吗？”

杨达克耸耸肩膀。争论有什么意思呢？他很明白赞成和反对的全部理由。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两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所能谈的一切已经在千百次工人的集会上谈过了。可是迦勃尔曼却不知道这一点。关于政治上的情况，他只是从报纸上和政府的会议上得知的。他没有时间跟群众来往，——因为他是一位部长。

“杨达克同志，我要跟你谈一件不应该谈的事情，”迦勃尔曼郑重地说道，一边从圈手椅里站起来，向杨达克走去。“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你们在准备政变。”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同时捧住了头；显然，谈这问题使他很苦恼。“你们准备做什么呢，杨达克！资本家们会用机关枪来对付你们的！”他用了悲剧性的音调叫喊道。

杨达克皱起了眉头。这委实太过分了！

“领导政府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他答道，竭力控制着自己，“政权是在你们手里。没有你们的命令，警察是不会用机关枪来对付工人们的。莫非你们已经把自己完全出卖给资产阶级，以至于要走这一步吗？”

部长在议员的燃烧般的目光前面掉转了视线。

“杨达克，”他象慈父般地说道，“听我讲。假定说：你们夺取了政权，并且以可怕的牺牲的代价把它支持了几个星期。可是以后，过了半年呢？你有没有把这事情从头至尾想过，杨达克同志，朋友？”部长恳求地两手合十。“你可知道，以后掌握政权的会是谁呢？已经不是象现在似的工人们，而是极端的反动派、大企业家、银行家、教权派、军阀们……可怜可怜捷克的工人们吧，杨达克！”迦勃尔曼的眼睛蒙上了泪水。“让他们免于遭受血腥的

屠杀吧！不要从他们身上夺去我们为他们苦苦争取到的东西！”

部长重又在圈手椅里坐了下来，同时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了麻纱手帕，把眼泪擦干。杨达克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看到一个男子流泪是一件不大痛快的事，特别是他向你请求什么而不可得的时候。要是你知道这是真诚的眼泪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使人加倍地难受了。

两个人沉默了大约一分钟。随后，迦勃尔曼又讲了起来。

“嗳，杨达克，你说你们那关于俄罗斯的消息……”

杨达克突然对部长产生了强烈的憎恨。他不能控制住自己，便站起身来。

“你为什么老是唠叨着说工人们将要流血呢！资本家的机关枪？这是你们的机关枪啊！政权是在你们手里！社会党人的义务是要用它来反抗资产阶级。可是你，自然不会这样做的。相反，你哭诉着说你将不得不拿这些机关枪来射击我们了！你这样做是奉了资产阶级的命令！那么，你就别伤心了！你自己承认吧，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卖给了资产阶级，不要假装自己是工人们的保护者了！”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而杨达克把这些责难的话语向部长扔去。他看见在迦勃尔曼的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含着惊讶、痛苦和悲哀。

“我？”迦勃尔曼说道。

“你！”是狂怒的回答。

“我要使工人们流血？这是你对我说的话吗，卡列尔？”

“正是对你！”

“我？”部长的眼睛由于这不公平的侮辱而重又盈满了泪水。

杨达克摆了摆手，开始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我在这儿没有意思，这些谈话全都毫无用处，”他想了一想，就迅速地走到迦勃尔曼身边。

“好，再见吧！”

迦勃尔曼吃惊地抓住了他的袖子。

“不，不，卡列尔，不要走，我们不能这样分手。你一定得听我把话说完。”

于是他又开始讲了起来。杨达克愁眉苦脸地听着，为了留下来而生自己的气。

“答应我，杨达克同志，你们在最近六个月之内不搞出什么事情来。”

“这个我不能答应。半年，以后又是半年，而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个时候巩固自己的地位来攻击我们。等它彻底巩固以后，连你们也要被它驱逐的，因为你们对它不再有用了。”

部长感到悲哀了。

“答应我，至少你得把我的话想一想。”

“这个我答应。”

“好吧，好吧。这虽然很少，可是总比没有强。把它们想一想吧，想一想，我的朋友！”

杨达克认为这场谈话到这里结束了，于是就站起身来。部长也站了起来。他把客人送到门口。

“你的儿子亚尔达可好？”他一边走，一边问道。

“他准备坐两个星期的牢。这是你们将他判决的！”议员嘲讽地答道。

迦勃尔曼的眼睛燃烧起来了，他紧紧地握住了杨达克的手。

“这是好的！在牢里，他将学会憎恨。苦难会使人坚强起来。

我始终喜欢他。代我向他问候，并且对他说：当牢房的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而他看见朝里的一面没有门把手的时候，愿他想到我。你可明白为什么我说这个话？这样的事情是忘不了的。同时告诉他：只有在那儿，他才能学会憎恨。”

杨达克打了个寒噤。“难道你不知道，”他想道，“亚尔达将学会仇视你，古斯塔夫·迦勃尔曼？”

他微微摇摇头，走进部长的会客室里。这些人在宫里住了两年，还不到两年！可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生命了！

在会客室里坐着内政部的官吏波德格腊兹基。他一看见议员，便跳了起来，向他走去。

“啊！杨达克议员先生！您好！”他们互相握了握手。“过得怎样，近况如何？”

在奥匈帝国时代，戈高·波德格腊兹基在维也纳的内阁里任职，在那里，他常常跟捷克的政治活动家们见面。这是一个头发淡黄色的男子，年纪四十五岁左右，蓄着英国式的短髭，举止很潇洒，但是穿得并不耀眼，高高兴兴的，有着上流社会人士的风度；杨达克在维也纳就认识他了。革命①以后，波德格腊兹基迁到布拉格，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甚至到了彼此以“你”称呼。可是目前，当工人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的当儿，杨达克觉得跟内政部的一个头头做朋友是不妥当的。可是，波德格腊兹基做得很得体：他在街上碰到杨达克的时候，只是客气地招呼一声，并且现在甚至不对他称呼“你”了。

“到我那儿去坐会儿，议员先生。我会很高兴的。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儿走廊里，走几步路就到了……请求您！”

---

① 指一九一八年捷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

“改日来吧。”

“为什么要改日呢！现在就去。”

杨达克掏出了手表，打算借口没有时间来推诿。

“唉，不要看表了！进来坐会儿，我早就想跟您谈谈了。请不要以为我们之间无话可谈，瞧着吧——会有话谈的。既然我们在这儿碰巧见了面，那就进来坐坐吧！”

“得啦，”杨达克想道，“不错，我既是在这儿……”

“好吧，”他说道。

他们走到走廊上，波德格腊兹基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门，请杨达克进去。他让议员在圈手椅里坐下来以后，就站在旁边，亲切地望着客人。

“呶，生活过得怎样？”他把雪茄烟盒、火柴和烟灰缸移到杨达克跟前。“请吸烟吧！”

“我不吸公家的烟，”杨达克说道。

波德格腊兹基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盒，把它打开。

“我自己的，议员先生！”

他说得那么亲切，简直就使人不能拒绝。

“谈谈关于自己的事，”波德格腊兹基接着说。“还常常到金蜘蛛去吗？”

愉快的回忆使他变得容光焕发了。

可是对杨达克说来，这个回忆是不大愉快的。正是在这个夜总会里，他跟波德格腊兹基一块儿在一九一八年底狂饮了几个晚上。

“啊，狂热的时光！”波德格腊兹基嘲讽地笑道。

“是的，我们大家都曾陶醉于这虚幻的自由里。”

“为什么是虚幻的呢？……不过我们今天不要谈政治。这终

究是愉快的时光啊！我常常想到您和您的歌子《我们彻底击溃了腐败的奥地利！》喔，是的…… 还有棕黄头发的爱尔诺契卡①我也记得。并且，顺便……”他记起了什么事，嘲讽地笑了笑。“我可以给您看一件有趣的东西。我偶然在一些旧的文件里找到的。”他走到上面放着两个公文夹的写字台前面，打开其中的一个，翻了几页。“啊，它在这儿！”

这是一张放得很大的照片，它是在很弱的光线底下照的，可是却十分清楚。波德格腊兹基高兴地对它望了望，就递给了杨达克。

“喏，瞧瞧吧！”

这相片里所照的是在金蜘蛛的一个房间里狂饮作乐的情形。在照片的前景上可以看见一只盛着香槟酒的银制小桶，稍后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酒杯、糖果和揉皱的餐巾。在左面，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杨达克议员的半侧面；在他的膝上坐着酒店里的一个女侍。后面站着爱尔娜。在她的一旁搂着她的是彼塔克议员，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员②，另一旁站着手里拿着酒杯、满脸笑容的波德格腊兹基。这样的照片可以登载在随便哪一张工人报上，当作暴露资产阶级寄生的生活方式的照相文件。

杨达克脸红了。

“这是什么？”

“什么？”波德格腊兹基笑起来了。“你自己知道：金蜘蛛。这一类照片是警察局拿来给我们开开心的。他们以为这是一种了不得的功绩——在金蜘蛛摄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们会说：瞧，这耸人听闻的事件：杨达克议员，彼塔克议员和波德格腊

① 爱尔娜之爱称。

② 这里所指的是捷克国家社会党。——俄译者

兹基处长！真是些乡下佬！我后来得知——自然，是在很久以后，——服侍我们的堂倌是警察局的一个情报员。他很高兴有机会把这一群可敬的伙伴们照了下来。他的镜头藏在扣领带的别针里。精明的小子！照片当然是放大了许多。”

杨达克的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使他惊愕不置的推测。他皱起了眉头，思索着。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为了不愿意得罪一个旧相识，才答应了波德格腊兹基的请求，来到这里，而这个熟人却把他诱入了陷阱，要想拿绞索套住他的脖子……杨达克被激怒了。不，你们不会得逞的，先生们！

“听着，处长先生，”他说道，从从容容地把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您把我请到这里来，似乎只是为了要显示这张照片。”

“全然不是这回事，我只是偶然想起：您也许会对它感兴趣，”波德格腊兹基神情自若地说。

“您打算拿公布它来恐吓我……”

“议员先生！”波德格腊兹基喊了起来。“您这是什么话，议员先生！”

“……并且对我进行政治上的讹诈！”

“真的，这简直是侮辱人！您怎么可能疑心我这一点！我们相识又不是第一天！把这张照片拿去，请求您。”

“您那儿有底片的！”

“难道我能够讹诈您吗？您会当面笑我，说我自己也被照在这张相片里。您当真在想：我为了政治，准备跟太太离婚，让孩子们来反对我吗？”

“在另外一张印出来的照片上，您的脸可能被涂掉的。”

波德格腊兹基不开口了。

“底片可以修改得使人认不出您来，”杨达克重复说道，目不

转睛地盯着对谈者。

“是的，这一点别人也对我说起过的，”那一个认真地答道，并且同样认真地朝议员瞥了一眼。

杨达克从圈手椅里跳了起来，恶狠狠地放声大笑起来。

“啊，这一点您也听说过吗？”他走到波德格腊兹基身旁。“你们弄错了！不要以为我怕你们。你们可以把这张照片公布出来。我的妻子相当明白事理，她会接受我的解释的。”

“议员先生！”波德格腊兹基沉着地回答说，并不害怕杨达克那种挑战的声调。“照片是不会公布出来的，这一点我可以发誓。现在，我希望您相信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可以使您有理由认为我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然而既然您还是表示怀疑，那么请允许我告诉您以下的事：在讨论这张照片公布与否问题的时候——我向您保证：我是反对的！——问题不在于您的家庭对这件事的态度，而是这张照片在工人中间会引起怎么样的印象。”

杨达克冒火了。利用一个人私生活里的事情作为政治上的讹诈手段——多么卑鄙！同时又多么无耻！这个家伙一方面保证不把照片公布，同时又向他威胁着说要在工人面前把它发表！

“可以把它公布，我并不反对！”杨达克叫了起来。

“我不会这样做的，议员先生！”波德格腊兹基有礼貌地重复说了一遍。

杨达克开始在办公室踱来踱去，随后在波德格腊兹基身边站住，用轻蔑的眼光把他打量了一下。

“一批无赖！啊，好一批无赖！”他叫了起来。“而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可是我这老蠢驴过去却相信了你们！这是我活该。难道你这个蠢人以为我会为了这张照片而出卖我自己吗？”

“不要嚷嚷，卡列尔，”波德格腊兹基抚慰似地说道，把一只手搁在他肩上。“隔壁也许会听到的……”

杨达克恶狠狠地对他看了一眼，可是毕竟放低了声音。

“我知道你们所希求的是什么！你们要我把工人们拉到你们这一边来，要我把他们出卖给资产阶级。你们在革命面前发抖了，所以不惜用任何卑鄙的手段来跟它斗争。蠢人！你们以为靠了一张照片你们就可以在这个斗争中赢得胜利吗？刚才迦勃尔曼还劝说过我……”

杨达克一说出这个名字，立刻就恍然大悟了。他拿手掌往额头上一拍，接着就走到波德格腊兹基紧跟前，两手叉在腰间。

“听着，处长先生，您是在内政部任职的……”

波德格腊兹基温顺地对他望着，样子就象一个正在受上司叱责的官吏。

“那就是说您的办公室不可能在这所房子里！”杨达克下结论说。

波德格腊兹基沉默了。

“这不是您的办公室，您暂时把它借用一下，并且特意把这张照片带到这里来。我们今天的会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布置好的。您在这儿等待我。迦勃尔曼用电话通知您说我将到这里来。”

波德格腊兹基直望着他的脸面。

“是不是这样？”杨达克咆哮着。

“不完全是这样，议员先生。迦勃尔曼部长并没有打电话给我。部长先生……要不显得无礼，应该怎样说才好呢……请您，议员先生，恕我直说，部长在这一类事情方面是很没有本领的……可是我们知道您将要到这里来。”

“你是个小丑，老小丑！”杨达克轻蔑地说道，做出厌恶的手势。“这一伙人真是挑选出来的！早就应该把你们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你究竟要对我怎么样？”

波德格腊兹基一听到议员先生改称“你”以后，就赶快跟着改称“你”。

“我想跟你谈一谈，”他回答道。

“为什么就是要跟我谈呢？”

“你跟我一样明白政治上的情况：聂密茨议员和索乌柯普①先生对布拉格工人们的影响垮台了。目前对工人们有影响的是你和施密腊耳。②”

“为什么你不跟施密腊耳谈谈呢？也许你们那儿没有他的照片，没有东西可以恫吓他吧？”

“不要再谈这张照片了！施密腊耳是不听别人劝告的。”

杨达克笑起来了。

“你们认为你们就能说服我吗？”

“是的。”

杨达克又笑起来了。

“完全有把握吗？”

“完全有把握，卡列尔。”在波德格腊兹基的声音里含着坚定的自信力。

杨达克坐了下来，讥讽的眼光紧盯着对谈者。

“你瞧，我已经在听你说话了。继续你的威胁吧。”

---

① 佛兰季歇克·索乌柯普（1871—1940），捷克社会民主党和它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权利报》的创建者之一，在资产阶级统治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他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右翼。

② 波古米耳·施密腊耳（1880—1941），捷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领袖之一。

"首先我要告诉你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

"嗯……"

"譬如就说这件事吧。"

波德格腊兹基走到桌子跟前,打开另外一只夹子,从那儿拿出一张纸来,把它放在杨达克面前。议员望了一望,就放声大笑起来。这是真正愉快的而不是象原先那样恶狠狠的笑声。

"快些拿回去藏起来吧!当心,不要让它被人偷去了。对这种捏造出来的玩意儿,连孩子都会发笑的。'将被布尔什维克处死的人名单'!第一名是总统,第二是聂密茨,第三是索乌柯普!我已经用不到看了,这种捏造的谰言我背都背得出来。你们梦想我会上这种当吗?这样说来,我也得被布尔什维克们处死了?"杨达克又笑了起来。"我不认为你自己相信这个文件,可是你说说,你难道不觉得害臊吗?"

"这个文件一点不比另外任何别的文件差。审查它是否确实不是我的事。如果你对它毫不在意,也随你。可是无论这个文件是真是假,它已经部分地达到了目的。而我没有理由感到惭愧,目前的时机太紧迫了。'你们在革命面前发抖了,'你说。不错!可是我们并不是象你们所说的为了自己的幸福或者为了自己的财富而发抖。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并没有什么财产,跟你比起来,我是个穷光蛋。我们害怕那个你们想要制造的内战。我们为了千万人的生命、为了把命运依托在我们身上的共和国而害怕。当这样的灾难威胁着社会的紧张日子里,无论什么手段,只要能够防止它,都是合适的。"

"怎样的伪善,怎样的假装真诚,怎样的用崇高的理想来可恶地掩饰卑鄙的动机啊!"杨达克想。他突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侮辱波德格腊兹基,可是并不仅仅用这个家伙已经从他

那儿听得很多的那种责骂，而是用更伤人的话语。于是他便说道：

“当你在维也纳作为帝国内政部的一个官吏，混进我们这伙人里来的时候，我们断定你是个奸细。后来我们忘记了这个初次的印象，这就造成了错误。现在，我坚决地相信：你曾经同样乐意和巴结地替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陛下干这下流的勾当，正如你现在替捷克资产阶级干的一样。”

杨达克带着恶意的镇静说出这些话。而在这个已转为紧张的神经战的全部谈话里，杨达克的对谈者第一次掉开了视线并且甚至脸红了。但是这种困窘的状态只是暂时的，波德格腊兹基仿佛立即想到了他不应该激动，并且无权以打击回答打击，甚至不能加快自己进攻的速度，他必须要镇静而有步骤地向已定的目标前进。

“关于这一层，你是错了，”他反驳道。“可是就连那时候，我也是诚心诚意地执行自己的职务的，而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并不为了那时候也一心想维持国内的秩序而惭愧。”

杨达克讥讽地笑起来了。

“正是这个！我要说的恰恰就是这个：维持秩序。你们大家对维持秩序太热心了，结果就造成了世界大血战，”他住了笑，望了望波德格腊兹基。“在我看来，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我可以走了。”

“请你再耽搁一会儿。”

“还有什么事？”

“我想同你谈谈政治。”

“谈政治？这个，迦勃尔曼已经谈过了。”

“他说得不完全。”

“好吧，请。这倒变得有意思起来了。这样说来，你们是害

怕内战罗？我相信是的。关于这一层，我可以告诉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防止它，那就是你们自动放弃经济上及政治上的特权。你回答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争论也就到此为止。总之，你们害怕。好啦，还有什么可讲呢？”

“现行的法制确实不容许剥夺私人财产，而我们也不打算改变这种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的居民都喜欢它。”

“那就是说，你们。”

“是的，我也是这多数人中间的一个。可是，我们有着另外的自卫方法。我们想建立一个包括尽可能多的、满足于现状的人的阶层，这些人将成为我们这个制度的支柱。要满足所有的人，自然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说不能满足无产阶级？”

“是的，要满足它的广大阶层现在还不可能。你知道，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善良的愿望是有的，你们的最优秀的人物已经被推荐到政府里来……可是，经济上的条件妨碍了这个。”

“你倒坦白。”

“我们的土地改革、我们的商业和财政政策都遵循着这个方向：就是要使国内有更多超然的、富裕的、满足而又忠于国家的公民。”

“在居民的各阶层中间，可不是在工人中间。所有这一切都是牺牲工人们的利益搞起来的。”

“在工人们中间，我们也想培植一个满意于政府者的阶层。”

“我第一次听说！”

“自然，要满足整个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在自然淘汰的基础上使它的领袖和优秀的工人们变得富裕和满足。你

们之间有好些人被任命为银行以及各种企业的董事。我们给予他们在政治、文化及其他机关中薪俸优厚的职位。你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出于私人的同情吗？绝对不是的！我们要使他们不受小市民群众的影响，让他们有机会奉行有效的、巩固国家的政策，因为归根到底只有这种政策才对工人阶级有利。"

"哼！"杨达克讥讽地笑了笑。"也许，你连我也想收买吧？"

波德格腊兹基不去理会这句话，继续说道：

"归根到底……干吗否认呢？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收服工人的领袖们。我们使他们中间很多人有机会靠了另一种手段——做生意而致富。他们对这一方面表现了出色的才能。"波德格腊兹基含蓄地微笑了一下，开始稍稍缓慢并且富于表情地讲起来了，可是依旧用了上流人物那种文雅的口气："在这种事情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给我们帮了大忙。按人情看来，这一切究竟是十分自然的事，为什么社会主义领袖们的妻子不住得舒服，不乘坐汽车，不穿丝绸和皮货，不在国家剧院里订长期的包厢呢？女人比那些往往不容易从死板的原则转到灵活的实际的男人来得容易制服。因而，商业也替我们大大地效了劳。如果一个工人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并没有象我们所能要求职业商人那样诚实地完成从我们手里接下的定货的话，那么……对他是应该宽容一点的。要是讲得彻底坦白的话，那么我们甚至还满意于这种供应者的有些疏忽，因为这种疏忽可以使他们受到约束。一个跟我们做过不十分规矩的交易的人，应该老是记着：我们能够随时把这个通知他的选举人。"

"哼！"杨达克议员说道，要想笑，但是笑不出来。"你在说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贪污舞弊的勾当吗？你想不想把我也收买呢？也许，你受了委托要给我某一个银行

董事的位置吧?”

“关于这个,毫无问题,将来总可以谈的。但是今天,我不能向你提出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拿什么来收买我呢?”

杨达克试着要把这些话说得带有嘲弄的口气,可是结果却没有嘲弄的味道。

“收买?”波德格腊兹基拖长声音,微微耸了耸肩膀,稍稍低下头,瞥了议员一眼。“关于这一点,已经没有必要了。”

议员的脸色变得跟放在他前面那张纸一样的苍白。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竭力要说得镇静,但却徒然。

“这事已经发生了。”

议员跳了起来。

“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坐下,卡列尔,不要着急。”

“不,不!”议员叫喊着,声音越来越高了。“发生了什么?你指的是灭火器吗?”

“是的,”波德格腊兹基镇静地答道。

“它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议员狂怒地叫道。“这些灭火器关我什么事?”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握紧了拳头,仿佛准备进攻的样子。“你们的事到底同我有什么相干?”

“坐下,卡列尔,听我说。”

“你们不能利用这一点把我抓住的,先生们!”

杨达克的声音变得嘶哑了。

“坐下,卡列尔。瞧着,我们总会谈妥的。”

“我不怕你们,”杨达克用了已经变得软弱的声音说道。

“我诚恳地请求你，听完我的话。”

“请吧！”杨达克做了个威严的手势，坐下去了。“说下去！说到了灭火器。说下去，这很有意思！”

波德格腊兹基也坐了下来，直瞪瞪地望着议员，决心不放过这个已经被追逐到角落里的敌人。

“我不愿意开口谈这件事，可是你知道，我是把它当作最后的手段了。眼下的情况十分严重，而你，对我们说来，又是个极其危险的敌人。你一定得放弃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另外的出路在你是没有的。你一定得这样做。在你没有答应我这样做以前，我是不会放你离开这里的。”

“我倒要领教，你想用什么来逼我呢？”

“要用公布灭火器的事件来威胁你。”

杨达克的眼光重又闪了一闪。

“这笔交易是我兄弟做的。”

“嗳呀，”波德格腊兹基摆了摆手，“请允许我打扰你，让我把这整个的事情叙述一下，不是照你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从我们的观点出发，依据我们所知道的来讲。你的兄弟不过是诺伐·派卡小城里一个面包师，这是实在的。可是难道我们需要你的兄弟，一个不问政治、循规蹈矩的小市民，一个普通的选民就算了吗？我们需要的是你，杨达克议员，布拉格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抱有危险的幻想的人物……事情发生在去年春天。几百所公家的房屋正在建筑和装备之中，接受国家定货的机会空前地展开了。你的兄弟——一个机灵的家伙，探得了这个消息。于是有一回，你就向我们提出：能否让你的兄弟替某所在你们小城里建造起来的工业学校承办灭火器。你，显然，把事情想象成这样：你的兄弟可以赚到一千——一千五，这对他是很有用的。最

最善意的照顾，不是吗？那时候，在政治生活方面是十二分的和谐，我们大家都彼此来往，各党之间的界线好象不存在似的，我们沉醉在自由之中，正如你所表白的那样。谁能想到一年以后，我们却变成了劲敌。可是我得向你承认：我们是想到过这一点的。

"靠了我们在国外的外交家的帮助，我们的消息比你灵通。我们了解事情会怎样发展，同时知道杨达克议员的性格，猜得到他会站在哪一方面。布拉格工人们的领袖对我们是极有用处的。这就是当你向我们请求这微小的照顾时，我们决计不放过你，并且不限于一千五百克朗的原因。我们要把杨达克议员抓在手里。所以我们就引你走入了歧路，我现在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们不提这个学校的事，而答复你说你的兄弟可以接受两万只灭火器的定货。这事情看上去很奇怪：一个面包师做了全国范围的灭火器的供应者！可是这一类事情比你所想象的要来得多。你的兄弟显然对这个数目感到非常惊奇，所以起初还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是事情却进行得很顺利。你们组织了一个做灭火器生意的公司，叫做'拯救'。股东是你、你的兄弟、你们城里的药商尔席迦克以及布拉格的建筑师伐依格耳。

"你是不公开的股东。然而你是纳税人，所以从你的纳税申报表上可以看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你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你从德国定来一大批灭火器，然后以每只五百二十克朗的价格把它们卖给捷克政府，那就是说比任何其他的公司贵五十克朗。"

"它们的品质是最上等的。"

"我并不怀疑。上等原料、经久耐用、质量保证——这一切都是商业上的用语。假定说，一只灭火器所得的纯利润是五十

克朗，二万只灭火器就产生整整一百万克朗的利润，——自然，要分成四份，就是每人二十五万克朗。这自然不是什么巨大的财富，可是终究是一笔小小的资产，足以使人在经济上变得稳定，或者照我们政治上的用语来说，就是变得可靠。为了收买杨达克议员，花这样一笔钱是值得的。可是因此，杨达克议员就得承担某些义务。至少——这就是不要损害我们。当他在尽这个义务的时候，我们始终是好朋友。要不然，我们就得开始斗争了。”波德格腊兹基沉默了一会儿。“喂，卡列尔，”他温和地说道，“你说你们的灭火器比别人家的好吗？我相信，”他走到写字台跟前，从纸夹里取出某个文件来，重新坐下来，对它看了一眼。“我们把它们检验了一下。老实说：我们还是两个星期以前，当我们觉得跟你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做这件事的。再说得坦白些，我们曾暗示过两个检验师说我们要一张最不利的检验书，它就在这儿。检验书的开头是这样的：‘付予检验的“拯救”牌灭火器乃是品质极低劣的产品。要是不能认为它们完全无效的话，那么，无疑地，它们是极不完善的……’接着下面是金属零件、化学成分等等的专门分析。对于这一方面，你大概知道得跟我一样的少。检验书的结尾是这样的：‘按照去年四月间支付“拯救”牌灭火器每只五百二十克朗计算，应该估计：每只多付的数额达两百五十克朗。’这样说来，你瞧，你们的利润显然不是一百万而是五百万了。”

“这是捏造，无耻的捏造！”杨达克叫了起来。

“我也相信检验是不公正的。可是这个文件由两个检验师签了名，他们是要对自己的检验书负责的。想想看，假如我们把它公布出来，怎么办呢？”

杨达克议员已经从那放在他前面的盒子里取出第三支烟来

吸了，他忘记了它们是公家的。

“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我要控告这两个检验师！”

“你不会控告的。你自己明白这一类的诉讼会使你获得什么样的政治上的后果，即使你是胜诉的话。”

杨达克从圈手椅里跳了起来。他的脸色苍白。

“你们是畜生！人面兽心的畜生！”

“绝对不是的，卡列尔。我们只是在保卫共和国，她在我们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们究竟要对我怎么样？”杨达克喊叫着。

“坐下，卡列尔！”于是波德格腊兹基便把杨达克轻轻地推到圈手椅里。

“你们要对我怎么样？”那一个重复说，眼睛闪闪发光。

波德格腊兹基默不作声地在客人身旁站了一会儿，然后沉着而严重地说道：

“我们要求你在一星期之内在《人民权利报》上写一篇文章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并且在它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宁愿开枪自杀！”

波德格腊兹基耸了耸肩膀。

“那么，我们就要公布检验书并且把在金蜘蛛所摄的照片登在报纸上。这两个文件虽然属于不同的时间，可是社会的舆论会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要向法院控告拯救公司的诈骗行为。”

在议员的想象里涌现出今天的法庭、渴望着听到耸人听闻事件的公众、陪审员们的脸孔以及检察长的挑衅似的冷笑。可是这幅情景立即在他的意识里消失了，因为波德格腊兹基的平静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正在对他望着。

“这样说来，你们还是要把这张照片登出来吗？”杨达克无力地笑了笑。“你的诺言真可以相信得过！……”

有着冷酷的、淡蓝色眼睛的人回答道：

“如果我把个人的荣誉看得高于国家的福利，那么我就不是个好公仆。然而，我之所以允诺，是因为我深信一切事情都会最顺利地解决的，因此我并没有食言。照片是不会登出来的。不登出来的原因是由于你没有另外的路可走，你会同意的。”

“不，我要开枪自杀！”

杨达克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就站起身来。房间里是静悄悄的。整个宫廷仿佛都死绝了一般。办公时间已过，所以除了他们两个和下面的司阍以外，房子里显然一个人都没有了。窗子是朝花园开的，那儿空无一人。

波德格腊兹基默默地坐在写字台旁边，杨达克没有声响地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最后，他在官员的面前站住了。

“是的，我要用手枪自杀！”他重复说。

波德格腊兹基直盯着议员。那一个没有掉开视线。

“我恰好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停了一会以后，波德格腊兹基说道。“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的还是会达到的。内战正威胁着我们。我们面临着这样大的危险，一个人的死亡是不会使我们罢休的。可是你的死会对谁有好处呢？除了我们，你的政敌以外，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向你建议的是最有利而唯一明智的办法：你去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不！”

“不必在一星期之内写好，我刚才提出这个条件是未经思考的。这样做就会太仓卒了。你过个把月写好也成，可是在这以前，不要发言攻击我们，并且停止煽动工人们。这一切很容易安排

的：你疲劳过度，病倒了，需要休息。你可以在随便哪一个工人们的文化或者合作社性质的团体里活动。你知道，我们很重视文化并且很乐意扶助工人们的合作社。过一个月以后，我们再谈谈！谈谈比较使人愉快的问题。顺便说说，我相信情况马上就会起急剧的变化，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回到这个讨厌的话题上来了……你同意这一点吗？”

他们重又沉默起来。深沉的静寂开始了，房间里连一只以滴答的声响打破寂静的钟都没有；电车的隆隆声传不到古老的布拉格的这个角落里来。议员垂头丧气地坐在皮圈椅里，波德格腊兹基站在打开着的窗旁，身子靠在窗台上。交战结束，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了，黄昏从罗汉公爵们的花园里透过窗子降落到战场上。

“可怕的惩罚！”议员喃喃地说，接着便不作声了。“跟资产阶级打了三个月交道得来的可怕的惩罚！你们象蛇蝎一样的狡猾，象豺狼一样的卑鄙！”

沉默开始使人苦恼了。

“呶，”杨达克突然说道，把眉头一皱，站起身来，走到波德格腊兹基面前，冷冷地把手伸给他。“好啦，再见！”

“诸事平安，议员先生！”波德格腊兹基握了握伸出的手，同时客气地躬躬身子。

他送客人到门口，并且用愉快的声调说着话，仿佛协议已经达成，此后可以不用再想起它了：

“令郎你得稍微管束一下。他在斯米霍夫的集会上讲的一些事情简直使人毛骨悚然。告诉他，这两个星期的拘役——只是轻微的警告而已，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真的把他长期监禁起来的。”

杨达克只是摆了摆手。

于是他便回家了——好似一个把薪水输得精光的赌徒；一个梦想获得世界冠军的荣誉而却被一个默默无闻的新手打倒的拳术家；一个在行军中突然感到有人向他背脊上轻轻一推，过了几秒钟，就觉得自己的两腿发软、快要死去的兵士……

杨达克上了楼梯，走进自己的家里。他很幸运：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走进书房，在窗口站了一会儿，把额头紧贴在玻璃上。他的头脑里什么念头都没有。"随它去吧，我可要睡了，"他想着，便离开窗子，倒在沙发上。

在对面的墙上挂着列宁的肖像。杨达克望着这个有着锐利的目光和凸出的额头的脸面。从部里回来以后第一次，他才能够看清楚一件东西，而这就是列宁的肖像。在杨达克的脑海里，思路开始打开了。

用枪自杀吗？这或许是最适当的出路。约莫有一分钟，杨达克反复转着这个念头，更正确点说——这个念头在摆布着他。就在那边，在书桌后面，他可以用子弹打穿自己的额头。那时候，死了的他坐在圈手椅里，而勃朗宁手枪跌落在地毯上。妻子晕倒了，孩子们哭泣着。可是他的死难道能够使波德格腊兹基罢休吗？下葬以后两天，在《捷克的话报》上就会出现一则短短的报道："关于杨达克议员的自杀，散布着如下的传闻……"杨达克仿佛看到了这一则有着大号标题的短短的报道，他想象着它里面所写的全部内容……波德格腊兹基胜利了。他的目的——引起共产主义者队伍里的混乱，——将要达到了。这是一个套着羊皮手套的刽子手……不，自杀是没有意思的。怎样才能用巧计胜过波德格腊兹基呢？偷窃文件？收买部里的官员们？准备夜盗？好一派罗曼谛克的幻想！

从那沙发上面的肖像上，列宁的尖锐而嘲讽的目光正在对他望着。

怎么办呢，难道什么都完了吗？

“不！”杨达克用了全身心喊道。“有办法的，应该有办法的！”

杨达克忽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同时惊奇着先前他为什么竟没有想到它。他要到工人们那儿去，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如果资产者靠了供应公家定货发财，那么为什么一个工人们的领袖就不能在这上面赚钱呢？”他说道。杨达克想象着扎勃蓝斯基饭店①里的大厅，这个饭店是一所不大的、阴暗的房子，窗户是开在天花板上的，长长的电线上吊着电灯，横梁后面挂着高秋千和吊环。在蹩脚的镜子两旁，放着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半身石膏像。杨达克议员在讲台上向到会的人们演说。他是个热烈的演说者，他的话语始终能紧紧地抓住人心。“是的，同志们，”他说道，“为什么工人不去剥夺资产阶级的政府，使自己可以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革命而安心地工作呢？”说完了这个，他向会场里瞥了一眼，话语就此梗在他的喉头了。两千只眼睛——而在所有这些眼睛里只有冷冷的蔑视！在人群的头上，霜慢慢地厚起来了，它布满了整个大厅，冷气刺入骨髓。杨达克也感到了这个，他想把大衣的钮子扣上，可是就在那当儿，从大厅里发出了呼声：“叛徒！”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喊叫着：“叛徒，叛徒！”掀起了冰冷的暴风雪、可怕的旋风。带着冰块的、刺人的寒风打在杨达克的脸面上，议员把两手遮盖着面孔，旋风把他扔到墙上，随后把他吹出了大厅。他被风卷走了，一路撞着屋顶和电

① 扎勃蓝斯基饭店位于布拉格的工人区卡尔林。捷克社会民主党和以后的共产党曾在这儿召开过许多历史性的会议。——俄译者

线木杆……

杨达克从沙发上跳起来，又坐下来，两手捧着头。他的前额是冰凉的。杨达克望着空间。

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

有办法的！他把钱都还掉，连一个赫勒都不缺。这不到一百万，甚至可能还不到五十万。他把这些钱扔到他们脸上。可是他的钱够吗？不够！太太和女儿过惯了富裕的生活，儿子买着大批大批宣扬社会主义的书籍，这一切都得花很多钱。昨天，建筑师到过他们家里，下个星期，他们就要开始在特罗依叶① 建造一所私邸，——太太对它着了迷，她连在梦里也看到这所小巧的房子……是的，他已经没有这些钱了！

唉，恶棍们，他们终于把他抓住了！无论怎样躲避，怎样挣扎，还是不能从这些利爪中挣脱出来！

墙上挂着俄国革命的宣传画——一幅鲜明而热烈的图画：在石制的台座上，受了致命伤的资本主义多头蛇在那儿辗转打滚。它的三个头中的一个已经被斫掉了，血从创口涌出来。下边，在台座脚边，沸腾着工人群众。他们有些人把楔子打入石制的台座里，有些人挥着鹤嘴锄和锤子摧毁它。有些人往上爬着，有的站在同志们的肩膀上，手持着刀，同时嘴里咬着刀，直向多头蛇扑去，他们也象台座上面的怪兽一样狂暴。那些爬到多头蛇那儿的人便抓住它，用全身紧压在敌人身上，同时拿武器刺戳着它，多头蛇则用爪子把人们压住，咬他们，用触须缠住他们的脖子，而血便顺着台座流下来。可是人们并没有削弱他们的进攻，他们依旧激烈地战斗着，千万人跟这只怪兽战斗着！

① 特罗依叶是布拉格北面的别墅区。——俄译者

杨达克凝视着这幅可怕的图画，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人。多头蛇用尾部缚住他，并且把他的咽喉紧紧缠住。这个人的脸孔发青了。要是怪兽那致命的尾巴一放松，一具死尸就会落到地上。杨达克觉得：这个被缠死的人好象就是他自己。是的，这是他！他，杨达克议员，乃是跟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悲惨的牺牲者。多头蛇象揪住一只小耗子似地揪住他，不肯把他放松。他完了。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命运。杨达克相信这个，于是由于对自己的怜悯，他的眼睛润湿了。他侧转身子，把头埋在丝枕头里。这个枕头是他的女儿绣了送给爸爸的。不幸的孩子们，不幸的父亲！

在杨达克的记忆里突然出现的是什么曲调？这是某支在音乐厅里演唱的讽刺歌。呵，他知道它——在这支歌里有着这样开头的迭句："杨达克叛变了"……这支讽刺歌是从前为《人民权利报》的主笔斯季文编的。他是捷克最初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在报纸上写过宣扬共产主义的论文，并且在这些论文下面签着自己的全名，同时在各个集会上演说，替党争取了克拉德诺的矿工们。工人们喜爱斯季文，而资产阶级恨透了他。可是突然有一次，在《人民权利报》上刊载了一篇由他签名的反革命的文章。在一夜之内，斯季文转了一百八十度。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从那一天起，伊奥捷夫·斯季文就发迹了。他跟妻子离了婚，娶了一个年轻的美女，给她穿上皮货和丝绸，从两间屋子的公寓搬到府第里，在著名的画家那儿定画了一张自己的肖像。那时候，舞台讽刺家文察·巴利东便在西陵克斯酒馆演唱一支讽刺歌，歌子里的迭句唱道："斯季文叛变了。"现在这一行词句可以改成"杨达克叛变了"……

议员把头朝绣花枕头里钻得更深了。他的脸面扭曲着。"杨

达克叛变了，杨达克叛变了！杨达克投降了右翼分子！”

只是一纵身，只是一纵身，
他就那么轻快地转过去了，
必须撒上沙子，
免得这个跳梁的小丑滑交。

歌子变得那样地扰人，弄得杨达克怎么也不能把它从自己身边赶走，它重复着，仿佛留声机的唱片似的。这支笨拙的、缠人的曲调逼着杨达克把事情冷静地考虑一下。要是抛开那把这支讽刺歌里单纯的思想掩盖着的一切虚伪的废话，要是抛开这一切关于自杀的念头和对着革命的宣传画所流的感伤的眼泪，那么，唱片听上去就开始明白而清楚了。是的，杨达克叛变了。是的，杨达克将要写波德格腊兹基所需要的那篇文章。他已经不会上柯希尔日去出席工人的集会了，而是用电话通知说他病得很厉害……杨达克从来也不曾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始终只是个在生活上贪求名利的人。而革命把一切虚伪都揭露了。

在前厅里，钥匙在锁里卡搭一响。议员从沙发上跳起来，急忙在镜子前面把头发抚平。

二十岁的、充满生命力的亚尔达跑进了房间。

“爸爸！”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对父亲说话就象对同志似的。“我使劲的跑。从德国来了个好消息！德国人跟我们联合了。在德国中部，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只等待着信号。”

杨达克对儿子望了望。脸色红喷喷的青年的形象仿佛在雾里似的在他的眼前浮现着。议员感到可怕地虚弱。

“你怎么啦，爸爸？”亚尔达惊奇地问道。

于是父亲便鼓足了勇气。

“我有另外的消息，”他开始声音发颤地说道，接着，便带着不自然的坚决音调继续道：“德国人不跟我们走一条路了。一切我们革命的进攻早就注定要失败的。”

大学生跳到他跟前，抓住了他的袖子。在青年的眼睛里含着失望的表情。

“你发疯了，爸爸！”他叫道。

你好，年轻的无产者！

秋天的白昼是短促的。可是在布拉格的阔气的街道上，在人民大街和普尔希柯贝，这当然是觉察不到的。那里，天刚刚开始暗下来，街灯就点起来了，首饰店和服饰店的橱窗也突然放亮，在玻璃后面，雪白的男用衬衫和精致的瓷器耀眼地闪着光，在房屋的正面上，发亮的广告字母在闪耀。可是叶赛尼奥伐街在秋天是凄凉而难看的。街灯的电线杆装得彼此离得远远的，而它们上面的黄澄澄的球就象处决犯的头颅似的在那儿摇晃。在一所大房子的黑暗的正面上，那食物铺子的明亮的窗户看上去显得很孤单，它那样儿并不使任何人感到高兴。房子里也是一样的凄凉。在狭窄的门廊里，在天花板底下，点着一盏十支光的电灯，而在那又冷又充满着各种味道的半明半暗的公共走廊里，只有一扇下着条子窗帷的窗子在得意扬扬地放着光。这是克拉邦诺娃军士太太的住处，她是唯一拥有电表的人。在厨房后面，在那些窗子向西开的屋子里，还可以看见一抹暗淡的天空，屋子里已经不亮了，但是还不曾黑暗：点灯不上算，因为火油一天天贵起来了。

安娜忧虑不安地等待着分娩。自然，分娩——这是最平常的事，所有在这房子里的工人的妻子们都生育过孩子，堕过胎，埋葬过新生的婴孩。小棺材在叶赛尼奥伐街上已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可是，不管安娜怎样想到所有这一切，一个人在家还是感

到害怕和苦闷。这个自然不能告诉任何人，——安娜知道，邻居们会笑她的，而庆奇伐罗娃同志就会说："瞧，好一位敏感的伯爵夫人！你想不想现在就躺到床上去？我生了九个孩子，七个活着，两个死了，可是每一次都是第二天就站在炉灶或者洗衣盆旁边了。"

在这种昏暗的晚上，没有东尼克在，安娜就觉得分外的愁闷。在这个星期里，翻砂间的工人们在替一部巨大的旋床做机台的模型，东尼克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外，还要加班，所以回来得迟。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今天，那秋日的傍晚特别使安娜感到沉闷。她的心收缩起来了，好比小鸟在暴风雨之前，紧紧地偎依着大树干、心脏收缩起来一样。

她不能静坐在家里了。她把围巾朝头上一披，就出去迎丈夫去了，她久久地在工厂的有着铁栏杆的大门口徘徊着，恐怕走远了就会跟东尼克错过。天已经完全黑了。靠了从车间窗户里投射下来的光，只能看到工厂的撒着沙子的庭院。最后，安娜看到了东尼克。他夹在一群工人们中间从翻砂间里出来，匆匆地走到出入口，走到有着标准钟的地方，从那儿，他看见了安娜，她正抓住栏杆的铁条站着。东尼克远远地对她笑了一笑。

守门人打开了大门。东尼克紧紧地握住了安娜的手。她的淡蓝色的眼睛仿佛在对他说："东尼契克，你不在家，我觉得烦闷并且心慌得很。"他的坚定的目光回答说："我也在为你担心，安娜。可是我们将尽力使分娩顺利过去。别害怕！"所有这些话都是用眼睛表达的，而嘴唇却不曾说过一个字。东尼克跟安娜肩并肩地在街上走着。

"我陪你到家，安娜，"他说道，"随后，我要上柯希尔日去。杨达克将在那边集会上演说，我得跟他谈一谈。可是我不会留到

末了走的，我马上就回来。”

“赶快回来喔！”安娜说道，紧贴着他。

走到街角的第一盏路灯那儿，他看见在街灯的电线杆的阴影里，亚尔达·杨达克正踩着徬徨不定的步子在那儿走着。“说到鬼，鬼就到，①……要不然，至少是个小鬼，”东尼克想开一下玩笑，可是一看到大学生低垂着头，并且脸上带着忧伤的神情，他就不开玩笑了。东尼克和安娜停住了脚步。“亚罗乌歇克出了什么事？”安娜心里想。

碰到了自己的朋友们，大学生并不感到惊奇，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在街灯的亮光底下，他的脸孔显得更苍白了。

“我到你们那儿去过，”他说道。“庆奇伐罗娃告诉我说你在加班……”

“是的。可是为什么他说这些话的样子有点古怪？”东尼克和安娜想着，询问地望着亚尔达。

“我有桩事请求你，克罗乌斯卡雅同志。允许我在你们那儿住几个晚上。”

“当然可以，”东尼克回答道。

“来吧，亚罗乌施！”安娜补充说。

可是这还不是解释。他们俩等待着小杨达克继续说些什么。

“我不再回家了。我想搬到叔叔那儿去。他虽然也是个资产者，可是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他此刻不在城里，他要过三天光景才能回来……”

克罗乌斯基夫妇只是感到惊讶，同时等待着某个不祥的消息。

---

① 意即：提到某人，他就来了。

青年人的眉毛颤动了一下，绝望的表情在眼睛里掠了过去。

“父亲背叛了我们！”他叫道。

这好象是炸弹爆炸似的。东尼克的脸色也变得苍白了，他蓦地想起了杨达克妻子的漆皮鞋。他握紧了拳头，准备战斗似地挺直腰干，身子微微向前倾着。在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仇恨的光芒。他们这样子面对面地站了几秒钟。亚尔达只想做一件事：倒在谁的怀里痛哭一场。安娜站在旁边，同情地对他望着。

“咱们走吧，你把经过情形讲一讲！”东尼克坚定地说道。

他们走了。亚尔达的叙述并不长久。父亲忽然改变了方向。他赞成保持社会民主党原来的政治路线，而反对建立新党。他认为应该等待时机。在目前，任何革命的进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父亲引证了芬兰和匈牙利的例子，同时肯定说：德国的革命浪潮正在趋向低落，而各国又在准备武装干涉俄罗斯。工人的国家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击溃的……

“今天父亲不知碰到了什么古怪事儿，”亚尔达末了说。

“你相信他吗？”

“不，”是低声的回答。

“可能他有着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消息吧？”

“不。”

“他今天跟什么人碰了头？”

“据我所知，跟谁都没有碰过头。从早上起，他一直在家里工作，后来，就去听审了。”

东尼克甚至没有问起判决，虽然他还不知道判决的结果。

“关于你父亲叛变的事，还有什么别的人知道吗？”

“不，你是第一个。”

东尼克赶忙走向附近的公用电话室。他往自动电话机里丢

了几个克朗，就开始打电话找寻党的领袖们，到最后，跟区组织的书记通了话。

“杨达克议员背叛了我们!”东尼克激动地报告他说，并且转达了自己跟亚尔达的谈话。“杨达克这狗!”他末了叫喊道，想起了他怎样在人民宫向议员道过歉。电话筒里没有声响。“你听见没有?”东尼克焦急地喊道。

“他这流氓!”响起了回答的声音。

“今天在柯希尔日有个集会，”东尼克继续说道。“也许他已经在那儿开始他的进攻了。一定得立即上柯希尔日去揭发这个叛徒。”

“我就去，”书记说，接着，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仿佛在考虑似地补充道：“无赖!……事情是这样的，”他继续说，“今天晚上，我们本来有其他的计划，可是只能把计划改动一下了，这事情比一切都重要。你是唯一能够揭露杨达克的证人，你也一定得上柯希尔日去。革命者的职责自然要求亚尔达自己在工人面前揭发这个叛徒，可是我并不认为他能这样坚强。一定要从政治上消灭杨达克!”

“好吧，我去，”东尼克说道，挂上了听筒。

安娜跟亚尔达在电话室旁边等待着他。

“我要上柯希尔日去，安娜。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可能很晚，”他说道。“回头见!”

他迅速地握了握她的手，同时只匆促地望了她一眼，随后，就对大学生说道：

“跟安娜一起去吧，她会替你安排睡处的。可是她每分钟都可能生产。如果碰到了这样的事，叫醒庆奇伐罗娃同志，并且去找助产士来。”

他跟在电车后面跑，跳上了正在开行的电车。关于安娜和凯烈凯施的念头掠过了脑海。“目前，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工人的事业正在受到威胁。一定得揭发叛徒！”

于是东尼克去揭发杨达克，而安娜和亚罗乌施便回家了。

安娜和亚罗乌施坐在小房间里。曼尼雅送的那盏安着纸制的灯罩的煤油灯在铺着便宜的台布的桌子上投下了一圈黄光。安娜和他的客人的脸面留在朦胧的灯光里。安娜缝补着衬衣。两个人都不作声。有时，安娜同情地对青年望着，而他抬起了眼睛，为了她的亲切的目光而默默地感谢她，这种目光此刻是多么的需要。他看见安娜的淡蓝色的眼睛和那张由于即将做母亲而具有特殊魅力的脸面。现在他们的目光长久地遇到一起了，安娜微微有些发窘，温柔地说道：

“出了什么事儿，亚罗乌施？”

“可怕的事儿，安娜同志。”

于是他们坐在那儿，仿佛罩在一个玻璃罩底下似的。整所房子充满着活动和声响，可是这儿却笼罩着沉寂和静止的状态。在楼梯上和门廊里，不断地发出脚步声，人们不停地开门和关门，在走廊里，自来水哗哗地流着。在库契腊的屋子里，斯拉娃正在啪啪地打着高声啼哭的、四岁的佛蓝季克。隔壁，军士太太摇哄着自己的双生子，对他们哼着流行的探戈舞曲。

可爱的齐戈洛，① 悲哀的齐戈洛，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那显赫和富裕的青春，那一去不返的青春！

---

① “齐戈洛”，当时布拉格各游艺场雇佣的歌舞者，其中有许多俄国的白党分子。——俄译者

东尼克总是嘲笑这支白俄侨民们的歌子。可是此刻在安娜的屋子里却没有人在笑。军士太太的带鼻音的探戈舞曲和所有其他的声响都不能侵入到这个玻璃罩底下的小天地里来，这些声响一碰着这个罩子，便在它上面滑过，然后就掉下去了。安娜的蓝眼睛好似大大的蓝宝石，而在她那金黄头发的四周有着一圈由于灯光而起的光晕。她的手微微地动着，指尖抚弄着针。而在这当儿，在柯希尔日的某个地方，亚罗乌施的父亲正在遭受政治上的处决……

"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亚罗乌施？"

"不知道怎么办，安娜同志。"

有人缓慢而吃力地沿着楼梯走上来，仿佛背负着重担似的。"丢掉玩具，念书去，流氓！"庆奇伐腊的妻子在隔壁嚷叫着。"东尼克是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亚尔达想。"他是强有力的，他会打倒我的父亲，他会对党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毫无疑义的。东尼克和安娜——完整的性格，他们什么都清楚，同时他们从来也不动摇。悲剧感对他们说来是陌生的，它对全党的同志们说来，一般地是陌生的，只有他，亚尔达是动摇的，他是病态而沮丧的。没有人了解他，没有人帮助他。他在这里是个外人。工人们让他到他们家里来，跟他商量事情，相信他，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这个他偷偷地爱着的安娜可怜他，无论哪一个情人都不会那么温柔地望着他，可是安娜从来也不对他称呼'你'，如同党员同志们彼此之间随随便便称呼的那样。是的，这是最可怕的：那些他所喜爱的人，那些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们的事业、而今天他又把自己的父亲交给他们去处决的人，不接收他进入他们的大家庭。他对他们说来是个外人……"

在走廊上，不知哪一个走到自来水那儿，可以听到水流入大

铁桶的哗哗声。克拉邦家的门打开了。"鲍仙娜！"庆奇伐罗娃在走廊上生气地叫道。鲍仙娜？哦，这就是那个在院子里跟木匠们有过一段趣事的棕黄色头发的姑娘……各种声响在那盖住安娜屋子的玻璃罩上撞击着。

亚尔达站了起来，走到东尼克的书架子前面，拿了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坐下来想看。

"什么时候想睡了，就告诉我，亚罗乌施。我要等东尼克，"安娜说道。

大学生点点头。他试着看书，可是看不下去。然而拿着书本静静地坐在那儿，装做看书的样子，终究比从自己嘴里硬挤出一些不自然的话语来要少苦恼些。可是假如装做看书的话，就得时不时的翻着书页，这样的装模作样就显得很难堪。"我究竟干吗要呆在这儿，"亚尔达想。"坐在安娜身旁，望着她那拿着针的、红润的手指，是否使我的心头感到轻松一点？有时候，这枚针突然那样地一闪，仿佛其中蕴蓄着安娜心中的热情。是的，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轻松一点。"

东尼克走进了屋子，他回来得比他们所意料的要早得多。

"东尼克！"安娜叫了起来，高兴得脸红了。

亚尔达的心往下沉了，他的眼睛紧盯住同志的脸面。

"你好！"东尼克说道。

"你好！"亚尔达低声答道，在他的眼睛里，含着绝望的询问的表情。

"他没有来，"东尼克说道。

"没有来！"亚尔达的全身心都受到了这几个字的影响。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可是已经不象一分钟以前那样了。他激动着，可是心头却感到轻松了一点：父亲的死刑延迟了几个钟

头。

“给我点儿东西吃好吗，安娜？”东尼克问道。

“那边有咖啡。”

“面包没有了吗？”

安娜诉苦似地望着丈夫。是的，面包没有了。一清早，东尼克还没有出去上工的当儿，他们家来了失业的斯特尔那德同志，东尼克给了他最后四分之一的圆面包和最后的一块咸牛肉。钱也没有了。昨天晚上，东尼克在安娜那儿拿走了最后的十克朗，因为有人替左翼的报纸募集经费。那些剩下的钱，他今天晚上都花在自动电话上了。工资要到明天才能领。咖啡剩下的也不多，安娜给了亚尔达一大杯。他很不情愿喝这坏咖啡，至于饭食，他连想都不能想了，可是他不敢得罪安娜。

东尼克坐下来喝咖啡。

“集会上有些什么事？”亚尔达怯生生地问道。

“施密腊耳做了关于政治情况的报告。斗争尖锐化了。”

“你跟他谈过没有，他已经知道了父亲的事吧？”

东尼克点点头。

“他说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把整个事情详详细细的问了一遍，耸耸肩膀。还问候你。”

他们开始睡觉了。东尼克跟安娜——在床上，亚尔达——在地板上铺着的褥垫上。

在这个晚上，一个新的无产者诞生了，他注定了要成为一个不象他父亲那样的战士，而要成为一个未来的建设者。

亚尔达到天亮才睡着，可是不久，他又被声响和灯光惊醒了。东尼克迅速地穿上衣服，安娜躺在床上，她的淡蓝色的眼睛

注视着天花板，嘴唇紧咬着。她呼吸困难，同时轻声哼叫着。

"陪她呆一会儿，"东尼克对大学生说了一声，就匆匆地走了。

亚尔达慌忙穿上衣服，光着脚蹑足走到床跟前，他轻轻地走动着，因为在此刻，每一步不谨慎的脚步都是会亵渎圣物的。他站在床脚边。安娜的阵痛开始了。她的眼睛闭着，嘴唇紧咬着。她用手指抓住被子的皱褶，吃力地忍住哼叫。

安娜有没有感觉到他在这儿，在她的旁边？如果没有感到的话，那就好了。可是叫他怎么办呢？不能象这样无能为力、垂头丧气、不能给她——给安娜丝毫帮助地留在这儿，怎能望着她痛苦的面容、体会着她的痛楚而袖手旁观呢！"唉，这一切不过是虚假和空话，"大学生反复地对自己说道。"难道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吗？谁需要我的同情？要是东尼克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办呢？"亚尔达试着想象这一点。是的，不错，他们完全是不同的人。

安娜闭着眼睛，哀求道：

"亚罗乌歇克，请您走开，我觉得害臊。"

亚尔达涨红了脸，走到厨房里去了。他站在那边阴暗的角落里的炉灶旁边，寻思着："我干吗在这儿？我有什么用处，谁需要我呢？"他为一种强烈的欲望所控制，想倒在什么人的怀里，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可是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跟他这样亲密的人。亚尔达捧住了头，把额头紧贴在瓷砖上。从房间里传来高声的哼叫。

东尼克带着助产士回来了。在房间里，开始忙碌起来了。东尼克在厨房里点燃了蜡烛，生起炉子，从走廊上提来一桶桶的水，把它放在炉灶上，又把洗衣盆擦干净。所有这一切，他做得

又快又灵巧，嘴上没有说过一个字。他的长长的影子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摇晃着。他几乎没有望安娜。"纯朴、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的，"这念头掠过了大学生亚尔达的脑海。

助产士干着自己的事。被响声吵醒的庆奇伐罗娃穿着衬裙，肩上披着五颜六色的头巾跑来了。

"不要紧，不要紧，做母亲的，"她说道，走到安娜跟前。"这是逃不掉的，这是我们大家都受过的。只是别哭！把羽毛褥子拿开，要是痛得很厉害的话，就使劲叫吧，这会有用处的……让我来，婶子……嗳哟，好漂亮的包被！我以前用的只是些做麻袋的布。"

产妇的呻吟越来越厉害，变成喊叫了。

"好的，好的，"庆奇伐罗娃重复说道。"不要爱惜嗓子。让那边隔壁的克拉邦尼哈①去安定自己的神经吧。她可以唱她喜欢的探戈舞曲'齐戈洛'给自己听听。"

"瞧，"亚罗乌施苦恼地想道，"就是这带些粗鲁的友谊也要比我的无益的爱情有用多了！"

东尼克继续张罗着。他替助产士煮了咖啡，因为咖啡是照例应该给她喝的。东尼克永远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并且按什么样的次序做。

"东尼契克！"从房间里发出安娜惊惶的叫声。东尼克上那儿去了。亚尔达留在厨房里。他站在那边角落里，光着脚，衣冠不整，谁也不需要他，他是外人，是多余的。庆奇伐罗娃在走过厨房的时候，看到了他。

"您在这儿干什么，年轻人？"她问道，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

① 克拉邦尼哈，克拉邦诺娃之昵称。

“离开这儿吧，你此刻不该呆在这地方。随便上哪个咖啡店去吧。”

亚尔达溜到房间里去取自己的东西。在那儿，仿佛在雾里似的，他看到了赤裸着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安娜，他看到了被可怕的、无法解脱的疼痛折磨着的他心爱的安娜。她的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头的四周。床边站着东尼克，安娜抓住了他的手。这一次她没有觉察到大学生。

青年被失望攫住了。

他手里捧着一大堆自己的衣服，悄悄地走出了房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亚尔达在黑暗的梯台上穿着衣服，他穿了很久，把额头紧贴在冰凉的墙壁上，照这样的姿态呆呆地站在那儿。

当看门女人放他到街上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亚尔达决定在房子附近等待着随便哪一个二层楼上的房客走出来，那时候他就可以打听可怜的安娜的情况了。

十　二　月

在柯耳卞工厂的屋顶上，高耸着一具熔铁炉。每到晚上，它发着鲜红的火光，有时候向天空喷出一条条的火舌，吸引着过路人的注意。这具熔铁炉乃是一个巨大的圆筒，它的炉底是在下面，在炼铁车间里，东尼克就在那儿干活。

在上面，在熔铁炉口旁边的狭窄的铁踏板上，老里托赫列勃和爱达·伏烈耳——一个阔肩膀、鬈发的小伙子在那儿干着活。爱达卷起了袖子，衬衫在胸前敞开着；他老是被煤灰和生锈的铁灰弄成污黑。起重机把装着废铁的手推车从院子里运到这儿来，这些废铁是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从堆栈上、垃圾场上和后院里收集来的。这儿什么都有——碎裂的锅子啦，没有凹槽的折断的钥匙啦，用坏了的火车轮子啦，旧的铁箍和散热器啦，甚至有着榴霰弹的弹壳和大口径的炮弹。一天八个钟头，爱达·伏烈耳用铲子干着活儿，把所有这些废铁丢进炉子的口里，把金属和一层层的焦煤和石灰轮流递送着。于是熔铁炉就贪婪地吞食着金属、燃料和白色的石灰，同时，在摄氏一千二百度的温度下，把它们狂热地消化掉。

在下面，在翻砂车间里，那熔铁炉的褐色、强大的筒身宛如剥去了树皮的树木。在这筒身的光滑的表面上，开了一个不过象牢房门上的窗户那样大的小窗。这扇小窗的金属窗板可以随时放下，于是，通过一层云母薄片，就可以窥见熔铁炉内部，它简

单得象那把食物消化成血液的软体虫的胃那样，一滴滴粉红色的液体透过犹如带玫瑰色的白冰那样的焦煤和石灰掉下来，汇合成一条小流。那些在一个钟点以前还是废铁的金属现在变成了熔铁炉的血液，而再过一个钟点就变成机器的零件了。熔铁炉的血液，和翻砂工人们的血液一样，是属于资本家的，因为在这儿，无论人或者炉子，都不是白白受喂养的。熔铁炉的血液将要经过一个跟手掌那样大小的窟窿被放出来，——此刻那窟窿被粘土封住，看不出来。

下午四点钟。翻砂技师带着长长的钢钎来到这里，用它捅着炉子，好象刺戳屠宰场上的一头牲口似的。从熔铁炉的腹部，喷出白中带玫瑰色的、火焰般的浓厚血液，它顺着凹槽流着，用白色的反光照耀着车间和人们的脸孔。工人们照例是成双地站在炉口旁边，手里拿着有长柄的勺子。他们在这些勺子里装满熔铁炉的火焰般的血液，然后把它倒在铸造模型里。车间仿佛顿时有几十朵鲜艳的花朵开放似的。空气变得灼热，充满了刺鼻的、酸溜溜的味道。如果沙制模型没弄干的话，熔铁差不多会喷溅到天花板上，然后又从那儿象一粒粒灼热的小弹丸似地落到熔铸工人们的头上和衣领后面……

于是工作日完了。爱达·伏烈耳用袖子拭去了脸上的汗水和煤灰的混合物，就抽起烟来，而老里托赫列勃则坐在一堆铁上，身子支在铲子柄上，呆呆地望着前面。

爱达在上面干活，东尼克在下面。在巨大的长方形的车间里，到处是一堆堆的沙和铁。灰色的沙子，污黑的铁，金属和潮湿的土地的气息。翻砂工人们在沙堆里忙碌着，在它中间建立起复杂的建筑物。金属将流到这儿来，然后变成机器的零件。可是这个工作的灵魂是人。机器之所以能够活动，是因为工人们

通过他们的劳动，把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神经的感受性、自己肌肉的力量传给了它们，把自己血液中的热力以及与之相连的生命的一部分奉献给了它们。当那座东尼克正在替它做模型的涡轮发电机由骨架变成机器的时候，那么，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干活，东尼克的力量总在推动着它。而那些由这座发电机的动力开动的机器，不论它是织布机或纺绩机，机器锻铁锤或者旋床，它们的动作也将和东尼克的心跳互相合拍。

有一百个同志跟东尼克一起在翻砂车间里干活。劳动以及跟火及金属的斗争使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顽强的表情，使他们的手变成了黑色。

在东尼克头上十公尺的地方，他的朋友、党员同志彼得·马林那在那儿驾着行车。他是这部行车的支配者。彼得坐在铁制的驾驶室里操纵着那在滑铁上滚行着、发出叮当和辘辘声的行车。从行车上，放下一条带着几个强有力的钩子的链条，这些钩子把铁板、机器零件或者烘炉拉起来，于是这些物件便在空中骇人地摇晃着，被运到车间的另一端。而在铸造特别巨大的零件的时候，行车就开到熔铁炉旁边，接住一只盛着熔化的金属的大桶，把它举起来，然后在距离沙堆、铸型箱和铁板半公尺的高处把它运往复杂的沙制模型那儿。这个程序好似庄严的游行队伍。在行车的链条的音响中，工人们伴送着在空中缓慢地飘浮着的大桶，一边用钩杆使它保持平衡。在熔炼的火焰的闪光里，在那任何教堂里都看不到的灿烂的光辉之中，游行队伍在未来的机器模型上面停下来，翻砂工人们就把大桶倾斜过来，而熔化了的金属便闪烁着，发出嗞嗞的声音流出来，同时，鲜红色的反光照耀着工人们的手、脸和行车的车身……

工作日结束了。彼得·马林那拿污黑的指头擦着鼻子，同

时从自己的驾驶室里探出身子来，用目光寻找着东尼克。

炼铁车间的旁边是精炼车间。在那儿，铁象水似地在马丁炉里日日夜夜沸腾着。在另一旁是炼钢车间；那边的铸型是小小的，象儿童的玩具似的。在院子里，有着磨沙工场、打铁工场、木工工场、发行科、煤和铁的堆栈、办事处。在这个由许多工厂的建筑物和烟囱构成的小城里，工人们的双手毫不倦怠地工作着。二千九百四十只手，一千四百七十个男女工人。一千四百七十个工业无产者！

这已经不是我们祖父一代的那些逐渐变为无产者的家庭手工业者了，那些手工业者乃是大工厂的不幸的竞争者，他们被这种竞争弄得经济破产以后，终于沦为工厂里的雇工，可是仍旧没有忘怀自己手工业的黄金时代，同时梦想着向自己的敌人——机器报复，梦想把它毁灭。这已经不是那些一天做工十三小时无法自卫的奴隶了——我们父亲的一代——那些在机器的轰隆声中、在黄麻捆和麻袋堆上面生下来，渐渐变得愚钝、老是挨饿的人，他们在领到工资的一天，吃了第一杯酒就会倒下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时在这些被迫沦为奴隶的群众中间，还刚刚开始出现未来的战士、受难者和英雄们。在城郊的小酒店里建立的一些工人组织以及过去的迫害和牢狱，唤醒了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成为新时代的最伟大的启示，它所赢得的影响不下于宗教和爱国主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鼓舞着群众，在他们面前揭露了爱情和斗争的新意义。不怕死的爱情；引向胜利的斗争。阶级自觉早就渗入了安东宁·克罗乌斯基和他的同志们的血肉里。他们明白：他们，工人们，是世界上万物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凡是由他们的手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应该属于他们。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那种对机器和工厂

的憎恨了。对于他们说来，“雇主”这个概念失去了它的具体意义，因为现在，厂主们并不象过去那样每逢节日坐着马车驶出厂门，而工人们也并不在厂主住宅的窗下发出欢呼，表示感谢赐给他们的一大桶啤酒和一桶小香肠。高贵的厂主在一包包的股票中间丧失了个人的特征；这些股票成了资产阶级公馆里的写字台抽屉中的藏物。它们变成了太太的衣饰和家眷的私邸，因此，凡是生活过得阔气的人，在工人们看来，都是剥削者。一个阶级开始反对另一个阶级。两方面的战士已经有过小冲突和阵地战，他们知道敌人阵营里的人数和力量，知道对方的战术，同时明白：要达成和约或协议是决不可能的。不是死亡，就是胜利！

西方面临大战的前夕。在东方，在俄罗斯，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双方军队里的战士都开始激昂起来，这是战斗前常有的现象。在这个战斗里，东尼克在那儿干活的工厂变成了前进阵地之一。不论是在上面熔铁炉口做活的爱达·伏烈耳和下面的安东宁·克罗乌斯基，以及行车上的彼得·马林那都是先锋队的战士。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当那鲜红、发出火花、熊熊地燃烧着的金属流入沙制模型的时候，在前进阵地上，在柯耳卞工厂里，发出了战斗的警报：从隔壁的车间里，跑来了火伕聂杰拉。

“克罗乌斯基，人民宫被警察强占了！”

东尼克挺直了身子，他的心怦怦地跳动起来，手指紧握着，仿佛在摸索着枪身。

“你还知道什么别的？”

“别的不知道。我们厂里的人应该去帮忙。”

东尼克在车间里奔跑着，跳过各种工具和灼热的金属块，然

后顺着螺旋梯上去到熔铁炉口那儿。

“爱达，警察强占了人民宫。我们去帮忙。把院子里的人集合起来。我到各车间去走一转。”

东尼克赶快下来，跑到行车下面。

“彼得，彼得！”他抬起头，叫喊着。

彼得从驾驶室里探出身子来，用手罩着耳朵。东尼克爬到模型上，叫喊着，压倒嘈杂的声响：

“丢开活儿，丢开活儿，同志们，警察占据了人民宫。不要走散，我们一起上那边去！”

工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拢来。甚至那些漠不关心的人也停止了工作，想听一听发生了什么事。

工头从熔铁炉那儿奔来，脸孔涨得通红，他朝着东尼克叫道：

“疯了，这时候丢开工作！”

在上面，在天花板下面，彼得·马林那刹住了行车，于是车间里便突然安静下来了。

“喂，东尼克，我们是不是到那儿去帮忙？”

“是的！”

彼得·马林那也在自己的驾驶室里伸直了身子，随后便高声叫喊起来，连隔壁的各车间都听得到：

“丢开活儿！警察占据了人民宫！”

工程师跑进了车间。工头挥动着手，对着行车驾驶员叫喊着：

“你们疯了，伙计们！”

一个强壮的、脸色黝黑的翻砂工人目光炯炯地朝他那儿挤过去，吼叫着：

“不要管咱们的事！”接着就转身向同志们：“丢开活儿！”

东尼克从铸型上跳下来，跑到隔壁车间里，从那儿出来，他又奔进炼钢车间：

“丢开活儿！咱们上人民宫帮同志们去！”

那时候，爱达·伏烈耳跑遍院子、磨沙工场、堆栈和附属工场，发出警报。

柯耳卞工厂工人们发警报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十二月九日，警察真的占据了人民宫。在秋天，时机就成熟了。百分之八十的社会民主党员跟随着共产党员走，大家都明白：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了。一连几个星期，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权利报》的篇幅上，展开了混乱的论战，后来报纸断然采取了反革命的立场。那时候，工人的积极分子便从言论转到行动。在十月的一个晚上，施密腊耳把他们召集到扎勃蓝斯基饭店的健身房里。工人们直接从工厂来到这儿，穿着工装，沉着而严肃，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同时懂得他们决心怎样做。会开得并不久，报告，不十分热闹的鼓掌声，几个赞同者的发言。东尼克也发了言，他话语中的“同志们”这三个字重又象锤子敲击铁砧似地鸣响着。随后，布拉格各工厂的积极分子们便从工人的酒店里走了出来，而他们的突击队就开始顺着夜晚的街道向人民宫前进。

警察局打电话到报馆，给安东宁·聂密茨：“一批二百人左右的群众快到人民宫了。你们可需要警卫队，先生们？”

老聂密茨的心开始忐忑不安地乱跳起来了。事情竟然弄到了这种地步！他自己从前是个工人，而现在工人们却来反对他了。

“谢谢，不需要，”他在电话里回答道，然后，红着脸，傲慢地抬起了头，跟伊奥捷夫·斯季文一起离开了由他亲手建立起来

的报馆。

留在报馆里的工作人员是共产主义者。工人一积极分子们沉着地占领了人民宫。

工人们穿过人民宫半明半暗的院子向楼上进军的时候，并没有在这所大厦里引起特别的骚动。在排字房里、轮转机旁、发行科里、办公室里，一切工作都照常进行，仿佛那两个走掉的家伙向来就不在这里似的。虽然，人民宫的房子在形式上属于党的领导者安东宁·聂密茨，但是难道不是他们——工人们，为了在自己的代表那里买一张从抄写本里撕下来的、上面写着："建筑人民宫的砖一块"的纸片而节省晚餐、放弃烟卷吗？难道在《人民权利报》的艰难的日子里，工人们不曾为它募集经费，不曾到各家各户去宣传鼓动，不曾在清早上工之前推销自己的报纸吗？于是，他们现在便重又掌握了自己的权利。

他们把这些权利保留了两个月，把《人民权利报》改名为《红色权利报》。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和政府之间进行了两个月的关于把报纸归还"法定所有者"的协商，可是，到最后证明：只有用武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社会民主党用武器来反对工人是否合适？当然不合适。这意味着党的死亡。那末，怎么办呢？办法有了：社会民主党政府辞职。内阁总理，社会民主党员屠萨尔辞职，他的职位由奥帝国的老官僚、迫害工人的老手契尔内依继任。于是，今天，十二月九日，就发生了柯耳卞工厂在工作日快结束的时候所得知的事件：警察占据了人民宫。

这是遵照一切形式上的手续做的。在三点半钟的时候，布拉格市政府的一个官吏到了人民宫大厦，交给印刷所主任一张盖了印的公文，那上面写着：印刷所应予查封。官方的这个行动是秘密进行的，并且时间又选得非常合适：晚报已出，而编早报的

工作还没有开始；机器停着，房子里几乎没有人。在这黄昏正降临、橱窗开始发亮的当儿，街上的行人很少；人们待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想着快要来到的圣诞前夕，想着那有葡萄干的圣诞饼和那些送给孩子的礼物，而没有想到革命。昔日的工人领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借别人的手来攻击的那个堡垒的弱点，很清楚地知道它的卫戍部队的情况。

在这沉静的傍晚时分，与那小官吏不露形迹地出现在人民宫的同时，整个政府机关都在作森严的布置。军队处在备战的状态。警察局一早就戒备起来。它把近郊所有的警察都集中到布拉格；各处跟人民宫的电话联系都受到了控制。当小官吏在印刷所里递交关于查封的指令的时候，内阁总理契尔内依和他忠实的助手波德格腊兹基，奥国统治时代的两个奸滑的老臣，正坐在契尔内依的办公室里，吸着雪茄烟，竭力装做镇定的样子，等待着电话铃声。

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则集合在党的法律顾问的住宅里。他们的脸色苍白，神情激动。他们第一次下决心让工人们流血。在老安东宁·聂密茨的戴着金边眼镜的眼睛里，含着骚乱不安的神情。他绝对不愿意党内的冲突导致这样的后果，同时自己也不明白：他怎么会到这里来，他所期待的是什么。难道律师和部长们竟然把他带得那么远，以至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吗？

“不，不！”退职的迦勃尔曼部长用了由于激动和忍住眼泪而发颤的声音叫喊道：“不能让工人们流血。再打个电话给契尔内依，告诉他：即使流一滴工人的血，我也要亲手把他枪毙。”

迦勃尔曼想起了牢房的白色墙壁，在那儿，他度过了四个年头。从早晨起，一种模糊的隐忧一直搅扰着他：莫非所有这些新放上美国写字台而仍然按旧的方式建立的工人部长们的办公室

就是事故发生的起因？

“他答应了我的，我相信一切事情都会比较温和地解决的，”前任总理回答说。“可是过去的已经一去不返，事情很明显：现在当权的是契尔内依。”

人民宫的领导人接到封闭的命令后，便打电话到市政府，可是只能跟听差说话，因为办公的时间已经过了。于是他便打电话给警察局。可是警察局长并不十分弄得清政治上的论据，至于警告的话语，他根本就不想了解。可是他还是答应向总理报告。过了一会儿，人民宫管理处的电话铃响了：内政部建议依据双方协议来和平地解决冲突。内政部不希望这事件导致政治局势的尖锐化，而在报上公开披露。它考虑到：六点钟在人民宫将举行一个工人一积极分子的集会，这个问题可以在集会上得到解决。

“可是警察放不放开会的人进人民宫呢？”停了好半晌，人民宫的领导人在电线的那一端问道。

答复是：“总理先生此刻不在这儿，可是我会向他报告的。如果确实只有代表们举行会议的话，那么，大概可以放他们进去的。也许……”

讲话的是波德格腊兹基部长。契尔内依本人则叉着腿，坐在旁边的皮圈椅里，手里握着分机的听筒。他短促地点点头，回答波德格腊兹基询问的目光。

当这些毫无结果的谈判正在进行的当儿，三百个警察占据了人民宫。他们把院子包围起来，同时以紧密的哨兵线封锁住两条通路。工人们的堡垒在毫无防备的时刻被人侵占了，它被截断了跟城内的联系，并且严密地被封锁起来，不准出入。只有电话还是通的。有几个偶然来到大厦的工人一积极分子便打电话给各个工厂：“警察占据了人民宫，尽可能通知所有的人！请通

知柯耳卞和丹聂克工厂、捷克-摩拉维亚机器制造工厂、军火工厂和陵格霍费尔工厂的同志们。晚上六点钟在人民宫园亭里召开全布拉格工厂代表会议。请把这一切通知大家！”

在电话局里监视人民宫电话进出的警察听到这些号召以后，就割断了电话线，于是人民宫便完全陷于孤立的状态了。在这个十二月的夜晚，它在所有的房子中间，仿佛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失去以前的地位、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人了。

街上开始聚集了一堆堆好奇的人。从对面车站上出来的人们住了步，想瞧一瞧为什么人民宫的大门被警察的警戒队守卫着，为什么街上有这么多的警察。但是，资产者预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报上已经一连几个星期拿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性来吓唬他们。

“过去，不要呆在这儿，过去！”警察不时对行人嚷叫着。

可是，好奇的人们为了不要跟警察争吵，就顺从地走了一百步左右，随即又折了回来。于是，包括几千人的群众便沿着吉别尔恩斯卡亚街以及和它毗连的迦夫里奇柯伐亚街来回地循环走着。通过这一大堆人群，电车缓慢地移动着，不住地打着铃。街上是那么挤，以致人们已经不可能听从警察的指挥，警察已无能为力了。

过了五点钟，第一批约莫一百五十个有组织的军需品工厂的工人到了这儿。他们步伐整齐地沿着街道前进着，人群比较乐意让路给他们，而不愿意让路给电车。工人们的行列到了大门口，迎面碰上了警察，于是就停了下来，队伍稍微晃动了一下。“向后转！”警官躲在四排武装的队伍后面，在半明半暗的出入口里嚷叫着。“向后转，要不然，我就要命令开枪了！”他的话掀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懑。警察们使劲地彼此握紧手，构成了一条排成四

行的锁链。从两旁发出喊叫的声音。军需品工厂的一个工人代表向警官喊叫着说：六点钟在人民宫要举行集会，一定得让他——代表，进去开会。工人们走到封锁线的紧跟前，气冲冲地向警察们说明：事实上，他们也是无产者，而军装是不能把他们的家庭从贫困中挽救出来的。受惊失色的警察们脸上装出冷冰冰的神情，疯狂地彼此抓紧手。在不绝的喧哗声里可以听见这样的呼声："前进！咱们走啊！"后面的人猛力而急遽地朝前一推，于是，工人们就跟警察们撞了个满怀。工人们拿肘臂掩护着眼睛，粉碎了警察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就高呼着"乌拉！"，朝前直冲。被后面的人推拥着的工人先头部队突入了大门，于是，狭窄的出入口就响起众人奔跑的杂沓的足音。人群流入人民宫的院子，把所有想跟它一起走的人带了进来。

乌拉！乌拉！

站在街上好奇者中间的一群群工人们扬扬得意地欢呼起来，庆贺着自己同志们的成功。小市民们则怀着半好奇、半敌意的心情望着他们。被冲破的封锁线重又连接起来，挡住了到院子去的进路。警察们的脸孔变成了土色。四面传来对他们的嘲笑声。

在济克蒙德·斯特蓝斯基服装公司的商业大厦里，有人把灯光通明的橱窗上的铁帘轰隆一声拉了下来。街上显得更暗了。

不多时，丹聂克工厂的工人们也冲进了人民宫。随后，又来了一百五十个柯耳卞工厂的人。他们在路上跟军火工厂的第二队工人合并在一块儿了。

打头走着东尼克、彼得·马林那和爱达·伏烈耳。老远就可以听到这支队伍怎样地走近来。两百个男子的声音唱着《红色的

旗帜》，由于这个歌声以及沉重的脚步声，弄得房子底层的窗玻璃叮当地响了起来。“打倒暴君，扔掉枷锁！”人们在街上雷鸣般地喊叫着。

可是那不可避免的一天，
那严酷无情的审判，
终将来到。

歌声在夜空荡漾，队伍走近了人民宫，那一群呆呆地看热闹的人怀着胆怯的敬意，默默地让路给这支有组织的队伍。两百个由于干活而双手污黑、眼睛里燃烧着决心的冶金工人如同刀子切面包那样轻便地劈开了人群。警官在出入口重又喊叫着不知什么话语。

大学生亚尔达·杨达克用肘臂推挤着，从一群闲人中间钻了出来，迎面向着工人的队伍奔去。他的眼睛闪烁着。他跑到东尼克身边。

“咱们冲进院子去！”他喊叫起来，在旁边迈着步。“带我一起走。”

“走吧，”东尼克沉着地回答，并没有放慢脚步，接着，又继续唱起歌来。

“咱们俩走在前面，东尼克！”亚尔达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道。“咱们一定要冲进去！必须预先通知里面的同志们：警察们埋伏在迦夫里奇柯伐亚街的电影院里。等到电影一散场，他们就会从后门钻进人民宫。”

队伍离开警察封锁线已经只有二十步左右了……亚尔达·杨达克向前冲出两步，举起右手，喊了一声“乌拉”，便笔直向警

察们奔去。四百条腿跳了十五步，“乌拉！”的喊声代替了歌声，冶金工人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冲破了动摇的封锁线，迅速地、仿佛液体从拔掉塞子的大桶里流出来似地由狭窄的出入口涌进了人民宫幽暗的院子。已经没有人去注意那些被人流冲到一边、紧靠墙壁站着的警察们了。

从院子里爆发出军火工厂和丹聂克工厂工人们的欢迎的“乌拉”声。雄壮地响起了革命歌曲《红色的旗帜》的歌声。人们唱着这支歌，心里充满了对于自己事业的信心。只有亚罗乌施·杨达克心不在焉地低声唱着。大伙刚刚唱完末了几句，他便喊了起来：

“有人打算从迦夫里奇柯伐亚街来进攻你们了！”

工人们开始建造街垒。他们把箱子、手推车拖到园子里，用它们来堵塞那个现在已经不用的、通电影院的旧出入口。此外，在大门里，在警察们的后方，大家又用箱子和一卷卷的纸张筑起了街垒。这样一来，那些拦断街路而此刻被截断后路的警察们和那些沿着院子的墙边站着的几小群警察已经不显得可怕了；他们明白工人们占着优势，所以就保持温和的态度，甚至还带着笑，观望着大家怎样把街垒建造起来。站在街上的警官看到自己手下的人软弱无力，就派了一个便衣侦探打电话到城里要求增援。

在通院子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个工人的侧影，那人朝静下来的群众叫喊道：

“各工厂的代表同志们！请立即到园亭里去开会。除了代表外，其余的人不准进去！”

接着，说话的人重又消失在屋子里了。

有着玻璃墙的木造园亭里很快挤满了人，于是，跟平日晚间

一样，这个昔日伯爵的暖花房便象路灯似的照耀着园子。有许多冲进人民宫的工人不是代表，他们就把脸孔紧贴在玻璃上注视着亭子里面的一举一动。他们等待着决议和号召。

代表会议的主席陀米尼克·迦夫林，化工厂的一个工人，走到台上。他宣布开会，并且简略地叙述了今天所发生的事件。随后，人民宫的领导人斯卡拉克议员发言。他刚开始讲话，便有一个胖胖的、秃头的汉子领着几个人打开门走了进来。东尼克不由自主地朝这方向回过头来，便注意到他们中间一个瘦瘦的、戴着阔边眼镜、样子象个其貌不扬的店员的家伙。“我在哪儿见过他？”东尼克的脑海里闪过了这个问题。突然间，他记起来了：这就是那个在跟普列栖德依谈话的时候硬要从汉堡把武器运来的特务。

这时候，有人从大厅的右边角落里喊叫起来：“有特务进来了！”大家的眼睛都转向进来的那一伙人。“我认识这个秃头流氓！”有人发出了呼声。工人们朝门口扑去。特务们企图逃跑，可是大伙儿把他们抓住，痛痛快快地揍了他们一顿，随后，把他们扔出门外。这个短短的插曲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许只会引人发笑，可是此刻却使大伙儿感到激动，弄得他们一时不能平静下来。

最后，大厅里静了下来，于是，斯卡拉克才能够继续讲他的话。他讲了还不到五分钟，就听到从院子里的不知什么地方发出喊叫的声音。人们震了一下，马上又挺直身子。大伙儿的头都转到那个方向。在通吉别尔恩斯卡亚街的大门里，警察冲过街垒，奔进了院子。参加集会的人们站起身来，喧嚷地推开椅子。从院子里传来短促的、尖声的叫喊——这是警告的声音。东尼克跳起来，朝门口奔去。忽然间，乒乓一声，玻璃被打碎了，框子格吱格吱地响了起来，亭子的玻璃墙哗琅哗琅地朝里面坍了下去。这是

警察们在院子里散开以后来进攻园亭了，他们用枪柄打碎暖花房的薄框子，冲进了园亭。另外一伙警察则从门里进入大厅，开始殴打工人们。群众狂怒起来了。东尼克朝警察们跳过去，抓住一个警察的喉管，避开了他的刺刀，把敌人往打碎了的玻璃墙上摔去。那警察一下陷进打烂了的框子里，上半身栽倒在园子里；他的两只脚则倒竖在大厅里。有人朝东尼克腰间击了一下，又有人把他推开。东尼克抓起椅子，重又向前扑去，打击敌人。椅子撞在枪柄上，又似乎撞着了谁的钢盔，于是就飞散成了碎片，在东尼克的手里，只留下了一块椅子背，他就用了这个武器来打击敌人。

四周闪现着警察的制服，狰狞的脸孔和张开的嘴巴忽隐忽现，刺刀发着光。东尼克不能自制地猛烈战斗着。他听见怒吼的声音，同时模糊地感觉到他的同志们正在跟他并肩作战。转瞬间，他看到一个枪托挥舞到他的眼前来，接着他感到头上挨了狠狠的一击，于是他的身子便摇晃起来，终于失去了知觉。他挥了挥手，就倒在一张翻倒的桌子上。人们越过他的身子跳来跳去。大厅里搞得混乱不堪。一支人流向狭窄的出口冲去，另外一支则朝舞台的入口冲。有些人穿过被打破的框子跳到园子里，手和脸都被碎玻璃给擦伤了。受伤的人们躺在地板上，在一些家具的碎片中间，可以看到一滩滩的鲜血。有两个同志拚命挤过去，抬起几个可能被人践踏的负伤者，把他们带到舞台上。可是这救命岛上的人挤得太多了，木头地板支持不住，舞台倒塌了。警察们跳过翻倒的椅子，殴打着人们的脑袋。大家东奔西窜，那个通小饭馆的狭窄的过道被人挤得水泄不通了。

还有一伙警察在人民宫的院子里活动。而在吉别尔恩斯卡亚和迦夫里奇柯伐亚街上的警察们则在赶散人群。枪柄和橡皮

棍象雨点一般打下来，响起了被殴打和被摔倒的女人们的号叫声。

东尼克不久就恢复了知觉。他醒过来的时候是躺在一张翻倒的桌子上，在他的膝头上放着一把椅子。他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电灯的模糊的轮廓。东尼克怎么也不能把它看清楚，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是什么道理：他的眼睛里浸满了血。他倚着桌子吃力地站起来。周围凌乱不堪。在一些翻倒的桌子和椅子中间躺着负伤的人们。有几个人在那儿奔来奔去。东尼克看到这一切仿佛都在雾里似的。远远地，大概从街上，传来低沉的声响，在这种静寂的气氛里，显得很古怪。"我们打败了，"是东尼克的第一个念头，"而周围是牺牲的同志们……"他想闭上眼睛，可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念头迫使他抬起身子来："现在怎么办呢？"

柯耳卞工厂的翻砂工人安东宁·克罗乌斯基明白：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在工厂里，在家里或者在战场上，甚至你受了伤倒了下来，你决不能呆着不动。这个念头有力地迫使东尼克站起来，虽然他的头部疼痛难熬。他站了起来。有人一把把他扶住。

"东尼克，我正在找你呢！"

这个人是亚尔达·杨达克。他的脸上有着伤痕。他带着东尼克穿过园子和空洞洞的庭院。只有几个警察疏疏落落地站在墙边。

"多么背信弃义的行为！"亚尔达反复说着。"多么可鄙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政府自己建议工人代表们开会协商，可是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却打发警察去攻击他们！这跟盖罗侯爵①的血

① 盖罗侯爵，德意志东方边区的藩侯，他在十世纪时曾残酷地镇压西斯拉夫人的反抗。公元九三八年，盖罗假装邀请斯拉夫族的三十个首领去缔结永久和约，结果却背信弃义地把他们杀害了。——俄译者

腥屠杀又有什么分别？”

他把东尼克领到排字房里。有人站在浸染血水的洗脸盆前面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其余三个人挨次序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把染满血迹的手帕紧按在自己的眼睛上。包扎的人显然是个医生，因为他很熟练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一个排字工人擎着一盏挂在长电线上的、可以移动的电灯替他照着。

在包扎的当儿，东尼克咬紧了牙关。

“您的皮肤撕破得相当厉害，”医生对东尼克说，一面把他头上的伤处缝合起来。“您得上医院去一趟。”

一些新受伤的人走进排字房来。

剧烈的疼痛使东尼克的思路打开了。

“这儿有没有党执委会里的人？”他愁眉蹙额地向亚尔达问道。

“有的，他们在那边，在编辑部。你身上觉得怎么样，东尼克？”

“还好，你自己看得出来。可是明天怎么样呢？”

亚尔达耸了耸肩膀。

他们上三楼，到编辑部去。在他们上楼的当儿，东尼克那条被打伤的腿剧烈地疼痛着，可是他没有露在脸上，生怕亚尔达会来扶他。东尼克对自己很生气，为了他在跟警察搏斗的时候太大意了。

他们在走廊上遇见了施密腊耳。他看到东尼克头上的绷带，便住了步，同情地望着受伤者。

“明儿怎么样，施密腊耳同志？”东尼克问道。

“你可是齐日考夫的克罗乌斯基同志？你头上是怎么搞的？”

“嗯，没什么……明儿怎么样?”

“亚尔达，”施密腊耳瞧了一眼东尼克苍白的脸孔，对大学生说道，“赶快把克罗乌斯基同志带回家去。用帽子把绷带遮上，免得出大门的时候被人抓去。”

“可是明儿怎么样呢?”东尼克重复问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还是回去躺躺，”施密腊耳严厉地说道。“别在这儿楼梯上走来走去。听见我的话没有?马上就回家去!”他的口气很严厉，但是在他的眼睛里却含着慈爱。可是正是这种同情的目光惹得东尼克生气了。血涌到他的脸上。

“别说蠢话了!”他喊道。“明儿怎么样?我应该知道这一点，我是柯耳卞工厂的工人代表。”

这些话听起来就跟他说:“我是第二师的师长”一样。于是施密腊耳便对这个战士的权利让了步。

“此刻我不能给你详尽的回答，”他说道。“一切口号都要提得合时，不能早一分钟，这是你知道的。事情很严重。明天早上你会在报上看到口号的。明天我们大家在国会大厦那儿集合。现在，你回去，知道吗?”

“好吧。”

东尼克和亚尔达经过站在大门口的警察身旁，走到了夜晚的街道上。天又冷又潮湿，在城市上面悬挂着凄凉而阴暗的天空。人民宫周围静寂无人，只能看到警察的巡逻队。东尼克和亚尔达徒步向齐日考夫走去，因为他们断定:在电车里，东尼克头上的绷带可能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东尼克拧着眉头，默不作声，竭力不让自已瘸着腿走路。而亚尔达的脑海里总是盘旋着这些血腥的话语:“叛变!”“父亲叛变了!”

当他们走到叶赛尼奥伐街那所房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

一点半了。就在这时候，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仿佛进入夺得的堡垒似地走进了人民宫的大门。警察们为他们让开路，然后，又笔直立正，好象仪仗队似的。走在最前头的是身躯高大的佛蓝季歇克·索乌柯普，在他后面是老安东宁·聂密茨，随后是迦勃尔曼、斯季文、宾尼尧魏茨、[①] 柯乌杰耳卡。[②] 他们走过空洞而沉寂的院子，走在那洒满工人鲜血的铺道上，他们一面走着，一面被新的环境弄得有些困窘，同时又为他们社会地位的崇高而稍稍感到激动和骄傲：他们正在创造历史，虽然因此而不免造成流血。在领袖们后面，走着一小群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者，还有十五个特务跟他们在一起，其中有五个是不久以前在园亭里挨过打的。率领这批特务的又是那个秃头的胖子和戴眼镜的、虚弱的、样子象个店员的家伙。

这十五个特务此刻在这里就象戏院里跑龙套的那类角色：他们奉命在这晚上担任愤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角色，而他们果然扮演得非常巧妙。在领袖们进入人民宫一刻钟以后，他们就冲进编辑部，驱逐了那儿的《红色权利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把年迈、孱弱的老诗人安东宁·马采克拚命往墙上一推，并且把施密腊耳拖下楼梯，撕破他身上的背心和衬衫。其中最凶暴的是东尼克以前在园亭里认识的那个戴眼镜的家伙。

快到半夜的时候，人民宫重又受自己的“合法的”所有者的支配了。

契尔内依总理和波德格腊兹基部长还在内政部的办公室里熬夜。他们喝着咖啡，吸着雪茄烟。接到报告警察袭击人民宫的最后结果的电话之后，总理就打电话到共和国总统的私邸里，

---

① 法兰季歇克·宾尼尧魏茨(1875—1944)，捷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

② 杨·柯乌杰耳卡(1889—1942)，捷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

简略地向他报告了一切。随后，他便放下听筒，挺直了腰板。

“可是明天怎么样呢？”他说道，朝波德格腊兹基看了一眼。

“大概会是很紧张的一天，”那一个回答说。

“还需要下什么命令吗？”

“我看，不用了。”

“您想明天会发动总罢工吗？”

“是的。”

他们吩咐听差给他们拿来皮大衣，然后，下楼上了汽车。他们的“工作日”也结束了。

大学生亚尔达陪同志到了大门口，在东尼克还没有自己动手之前，就按铃叫看门人。

“我送你到家里。”

“不用！你不是看到我好好的在这里。回家吧！”

他们互相告了别，于是，东尼克便扶住栏杆上了楼。他在黑暗的房间里悄悄地脱了衣服，免得弄醒安娜。但是她感觉到他在这里。

“是你吗，东尼克？”她睡意蒙眬地问。

“是我。你睡吧！”

“可是我们这儿为什么有股药味道？”

“没有的事。我刚才在编辑部里。睡吧，安娜，我也想睡了。”

他在沙发上躺下，可是睡不着。明天，明天，明天！明天，他工厂里的工人们要上国会大厦去！明儿怎么样？战斗！

东尼克记起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十月革命时期所作的指示：“不应该在那些警察或军队易于控制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地

点集合。对付任何一个号召大家这样做的人，就应该象对付奸细或者糊涂虫一样……"

此刻，当东尼克躺下的时候，他脚上的疼痛加剧了。"对付那些进攻的哥萨克，只需安置一些个别的射手，这些个别的射手在进行了几次射击以后，就可以躲到屋子里，然后越过围墙，出现在另外的街道上。不要忘记：兵士们是我们的弟兄，只要对军官们射击；可是不要饶恕哥萨克，他们手上沾到的工人的血太多了！"

睡着的安娜在床上平静地呼吸着，靠近她，在放衬衣的筐子里，躺着他们的儿子。他已经不会是个象他父亲那样的战士，而将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为了对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敬意，他们给他取名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在它的钟楼上飘扬着红旗。全世界无产者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儿。"我也要向列宁报告布拉格的情况……"

东尼克在发烧，他头脑里这么混乱是否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大概是的，大概是的，因为他从来也没有病过一次。他的脸上发烧，仿佛他贴近那盛着熔化金属的勺子站着似的。东尼克在被子底下翻来覆去。"明天，"他想着。在他的记忆里，异常清晰地出现了今天的情景。瞧，爱达·伏烈耳在工厂的院子里奔来奔去，叫喊着："丢开活儿！"……瞧，工人们的行列向人民宫行进着，他们的脚步声在夜晚的街道上清彻地轰响着……在大门里，在警察们的背后，同志们在筑着街垒……警察们用枪托击碎园亭的玻璃墙——呀，玻璃发出多么刺耳的叮当声！——于是，他们便闯进了大厅……"事情会很严重，"施密腊耳说道。"明天，你会在报上看到口号的。"明天，明天！"那些岗警们，如果他们不反抗的话，只需解除他们的武装，但是秘密政治警察却必须歼

灭！”彼得格勒苏维埃号召说……是的，东尼克一定是在发烧。他头晕，嘴里发干。但愿不要因此而睡过头，误了事！但愿不会睡误了事！要是柯耳卞工厂出去的队伍里没有东尼克的话，那该是多么可耻的事！

夜晚象飞一样地溜走了。

“东尼克！”

吃惊的声音打断了东尼克的乱梦。他颤了一下，便张开了眼睛。天已经亮了。

“东尼克！”

安娜站在他前面，她的眼睛里含着恐惧的表情……

“你是怎么回事，东尼克？！”

婴儿在筐子里哭起来了。

“什么时候了？”

“还早，有时间。求求你说出来，你出了什么事？”

安娜抓住了他的手。

“哎，没什么，昨天我在人民宫让警察给打了。有个医生替我包扎了一下。没什么，你自己看得出的。战斗就要来了，安娜，”东尼克说道，一面急急忙忙地穿着衣服。头上的伤剧烈地疼痛着。

“什么战斗，东尼克？”

婴儿啼哭着。

东尼克惊奇地朝安娜看了一眼。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东尼契克，”她吃惊地答道。

东尼克咬紧了牙关，穿着衣服。他用几句话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战斗就要来了，安娜！”他喊叫起来，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

可是奇怪的是：东尼克的激动却并没有传染给安娜。孩子在筐子里啼哭着，同那些饥饿的婴儿一样单调而执拗地啼哭着，而安娜时不时地把吃惊的目光从筐子上转到丈夫扎着绷带的头上。

“你可是准备上大夫那儿去，东尼克？我早饭还没有弄，你别着急，时间还早。我马上给孩子喂了奶来弄。”

他重又惊奇地朝她看了一眼。

“上大夫那儿去？”他反问道。

两双眼睛疑惑地对望着。“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淡蓝色的眼睛不安地询问着；而钢样发光的灰色眼睛却似乎在说：“怎么能不出去？”

“难道你准备上工厂去吗？”安娜叫了起来，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然要去。”

“你不准上那儿去！”她突然激动起来，向丈夫扑去。“我不放你走！”

“你不了解我，安娜。战斗开始了。革命开始了……”

她抓住他的双手，眼睛紧盯着他的脸孔。

“那么你……你是要到街上去吗？”

“当然！”是平静的回答。

安娜走到门跟前，背贴着门站着。

“不……”她简截地说道。

在这个“不”字里包含着一个女人保卫爱人的决心和一个母亲卫护自己的孩子的热情。安娜的“不”跟东尼克所说的“是”和

"不"一样的坚决，跟柯耳卞工厂的钢一样的坚强。

"别傻，安娜，"东尼克依旧抑制着自己。"要是你没有孩子的话，你也应该跟我一起去的。"

"不，"她重复说，呆呆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

"你疯了！你难道把我当作叛徒吗？"东尼克的眼睛由于这个可怕的词而愤怒地闪烁着，声音也变得严厉了。他走到妻子跟前。

"放我走！"

"不！"她拚命叫道，声音压倒了饥饿的婴儿的啼哭声。

东尼克用自己结实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握紧，然后顺手把她从门边推开。可是安娜即使在发脾气的当儿，仍旧保留着女性的狡黠：在这以前一分钟，她就把手放在背后，悄悄地从锁孔里抽出钥匙，把它藏在短罩衫下面。

"钥匙在哪儿？"东尼克拉着门，叫喊着。

"不知道。"

这时候，东尼克冒火了。

"给我钥匙！"

"不给！"

东尼克抓住安娜的衣领，揉皱了她的短罩衫，把妻子拖到自己跟前。他的眼睛射出了绿色的、闪电般的光芒。安娜在他身上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可怕的目光，她胆战心惊地确信：他是在把她看作一个外人，一个阶级敌人。同时，他会象对付阶级敌人似地对付她的！他会把她推倒，扔在地上，抓住她的头往墙上撞击，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瞧他马上就要来打我了，"安娜想道。可是东尼克眼里的绿色、犹如闪电的光芒蓦地消失了。

"别使我冒火，安娜！你可知道什么叫做叛徒或者女叛徒？

你可知道什么叫做反革命分子?”接着，仿佛受了这些可怕的话语的鞭策，他又喊叫起来:“钥匙!”

“不!”她低声嘟哝着。即使在软弱无力的时候也不屈服。“瞧他马上就会把我弄死的，一定会把我弄死的!”她望着丈夫的眼睛，想道。

但是东尼克并没有弄死她。他放松了安娜，把帽沿拉到眼睛上面，然后就向房门奔去。他双手抓住把手，双脚支在地上，把门一拉。第一下!——门格格地响了起来，可是打不开……东尼克又拉了一下，于是通厨房的门就喀嚓一声飞开了，弄得他几乎站不住。

他头也不回地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安娜茫然若失地站了几秒钟，随后就朝楼梯冲去。

“东尼克，亲爱的!”她绝望地叫喊道。

她走下几级楼梯，就住了步，开始慌忙地顺着楼梯上下奔跑着。她的亲爱的人走掉了，必须要跟着他跑。可是背后又有婴儿在啼哭，一定得回到他那儿去。安娜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她的膝头发软，就绝望地坐在梯级上，垂下头哭了起来。她的肩膀抽搐着。

可是，蓦地，在她的头上发出一种轻蔑的声音:

“啧，啧，伯爵夫人，好不害臊!啐!”

安娜抑制了自己，站起身来。她看到了庆奇伐罗娃的冷冰冰的目光，她正站在安娜面前，两只由于洗濯而发白的手叉在腰间。

“啐，好不害臊!”她重复道，而这些叱责的话语就好比一桶污水。

安娜奔到自己屋子里。她从筐子里抱起婴儿，把奶凑到他

嘴里。孩子贪婪地把它抓住，于是他的猛烈的哭声便立刻停止，而变成了咂咂的吮奶声。可是过了一会儿，安娜就忘记了儿子。她的目光注视着空间。东尼克，东尼克！她明白：她应该到他那儿去，她知道自己不能离开他，不能把他交给任何人。她应该保护自己的丈夫，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孩子！在她的心里，农村妇女的意识重又抬头了，在乡村里，每个人都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那些从千辛万苦中得来的东西。东尼克，东尼克，东尼克！

安娜不能马上跟着东尼克跑。索奶的小嘴和那从她自己的乳房里流入婴儿体内的奶流迫使她留在床边。可是安娜在想象中已经追上了丈夫。她心里激动不安，而她的这种不安的情绪同时传给了孩子。

庆奇伐罗娃没敲门就径自打开门走了进来。她重又把发白的双手往腰间一叉，目光照例是冷冰冰的，而声音特别愤激。

“您不害臊吗？这样看来，您是舍不得我们的男人为了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争一块面包而到街上去打架了。我的男人也在那儿，是我自己叫他去的。要是他不去，我准朝他脸上吐口唾沫。他们一辈子在做什么，这些汉子们？什么也没做！可是我们女人倒象牛马样的干着活儿。我们！……唉，您倒是还好……”她气冲冲地添上一句。“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我的那一个耍着粘土混日子，您的呢，玩玩模型罢了。让他们今天去跟警察比一比力气吧！这样做从前有过好处，现在也一样有好处。可是您真丢脸，克罗乌斯卡雅！”

安娜用了满含泪水的眼睛对她望着。

“喂，您干什么哭哭啼啼的？”庆奇伐罗娃厉声问道。

“我不再哭了，庆奇伐罗娃婶子。”

女邻居到自己屋里去了。安娜喂饱孩子，就开始在房间里

踱来踱去，哄他睡觉。在从窗子到拆毁的厨房门之间走来走去的当儿——来回九步路——她觉得自己在思索着，打着主意……最后，她决定了。可是这是一种错觉。她之所以这么匆忙而性急地哄儿子睡，是因为她早就已经有了主意。安娜把睡着的孩子放在筐子里，然后自己迅速地穿好衣服。她不想吃早饭，因为东尼克也是没吃早饭走的。安娜只去找了庆奇伐罗娃。

“庆奇伐罗娃婶子，”她说道，“弗洛佳①睡着了。要是他哭了，麻烦您上我们那儿去瞧一眼。”

庆奇伐罗娃的孩子们，鲍仙娜和在四年级读书的儿子正从厨房里拖出草褥子，准备把它放在女寄宿者的床铺上。

“快些，快些！”母亲对男孩子嚷道。“要不，就得迟到了！”她不满地转身朝安娜。“您上哪儿去？”她斜眼瞅着安娜问道，但是目光里并没有敌意。

安娜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游行的人，于是就问道：

“可是他们是上哪儿去的？”

“不知道。大概是上旧城广场去的。我丈夫清早提起过。《红色权利报》今天不出，可是，听说出了张传单。不过我们报贩那儿没有。您上广场去干吗？”

“找东尼克。”

“给我房门钥匙，”庆奇伐罗娃皱着眉头说。“要是孩子哭了，我会把他抱到自己房里来的。”

安娜走了。

黎明时分，叶赛尼奥伐街上铺满了雪，可是，因为天气不冷，它就融化了。安娜急急忙忙走到市中心。在一条邻近的街道上，

---

① 弗拉基米尔之爱称。

她拿到了一张代替《红色权利报》出版的传单。传单的标题是这样的："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工人们！"而这个巨大的黑色标题使安娜充分地意识到了时机的严重性。"……我们将以总罢工来答复这次事件！"传单里接着写道。

安娜的心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了。包括东尼克在一起的工人们流了血。安娜急速地读完了传单。

我们对于这次暴行的答复
是有力而坚决的：
宣布总罢工作为抗议！

安娜明白总罢工的意义。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她跳上了去旧城广场的电车。所有的乘客都在埋头读报，因此，车厢里的谈话就比往常少了。去办公的官员们已经一连好几个星期在自己的报纸上读到关于共产党人准备在布拉格制造流血事件的报道。此刻，他们惊惶地从同路的乘客那儿拿到上面写着宣言的传单，同时就想起了他们打算买给自己的孩子们作为圣诞节礼物的兔子皮袄，想起了那可能到手的美国火炉，如果商人肯把分期付款的数目再减少五十克朗的话。车子驶过市中心的当儿，安娜老是望着窗外，瞧瞧有没有地方聚着人群，或者，即使有一小群工人也好。可是随便哪儿都看不到工人们。就这样，她到了广场。那儿空无一人。安娜还是下了电车。在人行道和电车轨道上，融雪已经成了雪水，只有在杨·胡斯和他的门徒们的铜像上，它还保持着初降的白雪的形状。这阴湿的日子不知怎的令人想到了死刑。

安娜朝国会大厦走去。那边也空无一人，又静又冷。

东尼克究竟在哪儿？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安娜着慌了。她模糊地感觉到：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前，她也曾象这样站在街道上，毫无办法，不知向谁去求援。

一个愉快的女人声音朝她喊道：

“你可是彼格尔齐莫夫来的安娜？”

在安娜前面站着一个穿豹皮大衣的身材苗条的漂亮太太，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

“达德拉小姐！”安娜吃惊地叫了起来，突然间想起了她有一次怎样束手无策地站在街道上。这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把鲁箕带到我这儿来，”当时，就是这位小姐对她说道。“要是他不在那边，你就到某处，到某处，再到某处……”可是，今天上哪儿去找东尼克呢？

“生活过得怎样，安娜？”

“谢谢，小姐，很好。”

“我已经不是小姐了……你难道没有在报上看到我结婚的消息吗？”

“没有。”

“我已经同乌尔邦先生，一位银行经理结婚了。”

达德拉微笑着，在她的眼睛里闪现着淘气的光芒，仿佛她差点就要说出来：“要不要巧克力糖，安娜？”

可是达德拉谈起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的丈夫知道你丈夫。他不是个共产党员吗？”

“是的。”

“喔，对，我记得，”达德拉重又笑了一笑。她怀着善意的好奇心打量自己以前的女仆，这使安娜很不痛快。

“你的样儿不大好。你住在我们那儿的时候，你的面色要好

些。你有孩子吗？”

“有。”

“回家去吧，安娜，”达德拉带着安娜非常熟悉的命令的声调说道。

安娜询问地对她望望。

“走，走，”年轻的银行家夫人不住地笑着，吩咐道。“不要放你丈夫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人家今天要对你们开枪了。”

“嗳呀，天哪！”安娜吃惊地望着达德拉美丽的脸庞，绝望地双手抱住头，叫道。

上哪儿去找东尼克呢？！

安娜呆呆地望着美丽的太太，蓦地，这位太太开始在她的眼睛里变了样。她已经不是那个举止高贵、手里拿着巧克力糖的达德拉小姐了。这样的达德拉早就不存在了。她已经不是那个警告安娜、因而泄露自己阵营的计划的殷勤的太太了。在这空气潮湿的十二月的一天，安娜看到了阶级敌人的恶毒的嘴脸，这个敌人太软弱了，以致不能自己拿起枪来射击；太胆怯了，以致在这血腥的时分不得不装做一个亲切的朋友和善意的忠告者。可是，正是为了这衬着樱桃色绸里子的豹皮大衣，东尼克今天将会受到射击！正是为了这时髦的皮鞋和丝袜子，工人们将要遭到杀害了。正是为了这漂亮的帽子、美国手套和银行家夫人胸前佩带的五颜六色丝质的假花，工人们昨天流了血！在安娜的脑海里闪过了早就被遗忘的往事：疲弱不堪的泥水匠妻子把“捷克之心”所赠的东西丢到女慈善家——建筑师太太的脚下。同样，安娜仿佛感到：在达德拉的眼睛里含着恶意，而她的微笑是佯装的……

于是，安娜的目光也改变了，胆怯和惊惧从她的目光里消

失，她的眼睛燃烧着，表现出坚定的神情。昔日的女仆挺直了腰干，仿佛她变得高过了自己的身材。她的窘态消失了，她怀着敌意，严厉地说道：

"你们要对我们开枪吗？我们也会这样对付你们的，太太！"

接着，她就转身走开了。她已经明白自己应该上哪儿去。不是到东尼克那儿去，而是到工人们，到自己人那儿去。因为东尼克此刻无论在什么地方——跟安娜并肩一起或者离开她很远，他总是跟自己的阶级在一起。跟自己的阶级在一起！跟那些使她有了爱人和丈夫、家庭和孩子，并且在她艰难的时候永远站在她一边的人们在一起。

她要上工厂去！

于是安娜便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电车站走去，不去理会那个气得脸色发白的优雅的太太。多么忘恩负义，多么傲慢无礼，这些无产者真是太没良心了。这个仆人居然那么粗暴地回答她，回答这样的一位太太：她由于心地良善而破坏了对丈夫的诺言，想要拯救安娜和她的丈夫的生命，而生命乃是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

"贱货！"达德拉在安娜背后恶狠狠地骂道。

安娜向工厂走去。她已经不再恐惧和惊慌了，她的内心充满了决心。当电车驶到卡尔林区的时候，安娜远远地瞧见工人的游行队伍。于是她的心便激动而欢乐地剧跳起来了。是的，这是他们，这是同志们！电车里的乘客们从位置上站起来，张口呆看着窗外。安娜跳下了车子。

同志们在行进着。瞧，他们在这儿！

瞧，齐日考夫的无产者们擎着红旗在前进。在他们后面是卡尔林和里卞，高列萧维采和维索羌内区的无产者们。千万个

群众，严厉而沉默地在城里行进着。这些黑压压的坚强的行列是从纺织工厂、磨坊和面包房、家具作场和锯木厂、煤炭和木柴堆栈、翻砂车间和车厢制造厂、机械和化学工厂、火车站房和运输库里出来的。这是工人们，这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可是他们强过任何自发的力量，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工人们成千次地受到挫折，成千次地流了血，可是他们还是坚信自己必胜，重新向前冲锋。在这十二月的日子里，对新制度的理想把他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在他们的头上飘扬着鲜红的旗帜。游行者的行列在整个街面上行进着。道路由于他们的脚步而震动起来了。

一个女人迎面向游行的队伍奔来。这就是安娜，金黄头发的安娜。

“柯耳卞工厂的人在这里吗？”她叫喊道。

“在这里！”有人回答道。

安娜退到墙边，人群在她身边流过，成千的脸面飘了过去。安娜用目光找寻着柯耳卞工厂的人。一个青年朝她奔来。

“安娜，你在这儿？”

这是亚尔达·杨达克。他高兴地握握她的手，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第一次称呼她“你”。

“亚罗乌歇克！”

安娜和亚罗乌施站在行列里，加入了游行者的队伍，与它汇合起来了。

“可是东尼克在哪里？”

“他跟几个同志被派到前面去了。党执委会一早就在国会大厦内开会。我们现在就上那儿去。”

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城市里行进着，他们的脚步声在许多房

屋中间轰响。屋顶上积了一层雪。商人们把铁帘辘辘地放了下来。

游行的队伍进入旧城广场。目的地到了，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血液就沸腾起来了。他们的血液象一条洪流似地流动着，愈流愈急，愈流愈快……人群有着同一的脉搏，它以同一的节拍跳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头象一个人似地昂起着。脚步更响了。成千的声音象一个声音似地歌唱着：

打倒暴君，扔掉枷锁，
丢弃旧日奴隶的桎梏，
我们要向大地指出新的道路，
劳动将要变成世界的主宰！

工人之歌变成了战斗的歌曲，它变成暴风雨般的、森严的合唱曲向上飘扬，它震动着旧城广场古老建筑的围墙，从市政厅哥特式的窗子和顿斯基寺院的石板上响起了回声。这支歌曲无数次地被历史的回声重复着，现在它飞上塔顶，然后从它们的尖端飞入那满布乌云的天空，在那儿变成暴风雨和闪电。

无边无际的世界泛滥着泪水，
我们的全部生命就是沉重的劳动，
可是那不可避免的一天，
那严酷无情的审判，
终将来到。

先头部队的红旗已经飘过了圣·米库拉施教堂，而后面，远

在采列特那亚街上，歌曲的叠句声还不曾消失：

我们的血，工人的血，
在红旗上火似地燃烧！

“同志！”有人迟疑不决地扯扯安娜的袖子。“你的丈夫不在这儿吗？他在哪儿？”

安娜虽然不认识这个使人不快的、戴眼镜的家伙，可是她觉得他很可疑。她想叫亚尔达，可是那家伙觉察了这一点，晓得势头不对，便溜进后面的队伍里去了。过了半分钟光景，安娜又看到了他：他走出队伍，迅速地消失在侧面的街道上了。

游行者在卡普罗伐亚街上行进着。离开这儿五百步左右，在国会大厦前面，在有着圆形花坛的广场上——那花坛此刻蒙着一层薄薄的雪——工人们在举行集会。不到两个钟点以前，安娜和达德拉在这同一广场上谈过话，那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此刻，半个广场挤满了人。可是，这儿只有从对岸斯米霍夫过桥来的工人们。在符耳塔伐河的对岸，工厂很少，因而多数的游行群众还刚从齐日考夫、卡尔林和里卞区走过来。他们马上就要到卡普罗伐亚街了。

在国会大厦的栏杆上站着讲演的人。这是老施屠尔兹，革命运动的老战士，曾在牢狱里度过不少岁月，他已经六十二岁了，可还是个跟二十岁时一样热情的革命者。

“总罢工！我们只能用这个办法来答复昨天的流血事件！”他号召说。

全场报之以暴风雨般的赞同声。

在国会大厦里，在社会民主党的办公室里，党执行委员会正

在开会。可是，就连这儿，政府也派了警察来：装璜着两只石狮子的大门里站着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而在广场的东面可以看到武装的队伍，他们在静静地等待着。戴眼镜的那个家伙走到警官身边，不知报告了些什么，接着就匆匆地走开了。

广场上的人群微微震了一下。人们紧张地倾听着，等待着什么。从旧城广场那儿传来了歌声。

站在栏杆上的讲演者在讲着重要的事情，可是他的话语消失在潮湿的空气里，人们已经不在听他了。从卡普罗伐亚街传来了歌声！大伙儿的头都转到那个方向去了。

在卡普罗伐亚街上，歌声轰响着。

工人们的歌声在轰响着！

游行者挤满了整条街。大布拉格① 的无产者正在向这儿行进着！在他们的头上飘扬着红旗。战斗的红旗在千万人的头上欢跃着。乌拉！这是多么伟大的时机！

旗手把手里的旗杆抓得更紧，把旗子擎得更高了。旗面完全展开，迎风啪哒啪哒地飘响着。前面的行列加快了脚步。安娜和亚尔达站在最前的队伍里，靠近旗手那儿。

广场上的工人跑来迎接游行队伍。

在这个时候，警察出动了。他们从掩蔽物底下跳出来，散开，然后也向着游行者迎过去，手里紧握着橡皮棍子。他们想阻挡两条人流汇合起来。

可是警察们迟了几秒钟。在他们背后有一群人从广场上冲来，而在他们前面，有着从卡普罗伐亚街涌来的人群。瞬息间，警察被夹在迫近前来的两堵人墙中间了。人群推挤着，激动着。

① 指布拉格和它的郊区。——俄译者

可以听到高喊声。最初的打击朝人们的头上袭来，警察的橡皮棍子和游行者的棒在空中闪现着。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块砖头，一个警察双手捧着脸孔。格斗开始了。

突然间——噼啪……噼啪……噼啪！……——警察拔出手枪，开始射击了。

噼啪……噼啪……噼啪！……——这声音听上去并不可怕，甚至有些象玩具手枪似的毫不足道。安娜并不感到害怕。

噼啪……噼啪……噼啪！

“我们的人看来也在射击，”安娜思忖着。

红旗突然异样地摇晃起来，接着就向地上倒去。旗手向前仆倒了。亚尔达·杨达克奔到旗子那边，高高地把它举了起来。“乌——拉！”他叫喊着。他的眼睛睁得圆滚滚的。

警察笔直朝他的脸孔射去。稠密的人群还拥着这个被一枪打死的大学生走了几秒钟，随后，他就仆倒在融雪上了。

人群时而把安娜挤到前面，时而又把她挤到后面，把她带往什么地方，然后又把她拖向后。蓦地，安娜看到警察们从石头走廊下面奔出来，端着刺刀，在广场上跑来跑去，拚命想驱散人群，把他们赶上桥。那儿也在进行着血腥的屠杀，枪声砰砰地响着。人群已被驱走的广场上那块白色空处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小。在雪地上，躺着负伤的人。可是安娜并不害怕，她仿佛觉得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不真实而遥远的。

人群重又拥着她走。她现在已经在侧面的街道上，在激动的人们中间。这里松动了一些。可以听到后面的脚步声和叫喊声，随后又砰砰地发出了几下枪声。

“这儿我们是通不过的，”有一个站在安娜旁边的人叫道。“得过列吉依桥，顺着对岸走。”

人群急急忙忙在空旷的街道上奔跑着，安娜跟着大家一起跑。人们喘着气，从跑步转成了步行。他们在那些还蒙在鼓里的行人旁边行进着。他们拧起了眉毛，顽强地走着，在他们发亮的眼睛里，战斗的火焰在燃烧着。他们象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地行进着。

他们迈着迅速的步子过了桥，然后沿着对岸急急忙忙地走向国会大厦。

街道上挤满了人。人群在电车的三个车厢旁边沸腾着——这是那些被警察从国会大厦那儿赶走的工人，他们拦住电车，从那儿拖出企图钻到人群后方的警察们。工人们抢去警察手里的橡皮棍子，拖住他们的衣领，用拳头结结实实地捶打着。警察们甚至没有自卫，他们只用双手护着眼睛，一心打算溜掉。地上到处散乱地丢着他们的钢盔。

跟安娜一起跑来的游行队伍截断了警察的去路，把他们推到房屋的墙边。安娜停留在街道的中央。

“东尼克，东尼克同志！”她挥挥手，喊道。

东尼克抓住了那戴眼镜、样子象个容貌丑陋的店员似的家伙的衣领。他把这个特务从自己身边扔出去，随随便便地一扔，仿佛他不屑用出自己无产阶级的全部力气来对付这个卑鄙的流氓似的。

“安娜同志！”他喊叫起来，迎面向她跑去。

从斯米霍夫的什么地方传来枪声，比警察的手枪的射击更响，更集中。大概这是兵士们在射击。

“他们在陵格霍费尔工厂开枪了！”有人喊叫着。

人群朝那儿冲去。

东尼克和安娜在前面奔跑着。他们的脚步声在街道上震响

着。

前进，前进！

他们肩并肩地奔跑着。

前进，前进！

安娜的故乡，那补缀着洋铁皮的小屋顶，洋铁皮上面画着一只正在展翼飞向全世界的鸽子，那长满薄荷的田埂，那田野里的杨树，这一切都远远地、远远地留在后面了。那鲁别施家的厨房和达德拉小姐的玫瑰色的闺房也远远地留在后面了。在城市的另一头，留下了叶赛尼奥伐街……

前进，前进，东尼克和安娜！

后　记

伊凡·奥勃拉赫特是捷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无产者安娜》是他的代表作。

伊凡·奥勃拉赫特(原名加米尔·济曼)于一八八二年一月六日生于波德克尔康诺什耶的工业区赛米里。他的父亲安塔耳·斯达歇克是捷克有名的作家,以律师为职业,在工人同厂主的斗争中,这位律师总是卫护工人的利益。他教导他的儿子要爱人民,尊重人民的文化。

在中学读书时代,奥勃拉赫特认识了捷克工人运动的先驱伊奥捷夫·烈兹列尔,接近了工人们,开始参加他们的集会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九二一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捷克文。同时,他还读了不少文艺作品,他十分喜爱世界各国具有人民性的古典作品和高尔基等革命作家的作品。

一九〇〇年,奥勃拉赫特进了布拉格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毕业后,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当了新闻记者。

一九二〇年,奥勃拉赫特曾去苏联六个月,写了《现代俄罗斯写照》一书,其中叙述了作者好几次见到列宁的动人情景。

二十年代,捷克工人运动的队伍发生了分裂。奥勃拉赫特积极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左翼同该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所作的斗争。一九二一年五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奥勃拉赫特是

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参加了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首任编辑委员会。由于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因而经常遭受迫害，并且不止一次地坐牢。

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他参加了反侵略的抵抗运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奥勃拉赫特于一九四六年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奥勃拉赫特逝世。

奥勃拉赫特先后经历了奥匈帝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两个黑暗的历史时代，他的作品的主题大多是讽刺、揭露和鞭挞奥匈帝国和捷克资产阶级政权的残酷统治。他的报道、特写、随笔和中短篇小说主要收在《愤世嫉俗的人》（一九一三）、《奥匈帝国和共和国时期九篇动人的小说》（一九二七）和《无名之地》（一九三一）等几个集子中。长篇小说除了《无产者安娜》（一九二八）外，还有《最黑暗的牢狱》（一九一六）、《艺人叶赛尼奕的奇怪友谊》（一九一九）和《侠盗尼古拉》（一九三三）等，其中以反映农民自发斗争的《侠盗尼古拉》写得最为出色。

在奥勃拉赫特的早期作品中，他还是站在一般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来描绘现实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往往近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抗。经过在现实斗争中的不断磨练和思想、创作上的许多探索，奥勃拉赫特的世界观才逐渐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这种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无产者安娜》之中。

长篇小说《无产者安娜》是以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前夕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为基础的，它反映

了捷克工人运动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当时，资产阶级勾结了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后来改组为共产党）；但是捷克劳动人民不畏强暴，坚决起来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部小说中，奥勃拉赫特在捷克文学史中，第一次创造了有组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集体的形象。他们已经不是奥勃拉赫特的前辈所写的文学作品中那些被剥削得喘不过气来的"无法自卫的奴隶"了。奥勃拉赫特笔下的工人们深深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政府的卑鄙无耻和反动性，认识到"他们，工人们，是世界上万物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凡是由他们的手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应该属于他们"。"对新制度的理想把他们大家团结在一起"，使他们不怕流血和牺牲。他们虽然"千百次地受到挫折，千百次地流了血，可是还是坚信自己的胜利，重新向前冲锋"；书中描绘了工人们为了保卫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所在地——人民宫，不让它被警察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占领，赤手空拳地与警察展开肉搏战，那一幕激动人心的情景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

在这部小说中，奥勃拉赫特还在捷克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前景的先进工人的形象——东尼克·克罗乌斯基。东尼克已经不是奥勃拉赫特的前辈笔下那种被饥饿压倒、找不到出路、听任资本宰割的工人典型了。他乃是自觉的、最先进的、有组织的社会阶级的代表。残酷的现实使他认清了一九一八年在捷克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奥匈帝国完全是一丘之貉，两者都同样敌视人民的利益，同样是劳动人民凶恶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无产阶级要摆脱奴役和贫困，只有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需要无产阶级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东尼克认为自己与无产阶级集体

是不可分的，他个人的一切应该完全服从集体的利益。本书末章所写的东尼克与妻子安娜发生冲突的情景正是他的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东尼克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他也珍视家庭的幸福；但是，对他来说，无产阶级集体的利益比自己家庭的利益更为重要。因此，当妻子由于他前一天曾与警察搏斗，以致头部受伤、发着高烧而阻止他去参加工人们的示威游行时，他的眼睛“愤怒地闪烁着”，安娜“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可怕的目光”。他毅然把她推开，奔向游行队伍。他的这种高度的阶级觉悟在工人群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农民出身的安娜——他的爱人。

如果说东尼克这个新人的形象写得还不十分丰满的话，那么，女主人公安娜——新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却是非常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奥勃拉赫特细致而深入地描绘了她的成长过程。安娜本来是个心地单纯的农村姑娘。当她刚到布拉格的富翁——建筑工场主鲁别施家去做女佣的时候，她的阶级意识尚未觉醒。在她身上还带有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弱点和一个长期受压迫的农村妇女的胆怯心理。她曾为主人们表面上的“好心肠”所迷惑，曾满足于暂时的温饱。骨瘦如柴、濒于绝境的泥水匠的妻子愤怒地拒绝“慈善协会”副主席鲁别施太太的“恩施”，并且有力地揭穿鲁别施夫妇的狡诈、伪善面目的那一幕，促使安娜对主人们的“好心肠”产生了怀疑。与先进工人东尼克的相遇，形成了安娜生活中的转折点。她开始与东尼克一起参加工人的集会。起初，集会中有些工人所讲的话她并不能完全了解，但是，却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很自然地感到她和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语言”同时也成了安娜与东尼克之间爱情的基础。在东尼克和其他工人的影响下，安娜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她对主人们

的“好心肠”越来越感到怀疑，不再满足于暂时的温饱，开始想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正如那个泥水匠的妻子所说的：“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布施，我们要拿到自己该得的一份！”同时，主人们的自私和贪婪也在她面前暴露得越来越清楚，这更使她体会到她和她的主人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当她怀孕已经几个月、眼看就会被主人们撵走而又归不得老家的时候，与她和东尼克素不相识的齐日考夫区的一百五十个工人自动伸出了援助的手。他们下班以后，不顾一天工作后的劳累，以集体的力量帮助这一对爱人从投机商人手中争取到了房子，使他们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家。这件事使安娜这个比较实际的农村姑娘进一步体会到自己是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一员，体会到工人们是她的亲人。日益提高的阶级觉悟使安娜慢慢地克服了农民的小私有者的意识和一个长期受压迫的农村妇女的胆怯心理，最后，终于受了东尼克的革命热情的感染，坚决地参加了与资产阶级面对面的斗争。当鲁别施小姐在安娜参加工人游行示威前几分钟警告她，反动政府要对游行的工人们开枪的时候，她这样回答道：“你们要对我们开枪吗？我们也会这样对付你们的！”通过了以上的描述，奥勃拉赫特以感人的艺术力量，指出了参加工人运动怎样教育了安娜，怎样指导她的生活走上新的道路。

在塑造先进工人的形象的同时，奥勃拉赫特还把捷克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们的反动面目描绘得维妙维肖，特别是对叛徒杨达克这个人物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杨达克以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领导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在实际上，他却是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正如作者所说的，“杨达克从来也不曾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始终是个在生活上贪求名利的人。”因此，在资产阶级的威胁利诱下，他就完全暴露了原形，转向反

革命一边了。“革命把一切虚伪都揭露了”。

此外，奥勃拉赫特还通过鲁别施一家的堕落腐朽的生活，写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者以无产阶级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崇高无私的品德、对自己的阶级必然获得胜利的坚强信心，与资产阶级的颓废心理、腐朽的生活、残酷而又懦怯的丑态相对比，从而向读者揭示了无产阶级必然会获得胜利的灿烂前景。

奥勃拉赫特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写了现实，同时把这种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和对光明的社会主义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无产者安娜》这部长篇小说成为捷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中的里程碑之一。

译　者

装帧设计　陶雪华



书 号：1018S
定 价： 1.0